

济南名士篇

舜耕历山

济南南郊的千佛山,古称历山,又称舜山、舜耕山,传说大舜曾在山下耕种。

舜本是我国上古神话中的一位天神,古史学家认为他和帝喾、帝俊原是一体的。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下了十个太阳,而另一个妻子常羲生下了十二个月亮。远古时代,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东夷人的一支殷商部族,就把舜作为天帝来祭祀,而他们的始祖神契传说是帝喾(即舜)的儿子(《孟子》“商人禘舜而祖契。”禘,祭天之祭)。东夷以鸟为图腾,神话中的舜又传说是一只形状像鸡,鸣声似风,日中有两个瞳仁的吉祥鸟,名叫“重明鸟”,它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晋王嘉《拾遗记》)

西周以后,舜的神话逐渐地被历史化、世俗化了,特别是儒家兴起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把舜改造成一位贤明的上古帝王,列于黄帝、颛顼、帝喾、尧之后,并称“五帝”,又把他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而在民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有关舜的身世、性情、品德、才智、政绩的传说不断丰富起来,逐步汇聚成了一个大体完整的、富有人情味的生动故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的传记就是据此而写成的。

据《史记》记载:舜名重华,父亲瞽叟是个盲人,生母早死,继母生一子一女,子名象。瞽叟顽固,继母凶悍,弟弟象又傲狠,他们屡次要害死舜,舜都躲过了,而舜对他们却仍旧孝敬仁爱。舜

的名声传到帝尧的耳中，尧老了，正要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做妻子，并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和他交游，以便更好地考察他的德行。舜在历山种田，相传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历山的种田人也都不再争地界；舜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渔民都互相礼让居室；舜在黄河岸边制陶器，黄河岸边制造的陶器再不粗陋残破。舜所住的地方，一年聚成村落，二年成了乡镇，三年就变成都会了。尧赐给舜衣服、琴瑟、牛羊，为他修了仓廩。瞽叟他们眼红，又要害舜。他们叫舜爬到仓顶上涂泥，瞽叟却点火烧仓，舜用两个大斗笠，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飞了下来。瞽叟又叫舜淘井，舜暗中在井底壁上挖了个孔道，舜下到井底，瞽叟和象用土把井填实，舜却从暗道里逃出。瞽叟他们以为舜死了，就分舜的财产，牛羊粮仓归瞽叟夫妇，弟弟象要霸占舜的居宅、乐器和两个妻子。象正坐在舜的居室中十分得意地鼓琴，舜却回来了，象又惊慌又丧气，只得假惺惺地说：“我正在悲哀地悼念你呢！”舜十分有涵养，答道：“是啊，你是个好弟弟啊！”（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这些故事更富神话色彩，说是娥皇、女英给舜穿上鸟衣、龙裳，舜才脱了险）。后来尧让舜帮着管理国家，舜任用了高阳氏八位有德有才的人，流放了贪暴顽劣的“四凶”，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尧又派舜到无边无际的荒野里，虽然遇到急风暴雨，舜也没有迷失方向。于是，尧就把天下交给了舜，舜做了 39 年帝王，政治清明，人民富庶，教化有成，四夷宾服。晚年，舜到南方巡视，崩于苍梧，葬在九嶷山中。

关于舜耕历山的记载，最早见于《墨子·尚贤下》：“昔者，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濒，渔於雷泽，灰於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据此可知，这个传说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了，其起源是很早的。至于历山在何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东汉经学家郑玄以为是山西水济县的雷首山。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称历山。此外，河北怀来县、山东菏泽市、浙江余姚县等地皆有历山。

不过，比较而言，把济南的历山定为舜耕之地似乎更合适一些。

首先，东夷人的商族奉舜为天神，商族活动的地域大体在今山东南部、河南西部一带，其北境达于济水（即今日的黄河，见《史记·股本纪》），舜的传说发源地应在这一带。其次，济南古称历下，因历山而得名，见于《春秋》，来源最早。另外，舜耕于济南的历山，历代盛传，多见于记载。北魏史学家魏收曾任齐州太守，赋《登齐州舜山》诗一首，今存。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济水》则记载说：“（历城）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北宋著名学者曾巩，熙宁五年（1072年）任齐州知州，作《齐州二堂记》一文，文中驳斥了郑玄的历山在山西的说法，指出历代地理图记都说齐州的南山为历山，是舜耕作的地方。曾巩以为这是可信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历山虽在济南，但并非城南的千佛山。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记云：“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东家之井。”封演所说之处，即今日济南的历山顶街，那耸出的孤石，原在一居民院中的东屋里，冲门大方桌下，有一口井，水面上露出一块不足一米的小山头。1976年济南市冶金局建宿舍，将“历山”埋掉，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这也可聊备一说吧。

传说毕竟不是历史，不必过于拘泥，是不妨“姑妄言之姑听之”的。

（李永祥）

神医扁鹊

扁鹊，战国末年齐国卢（今长清县境内）人，姓秦，名越人，字扁鹊。

扁鹊年轻时作宾馆的管理员，有一位名叫长桑君的医生常来住宿，见扁鹊聪慧勤谨，便将自己的医术悉数传授给他。从此，扁鹊开始周游列国，治病救人。他到赵国邯郸，那里看重妇女，他就主要看妇科疾病；到周都洛阳，那里尊敬老人，他就主要看五官科疾病和痹症；到秦国咸阳，那里疼爱小孩，他就主要看小儿科疾病。所以，扁鹊很快名闻天下。

有一次，扁鹊来到魏国，听说太子死了，遂去宫廷门前，问一位官职为中庶子的人太子得的什么病？正巧那人亦懂得一点医道，告诉说太子因气血不能正常运行，突然昏倒而死。扁鹊又问死了多长时间，装殓了没有？中庶子答道：“死了还不到半天，尚未装殓。”扁鹊说：“请禀报你们国君，我乃齐国秦越人，能救活太子。”中庶子说：“先生该不是哄骗我吧？”扁鹊说：“您若不信，可进去试诊，太子鼻息尚存，顺着两腿摸到阴部，应该还是温热的。”中庶子闻扁鹊所言，顿时目瞪口呆，只好进去报告国君。魏君听了大惊，立即出来与扁鹊相见，说：“久仰先生大名，只是无缘相见，太子能得到您的救治，我深感幸运。”话未说完便泪如雨下。扁鹊说：“太子的病即通常说的假死症，是因阴破阳绝而导致容颜衰败、血脉紊乱、昏睡如死。良医可以将其救活，庸医则会被

假相迷惑而放弃医疗。”扁鹊叫弟子子阳为其扎针,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扁鹊让弟子子豹煮好药剂为其熨烫两肋(从腋下到腰上的部分),太子很快坐起。随后,太子又按扁鹊的药方服汤药20天,身体即康复如初。

扁鹊到齐国,齐桓公田午请他作客,扁鹊见到桓公,说:“君有病在皮肤肌肉之间,不治将深。”桓公不以为然。扁鹊走后,他对左右说:“当医生的为了图利,想医治没有病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功劳。”过了5日,扁鹊又来,说:“君病已至血脉,再不治还会加重。”桓公闻之不悦。又过5日,扁鹊再来,说:“君病已深达肠胃了。”桓公连理都不理他。又过5日,扁鹊复见,与桓公打个照面即退走。桓公感到奇怪,使人问其缘故。扁鹊说:“病在皮肤,汤药热敷可治;在血脉,针灸可治;在肠胃,药酒可治;现在桓公的病已深至骨髓,即使神仙也无可奈何了。”又过5日,桓公感觉浑身难受,急忙派人召扁鹊,这时扁鹊为躲避是非已经离开齐国。桓公很快就死了。

扁鹊于公元前307年来到秦国。秦武王脸上生疮,请扁鹊诊治。秦国太医令李醯知道自己的医术不如扁鹊,妒火中烧,向秦王进谗言说:“国君的病在耳目之间,治之不愈会耳聋眼瞎。”秦王犹豫不决,并把这话告诉了扁鹊。扁鹊非常生气:“国君如此没有主见,照这样执政,非亡国不可!”秦王听后不悦,李醯见有机可乘,遂指使刺客把扁鹊杀害了。

扁鹊是我国载入正史的第一位大医学家,是中医科学的奠基人。中医沿用至今的四大基本诊断疾病的方法“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就是扁鹊系统提出来的。特别是切脉以知病更是扁鹊的一项伟大发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言:“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扁鹊之前中医用于针刺疗法的针为石制(亦有陶制),称为砭石。随着铁的发现,冶炼技术的提高,各种工具发生了变革,扁

鹊用铁针代替了砭石，医疗效果大为提高。原来的砭石不仅用于刺疗，也用于灼疗，就是将砭烧热，灼烤一定的穴位。扁鹊则以艾为灸，并把灸疗发展成一种与针疗平行的医术。

扁鹊不仅是高明的临床医生，而且是我国第一位著书立说的医学理论家。据《汉书·艺文志》载，其著有《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这些书于汉成帝年间（公元前32~前8年）尚在皇家秘府中保存着，后来散失了。我国医学古籍中有一本《难经》，唐代人认为该书乃扁鹊所撰，清代有人考证该书或许即是《扁鹊内外经》的另一种版本，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不能肯定扁鹊就是《难经》的作者，书中阐述的中医理论发端于扁鹊则毫无疑义。

《难经》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它对扁鹊所首创的脉学有详尽的论述。宋代苏轼说：“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楞伽经跋》）

《难经》中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上面讲的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即是望而知之的例子。而对魏太子的病，扁鹊听别人转述病情便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扁鹊真正堪称神医。

后来的古籍中记载扁鹊事迹时，往往根据民间传说而把其神化。如《史记》说长桑君给扁鹊一种药，饮后目光能穿透墙壁，给人看病尽见五脏六腑。这不过是把扁鹊的望诊技术夸大到荒诞的地步。

然而扁鹊本人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曾提出“六不治”的原则，即骄横不讲理，病治不好；舍命不舍财，病治不好；起居饮食无规律，病治不好；病深不早求医，病治不好；身体虚弱不服药，病治不好；信巫不信医，病治不好。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和人体的奥秘知之甚少，加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愚弄人民，因此求天拜神的巫术盛行，医术不过是巫术的附庸。而扁鹊则以自

己高超的医术与虚妄的巫术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如他要求为魏太子治病时，那位中庶子曾说，上古时的俞跗治病不用汤药、砭石、按摩，自能割开皮肉，疏通脉络，洗涤肠胃五脏，以聚敛精气，改变形体，假若扁鹊的医术像他那样，太子才可以死而复生。中庶子所说的俞跗实际上就是个巫医。扁鹊对此答道：“你讲的治疗方法，好比以管窥天，并没有认识和掌握真正的医术。”当扁鹊治好太子的病，人们称赞他能起死回生时，扁鹊断然否认，说：“我不能使死人复活，太子本没有死，我不过是使他恢复健康罢了。”这番话不是谦虚，而是表明扁鹊坚定地与假托神灵来论人生死的巫术划清界限。

扁鹊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高明的医理医术为中华医学开拓了一条正确而广阔的发展道路。

（周长风）

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

先秦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两大高潮，其一是春秋时代孔子在鲁国的讲学，有号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的大弟子，其门徒又号称有“三千”之多，孔子创立了中华最大最悠久的学派——儒家；其二是战国时代齐国成立了稷下学宫，导致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济南地区正处于儒学中心的鲁国曲阜和稷下学宫所在的齐

国临淄之间，必然深受齐风鲁雨的影响。济南的东北部为古代的邹邑（也写做邠、鄆），相当于今章丘、邹平一带。稷下学宫先后有三位姓邹的著名学者，即邹忌、邹衍和邹奭。邹衍的墓地，据宋代乐广的《太平寰宇记》：“葬齐州章丘县东十里。”1992年版的《章丘县志·文物名胜》说：“邹衍墓在明水东北十公里长白山西麓，相公庄镇郝庄西北角。旧《县志》载，‘邹衍墓在县（旧章丘城）东十里’。原有高冢石碑。1975年搞农田建设，冢已变形，有一高阜，石碑无存。”此墓地在古邹邑，文献记载于千年之前，邹衍是今济南市章丘出生者，当无疑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邹衍之后提到邹奭（也写为“赫”），说：“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其注引刘向的《别录》云：“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可见邹奭是邹衍的学术继承人，盖也是他的亲属或同乡。比邹衍的行辈早一些的邹忌，又其后的传授《春秋》的邹氏，均可能是今章丘东北部邹邑的学者。那么，战国时的章丘实为一学人辈出之地。

稷下学宫，是战国初期，田氏贵族篡夺了姜姓齐国君位后所立的学宫，据说是桓公田午时就已存在了，其时为公元前370年左右。到了齐威王（前357年即位）时，任邹忌为相，稷下学宫开始兴旺，淳于髡等人已来此讲学。孟子和荀子也先后一度在稷下学宫游学。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即位后，稷下学宫达到全盛时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时期如孟子、荀子这些学术大师又相继返回，荀子在其晚年曾三次任学宫祭酒（首席学士）。这座学宫是因为建立在齐国稷门（西门）附近而人称为稷下学宫的，其学者们称为稷下学士。邹衍的年龄晚于孟子，大约与荀子同一时期在此讲学。这些学士们享受优厚的俸禄，住在特辟的高级住宅区，在学术上各持己见，交流辩论和

传授后学。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和纵横家等等各有其代表人物在这里活动。邹衍则是阴阳五行家的最有影响的大师。

邹衍大约生于公元前355年，死于公元前265年，活了90岁左右（据刘蔚华《稷下学史》）《盐铁论·论儒》说：“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看来，邹衍是从儒学出身的，而其五行学说也是由儒家的观点变化而来的。

五行，原指金、木、水、火、土五类物质。最初见于儒经《尚书·洪范》。古人以为万物都是由这五大要素构成的，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子思、孟子则视之为气，进而引申到五种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上来，从而证明政治教化的施行是一种文质交替相救的过程。邹衍则进一步把这源于五种基本物质的五种德行的始终（变迁）过程，认为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五德的运行是有一定顺序的，故谓之“五行”。五行的运行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顺序有两种，一种是相生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另一种是相胜的：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邹衍以为一个君王每年的施政必须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按季按月都执行相应的政策。又以为每个王朝不是万世一系的，经若干年（例如孟子以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要改朝换代，新朝代替旧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按五行相胜的客观规律。

邹衍关于五行的著作有《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共105篇之多。文献中所提到的《大圣》、《主运》、《大历》等可能是这两种书中的篇名。钱穆以为前书盖是论相生说，而后者则是论相胜说的。（两书均已佚失）

邹衍的学说涵盖很广，五行是讲时间（历史）的，而其“大九州”说，则是讲空间（地理）的。西周以前并没有九州的概念，只有四夷之分。约当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典籍《尚书·禹贡》才有了九

州的划分，显然这是儒家为大一统的中国所设计之规划图。邹衍是吸取了思孟学派的儒家观点的，随着战国后期人们视野的扩大，以及他久居齐燕滨海地区而产生的丰富的想像，他据儒家九州说而予以类推。他以为《禹贡》的九州，合而为一统称为“齐州”（齐即脐，中央。当然也隐隐表现了齐国人士的对此名词的感情），或曰“赤县神州”。此“齐州”包括《禹贡》的“小”九州，而为一大州，其四周有稗海环绕之。天下如“齐州”者共有9个，每州皆领有其小九州，而皆被稗海所环绕。这9个大州又通通被更大的大瀛海环绕之。《史记》说邹衍是以小测大，以近推远而得出这个“大九州”说的，虽然缺少实证的根据，但是却与后来发现的全球七大洲（亚、欧、非、大洋洲、南极与南、北美）相近似，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猜想。

邹衍善于推理，思辨能力很强。名家大师公孙龙持“坚白”之辩风靡当世。邹衍晚年奉齐国使命到赵国，赵相平原君为之引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讨论“白马非马”的命题。邹衍提出：“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指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的转移命题的诡辩的方式。赢得了平原君宾客的称赞（《史记·平原君列传》之《集解》引刘向《别录》）

邹衍是多才多艺的，他制作有《邹子乐》，其中有四章（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在汉代尚保留于《郊祀歌》中而演唱。他又善于养生之学，著有《重道延命方》，曾为汉代淮南王所宝藏，此书在晋代犹存，名为《邹生延命经》。他虽早年受儒家影响，但作为滨海地区的学者，也受了燕齐方士巫术的影响。他既然要顺应天时来从政，利用五行相胜以行道，提倡“天人感应”学说就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后世流传他一些传奇逸闻。如传说邹衍在燕国，昭王死后，燕惠王信谗言诬陷，将他监禁，他仰天而哭。其时正是盛夏季节，但天却从而感应为之降霜。这显然是从五行论中的夏行秋

政“则水或霜”的说法而演绎出来的。又有传说，燕国有大谷地，土壤肥沃而寒冷，因此不生禾稼。邹衍在此居之，吹律管，用音乐而得温气生发，从而使作物生长，此地遂名为“黍谷”。看来，他讲究延命长寿，又有“发功”改变气候的传说，确实与燕、齐的地方迷信职业者——方士有相当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后世的医卜星相的书籍，都借用阴阳五行的术语和系统来支持自己理论的缘故。

邹衍生长于齐国，活动于魏国、赵国等地，是稷下著名学者，又是燕国受到尊重的政治谋士。他著述甚多，门徒不少，从而影响广大和深远。他的著作文本虽未传留，但其观点、术语却继续在现今的一些学科和行业中使用。儒家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化高的文士阶层中持续存在，而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则在文化低的武人和民间继续流传。

汉代以后，济南伏生著有《尚书大传》，薛地的号称“稷嗣君”的叔孙通，淄川的公孙弘，广川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这些燕齐出身的儒家，都致力于把五行和儒术相嫁接的新儒家的建构，从而使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可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上层以儒家为主，下层则以阴阳五行家为主。足见邹衍在中华文化演化中的重要性。

（徐北文）

请缨报国的终军

终军，字子云，济南终宫（今作仲宫）镇人，西汉时期青年外交家，一位请缨报国的少年英雄，所以人又称之为终童。如今，这位少年英雄的高大石像已巍然屹立于仲宫镇的街心，寄托着家乡人民对他的景仰。

史载，终军自幼聪慧好学，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神童。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擅写文章，在郡中颇有名气。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年仅18岁的终军，便被选为博士弟子，并由地方官举荐到长安受业，以备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终军怀着将逞大志的欣喜心情踏上征程，奔赴长安。行至函谷关口，当时，各地官府送往京城的人才，守关人都要给他们一个帛书的符信——“繻”作为出入关口的凭证，回来时也要凭此帛符交验出关。不料终军听后仰天大笑，声言“大丈夫志在四方，此次入关，不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来，要此何用？”说着便将帛符掷地，大步跨关而去，守关人瞠目结舌，暗自称奇。果然，终军到长安后，以其出众的才华，深得汉武帝的赏识。武帝任命他为谒者给事中，成为谋议朝政的皇帝近臣。两年后，终军以朝廷重臣奉命出巡郡国。此次过函谷关，已是今非昔比，他身佩宝剑，手持旌节，端坐在高头大马之上，踌躇满志，在随员的前呼后拥之中出关东去，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帛符交验。当年的守关人认出眼前的这一位大员正是过关时“弃繻”的那位年轻书生，莫不惊叹：

“果然有志气，有出息！”

终军的辩才充分表现在他对博士徐偃的批驳上。博士徐偃在外地巡视时，不顾朝廷盐铁官营的政策，公然假借君主名义鼓动一些地方私自治铁、煮盐。御史大夫张汤对他弹劾，要求朝廷治罪。徐偃引《春秋》为据，说大夫到诸侯国对利国利民的事情，可以不请示而做出决定。这样的抗辩，竟使张汤无言以对，连汉武帝一时也没了主意。于是从外地召回终军，欲倚其才智驳倒徐偃。终军抓住了《春秋》与当今时势的不同，处理诸侯国的事情不同于今日中央与地方的事情，指出徐偃是日无国法，独断专行；而假借君命，尤为不可。私自煮盐、冶铁，损害国家利益，以此沽名钓誉，其罪当死。徐偃被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得认罪伏法。

终军的才略尤其表现在外交斗争中。汉代，北方的匈奴一直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汉武帝时经过长期的讨伐战争，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要根绝外患，必派人说服匈奴归降。面对这样艰险的外交使命，终军不避个人安危，主动请缨，甘愿冒死前往匈奴，说服匈奴单于归附汉朝，化干戈为玉帛。汉武帝对终军劝说匈奴的策略十分满意，于是提升终军为谏大夫，派终军出使匈奴。在保卫国家北方不受异族侵扰方面终军是有贡献的。

之后，终军又主动请求出使南越。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对国家的安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终军面奏武帝，主动担当说服南越归顺的艰巨任务，要求武帝授予“长缨”，一定要治服南越王。终军至南越，以其出色的辩才，陈说利害，终于说服了南越王赵兴答应归汉。终军奉命留居南越镇抚，以巩固得来不易的外交斗争成果。然而忽逢不测，怀有二心的南越相吕嘉却起兵叛乱，南越王与时在南越的终军同时被杀害。时为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终军年仅二十几岁。就这样，这位赤心为国的青年外交家的鲜血洒在了异邦土地上。

据说，终军后来归葬家乡济南。他的著述史载有8篇，名为

《终军》,其后散佚,清人马国翰辑得4篇,流传于今。

终军早歿,却留下了为国请纒的千古英名,并成为后世反击异族侵略的楷模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李白有诗云:“请纒不系越,且向燕然山。”辛弃疾、杨深秀等也为此写下了不少咏赞诗词。

(董正春)

曹操、曹植与济南

一代英豪曹操,虽是沛国谯县(今安徽地)人,后来又居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却与山东,特别是与济南有缘分,因为他本人曾任济南国相,而且他的儿子曹植也曾封为东阿王(东阿古城在今济南市平阴县),他的孙子——任城王曹彰的儿子曹楷于正始七年(246年)以后以迄魏亡(265年)封为济南王。祖孙三代都曾为济南的统治者。

济南在汉代多次划为封国,东汉时所辖县为东平陵、於陵、邹平、历城等10县,一度扩大领有原平原郡(今德州市一带)祝阿等6县,共16县。东汉时封皇帝子孙为国王,有的仍住京师,有的则派驻封国之内,虽享有俸禄和政治上的一些特权,但行政权是由朝廷委派的国相来执行的。国相的职务相当于一郡的太守。汉末黄巾军起义,曹操随从皇甫嵩、朱雋在东颖川一带征讨黄巾有功,于中平元年(184年)被任为济南相,时年31岁,正在盛年。据《三国志·武帝纪》载:济南当地的官吏都奉承和依靠皇亲国戚,

脏污狼藉，他呈请朝廷撤免了所属县中的 8 个县令。赃官们所包庇的奸宄分子也纷纷逃窜，不敢在济南地区居留，从而“郡界肃然”，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秩序。

济南在汉代是工商发达地区，朝廷特别在此设立工官（纺织品管理机构）、铁官（金属器物管理机构），这是一般郡国少有的。正因为如此，富商大贾也比较多。商人需要集市以及公共文化活动来进行贸易，因此，热衷于齐地的传统宗教活动。当时的济南民众最信奉城阳景王的神祀。城阳景王是西汉皇族刘章的谥号，他被封在城阳国（今山东莒县）为王。当吕后于刘邦死后要把权柄交与吕氏家族时，刘章和朝廷大臣周勃、陈平共同消灭了吕氏，恢复了刘氏的汉朝皇室地位。齐地人民都熟悉刘章的“复汉安刘”的功勋，并引以为豪。西汉末期王莽专政，他的繁琐的条令以及朝令夕改的施政作风，失去了民心，他一旦篡汉为帝，激起了全国官民的反对。山东起义农民军利用“人心思汉”的舆情，赤眉军就特请齐巫经常举行击鼓舞蹶的跳神活动，以城阳景王降附于巫身而发表意见的方式，来维系人心，加强号令的实施。例如当赤眉军远离齐地进军至河南时，军士们都想念家乡，不愿前进，赤眉领袖就请齐巫跳神，以城阳景王附体的方式，说“景王大怒了，王爷要大家西征京师，夺帝位”。遂使士气大振，顺利进军。当刘氏果然建立了东汉王朝以后，城阳景王的威信越来越高了。据东汉末年曾任泰山太守的应劭所著《风俗通义》载，当时自琅琊、青州 6 郡及渤海各地，凡国都、郡县城市以及乡亭村落都建立了城阳景王庙。每当庙会之日，用二千石官员的服饰仪仗来迎送，当地的商人轮流出资办理。商人迎神时扮演众官员，身穿各级官服，聘请倡优演出，并击鼓宰牛羊祭神讴歌。齐地各郡尤以济南为最盛，全境的城阳王庙就有 600 余所之多。奉祀景王的活动，到了东汉已由政治作用转化为经济作用。商人们出钱筹办庙会，可以促进消费，增加生产，并扩大交易而创收。当地群众可以

在此出售家庭副业产品，并满足文化娱乐的精神生活需要。

曹操在济南任国相时，正值黄巾军起之日，大概害怕农民会因庙会活动而聚众闹事，而且又只看到庙会的奢侈浪费的现象，忽视了促进生产的实质，下令强行毁坏祠庙，禁绝官吏人民祭祀。这一“禁绝淫祀”的政策，始终如一，后来当他做了丞相专政之时又推行到所统辖的各郡国去。然而曹操没有理解到东汉末激进的农民已经与西汉末的“人心思汉”的心态不同，这时是人心厌汉。所以黄巾军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城阳景王是“扶汉安刘”的象征，虽然这时对他的祭祀是以发展商贸和进行娱乐为主，但仍给造反群众以心理上的压力，所以黄巾军也讨厌城阳王的祭祀。这一点，曹操疏忽了，不自觉地做了黄巾军所希望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早已离开济南，黄巾军的势力大振并号称百万之军攻入兖州，占领任城、东平等地。曹操以“领兖州牧”的官衔领军镇压。这时黄巾军向曹操下战书，信中说：“（你）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我们主张的）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即黄巾军的太平道）。今更迷惑。汉行（气数）已尽，黄家当立。天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史载：曹操见信后“呵骂之”，这真是曹操在毁景王庙时所始料不及的，使他十分尴尬。

曹操的儿子曹植，号称“才高八斗”，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于曹操领军在兖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元192年出生于今济南市西南方的鄆城县。直到5岁时才随家迁至许（今河南许昌）。他后来封为平原侯、临淄侯，虽然封国都在齐地，但并未亲到该地。直到曹丕即位的黄初元年（220年）被封为鄆城王，才返到鲁西出生地。4年后又徙封于雍丘，至太和三年（229年）则徙封为东阿王。原来的东阿地跨大清河（今为黄河所夺占）的东西两岸。其黄河以东的东阿领地及治所，今已划入济南市之平阴县（即东阿镇），则曹植当年封土的一半是在今济南的辖区。这就是说，继曹操当

过济南相的 40 余年之后，曹植也来到此地，并在济南地区度过了他的晚年生活。他在这里生活了 3 年光景，至太和六年（232 年），他又接到徙封陈王的命令，但当年他就死去，因此，他并未葬于陈，而是埋葬于东阿之鱼山之上。鱼山距今黄河 1.5 公里，因在黄河之西，现仍属东阿县。其墓至今尚存。

曹植在东阿写下了一些诗文，他的诗篇如《薤露行》、《泰山梁甫吟》等，明显取调于泰山附近的齐鲁民歌。他的《驱车篇》曾写道：“驱车掸弩马，东到奉高城（今泰安市），当是在东阿时所作；另外还写下了一些散文作品。同时，他曾考察了东阿国内历代官员遗留的颂德碑铭 30 余通，认为都是些阿谀吹捧的文字，命令皆毁除之，只有关于会稽虞歆的一篇，他认为不是溢美之词，予以保留。特别是他曾在东阿研究古印度的梵文的音读，对我国文艺史起了重要作用。据文献，佛教在东汉时已传入我国。汉章帝封楚王刘英就曾祭祀过浮屠神（佛陀）。刘英的封地在徐州，与鲁南邻接，东阿一带当有西域僧徒来传播佛教。曹植以其诗人的敏感，听到了不同于汉语的另一语系的语言，以及咒语、梵呗等转经的音调，通过两种语言的比较，更容易理解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曹植的这次接触，有助促使汉语诗歌格律的发展。曹植对于外来文化是持积极学习态度的。据载：曹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这是说曹植曾为佛经呗赞谱曲。他之所以谱曲，据说是受了印度神灵的启示：“（他）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为婆罗门教的三大神之一，亦称大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曹植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于后世。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章）。”（以上据唐人道世编纂《法苑珠林》第四十九卷）说曹植是在鱼山上听到了印度神灵传授的曲调，显然是托词以夸大其神秘性，这是僧侣们的惯技，可以不必争辩。我们认为当是曹植从西域传法的僧侣那

里听到梵呗，并从而介绍过来的，这并不排除他在引进时予以加工改造的可能。这就是著名的《鱼山梵》的来历，是我国文艺史上借鉴外国文化的开始。到了北魏以后，学者不仅了解了梵语、西域语，还熟悉了鲜卑语，在多种语言的参照下，使音韵学充分发展，应用到诗歌创作上，导致了梁朝沈约的“四声八病说”，为唐代律诗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文献不足，曹植在济南地区的文学活动以及与当地人交游和影响，我们不能详知。更遗憾的是，他的侄子——任济南王的曹楷，虽居济南 20 多年，其详情也没有文献可考了。

曹操与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辉煌的建安文学倡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的籍贯，多是在济南周围，如曲阜的孔融，山阳高平（今邹县西北金乡一带）的王粲，北海（今寿光一带）的徐干，东平的刘桢等。“七子”之外的文人更有平原的祢衡，济阳（今济南辖县）的吴质，稍晚一些的又有临淄的左思和女诗人左芬等，足见曹氏父子在济南的影响，使之成为魏晋之际文学鼎盛之乡。

（徐北文）

唐代开国名相房玄龄

济南市历城区东南有山名赵山，赵山北麓，旧有古墓群，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开国名相房玄龄的父亲房彦廉之墓。

房玄龄（579~648 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新、旧《唐

书》载其为临淄人，唐代济南称齐州，玄宗天宝年间曾一度改齐州为临淄郡，房氏一族墓茔在济南赵山，故此处临淄当指济南。玄龄少年聪敏，博览经史，善属文，18岁举进士，仕隋为羽骑尉，补隰城尉，后因罪流放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李渊起兵反隋，其次子李世民率兵出征渭北，玄龄驱马驰奔军门求见，世民与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记室参军。他追随世民南征北战，军中重要文书事务都由他负责，每攻占一地，别人都忙着搜罗珍宝，他却专注于物色罗致人才。他和众将密切交往，推心置腹，团结众将为李世民效忠尽力，被世民视为心腹。世民时为秦王，因功大，为太子李建成所嫉。太子为削弱世民势力，不断向高祖李渊进谗言，将玄龄和杜如晦斥逐。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欲害世民，世民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入府，玄龄等人协助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建成、元吉。不久，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论功以房玄龄等5人为第一，封玄龄为邢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授为中书令。后擢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太子少傅，进位司空，仍总朝政。改太子太傅，主持门下省事。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卒，享年71岁，追赠太尉，陪葬昭陵。

房玄龄任宰相之职，长达21年，他公忠练达，夙兴夜寐，立法施政，务为宽平。他重视人才，不以自己的长处苛求别人，用人从不求全责备，即便出身卑微者，他也能量才任用。同时，又立身谨慎，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每有过失，他必定向皇帝叩首请罪，惶恐惭愧，仿佛无地自容。不过，一旦事关国计民生，他则甘冒风险，直言敢谏。唐太宗远征高丽（在今朝鲜半岛），久而无功，劳民伤财，大臣谏劝者皆获谴，无人敢言。他当时重病卧床，以为如不直谏，死而有愧，于是勉力上疏。唐太宗读后，十分感动，对高阳公主（玄龄子媳）说：“病已垂危了，还在忧念国事阿！”不久，太宗即罢征高丽之兵。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倚重，把他比之为西汉开国名相

萧何。有一次，太宗外出到翠微宫避暑，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适逢有人从京师来，太宗询问玄龄有何意见，来说玄龄只讲了一句“李纬长了一部好胡须”，再没说什么。太宗听罢，赶紧把李纬改任为太子詹事。太宗亲征高丽，命玄龄留守京师，主持粮草车马等后勤之事，有人在京城诬告玄龄谋反，玄龄立即派驿卒将告状之人送到太宗驻地，太宗看了奏状之后，当即下令斩了诬告之人，又亲下诏责备房玄龄说：“你怎么这样不自信！”玄龄晚年体衰，多次恳辞宰相职务，太宗不允，下诏说：“国家依赖你很久了，一旦失去良相，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啊！”太宗特命他乘肩舆入朝。玄龄卧病，太宗派宫中御医天天诊候，让宫中御厨日日供食，每天都要人向他汇报玄龄的起居，听到病情稍有好转，便喜形于色。玄龄病危，太宗命人凿破宫墙，以便能随时去探望。临终之际，太宗亲握其手，与之诀别。

房玄龄虽然位高势尊，但他的家教很严，他把古今治家的格言戒律写到屏风上，让子女诵读默记，并经常教导他们说：“你们如果能记住这些格言，就能保身成名。”可惜的是，他死后，次子房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骄纵不法，唐高宗时，终于以谋反罪被诛，房玄龄也受连累被取消了配享太宗庙的荣誉。他一世英名，身后竟被不肖子女玷污了，这也是历史留给世人一个教训吧！

房玄龄的父亲房彦康，北齐时为齐州主簿，年仅18岁，后仕隋历任监察御史、郡州司马、长葛令、司隶刺史、涇阳令等职，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卒于任所。贞观五年（631年），时房玄龄为中书令，扶柩归葬济南，葬礼十分隆重，追赠为徐州都督、临淄县公。碑文由李百药撰写，欧阳询书石。李百药是初唐著名学者和诗人，二十四史的《北齐书》即由他主编的，时任中书舍人之职。欧阳询是著名书法家，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贞观时曾任太子率更令之职，故世称其书法为“率更体”。此碑为隶书，后世赞其“极跳拔险峻之妙”，充分体现了“欧体”的风

格，其价值不在欧阳询传世名碑《九成宫醴泉铭》之下。

（李永祥）

唐代开国名将秦琼、程知节、罗士信

隋末，济南一带是农民起义的发源地，战争的环境造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武将，其中尤以秦琼、程知节、罗士信最为著名，他们后来都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

秦琼（？~638年），字叔宝，齐州历城（今济南市）人，相传其祖居在终官镇（一说在西沙王庄），世代以冶铁为业，有“冶铁秦家”之称。但据近年出土其父秦爱墓志铭证明：居历城怀智里（即经六路小纬六路一带）。父祖三代为官。隋炀帝大业年间，他在隋左卫大将军来护儿帐下效力，深得来护儿赏识。后入齐郡通守张须陁部下为将，有功，封建节尉。张须陁率隋兵进讨以李密为领袖的瓦岗寨义军，在荥阳兵败战死，秦琼随隋将裴仁基投降义军。李密得之大喜，授为帐内骠骑将军。大业十四年（618年），李密被洛阳王世充击败，瓦岗军溃散，秦琼、程知节、罗士信等为王世充所获，王世充授秦琼为龙骧大将军。秦琼等人以为王世充器度狭小，性情狡诈，不是拨乱反正之主。适逢王世充率兵抗击李渊的唐军，至九曲，秦琼与程知节、罗士信等数十骑驱马西驰百余步，下马朝王世充行礼，说道：“我等虽蒙你礼遇厚待，但不能为你效力，请从此告别！”说罢，上马而去，世充不敢追赶。秦琼

等人遂降唐。李渊命他们归属秦王李世民部下，李世民素闻秦琼骁勇，厚加礼遇，任命他为马军总管。秦琼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每为前锋。临阵之时，敌军常常以骁将猛卒，纵横驰骋，炫耀兵力，李世民一看到便十分生气，即命秦琼出阵攻取。秦琼应命，跃马挺枪，闯入千军万马之中，刺杀敌将，勇不可当。李世民为此而愈发器重他。秦琼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秦王右三统军，后授上柱国，进封翼国公。武德九年（627年）六月四日，他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久，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拜他为左武卫大将军，食邑实封七万户。秦琼晚年多病，常对人说：“我自年轻就戎马征伐，大小经历了二百多场战斗，多次受重伤，前后约计流的血也有几十斗，怎能不生病呢？”贞观十二年（638年）去世，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命在其墓地立石人石马，以表彰他的战功，次年又改封他为胡国公。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隋唐志传》、《说唐》等通俗小说广泛流传，山东好汉秦琼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他的“为朋友两肋插刀”“贾家楼结拜”“瓦岗寨聚义”等故事脍炙人口，济南人更是开口必称秦叔宝。相传是秦琼拴马的古槐在济南就有好几处，千佛山旧有秦琼庙，而五龙潭也据说是秦琼府旧址。

程知节（？~665年），原名程咬金，济州东阿（今济南平阴县东阿镇）人，少年骁勇，善用丈八长矛。隋末乱起，他召集了数百人，共保乡里。后参加瓦岗寨义军，李密任命他为内军骠骑，当时李密从军中挑选勇士八千人，分属四骠骑，称为内军，自诩说：“这八千人可抵百万兵。”隋大业十四年（618年），瓦岗军进攻洛阳隋将王世充，王世充出城决战。当时，程知节率内马军，与李密同营，驻扎北邙山；单雄信领外军马营驻偃师，王世充进袭单雄信，李密命程知节、裴行俨出兵助战。裴行俨一马当先，冲向敌阵，被流矢所中，掉下马来。程知节飞马来救连杀数人，敌军退避，知节抱起行俨，勒马回奔，敌将追了上来，挺槊就刺，把程知节的战袍

穿了个大洞,知节回身抓住槊柄,一使劲,把槊柄折断了,又斩杀了追赶的敌将,二人安全回到自己的部队。后来,李密战败,他与秦琼被王世充俘获,王世充待之甚厚。程知节私下里对秦琼说:“世充器度狭窄,多妄语,又好符咒之事,像巫师神婆一样,哪里是拨乱反正之主啊。”于是,他们离开王世充,投奔李渊的唐军。知节被授为秦王(李世民)左三统军,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伏王世充,冲锋陷阵,多立战功,封为宿国公。太子建成非常嫉恨他,向高祖李渊进谗言,把他贬为康州刺史。他对秦王李世民说:“大王的臂膀都被砍掉了,自身也必定不能久全,我如今冒死抗旨,不离京城,大王你要赶快设法保护自己!”于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建成,自己做了太子,任知节为太子右卫率。不久,世民即位,拜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历泸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改封卢国公。高宗时仕至葱山道行军大总管。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去世,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在《说唐》等通俗小说中,程知节被塑造成一个出身贫寒,粗豪勇猛而又机智诙谐的农民英雄的形象。“程咬金卖耙子”“劫皇杠”“梦中学艺”“瓦岗山做混世魔王”等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程咬金的三斧头”也成了嘲谑那些开始勇猛,但道业不深、难以为继的人们的俗语常谈。

罗士信,齐州历城(今济南市)人。少年即英勇过人。隋炀帝大业年间,齐郡通守张须陁率兵征讨王薄领导的起义军时罗年仅14岁,要求上阵。张须陁认为他年幼体弱,穿不起盔甲,他听了很生气,便穿了两重盔甲,戴了两副箭囊,跃马冲入敌阵,连杀数人,斩下其中一人首级,扔在空中,用枪头刺住,举着人头,在阵中纵横驰骋。张须陁十分叹赏。此后,每次战斗,张须陁身先士卒,他都紧随其旁,成了须陁得力副将。隋炀帝十分赞赏,特地命画工画了《须陁、士信战阵图》,交内史收藏。张须陁战死后,他随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归了李密瓦岗军。李密与王世充大战,他

在阵前跃马突进，身中数箭，被王世充俘获，世充久闻其骁勇，对他非常器重，和他同食同寝。后来，李密部下邴元真等投降，王世充都拜为将军，士信不屑与他们为伍，便与秦琼等弃王世充而投唐。唐高祖李渊任命他为陕州道行军总管，专门对付王世充。唐军兵临洛阳，他率兵把王世充围困在千金堡中，世充派人在城上大骂他忘恩负义，他十分恼怒，便夜间派亲兵百余人，用车拉了几十个婴儿，来到千金堡城下，扬言是从洛阳逃出的百姓，来投奔罗总管，他们把婴儿弄得大声啼哭，接着，又装着吃惊，大喊：“这是千金堡啊，咱们跑错了地方！”急急忙忙地往回跑去。王世充以为真是洛阳逃出的难民，立即打开城门派兵去追，士信早已伏兵在路，趁机奋力攻进千金堡，把王世充的兵将全部歼灭。平定王世充后，他被升任绛州总管，封鄜国公。此后不久，他随李世民征讨河北汉东王刘黑闥，适逢有人以洛水城（今河北永年县）来降，他入城据守，刘黑闥围攻甚急，又碰上连日雨雪，李世民大军没法赶去救援，数日后城破被俘。刘黑闥素闻其骁勇，劝他降顺，他坚决不屈，被杀，死时年仅20岁。李世民闻讯后，非常哀痛惋惜，用重金买回他的尸体，隆重安葬，赐谥号曰“勇”。

《说唐》等通俗小说塑造的那位武艺非凡、生性高傲，淤泥河乱箭穿身而亡的白袍小将罗成，就是以罗士信为原型的。罗士信的故居，相传在今济南县东巷，宅中有泉，士信从军后，家中惟有一孀独居，抗暴而死，后人悼之，遂称此泉为“罗姑泉”。

（李永祥）

唐代济南诗人员半千、崔融

员半千，字荣期，齐州全节人。唐初设平陵县（治所即今济南章丘平陵城），贞观十七年（643年）齐王祐反，平陵人不从，事平后，朝廷下诏改平陵县为全节县，以资表彰。半千本名余庆，父早亡，由伯父抚养，童年就能读通书史。客居晋州（今山西太原），应童子试，成绩优异，殿试对诏，已经能讲解《易经》、《老子》，宰相房玄龄对他特别赏识。成人后，与乡人何彦先同师王义方。王义方曾为侍御史，学识渊博，忠正耿直。因当廷怒斥奸相李义府，为李义府所陷，贬官莱州司户参军，后客居昌乐（今河南南乐县），聚徒教学。他见员半千才学超群，非常爱重，说：“古人说五百年才出一个贤才，你将来可以当之无愧。”于是，为其改名为半千。员半千应举考试中第，但因家世清寒，与朝廷官员没有任何关系，长期没被授任官职。后调为武陟（今属河南）尉，适逢大旱成灾，他劝县令殷子良开仓赈济灾民，县令不答应。适县令到怀州拜见刺史，半千乘机把仓中的存粮全部发放给灾民。怀州刺史郭齐宗闻知，又惊又怒，把半千捉人大狱，要治以重罪。当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任河北道存抚使，按察怀州，得知此事，对刺史郭齐宗说：“你作为刺史而不能抚恤百姓，使惠政出自一个小小县尉，还能治他的罪吗？”便释放了他。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应岳牧举，中第，任华原、武功尉，调右卫胄曹参军，出使吐蕃，临行，武后召见，说：“我早就听到你的名声，原以为是位古人，却在朝任职，境

外出使之事，何用你去，你应留在朝中待命。”随召命入阁供奉，升司宾寺主簿，不久，任弘文馆直学士、待制显福门下。又提升他为止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控鹤府是武后圣历二年（699年）设置的宫中近侍宿卫机构，以武后的男宠张易之为监（长官），半千不屑与之伍，上奏武后说：“控鹤府古来没有这种机构，况且入选的人都是浮荡无行的少年，不是朝廷按德操选拔的，恳请予以罢除。”由此得罪了武后，调为水部郎中，又外任棣州刺史，回朝，仍任弘文馆学士。武三思掌权，对他十分嫉恨，把他排挤出京城，先后担任濠州、蕲州刺史。睿宗即位初年（710年），入朝为太子右谕德，累封平原郡公。晚年自请致仕，定居尧山、沮水之间。卒年94岁。

员半千一生节操清白，至老不衰，文笔优长，曾撰《明堂新礼》三卷，封禅碑文12篇，武后十分赞赏，可惜其文集多半遗失。

《全唐诗》卷九十四仅存其诗3首。其《陇头水》一诗，是一首边塞题材的诗；《陇右途中遭非语》一首则抒写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节操。

崔融，字安成，齐州全节（今济南市）人。应举中第，仕为宫门丞，崇文馆直学士。时李显（即唐中宗）为太子，选为太子侍读兼属文，主持东宫典章表疏之事。武则天叹赏其文，提升他为著作郎兼右史内供奉。长安二年（702年）任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知制诰，升司礼少卿。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多招揽文士，崔融、李峤、苏味道等人依附之。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迎中宗复位，张易之兄弟被杀，崔融以婚事张易之罪贬袁州刺史。不久，召还为国子监司业，参预修撰《则天实录》，书成，封清河县子。

崔融文笔典雅华丽，当时文士无人可以相比。朝廷凡有重要文章，武后、中宗便亲笔下诏委任他来撰写。他所写的《洛出宝图颂》尤为精工，后受命撰《武后哀册文》，哀婉华美，竟因此竭尽心

力而死，卒年54岁。他与苏味道、李峤、杜审言齐名，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是盛唐伟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一直受到崔融的关怀和奖引，审言铭感于心，崔融葬时，审言以子弟身份为他服孝。

崔融还是初唐一位著名诗人，《全唐诗》卷六十八收其诗一卷(20首)，其中多为边塞军旅题材之作，诗风古朴苍劲。

(李永祥)

济南的“唐三藏”义净

济南的灵岩寺有棵老柏树，号称“摩顶松”(济南方言“柏”与“悲”同音，人们为避这个音，乡老们故把“柏树”唤作“松树”)说是唐三藏——玄奘曾居此寺，赴西天取经前指此树向徒弟们道：“这个树的树枝若回向东指，就是我返回之日。”寺外又有所谓“晒经石”，说是玄奘取经回时晾晒经卷之处。但是玄奘取经是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西行，他是河南人，一生从未到过山东。这些说法显然是人们读了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剽窃其中虚构的情节而拉到长清来的。

玄奘去印度取经，通过《西游记》的引人入胜的虚构故事而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当年灵岩寺的宣传家们只看见人家赐号“大唐三藏法师”，好不眼热，于是就硬接玄奘到自家寺里当开山祖师爷。虽然曾经一度骗过了乾隆皇帝，他到灵岩寺时也附庸风雅为“摩顶松”写了一首怀念玄奘的诗，闹了个“不学无术”

的笑话，经臣下提醒，再次到灵岩时，他以皇帝之尊也只好出面更正。其实，长清县在唐代也出了一个名闻中外的“三藏法师”，只是因为没有被写进通俗小说或作为表演艺术的角色，不为普通群众所知罢了。

我国古代赴印度求法取经的有三位高僧，即比玄奘早 200 年的晋代法显，他于公元 412 年由海道经青岛崂山回国。玄奘之后，在今济南长清县出了一位义净，他只比玄奘晚生了 30 年。玄奘于 629 年山陆路西行，于 644 年自印度取回佛经 657 部并翻译出其中很多部。过了 27 年，义净又于 671 年航海到印度，取回经典近 400 部，译出了 107 部。唐太宗专门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而唐中宗也专门为义净写了《大唐隆兴三藏圣教序》，二人均被尊为“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主持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而义净则亲自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上述 3 部书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早已翻译为英、法、日等文字而饮誉中外了。

义净的事迹，最早的记录是唐人卢粲的《大唐隆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塔铭》，撰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4 年），云：“师讳文明，字义净，俗姓张氏，齐郡山庄人也。”齐郡即齐州，唐代《贞元释教录》曾记载：“义净三藏卧疾不愈，欲归齐州。”《义净遗书》记其在长安荐福寺临终前嘱咐僧徒道：“齐州孤妹诸亲眷，并言好住”。齐州即今之济南市。所谓“山庄人”直接在齐州之下，未署州下所辖县名，于理未安。按《新唐书·地理志》：“齐州”下所辖领的县有“山茌县”，显然在传写中人们把“茌”误写为“莊”（简化为庄）了。山茌即今之长清县。义净自言 8 岁时在齐州城西 40 里的土窟寺出家，该寺正当今之长清地界内。至于有关文献说他是“范阳人”，这是唐人好称姓氏郡望的习惯。如李白称陇西李氏，房玄龄称清河房氏（他其实也是齐州人），传说也称范阳张氏等，均非指其乡里。后人不了解，于是有的文章就误以为义净是范阳人了。

玄奘取经是由陆路来回的。义净则“以咸亨二年（671年）发白全齐（济南），达于广府。”（《塔铭》）他是从济南出发到广州，经印尼的苏门答腊进入印度。他在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潜心学习10年之久。特别是他广泛结识和调查了当时在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其中竟有两位是济南去的和尚。一位名道希，齐州历城人，约在655年左右从吐蕃（今西藏）到印度。他“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印度名寺）造碑一首”。并且从中国带去了汉译佛经400余卷，捐赠给那烂陀寺，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一位名师鞭，也是齐州人，约于665年随玄照禅师自北天竺到西印度，“善禁咒，娴梵语”，并与道希在印度相遇，同居一夏，死时才35岁，道希活了50多岁也死在印度。义净到达时没有见到他，赋诗吊念：“如何未遂传灯志，湫然于此遇途穷。”上述引文出自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它记载了60位中国赴印度留学的僧人。其中虽有几个朝鲜人、越南人，但当时也是唐朝的藩属。这是中国早期的一批留学生，大都夭亡在国外，或因病、或遭伤害，可见境遇是很艰苦的。义净本人就在途中遭过两次抢劫，几乎被土著吃掉。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子由）在齐州任官时于熙宁八年（1075年）曾赴泰山游历，按沿途所见景点写了《游泰山诗》四首：《初入南山》、《四禅寺》、《灵岩寺》、《岳下》。其《四禅寺》云：“山蹊容车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岩根，连峰转相揖。”说该寺在灵岩寺之北面的一座山中。同时寺内尚有“双碑立风雨”，碑文载“云昔义净师，万里穷西域。《华岩》俱多纸，归来手亲译，蜕骨骨未移，至今存石室。”看来，义净的遗体犹如南禅六祖惠能一样也保存下来了，直至宋代犹存于济南之四禅寺（疑即唐代之土窟寺）。莫非长安荐福寺的墓塔没有舍利，而是衣帽冢吗？只好存疑。不管怎样，义净临终遗言是“欲归齐州”的。1994年重阳节开元寺石坊落成，我为撰写楹联镌刻其上云：“秋棠泉美沧溟乐，佛慧山青

义净归。”义净爱乡情深，不容他不归的吧。

义净是名闻中外的高僧，著作及译经均收入《大藏经》中，其单行本著作注释本也在国内发行，并有多国文字翻译本，然而济南人却大都不知道，居然硬拉另一个唐三藏（玄奘）来装点门面，殊为遗憾，我曾感而打油云：

寄归南海渡重洋，中印沟通开译场。
又一大唐三藏出，谁知义净是张郎。

（徐北文）

曾巩知齐州与南丰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齐州（今济南）来了一位新知州，他就是在当时早已蜚声文坛，后世又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曾巩。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曾巩知齐州，是他中进士步入仕途后第一次出任地方首席长官。他以卓著的政绩赢得了济南人民的爱戴。

曾巩到任之后，首先大抓了水利建设和市政建设。由于济南地势南高北低，来自南部山区和城内泉群的水流，常常毫无节制地宣泄城北，因此城北常罹水患。曾巩考察了地理状况，在北城进行了系统的水利建设，其中包括：修筑堤堰、疏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水门（即可调节水流量的水闸）。熙宁五年（1072年）三

月,其核心工程——北水门落成(在今大明湖东北角),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北的水患问题。另外,曾巩还为西湖(今大明湖)修了长堤,在城内修了一些石桥,还修了 涑源堂,北渚亭等等。

其次,是抓地方治安。在曾巩到任之前,有些地方豪强横行乡里,百姓不得安全。曾巩至齐州后,首先镇压了曲堤(今属济阳县)的豪强周高,同时又全面推行了王安石的保甲法,因此,齐州治安明显好转,出现了“奸寇屏迹,民外户不闭,道至不拾遗,狱以屡空”(《曾巩墓志》)的局面,齐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曾巩还在齐州改革教育,使齐州学校皆授《尚书》,重新振兴了齐州地区的《尚书》之学,推动了齐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曾巩调任襄州,消息传出后,齐州百姓不愿曾巩离去,便关闭了城门,拉起了吊桥,不让他走。由于皇命不可违,曾巩只好在夜间悄悄出城南下了。

由于曾巩为政有方,齐州“市粟易求仓廩实,邑獫无警里闾安”(曾巩诗《冬夜即事》。獫,读 mang,多毛的狗)。对于文学家的曾巩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慰藉:再加上齐州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名胜古迹众多,文化气息浓厚,所有这些都激发了曾巩的创作热情。所以,曾巩在齐州的两年,也是他文学创作大丰收的两年。

曾巩在齐州创作的散文,最有代表性的是《齐州二堂记》和《齐州北水门记》。前者系为新建涑源、历山二堂所作。文中对历山、涑水进行了周详的考证。行文自然朴实,既无刻意求险之态,亦无一般考证文章的枯涩之感。后者短小精悍,一气呵成,谨严有序,委曲有致。这两篇散文,都体现了了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

最能反映曾巩在齐州的文学创作实绩的,是他在齐州两年的时间里,写下了70多首诗,占其全部诗作的六分之一还多。从创作题材上看,曾巩在济南的诗作绝大多数是吟咏风光、娱性写物的作品。他以极高的热情讴歌齐州山水,历下名山(如鹊山、华

不注等)名泉(如趵突泉、金线泉、舜泉等)以及大明湖和大明湖周围的名胜。这些吟咏齐州风光的诗,笔墨淋漓,气韵酣畅,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曾巩写大明湖盛夏风光的《西湖纳凉》:

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
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荫成。
虹腰隐隐松桥出,鹳首峨峨画舫行。
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

诗中通过写鱼戏、鸟啼、新浪、绿荫、松桥、画舫,将盛夏大明湖描绘得充满了生机。特别是尾联写月下明湖,荷花夜色变紫,香气随幽风飘散,静听还隐约可闻泉水淙淙之声。读者的视觉、嗅觉、听觉都被诗人调动了起来,明湖纳凉之幽趣,跃然纸上。

曾巩写泉也有生花妙笔,如七律《金线泉》:

玉甃常浮灏气鲜,金丝不定路南泉。
云依美藻争成缕,月照灵漪巧上弦。
已绕渚花红灼灼,更萦沙竹翠娟娟。
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销一片天。

金钱泉是历下七十二名泉之一,泉水清澈见底,方池正中,一道波纹长浮水面,形同金线。曾巩巧妙地运用形象思维,形容为云在水中因藻而“争成缕”,月在池内凭漪而“巧上弦”,不仅形象地写出了此泉之“美”,更成功地写出了此泉之“灵”。

曾巩在齐州的诗作中,也有一些体恤民情和赠答酬唱的作品,诗中表现了他对民生民情的关心和他那超逸不群的性格。虽然奠定曾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他的散文而不是诗,但曾巩的诗才也不应为文名所掩。曾巩在齐州的文学创作,就是诗文并健而诗优于文的。

曾巩离开齐州之后,对齐州一直念念不忘,他在《离齐州后》诗中写道:

画船终日扒沙行,已去齐州一月程。

千里相随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齐州人民也没有忘记曾巩。早在明代初年人们就在千佛山修建了曾公祠，刻石像以纪念之。清道光年间，又在大明湖东北岸修建了南丰祠。南丰祠北邻北水门，南傍大明湖，清静幽雅，古朴庄重，与大明湖西南岸之稼轩祠遥遥相望。1994年7月，南丰祠重修后开放。祠中陈列丰富，曾巩故乡江西南丰人民还赠送一尊曾巩木雕立像。祠前悬一楹联：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二字属先生。目前，南丰祠已成了大明湖畔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

（荣斌）

苏轼、苏辙兄弟与济南

苏轼，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人；其胞弟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兄弟二人都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后皆列名“唐宋八大家”，与其父苏洵合称“三苏”，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苏氏兄弟，与济南有着不解之缘，或为官，或流连，都留下了吟咏济南的美妙诗文。

苏轼于宋熙宁七年（1074年）年底出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本为靠近任齐州（今济南）掌书记的苏辙，以慰思弟之情，但终未能有机会在济南聚会。密州、齐州毕竟相距近千里之遥，兄弟之间只能诗词赠答，互通情愫。苏轼著名的词《水调歌头》就写于这个期间，词前的小序写着中秋之夜为“怀子由”而作，其中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句，由兄弟之思，道出了人间真情，成为经久传诵的佳作。熙宁七年，苏辙在齐州喜得一子，因系寅年取名“虎儿”，苏轼闻知题诗一首为贺。苏辙遂唱和，希望儿子长大能像伯父那样有学问，有道德。

熙宁十年（1077年）初，苏轼卸密州任，转徙徐州，路过济南，可惜这时苏辙已离开济南，只是到了翌年二月才在河南濮阳相会。此次苏轼在济南小住一月，与其密友齐州知州李常遍游济南山水，诗酒赠答，留下不少佳作。他们同游龙山，苏轼有《阳关词》一首，其中“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描绘了人在马上轻松愉快的雪霁春景。诗人还和这位知州大人调侃：“使君莫忘雪溪女，时作阳关断肠声”，提醒老友可别只陶醉于济南的美景之中而忘了江南美丽钟情的姑娘。足见苏轼眼中的济南景色是何等的迷人！另外，苏轼还写了《至济南，李公择（即李常）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抒发了对官场和人生的种种感慨。

苏轼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冬天又来过济南一次，已难知其详。他在济南曾有不少书法刻石，可惜亡佚难觅，至于灵岩诗刻，则系后人附会，不足为信。

苏辙是在宋熙宁六年（1073年）出任齐州掌书记的，在济南前后住了有3年的时间。他对济南早有欣慕之情，尤羨济南泉水之胜。他在《舜泉诗并叙》中说：“始余在京师，游宦贫困，思归而不能，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可见，苏辙是因向慕济南泉水胜境而主动请求任职济南的。任内他游遍了各处名胜，而且每有题咏，写下了诸如《北渚亭》、《鹄山亭》、《槛泉亭》和《舜泉诗并叙》等盛赞泺泉之美的优秀诗篇。他还东去龙洞访禹迹，西登灵岩探幽谷，赞叹灵岩一带“青山何重重，行尽土囊底，岩高日气薄，秀色如新洗。”（《灵岩寺》）他曾对阳起石山（今药山）产生过

浓厚的兴趣，甚至冒雪往游。

苏辙在济南，也绝非只是流连山水，作为知州从官的掌书记，也是“官事如林”，案牍繁忙。他与在任知州李诚之和继任李肃之都相处配合得不错，先是忙于推行保甲法，时值齐州大旱，他抑强暴抚百姓，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又修造了城西门外护城河上的泲源桥，解决了交通阻塞的问题，并撰《齐州泲源石桥记》记之。他还写了《齐州闵子祠堂记》，记下了修建闵子骞墓的事情，以示崇尚教化之旨。

苏辙所历前后三任齐州知州都属清正的地方官，嘉惠黎民多有建树，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有这位掌书记相佐之劳。苏辙为人喜交际，在济南期间，与同僚齐州教授孔武仲和第三任知州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字公择)尤为相得，同声相应，酬答唱和，成为济南文坛的盛事。

(董正春)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

晁补之，字无咎，自号归来子，宋代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文学家。生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卒于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终年58岁。

晁补之出身豪门世家。其先祖晁迥官至太子少傅。其曾祖晁宗慤为知制诰、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等官。其父晁端友官至著

作佐郎，工文词，尤长于诗。

补之自幼刻苦读书，博闻强记。加之才思敏捷，故此幼时即善于写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一见其文甚感奇异。17岁时，父亲在杭州做官，补之随父也居杭州。他为钱塘的美景所陶醉，便会集其山川风物之丽，写了一篇文章，名曰《七述》。补之以此文前往拜见正在杭州做通判的苏轼。苏轼原本亦想写这样一篇文章，阅后叹曰：“吾可以撝笔矣！”同时称誉他的文章“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宋史·晁补之传》）。由于苏轼的称誉，补之得以文名远播，声振文坛。

不久，晁补之举进士。他参加开封府和礼部的考试，均名列第一。宋神宗看了他的文章说：“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宋史·晁补之传》）授任澶州司户参军，调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其堪任馆阁之职，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召还，为著作佐郎。

后来，哲宗绍圣初，章惇当国，晁补之被排挤，出知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在齐州任内，有一次，大街上发生光天化日之下群盗掳掠百姓的事件。晁补之经周密调查，设计在一次宴会上，将全部案犯擒获。后以修《神宗实录》失实，晁补之降为应天府、亳州通判，又贬监理处、信二州酒税。

1101年，宋徽宗即位。晁补之被召还朝。既至，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后蔡京专权，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309人列为奸党，晁补之也名列其内。因而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接着又罢职为鸿庆宫主管。官场的倾轧，宦途的浮沉，已使晁补之感到厌倦，于是，他绝意于仕途，慕陶渊明之为人，回到故乡巨野，修起了归来园，自号归来子，过起了田园生活。此时，他写了一首词抒写他罢退后的情怀：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汴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

米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摸鱼儿·东皋寓居》

此词写其隐居家乡东皋时，对个人功名蹭蹬、半生潦倒的苦闷心情。写景抒情，情真意切。

晁补之的著作有《鸡肋集》70卷，词集《晁氏琴趣外编》6卷。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他的散文即景抒情，描摹真切，借事寓理，夹叙夹议，流畅俊迈。张耒说“补之自少为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四库全书总目》）清代的永瑆说他的“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四库全书总目》）其诗古体为多，古乐府尤具特色。《苕溪渔隐从话》说他的古乐府“辞格俊逸可喜”。但其诗有散文化倾向。晁补之的创作成就最高的还是词。他的词豪迈如苏轼，刘熙载说他的词“堂庑颇大”（《艺概》）。但他的词缺乏苏轼的旷达超妙，而流于凄绝沉咽，所以，冯煦说他的词“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王延梯）

范讽与东州逸党

北宋时期山东的文学活动，以泰山南北为中心。其影响重大的人物，一是泰山之北的长白山下的范仲淹，一是泰山之南的徂徕山下的石介。在这两山之间的齐州(济南)，尤以诗歌的成就为最高，而且得力于泰山学派的影响。

泰山学派以石介为主干，以孙复为冠冕。两人都是范仲淹提携扶植起来的。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曾称“文正公(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曾任齐州知州)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分不寝”。范仲淹在徐州出生不久，即丧父，随母改嫁至齐州之长山朱姓人家，幼年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而成名。范仲淹晚年罢相后又曾任青州知州。王辟之《澠水燕谈录》载他到青州后，“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口：‘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他素来提倡勤学致用。“学者多从质问(仲淹)，为执经讲解，无所倦。尝推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第三一四卷)这种“矫厉尚风节”的作风，也在石介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石介与济南人士交游颇密切，其婿徐遁是济南著名的医生，曾与苏辙为诗文之交。他又与济南学者张揆(祖居今王舍人庄，与兄张揆齐名，其读书堂至清末犹存)相友

善。另外，石介友人祖无择(著有《焕斗集》)以及范纯仁都先后出任齐州知州，足以说明范、石对济南一带的影响。

石介与范仲淹，都是服膺孟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名言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但是他与范仲淹的喜爱诗词的性格不同，表现在文学上，则崇尚韩愈的刚劲险奇的风格。石介不仅在散文方面提倡这种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风，在诗歌方面也极力推崇。石介与著名诗人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志同道合。石延年的诗歌豪迈不羁，其人也仗酒任气，不拘小节。石介的门人杜默(师雄)的歌行，打破格律束缚，喜用民间俗语，言词慷慨激昂，虽文采不足，但勇于创新。石介为此写了《三豪诗》，其序略云：“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修)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石徂徕先生集》)其中之“诗豪”石延年，曾任金乡县令，与济南的范讽既是酒友，又是诗友。他俩和诗人刘潜(定陶人)等，“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进多慕之。”(《宋史·文苑传》)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东州逸党”，所谓“东州”，指宋代京师(开封)以东，即京东路(后又划为京东西路和京东东路)，其地区相当于今山东省。所谓“逸”，即不受束缚，奔放纵逸之意。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颜太初专为此写了一篇《东州逸党诗》来批评他们，反而使他们在文坛上更为闻名了。其诗略云：

东州有逸党，尊大白相推。
号曰方外交，荡然绝四维。
流宕终忘返，悉闻有民彝。
或为童牧饮，垂髫以相嬉。
或作“概量”歌，无非市井辞。
或作《簷露》唱，发声令人悲。
或称重气义，金帛不为赀。
或曰外形骸，顶踵了无私。
麇麇聚复獭杂，何者为尊卑。

（《宋文鉴》）

这些斥责甚至谩骂之辞，正因出自一位迂腐的礼教卫道士之口，反而博得了广大人士对逸党的会心微笑。

范讽，字补之，齐州人。其父范正辞，在京东路任地方长官多年，《宋史》有传。范讽年轻时，值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车驾至泰山封禅，因献所作《东封赋》，得任平阴知县，后举进士，历任淄州、郓州通判，升青州知州，后召至京师任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后来因朝廷党派相争，遭贬斥，其好友石延年也受到牵连。范讽这时正持母丧，在济南老家守制，却因饮酒自放，受到礼法之士的讥刺。《宋史》也批评他“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受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当时不仅颜太初作诗讽刺他们，甚至连石介门人姜潜也写信劾范讽。然而，石介的好友欧阳修在有关石曼卿的评论中，却对他们的作风还是认可的。

当时范讽名满天下，身任朝廷要职，自然奉承的人不少，当他罢官回到济南后，乡人大都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了世态炎凉的态度，又因他持服守制时饮酒而讥讽他，只有少数好友仍不失旧情。他在《题济南城西张寺丞园亭》一诗中写道：

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

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

与范讽同时的济南诗人有历城李冠（著有《东皋集》20卷），在赠淄川学者王樵诗中曾说：

霜台御史新为郡，棘寺廷评继下车。

首谒梓桐王处士，教风从此重诗书。

是记王樵隐居淄川梓桐山下时，御史高弁时任淄州知州，戴大理守评事衔而任该州通判的范讽相继拜访他的佳话。王樵曾深入边地求索被契丹掠去的父亲，为世所重，著有《游边集》《安边三策》《说史十篇》等。终生不出仕，自号赘世翁。据《澠水燕谈录》

说：“济南李艺为《赘世先生传》记其事。李完、李艺都是济南人，而王樵所居淄川一地，历代都属齐州辖领。这些人物既与范讽同时交游，亦可在“东州逸党”之列吧。

总之，济南地区在北宋时代，可谓文风昌盛，而且也有其特色，这特色应是“豪迈放逸”。比范讽稍后，济南又出了个李格非。格非评论文章，曾说：“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惟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苏轼）《贫筇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张邦基《墨庄漫录》）李格非提倡“横”，提倡“离俗绝畦径”，不在乎“众人之疑”，无怪《宋史·文苑传》评价他“苦心工于词章，凌轹直前”。这种“凌轹直前”的精神，就是“横”，也就是“逸”。李格非的主张是和范讽等一脉相承的。而他的女儿李清照之所以倜傥自喜，俊逸绝伦，又是继承父风，也是在“东州逸党”的风气熏陶下而使然的。至于稍后出现的辛弃疾，这位豪放派词作大师，其文风之横、之逸、之豪，也与东州逸党的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徐北文）

“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山东济南人，李清照的父亲。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调冀州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后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崇宁元年（1102年），以党籍罢，卒年61岁。

李清照在《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诗题中的“枢密韩公”是指韩肖胄，绍兴三年（1133年）肖胄任端明殿大学士同金事枢密院事，故称。而序文中所说的“韩公”，当指韩琦，非韩肖胄。韩琦乃韩肖胄之曾祖父。《宋史·韩琦传》说：“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仁宗时，西夏入侵，“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宋史·韩琦传》）因此，边疆人民曾有歌谣赞美他们：“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后韩琦居相位。清照说李格非及其父辈皆出韩琦门下，可见李家与韩家有着世交的密切关系。又说：

夔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

——《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这说明他和父辈都生于齐鲁，并曾在稷下住过；也说明当时李家

的地位虽然甚低,但名望却很高。这恐与他们“皆出韩公门下”有关,也与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有关。

李格非是一位博通经史之学的学者。他“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宋史·李格非传》)。他的经史著述著录于《宋史·艺文志》者,有《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此外,还有《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等学术著作。

李格非又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诗文都不错,尤以文为佳。元祐元年时,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与廖正(字明略)、李禧(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并号为苏门后四学士。(见韩洙《涧泉日记》卷上)所以,南宋的刘克庄说他“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后村诗话》)。《宋史·李格非传》说他“苦心工于词章,陵辄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韩洙《涧泉日记》卷下)此虽过誉之词,但也说明其文章确有特色。他的文学著作和经史著作一样,仅见著录,不见作品。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说他有诗文45卷,《遂初堂书目》载有《李格非集》,韩洙《涧泉日记》卷上说他有《济北集》。这都说明李格非在创作上是有一定成就的。

李格非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也颇有见地,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格非文论曰:

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他主张文章应真实自然,感情充沛;作家应写真情实感,而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又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

工。《宋史·李格非传》他奉为典范的《出师表》、《酒德颂》、《归去来辞》、《陈情表》以及杜诗,都是在这方面的名篇佳作,批评十分中肯精当。所以,释惠洪说他“善论文章”(《冷斋夜话》卷三)。

李格非论文不仅尚“气”,尚“诚”,还尚“横”,张邦基《墨庄漫录》引格非之语曰:

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惟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笈篋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

他盛赞孟子言道、左丘明的辞令、韩退之的文,李太白的诗以及苏轼的文,都是其得“横”要领的。然而,何谓“横”?他说:“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墨庄漫录》卷六)无论赋诗,还是撰文,必须摆脱俗套,独辟蹊径,富于创造;否则,便不能称之为创作。如果说“气”、“诚”是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那么,“横”就属于艺术创作的问题了。

李格非实践了他的文学理论主张。当日有人这样评论他的《洛阳名园记》:“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邵博《跋〈洛阳名园记〉》)

(王延梯)

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约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之后，山东济南人。宋代杰出女作家。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颇有声望地位，而且文学空气甚浓的家庭中。其父李格非，字文叔，官至礼部员外郎，是一位博通经史的学者，又是一位文学家。李清照的母亲王氏，是正状元拱辰的孙女，也有很好的文学素养。

这样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对李清照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她在早年就写出了《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这样很有现实意义的咏史诗，从而赢得了“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称誉。

18岁，李清照与山东诸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明诚，字德甫，丞相赵挺之的幼子。他自幼酷爱金石考古，又爱好文学，是宋代著名的考古学家，著有《金石录》30卷。婚后，赵、李夫妇便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开始了共同的学术研究活动。其生活充满了书卷气氛、文化色彩。

公元1126年，由于金人的入侵，宣告了北宋的终结。南宋的开始，也破坏了清照平静的学术生活，使她被卷进了逃亡大军的队伍，过着“飘零遂与流人伍”的凄惨生活。

南渡后，国破家亡之痛，文物的大量散失，已经在清照的心

灵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建炎三年（1129年），明诚的猝然病故，又给她难以承受的打击。在痛定思痛中，她终以极大的毅力，振作精神，埋葬了明诚，并撰文沉痛悼念这位情投意合的伴侣。

清照的创作原本甚富。宋陈直斋《书录解题》称：《漱玉词》一卷，又说“别本五卷”；宋黄升《花庵词选》亦称“《漱玉词》三卷”；《宋史·艺文志》载：“《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全集性质的有《李易安集》十二卷。这些词集、诗文集和全集久已不存。现行之《李清照集》、《漱玉集》，均系新辑本。

李清照是一位诗、词、散文都有较高成就的作家，在宋人的许多评语中称她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是一代名手。不过，从她现存的作品看，词的成就则更为突出。

李清照坚持“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主张诗词有别，明确分工。她把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一类内容吟之于诗，而把生活中个人的悲欢离合、惜春悲秋一类的感受赋之于词。如同她的生活道路，她的词的内容也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南渡前的词，多为离情别绪，惜春悲秋之作，是其平静、美满、幸福生活的反映。由于种种原因，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时有小别。每次分离如投石于水，在她平静的感情溪流里激起了一些涟漪，给她精神上带来点点相思，缕缕哀愁。由此，她写了一些以离情别绪、惜春悲秋的篇章，表现了对丈夫深沉的思念之情。如《醉花阴》、《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念奴娇》、《点绛唇》（“寂寞深闺”）、《如梦令》等，同为脍炙人口的杰作，为历代读者叹为观止。由于它们都是作者现身说法，亲身感受，所以都以真挚动人见长，为其他人的同类作品所不及。

在李清照南渡以后的词里，主要表现了她从一个“位下名高”的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沦为“飘零遂与流人伍”的“闾阎鬻妇”的凄惨心境和痛苦感情，带有深沉的感伤情绪，如《武陵春》、《声声慢》。

生活境遇的逆转，时代激流的冲击，使清照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纵使严分诗词畛域，其爱国的情怀，“生当作人杰”的气节与情操，也不能不在词中有某些流露：“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眷念故国的殷切之情，拂拂指端。在《永遇乐·元宵》中，她的爱国感情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词人抚今忆昔，通过对汴京元宵节热闹场景的回忆，表现她物是人非、今不如昔的感受和对故国的怀念。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刘辰翁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永遇乐》序）

李清照词在艺术上的成就可借用李白的两句诗加以概括：“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无论是感情、形象、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的锤炼，都如出水芙蓉，那么自然真实，毫不雕饰，几近完美境地。

在艺术风格上，清照的词是人们公认的婉约词派的代表。王士禛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花草蒙拾》），沈谦也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以浅俗易懂，明白如话为特点的语言风格，被人们称为“易安体”。

李清照因词独树一帜，而为世人推重，蜚声词坛。不仅如此，她的诗文在当时的诗坛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张文潜说：“长女清照能诗文”（《李格非墓志铭》），朱弁说她“善属文，于诗尤工”（《风月堂诗话》卷上），《宋史·李格非传》也说：“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这说明她是一个词名、诗名、文名并盛的作家。

就数量来说，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诗文，较之她的词还要少。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她的诗文与她的词都有很大不同。她的诗文，绝无词中的那种感伤低沉的情调，而代之

以关心现实，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激昂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风格上，与其以婉约为主的词风迥异，占主导地位的是高昂、豪迈、刚健的风格。在写作方法方面，与其词的不数典不用事，多用白描手法不同，她的诗文则以数典用事见长，善于驱遣古人古事，表达思想，抒情言志。

李清照生当宋金对峙，困难深重的时代。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韩肖胄、胡松年使金，李清照以“闾阎嫠妇”的身份，“沥血投书”，上诗二公。诗中首先揭露和批评高宗的懦弱无能、屈辱卑怯和伪装孝子的无耻心理。“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她指出金人统治者的凶残本性，建议二公做好发生意外事件的精神准备。她“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她表示“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她反对和敌人订盟，指出：“圣君人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表现了她在民族斗争中的远见卓识。

在南宋满朝投降论调甚嚣尘上时，她响亮地提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并以项羽为其楷模：“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说明李清照崇尚气节，具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她对金人扶持的伪楚、伪齐傀儡政权坚决不予承认：“两汉本继绍，新室为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她对贪生怕死、不思抗战救国、毫无民族气节的高宗君臣极为不满，讽刺他们：“南渡衣冠少正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不仅如此，她还以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而归的木兰相期许：“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幻想在民族斗争中建立武功而不可得。如此坚毅刚健的思想与性格，岂只女子所难能，在男子中无疑也是特出者。

李清照词自成一体，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地位甚高。清陈廷焯说：“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白雨斋词话》卷二）

沈谦则说她是婉约派之“当行”，是很正确的。郭沫若同志也曾高度评价她为“一代词人”。就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她是当之无愧的。

（王延梯）

宋代杰出的雕塑家盖忠

长清灵岩寺千佛殿内的 40 尊彩塑罗汉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向为世人所瞩目。1922 年，梁启超先生题石千佛殿前，推其为“海内第一名塑”。1983 年刘海粟先生观览后，续题石赞誉道：“灵岩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观”。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这批塑像的塑造时代、工艺、作者等情况，人们却是一无所知，只是根据塑像的风格，推断其为宋塑或元塑。

1981 年起，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这批塑像进行了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从部分罗汉像的残损体腔内发现了一批文物及题论，同时，也获得了部分关于艺术风格、工艺规程方面的资料。其中罗汉作者的墨书题记，把作者的姓名、籍贯、制作时间等最重要的信息保留了下来。

根据题记及发现的文物可知，千佛殿内的 40 尊罗汉像，大部分出自宋代雕塑家盖忠之手。盖忠，齐州临邑（治所在今济阳县西南之孙耿镇）人。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他和他的助手们共同完成了这批塑像。

盖忠塑造的这批罗汉，在工艺制作上继承了前代泥塑以木为胎骨，而后堆以数层麦糠泥，塑出大形，再以棉花泥盖平整形的做法，比前代有了重大改进。如塑像胎骨的制作，他根据罗汉姿态的不同，在塑像胸腔内部做出收胸、弓背等形状的空木箱箱体，用以支撑塑像。这种空箱体的运用，较唐代敦煌、麦积山石窟中塑像以主心木为胎骨的做法，具有节省塑泥、降低泥塑重量及减少泥层开裂的作用，是一项重大的革新。

在塑造用的泥层材料方面，盖忠一般于木制体腔外皆敷厚约3厘米的粗泥，粗泥外通体绕麻皮一层，麻皮外捺厚麦糠泥，其外再加细沙泥盖平整形，最外层用厚约二三毫米的棉花泥压光。较之前代的做法，盖忠的作品更为坚韧，更富于质感。

不过，盖忠的这批塑像的最为成功之处，还是在于艺术创作方面。他根据传说中众罗汉的不同身世和经历，将他们分别塑造成或神态寒伧潦倒，似乎有说不出的内心隐恨；或皱眉抽涕，似乎在悔恨自己的过失而内疚；或侃侃而谈，似乎在与同道探究佛法的真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明显地表露出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使观者一见即可感到神灵活现，引起对他们身世的联想，好像看到了他们过去的经历，理解他们在修炼中的艰苦生活。

由于东西方伦理观念的差异，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家们在创作之前未曾受过西方同行们所接受的系统的人体解剖学和透视技法的训练，这使中国古代一般雕塑艺术家们在创作的科学性、人物的写实上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但盖忠却凭藉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敏锐的观察力，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单凭记忆和想像，就创作出符合他所熟悉的北方人的体态特征的筋骨逼真、脉管隐约可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动态、肌肤，完全符合人体解剖学和运动力学、运动生理学的关系，使人看来，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在对塑像衣纹的处理上，盖忠继承和保持了唐代雕塑中服饰逼真、线条柔美流畅的传统。对体积的起伏、角度的转折、线条的曲直、斜度的动势、光线的明暗变化，都非常注意节奏感，刚柔相济，虚实对比。衣纹的繁简变化，也特意衬托面部表情和手势。衣带的来龙去脉和结扣的穿插也都交待分明。这些，也从整体上增加了众罗汉的栩栩如生之感。

盖忠生活的时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表明他早已从依样画葫芦的工匠脱胎而成为一代艺术大师。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相比，他毫不逊色。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一文中就曾赞誉道：

“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的作家来比的话，这些作家完全可以与都拿泰娄(多那泰罗)并美。”

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艺术曾数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之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巨匠、工程大师和艺术家们灿若群星，但只要他们不曾入仕，就鲜有名垂青史者。盖忠就曾是其中的一位。今天，盖忠之名已经拂尘再现。他为我们留下了在世界艺术之林堪称瑰宝的作品，我们为他而骄傲！

(刘伯勤)

文武兼备南宋词坛领袖辛弃疾

1140年(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

纪念的日子。我国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这一天诞生于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四风闸。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宋史·辛弃疾传》），故以稼轩名，别号稼轩居士。

他出身于宦门。始祖维叶当过大理评事，开始由甘肃狄道迁来济南居住；曾祖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赞仕金为朝散大夫，陇西郡开国男，亳州谯县令，知开封府。所以，在《美芹十论》中，有“臣之家世，受廬济南，代膺闾寄，荷国厚恩”的话。

辛弃疾早年丧父，自幼由祖父抚养长大成人。据辛弃疾说，辛赞是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人物。他虽无奈“被污虏官”，却心怀异志。“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目睹身受的种种民族压迫，使辛弃疾本已打上了民族意识的烙印，祖父的引导和启迪，更使他埋下了反抗民族压迫的火种，幼小的辛弃疾便已立下了报效国家的志向。所以，当他年仅 22 岁时，就怀着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在济南聚集了 2000 多人，起义抗金了。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辛弃疾抛弃了“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美芹十论·详战》）的偏见，率部投奔农民出身的抗金义军领袖耿京，并在耿京帐下当掌书记，共图恢复大计。他曾单兵独骑追杀叛变投敌的义军小头目义端和尚。这初步显示出他的智勇和才能。1162 年，他奉耿京之命赴南宋朝廷时，耿京为叛徒张安国所杀。辛弃疾获悉，义愤填膺，带 50 人冲进重兵把守的敌营，生擒张安国还朝。这一壮举，在当时的南宋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献记载说“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段战斗的经历，英雄的壮举，他在后来的词中写道：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

——《鹧鸪天》

从此，耿京 25 万义军瓦解，辛弃疾在南宋开始了宦途生活。

他的学生范开曾说他“以功业自许，以气节自负”（《稼轩词序》）。在南宋 40 余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指挥军队去驱逐敌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创造一番英雄的业绩。为此，他在滁州、江西、福建、镇江等地做军政长官期间，须臾不曾忘此。尤其淳熙七年（1180 年），他在湖南创建飞虎军，最令人振奋。他写了《美芹十论》、《九议》等军事论著，对抗金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详加论述，上奏朝廷。但是，南宋朝廷投降派当道，他的抗金复国的崇高理想得不到实现，他的卓异的抗金大计也得不到采纳。南渡 40 年，竟使他在家赋闲 20 余年；1207 年，这位英雄终于在“大呼杀贼”之后，老死在江西农村。

辛弃疾有《稼轩词》600 余首。他的诗文则没有集子行世，据邓广铭先生所辑《辛稼轩诗文钞存》，他有诗近百首，文十多篇。从他现存作品看，几乎都是南渡以后所作。他的词充分反映了民族斗争这一尖锐主题，集中抒发了他那炽热的爱国情怀，突出表现了他奋发昂扬的战斗精神。淳熙三年（1176 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在造口怀古，由 40 年前金人迫隆祐太后的往事，想像到江水里还流着那时逃难者的眼泪，写了一首《菩萨蛮》，表现了对国耻的沉痛和对偏安的愤慨的感情：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是以英雄之躯唱出英雄之歌。他在词中经常表示杀敌报国的决心和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他甚至在睡梦之中。还在指挥抗金部队英勇杀敌。他寄陈亮的一首《破阵子》，表达了这种雄心壮志：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

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英雄在醉酒的情况下，惟一没有忘怀的是拨亮灯火，深情地端详着杀敌的宝剑。在迷离恍惚的醉态中，英雄进入了梦境，描绘了梦中抗金部队的壮盛军容和他检阅军队的盛况，表现了豪迈的气概，战斗的情怀。辛弃疾这种与敌一决雌雄，为国建立功勋的壮志至死不衰。他以 66 岁高龄在京口北固亭怀古时写的《永遇乐》中，还表示要做“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和老当益壮的廉颇：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中的孙权、刘裕、廉颇都是历史上武功卓著的人物，词人以他们自喻，正表现了他的壮心不已。

到晚年，辛弃疾自觉老矣，但仍把抗金事业寄厚望于子孙后代：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

这分明是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在抗金斗争中的生动体现，何其令人感奋！

南宋当权者只图偏安，哪管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这不能不使他慨然于心，愤然于口，于是“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之类的指责与唾骂，辄露笔端。

前人评辛弃疾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认为他是“异军特起”（《四库全书提要》）的人物。人们又常以辛弃疾与苏轼相比半的。

确,他们同属豪放派词人,所以人们习惯于苏辛并称。但是,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者,辛弃疾发展和完成了苏轼开创的事业,彻底改变了词的“艳科”面目,使词可以抒写一切思想感情,可以反映一切生活现实,把人们视为“小道”的词,提高到与诗文同体的位置上来。对词风进行了彻底变革。由于辛弃疾用词抒爱国之情,言抗战之志,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称誉,得到了伟大的爱国词人的美名,为人民永远缅怀和纪念。

(王延梯)

没有到过济南的济南籍词人周密

济南湖山风光旖旎,钟灵毓秀,人杰辈出。有一位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游子,他梦魂萦绕的故乡热土上,却没留下他的履痕。他就是南宋著名词人、史学家周密。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萍洲。祖籍济南,其曾祖父周秘仕为御史中丞,于靖康之难后随宋高宗南渡,因家湖州,后寓吴兴弁山。周密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歿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周家世代书香,三代累之藏书有42000余卷,金石之刻1500余种。周密幼年随父周晋宦游浙闽等地。周晋工词能文,“常与学者名流载酒论文,清弹豪吹,笔砚琴樽之乐,盖无虚日。”周密《萍洲渔笛谱》其母章氏亦通文墨,周密就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

氛围中渐渐成长起来的。

周密天赋过人，风雅倜傥。他工诗词，善书画，精鉴赏，谙音律。尽管他才华横溢，却仕途侘傺，一生郁郁不得志。30岁时始为临安府幕僚，32岁奉檄督昆陵民田，以忤大吏辞官，34岁出任两浙运司掾，43岁监丰储仓，45岁为义乌县令，任内，元军破临安，宋亡。周密即归湖州，弁山家破，兵荒马乱中所藏金石书画荡然无存。翌年，息影杭州，依内弟杨大受，居癸辛街，从此遁迹不出。自46岁至67岁谢世，20余年孜孜矻矻，专心著作，将其抱负与隐衷都抒发于著述之中。

周密盛负词名，他曾与张炎、王听孙、陈恕、李居仁等结社唱和，俨然为翘楚。这时词坛仍处在姜夔格律派的流风余韵中，多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内容则较狭窄单薄。郑振铎分析说：“因为词的一体，到了张炎、周密之时，已经凝固了，已经是登峰造极，再也不能前进了，只能在咏物寓意上用功，只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风为极则。”（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故周密150多首词中寄兴托喻的占了重要比例。

周密的词清妙明瞻，婉雅空灵，每首词中仿佛流转着一股沁人的清气，意味不凡。历来品评周词者甚多，其中以戈载的评论较割切：“草窗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允矣无黍。”（《七家词选》）将他与吴文英颉颃，洵不为过。下面录其《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按：此阁在浙江绍兴），此首一向被称为周词的“压卷之作”，从中可窥其风格：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飘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
登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

周密的词集有《萍洲渔笛谱》，脍炙人口。他编选的《绝妙好词》流传更广。

周密不仅是一位著名词人，也是一位有高度成就的史学家。他身经国亡家破的惨痛，目睹异族侵略，民生涂炭，悲愤难平，激发了他著书立说，以保存民族文献为己任的宏愿。在杭州隐居的岁月里，他晨抄暝写，涉暑经寒，撰著了《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澄怀录》、《云烟过眼录》等30余种。所谓“遗老故臣，惻惻兴亡之隐，实曲寄于言外”（《四库总目提要·武林旧事》）这些书中提供了大量史料，内容翔实，考证精详，多属轶事秘闻，能匡正史之不逮，为后人研究南宋史实、典章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体现了他一片报效故国的忠心。

周密著作等身，约有40余种，亡佚不少，流传至今者尚有20余种。《齐东野语》为其精心之作，自叙云：“务求事之实，不让言之野。”史料来源一方面系辑录其曾祖父、祖父、外祖父的手稿，另一方面则由他亲自采访得来。可以说此书以家乘补国史，以评议抒见解，以亲闻寓世教，“足以补史传之缺”（《四库全书总目·齐东野语》）。

周密深怀爱国之情与亡国之痛，始终抱有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在《齐东野语》中，自署“历山周密公述”，又自号“华不注山人”，成书时宋已亡十余年，既著于江南，又多记南宋事，而以“齐东”命名，显系寄托缅怀北国故乡之深情，用心良苦矣！

周密的祖辈被迫背井离乡，盼望着子孙后代能返回故里。其父曾言：“我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也。”周密牢记这一遗训，当赵孟頫从济南为官任满回杭，他就请赵画一幅济南的山水以慰乡愁。赵遂作《鹊华秋色图》相赠。图上鹊山起势崔巍，华山绿秀如芙蓉，远树茅屋，烟霏迷茫，这画时时叩动着他的思乡情怀。

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历史的长河滔滔汨汨。周密终生未忘情于故乡，同样，故乡人民也永远纪念着这位未归的游子，且引以为骄傲。

（张稚庐）

热爱济南的诗人元好问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忻州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父元德明，嗜读书，能诗文，终身不仕，放浪山水，好问出继叔父“陇城府君”元格为子。5岁时从其继父来官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道经济南，便对这“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地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42年后，他已盛负诗名，再游济南，挥笔泼墨，写了歌咏济南山水的名著15首。其《济南杂咏十首》的首篇写道：

儿时曾过济南城，暗算存亡只自惊。

四十二年弹指过，只疑来处是前生！

所谓“存亡”“自惊”，包含着时代兴亡的悲愤与自身荣衰的哀愁。42年中，他由天真的顽童，成为金代赫赫有名的大诗人，蜚声朝野，登第进士、官国史编修、内乡县令、左司都事、右司员外郎，正在青云之际，忽然成为蒙古军的阶下囚，天兴二年（1233年），被拘管于聊城佛寺中，二年后释管，后移居山东冠氏县（今冠县），依县令赵天锡。46岁这年，因“故人李君辅之故”，来游济南，道经

齐河,约长清著名诗人、散曲家杜仁杰同游,遍览济南胜景,游踪所至有:大明湖、历下亭、北渚亭、匡山、鹄山、华山、栗山、药山、趵突泉、珍珠泉、金线泉、灵泉庵、千佛山、舜祠等,并在诗中赞美倍至:

入秋云物更凄迷,一道湖光树影齐。
诗在鹄山烟雨里,王家图上旧曾题。

《其八》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发兴新。
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

《其十》

《济南杂咏》十首,写古迹,颂泉池,咏湖光,描山色,画荷蒲,绘烟云,泉城动人之美,使诗人流连忘返,有心想做“济南人”了。

元好问游遍济南兴致不衰,又东行至章丘而荡舟绣江。他在《济南行记》里说:“遂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发源长白山下,周围三四十里。府参左张子钧、张飞卿觞予绣江亭,荡舟荷花中十余里。”他在《绣江泛舟中有怀李郭二公》中写道:

荷花如锦水如天,狼藉秋香拥画船。
长白风烟最潇洒,外台宾主重留连。
胜游每恨隔千里,乐事便当轮百年。
咫尺西州两诗客,不来同作饮中仙。

诗人被绣江、长白山的山光水色所陶醉,“留五日而还”。回济后,又留二日,泛舟大明湖,待杜了(即杜仁杰)不至,才恋恋不舍的离开济南,返回冠氏家中。元好问不仅对济南的山水风物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对齐鲁大地也有无限的向往。47岁(1236年)时,他偕同县令赵天锡往泰安会见东平路行军总管严实。此行“凡三十日,往复千里”,途经长清之郭巨庙(即孝堂山石室)隔马祠,游灵岩寺,而后登泰山,观日出。他在《游泰山》诗里写道:

鸡鸣登日观,四望无氛霾。

六龙出扶桑，翻动青霞堆。

.....

孤云拂层崖，青壁落落云间开。

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觉胸次高崔嵬。

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

写出了诗人亲身登泰山、观日出的遐想和感受。他在《东游略记》里，记述了这次登泰山所历的重要古迹和景观：“出州北门，经水帘、马棚、回马岭、御帐、护驾泉而上，遂登天门。岳顶四峰：曰秦观、日观、越观、周观。秦观有封禅坛，坛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述景简要而条理。

元好问金亡不仕，惟以游历山水，寄情风物以抒愤懑。

他从49岁(1238年)，到53岁(1242年)常往来于东平、秀容之间，当时为东平行台严忠济(严实之子)所聘，在东平府与杜善夫、张澄、商正叔、商挺、宋之贞、康晔友善，并为严忠济主办府学。在此也与友人宴集东平湖上写诗作词，吟咏山水。《出东平诗》写他离别东平时的留恋之情：

老马凌兢引席车，高城回首一长嗟。

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

潦倒本无明日计，往来空置六年家。

东园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诗到处夸。

此应是元好问在东平应严氏之聘六载，临别出城路上所作。诗中写出当时东平繁华情景，虽然离去归家，但仍有留连东平“东园花柳”和“西湖水”之意。这里“西湖”是指当时的安山湖(即今之东平湖)。他的《东园晚眺》一诗也写得风韵凄婉：

杨柳搀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余寒。

一诗不尽登临兴，落日东园独倚栏。

类此之作在《遗山先生集》中是不少的。

元好问的诗“构思宵涉，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

（赵翼语）可谓独步金代诗坛。他生于杀伐动荡的金元鼎革时期，命运困厄。他与山东好友交谊深厚，北渡后十数年流寓聊城、冠县、东平等地，对山东父老结下深厚情意，也留下了不少歌颂山东胜景的名篇。

（孔繁信）

放歌家乡山水的杜仁杰

杜仁杰，原名之元，又名征，字善夫，一字仲梁，号止轩。元代济南长清（其原籍在今槐荫区段店镇辖区）人，著名散曲作家，约生于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出身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其父杜忱，“以词赋雄东州”，“登进士，授京兆录事判官”；其家以世代艺竹享名乡里，家有万竹园，园内有万竹堂。贞祐初（1216年），元军征伐山东，其父于兵乱中去世，当时杜仁杰约20岁。正大元年（1224年），他南游汴京，结识了大诗人元好问，后游洛西，与张澄、麻革相交，三人成为诗友；后来三人同去内乡山中隐居，依内乡令元好问。“日以作诗为业”，诗名享于当时。后来，蒙古军攻克金京汴梁，杀戮抢劫，杜善夫经九死一生返回故乡。不久，为东平行台严实聘为诸子师，后又成为严实的门客，参谋政事；严实卒后，又在东平行台严忠济（实子）处作幕宾，继为严忠嗣、严忠范参谋政事。在东平期间，他写了不少散曲，但留下来的只有五六篇，最著名的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以谐趣滑

稽的情调记述了当时演唱杂剧的情景，这篇套曲成为后人研究初期杂剧的重要参考资料，曲中描述了表演方式，勾栏（即戏院）的形式，舞台的格局，观众看戏的情形等，提供了生动真实的依据。尤为难得的是，他用当时的村言俗语写出，情趣横生，读来令人捧腹。他在东平待了 20 多载，自中统到至元初的七八年间，他的许多朋友都入京做了大官。有人向朝廷推荐杜善夫，“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杜氏无动于衷，“累征不起”。约于至元二年后，他便毅然辞别东平，隐居灵岩寺（在长清县境），往来于泰山、五峰山、济南、长清，眷恋家乡故土的山山水水，用笔墨描写这壮丽的山河。

在归乡（1232 年）后的 20 多年间，他曾 9 次登泰山，写过有关泰山的碑文、铭文和游记，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艺术笔法，描绘了泰山的奇景异彩。在《东平张宜慰登泰山碑》里，他写道：

薄暮至绝顶，由东以望，见山影黧黑，偃卧无际。

给人们展现了一幅雨晴后夕阳将落，墨黑色的山峰偃然而卧，连绵无际的景色，令人油然而生“苍茫浩渺”之叹。他写泰山观日出的情景，更是妙笔生花：

登山观峰，六合囊开，肃然无纤滓。待蒸黍时，东方咙咙，乍离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无量金色界中。这与姚鼐的《登泰山记》相较，则又另是一番景致。

五峰山，在长清县治东南 20 多公里处。其山五峰，隆突天际。峰上古木参天，草莽翠蔚，峰下殿阁参差，楼宇错列，金元时有洞真观、三清殿、玉皇殿、三元殿、东西两楼等。杜善夫数次来游，并与这里的道士崔真人结为好友。他的《题五峰山》诗，曾刻于玉皇殿西壁。其诗以写五峰山的高绝挺拔为特点。诗的开端口：

青崖何亭亭，险绝不可状。
中有仙人台，曾此簇大仗。
千年迹已陈，剪灭复谁创？

首二句直写山的险绝高拔，有屹立天外之感，其山势陡峭高矗到无法形容描绘的地步。下二句接前二句的概写，突出“仙人台”的特点，竟有人在高峰险巖上“簇大仗”，“树道场”，更显示人能胜天的本领。所以才“剪灭”“陈迹”，重创新巧，殿宇中出，崭然一新。接着诗以对比写法再行开拓：

向来樵木场，今为锦绣嶂。

泉鸣灌木杪，人语飞鸟上。

居人固自轻，过客诚难忘。

把经过人们精构设置的殿阁楼台和自然恩赐的奇峰异石互相结合，互为衬托，把人工美和自然美融会在一起，更使人流连忘返。所以诗尾说：“明日黄尘中，回头失昆阆。”表达了作者热爱家乡山水，至死难舍的眷恋之情。

杜善夫晚年长居灵岩寺，对这座名山古寺更加热爱，在其临终前，还写了《游灵岩寺》诗：

涧冰消尽水声喧，山杏开时雪满川。

老木嵌空从太古，断碑留语自前贤。

蓬莱不合居平陆，兜率胡为下半天？

金色界中无量在，可能此地了残年！

杜善夫这位英才，生于乱世，颠沛流离半生，未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学才能。元朝统一后，他不满元廷的黑暗统治和征讨杀伐的野蛮政治，屡次征召不赴，因此其事迹正史不载，野史不记。他的诗文词曲，散佚不少，现在留下的几十篇作品，不过吉光片羽而已，已难窥其全貌。仅从这些遗作里，我们仍可看到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歌颂大好山河的至诚情怀。

（孔繁信）

元初济南拥兵据地的严实和张荣

金朝末年，蒙古兵内侵，南宋也出兵北上，中原地区，三方混战，动荡纷扰；地方豪强，趁机发展势力，拥兵据地，保境安民。山东境内，严实以东平为中心，控制了鲁西地区；张荣则控制了济南以东的鲁中地带。

严实，字武叔，长清（今济南属县）人。粗通文墨，性情豪放，不治家产，喜欢结交豪杰，救济落魄之人。多次被官府捕拿入狱，乡里中少年往往出死力把他救出。金贞祐二年（1214年），成吉思汗由紫荆口（今河北易县）入关，分掠河北、山东一带。兵退之后，金东平行台（官名）征调百姓为兵，因严实为众所服，任命他为百户（下级军官），后以功授长清尉，不久，代理长清县令。南宋军队攻占益都，乘胜西进，东平行台命令严实筹措粮草，以备守城。严实外出督讨租税，返回时，长清已被宋兵攻破，他携家逃避到青峰山（在今长清县境）。有人向金东平行台诬告他与宋兵勾结，行台派兵围攻他。他只得降宋，宋任命他为济南治中。他分兵四出，攻城掠地，控制了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后来他见宋廷不能依靠，于金兴定四年（1220年），率兵投降蒙古太师木华黎，授任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他协助蒙古攻占了曹州（今山东菏泽市）、濮州（今山东鄄城）、单州（今山东单县），击溃了王义斌统率的宋兵，开封以东的州县，都为严实所据有。又助蒙古兵取彰德（今河南安阳），占益都，因战功卓著，两次受到蒙古国主窝阔

台的接见，授他为东平路行军万户。攻占彰德之时，蒙将带孙恼恨彰德人先降后叛，反复无常，把数万老幼驱赶到一起，要下令屠杀，严实劝解说：“他们都是国家的顺民，只是因为咱们的兵力达不到，才被宋兵胁迫顺从，他们有什么罪呢！”带孙取消了屠城命令。接着攻占濮州、曹州等地，带孙又要屠城，经过严实一再劝说，才又保全了百姓性命。蒙古大军经河南出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进兵湖北，严实率部屯驻徐州、下邳一带，他以为蒙古兵入河南一定大肆屠戮百姓，便带了大量金银绢帛去向蒙古兵贖买百姓，并严格约束自己的部下不准烧杀抢掠，仅灵璧一县，就救下了5万多人。河南、江苏一带闹灾荒，饥民逃亡到山东境内。当时，蒙古法律规定：有收留藏匿流亡人口的要连坐治罪，灾民们没有栖身之地，饿殍遍野。严实命令开仓取米熬粥，广置路旁，无数灾民赖以保全了性命。严实为人宽厚，不念旧恶，尊老敬贤，深得人心。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年）卒，享年59岁。他的儿子严忠济继任了他的职务。忠济效法其父，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他又特别重视教育，东平府学原在卑湿之地，狭小阴暗，他另选高敞处重建府学，扩大规模，培养了大量人材。例如元杂剧著名作家，人称“小汉卿”的高文秀就是东平府学的生员。据《录鬼簿》载，高文秀创作的剧本有三十多种，尤以《水浒》黑旋风李逵戏最为擅名。另外，在东平著名的杂剧作家，还有李好古、张时起、顾仲清等，这说明，东平当时是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之一，也可见其市井繁华、文化发达。同时，忠济又广为招徕天下人材，其幕僚宋子贞、刘肃等后来都成了元朝名臣。

严实父子统治东平一带长达数十年，赋税、军旅、官职、民事皆由他们自主，仅在名义上受蒙古节制，他们使鲁西一带成为中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化昌明的地区，而东平州也发展成北方的一座繁华昌盛的名城。

今日平阴县洪范乡书院泉，记载即是严实父子所建书院故

址,这里翠山环抱、池水涵漾、溪流潺湲,景色十分幽致雅静,确实是学者文人读书治学的好地方。相传,当时书院规模很大,庭院数重,溪水流贯庭中,厨房做好饭菜,以木匣贮之,置于溪水之上,可自动漂至厅堂,取以待客。

张荣,字世辉,济南历城人,生得状貌奇伟。曾从军作战,被流箭射入目中,自己拔不出来,便叫人用脚蹬住他的额头,猛力拔出,旁观的人惊得目瞪口呆,而他却神色自若。金朝末年,战乱蜂起,他率领乡民,占据历城城南赏堂山,抗击入侵的蒙古兵,势力逐渐壮大,控制了济南以东直到淄川、惠民的广大地区。后来,严实等各处军兵先后都降顺蒙古,他孤军无援,不得已也以部属上地降顺。蒙帅引他朝见国主窝阔台,窝阔台问他何故以孤军抗击蒙古大军数载而不投降。他回答说:“山东地广人稠,都被您占有。我如果还有一点依靠,是决不会投降的!”窝阔台听了,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背说:“真是位勇士啊!”授任为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蒙古大军进攻金国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他请率部为先锋,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军至黄河北岸,他亲领敢死之士深夜潜渡黄河,守河的金兵溃败。天亮之后,金兵整队反击,张荣驱马冲阵,金兵望风披靡。张荣夺得战船50艘,指令部下驾船驶回北岸。蒙古大军继之渡河,乘胜夺取张山、盘山二寨,俘虏金兵万余人。蒙古大将阿木鲁要把俘虏全部杀死,张荣力争,才停止了杀戮。五年(1233年),占领汴梁。接着又攻占了淮阴、沛县、徐州、邳州等地,张荣冲锋陷阵,都立了大功,遂收兵回济南。河南灾民大批流亡到济南一带,张荣命令济南百姓让出房屋、土地安置灾民,使灾民能够种庄稼、养家畜,生产自救,并定期考察,予以表彰或责罚。这样,灾民不但没有成为负担,而且使济南一带荒地得到开发,经济得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当时,朝廷中书省进行考绩,济南被评为天下第一。张荣61岁,请求致仕。1260年,忽必烈(即元世祖)即位,封

张荣为济南公，卒年83岁。

张荣的故居在珍珠泉濯缨湖上，宅中有楼，名“白云楼”，高数十尺，元代著名散曲作家张养浩曾作《白云楼赋》赞美它“括万象于宏敞，飞四阿于鸿冥。”明初成为山东都指挥使平安的宅第，明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归入德王(朱见潋)府，即今省人大常委会驻地。

(李永祥)

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

潇洒名城济南，在历史上不但以名士多著称，而且还不断地有“文章太守”来到这里主持风雅。在元朝就有以文学家、艺术家著称，列入唐宋以来的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他出身宋皇族，是宋太祖幼子秦王德芳之后，南渡后家居湖州(今属浙江)，他的高祖以下几代，都因是皇室而历显宦。他11岁丧父，14岁时，按皇族例授职衔，铨任真州司户参军。1275年，他刚刚过20岁，元军渡江陷临安，宋亡。经此惨变，他的皇族的优越地位丧失，家道中落。

赵氏天资聪敏，又极好学，对诗文书画有多方面的才能。宋亡后，居家力学，博通经史，深究书画艺术，数年间，文名远扬。元朝定鼎，世祖忽必烈重视南方人才，1286年，诏命侍御史程巨夫往江南搜访才俊逸士，得20人，首选即赵孟頫。朝见时，孟頫仪容

秀异，才气英迈，忽必烈认为真是出众超凡的人物，应对之间，试草诏书，均符忽必烈意旨。忽必烈拟以侍郎任用，因赵乃宋室后裔，为勋旧大臣所阻。1287年，赵孟頫受任兵部郎中，继调集贤殿直学士。忽必烈经常召见，垂询朝政，并拟调升中书省参议政事。赵氏自知自己的处境，坚请另选他人，从此更加谦抑，尽量少入宫廷，并力请调外任。

1292年，赵孟頫受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偕同夫人管道升，莅任济南。孟頫为政以政简刑轻为主，他重教兴学，访问耆老，立学田，平冤狱，轻刑罚，与民休息。尝夜间微服出巡，闻有读书声处，即刊记其门柱，第二天便派人送去酒肉以资鼓励。白昼出游，也常常不带侍从。“道逢黄发惊相问，只恐斯人是伏生。”“春阴柳絮不能飞，雨足蒲芽绿正肥。政恐前呵惊白鹭，独骑款段绕湖归。”可以想见这位文章太守对济南山水人物的情感及其风流潇洒的风度。

他在北园有座别墅，院内有泉水小溪，休沐之日，便到那里对着鹊华烟雨、荷塘稻田，读书写字，以消案牍之劳。至今故址名砚溪，因赵氏常常在泉溪洗砚得名。

赵孟頫宽简仁厚的政风，却受到苛虐的廉访使韦哈刺哈孙的刁难。恰到三年任满，孟頫卸职，一度返回江南。此后，元廷曾两次召其回京任职，赵孟頫又两次请求回籍和外任。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久闻孟頫才望，特派使者召其回京任翰林侍读学士，历翰林侍讲学士、集贤学士，延祐二年（1315年），进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仁宗尝对群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今我朝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但仍是许多人向仁宗进言，以为赵孟頫乃宋宗室之后，不宜修国史，不宜与闻兵谋战策，均为仁宗斥退。赵孟頫作为文学侍从之臣，也可说是眷遇甚隆了。

延祐六年（1319年），孟頫以年老再三奏请回里，仁宗方准给

假。第二年即派使促其回朝，因病不克行。英宗继位，又两次派使存问赐衣物。1322年，在原籍逝世。元廷追封其为魏国公，谥文敏，遗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博学多才，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当时即有书画冠绝古今，名满天下之誉。在经学方面，他曾著《尚书注》；在音乐律吕方面，有《琴原》、《乐原》两篇。在文学方面，他的文章虽多碑铭序记等 番皇典丽之作，但他少数的游记、题跋等散文，简洁清俊，是他文章中的精品。当然，他文学上的代表作是诗歌，言志抒情，有的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田园的热爱，有的表达了他人仕元朝的负疚隐衷，有的表达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如：“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莫向西湖歌此句，水光山色不胜悲，”等句，都是出自真情的流露。他在济南三年，留下了不少诗篇，尤以《趵突泉》诗，影响最为深远。明清以来，诗人咏趵突泉，很多都是和赵氏原韵。颈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为传世名句，堪与济南的泉湖争辉。

当然，他的最高成就是书法与画。在画方面，他笔下的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不精绝。当时人即赞他“画入逸品，高者讲神”。“气韵形似俱备者，唯吴兴赵子昂得之”。赵氏开创了一代画风，元代的画家钱选、王蒙（赵的外甥）、崔彦辅、王渊等，都属于这一派。赵氏夫人管道升也工绣善书画，长于画梅竹兰，有他夫妇二人合作的画幅传世，世人誉之为“双双清绝”。赵氏的《鹊华秋色图》，原是绘赠给他的老友和前辈，大词人周密的，此图历经名家题跋、著录，清康熙晚期传入内府。乾隆帝南巡过济，曾携带此图，在汇波楼上对照着眺望鹊华景色，并题跋其上。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赵氏传世的名画，据统计有200余幅，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有收藏，已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宝。

他的书法，与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四大家。他

尤其卓绝的是，于篆、隶、行、楷、草书无一不精。他的大、小楷书，师法钟繇及王羲之、献之父了，参以李北海，秀逸生动，遒峭劲拔。当时即被誉“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名满天下，冠绝古今”，虽不免稍过，但赵氏书法造诣之高，是足可上追魏晋唐贤，与之媲美的。影响深远，于书苑中自成楷模。

赵氏给济南也留有书法文物。清康熙时，有位孙氏的园丁，在砚溪整治菜畦，发现了赵氏篆书的诗刻石一方，殫刻七古、七绝各一首，七古诗是：

抱膝独对华不注，孤襟四面天风来。
泉声振响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
散发不冠弄柔翰，举杯向月临空阶。
有时扶筇步深谷，长啸袖染烟霞回。

七绝诗是：

竹林深处小亭开，白鹤徐行啄紫苔。
羽扇不摇纱帽侧，晚凉青鸟忽飞来。

末款是“同知济南总管府事赵孟頫题”。查这首七绝，见赵氏《松雪斋集》，但七古未收入，是赵氏的一首佚诗。赵氏的篆书传世又较少，这方石刻弥足珍贵。刻石现藏济南市博物馆。

据计赵氏传世的碑贴最多，最流行的有《宝云寺碑》、《张留孙碑》、《头陀寺碑》、《泗州普照寺碑》、《赵府君阡表》、《鲜于墓志》及《天冠山贴》、《赤壁赋》、《洛神赋》、《闲邪公》、《雪赋》、《四体千字文》等数十种，传世的墨书真迹也不少，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奇珍。

（张昆河）

七聘堂主张养浩

“我济富山水，人称名上乡”。在历史的长河中，济南这方宝地，的确是湖山代有才人出，即使在那崇尚武功，“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代统治时期，还出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古文家、诗人兼散曲家张养浩。

张养浩(1269-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祖籍章丘，自他祖父起，迁居历城北园。他少年时即刻苦攻读，早负文名。方20岁，经荐举任东平学正。23岁北游大都，上书中书省平章政事不忽木，为不忽木所赞赏，辟为礼部令史，历御史台掾、中书省掾，与元明善、曹元用并称“三俊”。外放任堂邑县尹、博平县令，都有惠政。

1301年，元成宗病死，其侄武宗海山即皇帝位。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拣选才俊任太子宫僚，张养浩受召任太子司经，继转太子文学，调监察御史。

皇室的过度奢侈，造成财政困难。武宗采纳权奸脱虎脱、三宝奴建议，另立尚书省专司理财，也就是专管增添税收，加强搜刮。命二人为左、右丞相，总治百司。诏书宣布，朝野震动。张养浩不畏权奸，上疏请停建尚书省，并在朝堂上引据世祖忽必烈时曾两次另建尚书省理财，结果是奸相阿合马与桑哥祸国殃民，万方怨恨的往事应作为鉴戒。遂又奏上万言的《论时政疏》，针砭时政十大弊病，如赏赐太侈、名爵太轻、幸门太多、异端太横、取相

之术太宽等，都是针对皇帝和权相的。这样的奏疏，武宗海山当然不纳，更触怒了脱虎脱、三宝奴。张氏得到的是革职不再录用的处分，脱虎脱还阴谋罗织罪名加以陷害。张氏见大祸将临，只好孑然一身，潜归乡里。

不到两年，武宗病死，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他即位后第一道诏书就是撤销尚书省，并将奸佞脱虎脱、三宝奴等处死。召回张养浩任中书省右司都事，不三年，擢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秘书少监、礼部侍郎，又两年，升礼部尚书。

仁宗采纳李孟、程巨夫、张养浩的建议，恢复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选拔才能。延祐二年（1315年）张氏任知贡举（大主考），主持了元朝的首次进士科考试；延祐五年又主持了第二次进士科考试。他兴奋地写了《贡院试笔》诗，表示要“得人麟凤瑞中原”，要“莫使刘蕡李豸冤”，也就是要选拔有文才有品节、敢直言时政的贤能士了。张氏是实现了他的愿望的，第一次取中了张起岩等56人，第二次取中的崔希贤等50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元史中有卓越成就的人物。张养浩以文章选拔人才的识力，对当时确实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

仁宗在位的10年，是张氏在政治上有作为的时期，1320年仁宗病逝，由16岁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继位，张养浩调参议中书省事（丞相助理）。英宗要在灯节时在宫中大张灯火为鳌山，张氏知道这是奢侈荒嬉的苗头，又上疏切谏。英宗闻有谏疏来，甚为恼怒，但看完了张氏奏疏，反而喜道：“非张希孟不敢言，有臣若此，吾复何忧！”立罢灯火，并奖赐张氏织金帛。

正在这帝誉方隆，下一步即会就任副相时，张氏却以父病归侍为理由，坚决辞职，返回济南。如从当时政局看，这是有根由的。原来在仁宗时，右丞相铁木迭儿，因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罪恶累累，为仁宗罢免，几乎杀掉。当仁宗方逝，英宗还未即位，这个名列《元史》奸臣传的巨猾乘机又回到丞相职位，大权在握，展

开血腥的屠杀与残酷的打击，刚正之臣，排斥殆尽。张养浩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只得急流勇退，回济隐居。他吟出了“正胶漆当思勇退，到参商才说归期，只恐范蠡张良笑人痴！”的散曲小令，道出了不与权奸共事、朝事难为的心情。

张氏息影云庄，将厅堂取名“遂闲堂”，荷塘取名“云锦池”，在园林里筑了“绰然”、“拙逸”等5座亭子，罗致了10座玲珑清古的太湖石分列园中，呼之为“十友”。以赋诗吟曲遣情见志。他在文学上不朽的代表作品散曲，大部分是在这时写出的。

他在归里的8年中，元廷先后6次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高位征召，他均坚辞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连年大旱，饿殍盈野，元廷又第七次下诏，征召张氏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主持救灾。这时，张氏在济南城里宪衙街（今省府前街）新建的住宅方落成，诏使到来，张氏即受命，“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毅然就道。

当张氏行到河南的新安硃石一带，看到“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饿殍盈途不忍看”的惨绝人寰的景象，他一面囑地方官设法救济生者、掩埋死者，一面凄惶地赶到西安。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开仓赈济，散发库存钞锭（纸币）办理平糶，劝谕富民出粟给予奖励等办法。他未有一日安居，亲自周历各县督视赈务，昼夜过度劳累，心身交瘁。仅仅4个月，虽救活秦民百万，可张氏竟因劳染疾而卒。“秦民痛悼如失父母”。死后，元廷追赠摅诚宣惠功臣，封滨国公，予谥“文忠”。

张氏遗榇归葬济南北园云庄庄东（明清以来云庄即名张公坟庄），坟墓现为济南市文物保护单位。他在城内的新居，因张氏曾经元廷七次征召，其弟子张起岩为取名“七聘堂”，以彰张氏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明初改为张文忠公祠，有后裔奉祀。旧有明初的张氏塑像及元代《七聘堂记》碑、张氏家训碑、张氏手书诗词碑，均毁于十年动乱时。

张氏遗著传世的行政论文《为政忠告》，全书贯穿着儒家正统的爱民恤民、勤本富民的思想。有诗文集《云庄类稿》245卷，他的散曲集《云庄休闲自适小乐府》一卷，可以说是元散曲中的珍品。传世的元散曲，多是写酒楼歌馆男女风情的，而张氏之作则多是歌颂河山田园风光与揭露宦海险恶、同情贫苦群众的作品，和他的爱民恤民的思想是一致的。

张养浩在政治史、文学史上，永远闪烁着光辉。

（张昆河）

历史学家张起岩

我国史学著作，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为世界各国之最。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把史部分为15大类，首列为“正史”类。所谓“正史”一词，初见于《隋书》，是由朝廷认可的历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只有《史记》是通史），到了宋代，正史已有“十七史”，明代又增加了宋、辽、金、元四部为“二十一史”，清修《四库全书》又增添《明史》，补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号为“二十四史”（近日出版商又加《新元史》称“二十五史”）这24部权威的史书。其中有3部都出自济南学者张起岩之手，他担任《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总裁，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精力。

张起岩（1285~1352年）字梦臣。祖籍章丘，其先人于五代时迁居禹城，其高祖任权知济南府事，才徙家济南。其曾祖以下各

代均任地方官员，其父张范任四川省儒学副提举。起岩生在一个仕宦读书人家，幼年时随父亲读书受教。20岁起任福山县学教谕，后迁任安丘。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他中了第一名进士，时年30岁。

张起岩是一位干练多才的人，成进士以前，任福山教谕的时候，一度代理县令的职务，判案子听断明允，受到居民的拥戴。中进士后，曾任燕南廉访使，他敢于搏击豪强，贫民赖以吐气。他主持修治滹沱河水利工程，消弭了水患。他在朝廷任官时，敢于和丞相当面争辩，任御史时也敢于向皇帝抗章谏诤。他擅文章，又善书法，工篆隶各体。他与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同乡又同时。至治三年（1323年）他为济南的全真教庙宇迎祥宫撰碑文，亲自书写，并请张养浩为之篆额。这座元代济南的两位著名文人的合作文物，于1985年春在舜井街出土，现重立于此街之舜园中。

张起岩长期在朝廷任史官。在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一职期间曾奉命修撰《三朝实录》。元朝在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主要因“义例”未定。一种意见认为仿《晋书》例，只修一部《宋史》，而把辽、金作为《载记》，附于《宋史》之中。一种意见认为应依照《南史》《北史》的方式，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依此争论不已，拖了60多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2年）才确定分修宋、辽、金的史书，使三史并列，诏张起岩参加修撰。这次史局由丞相脱脱任都总裁，同时又任命总裁若干人。总裁的前二名为平章政事（副丞相）帖睦尔达世、御史大夫贺惟一，第三名以下才是翰林史官。张起岩以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的名义出任第三名总裁，著名学者欧阳玄也以同样名义出任第四名总裁。第五名以下的总裁，人员在三史中各有不同。显然，其实际担任主编者应是张起岩和欧阳玄二人。史载，张起岩主编三部史书时“熟于金源典故。宋儒

道学源委，尤所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审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史·张起岩传》）

这三部史书，卷帙浩繁，尤以《宋史》字数为《二十四史》各史之冠。列传有2000人，《志》的分量巨大，《食货志》是《旧唐书》的7倍，《兵志》是《新唐书》的12倍。全书共496卷，计800万字。但是成书时间却十分短促，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辽史》160卷，只用了11个月就完成。《金史》135卷，也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部集体参与而又限时短期完成的书，当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被讥为“繁芜杂乱”。但是从另一观点来看，却从而保存了更多的史实，比高谢史法标榜简洁的史书（如《新唐书》）的价值更高、更可靠。

张起岩生得“面如紫琼，美髯方颐，而眉目清扬可观，望而知为雅量君子”（《元史·张起岩传》）他性情刚直不阿，临政决议，坚持而不可回夺。史称其“或时而折人，而颈发赤，不少怨，庙堂惮之”。但是他却以孝友闻名，年轻时至外任教师，自己背米从百里外回家以养父母，抚养幼弟，使之学成就仕。亲族中无力埋葬者他予以资助，并买祭田以供族人公用。凡获朝廷的俸赐，也都与亲友共享。以致去世之日，仓无余粟，家无余财，抖着两袖清风而去。

张起岩除了《三朝实录》及《宋史》《金史》《辽史》之外，尚撰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诗文集，可惜已经佚失了。

（徐北文）

元代词人刘敏中

刘敏中(1243~1318年),字端甫,号中庵,章丘西皋村人。

刘敏中的祖父刘鼎,在金末战乱中,参加了张荣的部队,割据济南以东广大地区,保境安民。张荣归降蒙古,刘鼎被任命为广威将军、益都总判兼安慰济南、淄、德军民劝农使。敏中之父刘景和,中山东乡试第十一名,仕为山东转运经历,以疾免归。

敏中少年聪慧,勤奋好学,所为诗文,深受散曲名家杜仁杰的赞赏。二十余岁,应召入朝,为中书掾,后升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时右丞相桑哥执掌朝政,深得元世祖宠信。桑哥结党营私,恣为不法。敏中上书弹劾桑哥,皇帝置之不理,遂愤而辞职。不久,朝廷起用敏中为御史台都事(御史台长官),同僚王约,得罪桑哥,被免官待罪,桑哥6次上书,要治王约以死罪。敏中杜门称疾,上书辞官,以示抗议,王约终于被赦免。但敏中也被桑哥排挤出京,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桑哥获罪罢官后,他又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国子监祭酒。

元成宗时,刘敏中仕为集贤殿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参与朝政。成宗崩(1307年),左丞相阿忽答等密谋推戴皇后伯要真氏称制听政,敏中力主迎立宁王海山为帝,得罪阿忽答,被逐出京。皇后称制的阴谋失败,宁王继位,是为元武宗,敏中再度入朝为集贤殿学士、太子赞善、商议中书省事。后外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淮南廉访使、山东宣抚使等职,晚年因病辞官归乡。

刘敏中为元初一代名臣，他居官清廉，刚正有识，史书称他“不积贮私财，不谈论钱物，坚守道义，从不苟且图谋升迁。入朝任职一定要对朝政国事有所纠正补救，引古论今，从容不迫”。元仁宗即位时（1312年），特召世祖一朝熟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15人进京“同议庶务”，刘敏中即是其中之一。

刘敏中学识渊博，有《中庵集》25卷传世，另有《平宋录》3卷，记叙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巴颜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及宋幼主赵昀被俘北迁事，很有史料价值。

刘敏中是元代著名的词人，他的词今存149首，收于《中庵集》中。清初朱彝尊编辑《词综》一书，选词素称严格，他的词在入选之列。清末朱孝臧辑刊词集，编《中庵乐府》一卷，收词26首，列为《强村丛书》之一。足见他的词作对后世颇有影响。

刘敏中的词，主要是表现他对仕宦生涯的厌倦和对隐逸生活的热爱，抒写了一个置身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为官数十年，他饱尝了“薄领埃尘、鞍马风沙”的劳苦，看厌了“搔瓜钻梨”、“兵鏊蜗角”的争逐，经受过“才见凌风霄汉上，忽看垂翅蓬蒿底”的浮沉，这使他苦恼厌倦、心灰意冷。在《摸鱼儿·九日上都次韵答邢伯才》一词中，他写道：

……龙钟态，也向人前叉手，思量难以持久。东涂西抹皆倾国，只有效颦人丑。嗟汝叟，今误矣，江亭好去藏衰朽。鸡鸣吠狗，尽里社追随，何须更说，鼻醋吸三斗。

晚年辞官归乡之后，则多以清丽小词，描山摹水，抒写他对故乡风物的热爱和恬淡闲适的情怀：

众山围绕纵横路，中庵正向中间住。花木四时开，沙鸥日日来。门前车马驻，不得中庵趣。下马问中庵，庵中睡正酣。（《菩萨蛮·山居遣兴》）

宋末元初，江南词人多承“婉约派”之风，以浓丽绵密为长。而北方金、元词人则受苏轼、辛弃疾词的濡染。刘敏中的词，风格

也是以豪放俊逸为主,很少婉媚纤柔之作。他的长调慢词,“雄廓而不失之于伧楚,酝籍而不流于侧媚”(《蕙风词话》卷三)。短词小令则写得语淡态浓、清新明丽。就艺术成就而论,刘敏中是足以和元初著名词人刘采中、刘因并称的。

(李永祥)

元杂剧作家武汉臣、岳伯川

元代的济南,是京城大都(今北京)以南的第一个大都会,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百业兴旺,士民辐辏,文化发达,因此,也就和山东境内的东平、惠民一起,成为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所作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就是以济南为背景的,这说明关汉卿曾在济南进行过戏剧活动。

关于元代杂剧的文献资料很少,仅见钟嗣成《录鬼簿》等数种,远远不能反映当时创作的繁荣情况。钟嗣成是元代后期人,祖籍开封,寓居杭州,他在《录鬼簿》中著录元成宗大德年间(1300年)以前的前期元杂剧作家仅56人,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而其中济南的著名作家就有两位:即武汉臣、岳伯川。

武汉臣,《录鬼簿》载其为济南人,事迹不详。元末明初淄川著名杂剧作家贾仲明补作《凌波仙》一曲吊之,曲云:

先生清秀济南人,风调才情武汉臣。登坛拜将穷韩信,老生儿,关日真。新传奇,十段皆闻。听泉水,看暮云,如此黄昏。

据曲词可知，武汉臣以“风调才情”闻名于世，所作杂剧 10 种，流传广远，直至明初，贾仲明还都见过。他大概久居故土，一生未仕，过着一种“听泉水、看暮云”的闲适悠然的生活。

据《录鬼簿》记载，武汉臣的 10 种杂剧是：《曹伯明》、《鲁义姑》、《天子班》、《三战吕布》、《老生儿》、《挂甲朝天》、《关山怨》、《登坛拜将》、《提头鬼》、《玉堂春》。今仅存《老生儿》一种，载于明代臧懋循编的《元曲选》。另外，《元曲选》还有《玉壶春》一剧，写书生李斌（号玉壶生）与嘉兴名妓李素兰的爱情故事，署名为武汉臣。然而，据《录鬼簿续编》，当为贾仲明的作品。《录鬼簿续编》就是贾仲明作的，自己录自己的作品，不会有误。恐怕是臧懋循把《玉堂春》误为《玉壶春》了，又据曹寅（棟亭）所刊《录鬼簿》版本：《玉堂春》全名为《郑琼娥梅雪玉堂春》，可见此剧与后世盛行的“苏三起解”的《玉堂春》也毫无关系。

《老生儿》全名为《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一部家庭伦理剧，写东平府刘从善经商致富，年老，膝下仅有一女，招婿张郎。从善有侄名刘引孙，父母早亡，依从善为生，为从善之妻所不容，逐出门外。从善纳婢小梅，有孕，女婿张郎欲害之，赖从善女儿刘张暗中救放。从善将家产交与女婿掌管。后值寒食，从善命女婿张郎备祭品到刘家祖茔上坟，却发现女婿以供品至张氏祖茔祭祖，刘家祖坟前只有贫困潦倒的侄儿引孙拜扫，于是从善之妻感悟，从善也将女婿管家产的钥匙要回，暂交侄儿掌管。婢女小梅携从善之子认父，从善晚年得子，十分高兴，便将家产分做三份，交给儿子、女儿和侄儿。

剧本所反映的是宗法制度下带有普遍性的财产继承问题，今天看来，剧本所表现的价值观念是不合理的、过时的。不过，剧本的关目紧凑、曲词苍劲浑朴，有相当高的艺术性。

岳伯川，曹寅所刊《录鬼簿》版本载其为济南人，或云为镇江人。贾仲明作《凌波仙》曲吊之曰：

老父共汝不相知，《鬼簿》钟公编上伊。度铁拐李岳新杂剧，更梦断杨贵妃。口玉京，燕赵名驰。言词俊，声调美，衰草烟迷。

据曲所云，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也仅是从《录鬼簿》中得知岳伯川的姓名和作品的，其他事迹一概不详。贾仲明评其剧作“言词俊、声调美、衰草烟迷”。是说他的曲词有一种悲婉凄迷的特色，当是针对其《杨贵妃》一剧而言。明初另一位著名戏剧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则说：“岳伯川之词如云林樵响。”则又赞赏其曲词风格清新悠远，当属“志在泉石”的“草堂体”（《风太和正音谱》卷上）。

岳伯川的杂剧，《录鬼簿》著录两种：即《杨贵妃》（《罗光远梦断杨贵妃》）、《铁拐李》（《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今仅见《铁拐李》一种，载于臧懋循《元曲选》。

《铁拐李》是一部神仙题材的剧作，写北宋时郑州六案都孔目（吏职名，是州衙门吏员的总管）岳寿有神仙之分，上洞八仙之一吕洞宾特来化度，岳寿不悟，反以为是疯道人，命手下张千将吕洞宾吊在门外。时郑州官吏滥污，朝廷特派韩琦为廉访使前来查究，韩琦化装为村老汉，进行私访，至岳寿门前，放走了吕洞宾。岳寿大怒，命张千扣住韩琦责问，张千又向韩琦勒索财物，韩琦只得亮出身份，并命岳寿明晨洗净脖子，到州衙试上方宝剑。岳寿惊恐而死，魂至阴曹，吕洞宾向判官说明原委，判官许放岳寿还魂，不料尸体已被其妻焚化。恰值城中李屠夫之子李拐儿新死，遂借尸还魂，经过这一番生死周折，岳寿遂参透世情，改名李岳，随吕洞宾出家学仙而去。

剧本情节曲折生动，结构巧妙，富于浓郁的喜剧气息，对当时官吏欺凌平民，凶诈贪婪，有十分生动的描绘。曲词风格也属悲慨苍劲一派。

（李永祥）

坚守济南的铁铉及铁公祠

明建文二年(1400年)山山东参政铁铉领导济南军民进行的反抗燕王朱棣的济南保卫战,是济南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

铁铉(1366~1402年),明代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人。由国子监生员入仕,授礼科给事中,调都督府断事,曾主持审理一个疑难案件,很快就审断明白,故深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亲自为他赐字“鼎石”。朱元璋去世以后,由长孙朱允炆继位,为明惠帝。惠帝为巩固帝位,听取大臣建议,决定削藩(朱元璋在世时曾分封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南下,实际上是要夺取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惠帝派人将军李景隆征讨,铁铉时任山东参政,负责督运粮饷。李景隆兵败,河北及山东北部城池,皆望风而溃,第二年四月,朱棣大军直逼济南城下。

铁铉决心坚守济南。他指挥济南军民突击加固城防,严阵以待。朱棣将济南围定之后,先令人将一封劝降书用箭射进城内。铁铉收到劝降书后,也叫人射到城外一信。朱棣打开一看,见是《周公辅成王论》一文。原来铁铉以此劝他效法辅佐侄子治理国家的周公,不要违背明太祖旨意,忠心辅佐惠帝。朱棣见劝降不成,遂令攻城。燕军攻势甚猛,但多次强攻均被守城军民击退。燕军架起云梯攀城,铁铉便令士兵往云梯上浇火油,引火焚烧;燕军炮火将城墙轰破,铁铉便令士兵用帐篷裹上草席塞在破损处,

同时加紧抢修。燕军竭尽全力，仍攻不下，朱棣便准备扒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城。为了减少济南百姓的损失，铁铉决定以诈降之计，诱杀朱棣。

一天，城西门忽然大开，1000多军民涌出城去，跪在燕王马前哭诉起来。他们对朱棣说：“我们误会了大王的本意。大王发兵除奸，是为了国家，可我们却误认为大王要荡平济南府。我们不想再打仗了，决心向您投降。请大王暂且退兵，明日大王可亲自入城受降，我们将设盛宴迎接大王。”朱棣信以为真，便叫大部队后退，准备翌日进城受降。

第二天，燕王在城中派来迎接的向导接引下，率轻骑自西门入城。当朱棣一行刚刚进入城门时，向导高喊一声：“千岁驾到！”刹那间，城门上倏地落下一块大铁板，朱棣坐骑的头被铁板砸烂了。朱棣落马，惊魂稍定之后，知是中计，忙夺过随从的马，掉头便逃。城头上管吊桥的士兵赶紧拉吊桥。桥还没来得及拉起，朱棣已抢先过了护城河，得以生还。

朱棣回营后，怒火中烧，非要拿下济南不可。他调来数门大炮，日夜轰城。由于炮火猛烈，城墙多处被毁，济南危在旦夕。铁铉又施一计，他叫士兵制作一些明太祖朱元璋的大灵牌，分别插在城墙破损处。朱棣见城上有父皇灵牌，不便再用炮轰。铁铉趁机组织人力修补城墙，继续固守。燕军久攻不克，兵士无心久战，在围城3个月后，朱棣终于引军退走了。铁铉见燕军撤走，又率军出城追击。燕军无心恋战，大溃而去。

济南解围之后，铁铉在大明湖天心水面亭设宴，犒赏将士。惠帝朱允炆遣官赐金慰劳济南守军，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升为兵部尚书。

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东山再起，鉴于上次济南城下惨败的教训，此次朱棣特率军绕道南下，经灵璧、宿州，最后攻下金陵，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自立为帝，改年号永乐。建文四

年(1402年)，铁铉在淮南被俘。朱棣亲自审问铁铉。铁铉反背坐于庭中，大骂朱棣无道。愤怒的朱棣令人割下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不屈服，最后被一刀刀地凌迟处死，时年37岁。

铁铉遇害之后，其父母被发配到海南，妻子女儿被充为军妓，长子充军，次子为官奴后被虐待而死。

自明代中叶起，当时的官府便先后在华阳宫为铁铉塑像，在七忠祠为铁铉设立祀位。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在风光秀丽的大明湖北岸修建了铁公祠。铁公祠的修建，固然有封建统治者对忠君臣子的表彰之意，但也反映了济南人民对忠于职守、誓死卫城的铁铉的缅怀之情。现在，铁公祠已成了大明湖畔一著名景观。这里面临小沧浪亭，有莲池曲廊、奇石修竹，漫步其中，可领略江南园林之趣，极目可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绘形绘色地描写了在铁公祠观佛山倒影的情景，可惜的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人们已无当年老残的眼福。

(荣斌)

明代“前七子”的中坚边贡

有明一代，“前、后七子”蜚声文坛。边贡为“前七子”的中坚，又被列为“弘正四杰”之一，王士禛《华泉先生诗选序》云：“吾济南诗派人昌于华泉、沧溟二氏，而筭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席”。由此可见边贡地位之重要。

边贡(1476~1532年),字廷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太常博士。因直言敢谏,又不愿媚事宦官刘瑾,正德间外放为河南卫辉知府、荆州知府、河南提学副使。嘉靖间起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嘉靖十年(1531年)致仕归乡,在大明湖畔筑万卷楼,收藏书籍、金石甚富。嘉靖十一年,书楼为大火所焚,他仰天大哭曰:“甚于丧我也!”遂发病而卒。

边贡的文学成就以诗为主。他的诗有许多送别怀人、赠答唱和之作。如《送周判官》:“一官成岁晚,共惜子云才。驱马国门路,北风声正哀。山形横塞起,边色映空来。感慨登临处,残阳照古台。”对“胸怀子云才”而晚岁得官的周判官充满怜惜之情和依依惜别之意。北风边色、残阳古台,把这种感情衬托得深厚动人,意味悠长。而他的《送王本一如辽阳》:“送君无奈别情何,五日生朝客里过。心逐旌旗离汉徼,梦随春柳度辽河。重关复岭狼烟接,暮雨朝云海气多。应有大篇吟出塞,不须停马问干戈。”则一反缠绵悲哀的送别诗旧路,境界壮阔苍茫,感情豪爽雄健。

游览山水、登临古迹也是边贡诗歌的重要内容。边贡的家乡济南,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北临黄河,南倚泰山,得山川之形胜,在两次丁忧家居和致仕归乡期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游踪,大明湖、千佛山、龙洞山和郊野田园的美丽风光都被写进诗中。如《七月四日泛湖,次暮吞佛寺韵》:“湖上扁舟寺里登,水云如浪白层层。横桥积雨斜仍断,卧石临溪净可凭。却过竹林忘问主,欲寻莲社恨无僧。酒酣更向城南眺,落日满山烟翠凝。”千佛山寺和空中的白云倒映在大明湖中,小桥流水,斜雨竹林,好一派秀丽风光。而城南的苍山翠烟更使济南景色美不胜收。此外,边贡在荆州、南京等地任职期间,也写了许多描写山水古迹的诗篇,且各有不同的风貌。

边贡的诗歌也有一些言怀感事之作。边贡自京师外放,可以说是不获重用的表现。他的《自感》诗表现了他对自己身世的感

慨：“春堂华烛照端居，自感行藏冷笑予。南郡一麾聊复尔，旧京三转欲何如。年华强半稀闻道，月俸无多苦积书。争似骖鸾向云海，驭风长曳紫霞裾。”诗人对出知荆州、任职南京只能以“聊复尔”的态度自嘲，对个人行藏只能“冷笑”置之，而“年华强半”、“月俸无多”的处境又使他感慨系之，因而产生了出世脱俗之想。然而，边贡毕竟是一个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即使在愁苦抑郁之际，忠君报国之志仍在。他在《次韵寄王先生四首》（其三）中写道：“博得荆南五裤歌，一钱囊底奈贫何。匣中犹有龙泉在，闲就巴江石上磨。”反映了他壮志未灭的心态。他也有些诗篇表现了对内乱、边患的忧虑，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说明边贡乃是一个关怀国事、热爱人民的诗人。

“前后七子”倡言“诗必盛唐”，边贡也不例外。但他学习唐诗并不只是模拟其字句，而是学习唐诗的兴象情韵，表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的诗善于捕捉和描绘鲜明生动的意象，较少抽象枯燥的叙述和议论。如《观城歌》（其二）“睥睨连云十二楼，西南形胜数荆州。已教岷首为屏绕，更遣巴江作带流。”形象与意趣兼胜，高华壮丽，不减盛唐气象。《泰山回马岭》：“回马岭前春日西，涧花岩树郁萋萋。上方钟落不知处，唯见白云岩畔栖。”确实形象飘逸，言有尽而意无穷。一般来说，边贡的诗既不怒张呼号，也不软言娇语，可谓之“沉稳”，语言有词彩而不雕琢，音韵和谐，自然流畅，可称之“流丽”。故陈子龙《明诗选》云：“能于沉稳处见其流丽。”可谓说中了边贡诗风格的主要特征。

边贡的散文也有若干可取的篇章。他的《言边患封事》一文，弹劾太监苕逵等人的欺妄失事之罪，其刚直无畏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复张孝伯宪副书》和《复同年魏中丞书》拒绝了前辈和同年关于越境入学之托，指出养士之道要以文为标准，其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令人敬佩。他的《县令丞簿史题名碑记》、《祭尹冢宰文》、《今雨轩记》等则表现了作者重视名节、仁政爱民的思想，无

疑也具有进步意义。

(许金榜)

著名戏曲家李开先

一提起李开先，凡熟悉中国戏曲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他的传奇《宝剑记》。

《宝剑记》以林冲故事为题材，是明中叶三部重要传奇之一，也是这位现实主义戏曲家李开先的代表作。雪蓑在《宝剑记序》中，曾对其作过这样的评价：“是记则苍老浑成，流丽款曲，人之异态隐情，描写殆尽；音韵谐合，言辞俊美，终篇一律，有难于去取者……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才思文学，当作古今绝唱。”这部传奇的第三十七出，当时的昆曲界题名为《夜奔》被搬上舞台，久演不衰，至今仍为昆曲中的一个优秀剧目。由此可见，李开先的戏曲艺术，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其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

李开先，字伯华，号称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今济南章丘市）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生，隆庆二年（1568年）卒，享年66岁。李开先26岁（嘉靖七年，1528年）举乡试第七名，27岁中进士，一年后在户部任主事。此后曾历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职。40岁（嘉靖二十一年）时，因九庙失火，上书自陈乞休，权相夏言趁机挤陷，遂罢官。从此，隐居故里，潜心于民间

文艺的搜集整理，以及戏曲诗文的创作，直至终年。

李开先天资聪颖，少年能文，一生喜藏书，善诗文，精通音律，擅长词曲。与王慎之、唐顺之等人号称“嘉靖八才子”。在任时，曾与当时的杂剧名家康海、王九思诗曲唱和，相见恨晚。罢官后，自蓄歌伎，致力于词曲，尝自谓“书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声四十人”，也有人赞他“年几七十歌犹壮，曲有三千调转高”。他对金元词曲颇有研究，曾校刻乔梦符、张小山散曲，并改定编刻元人杂剧多种。他一生的著作除今存传奇《宝剑记》外，还有传奇《登坛记》、《断发记》（此剧作者有不同看法），诗文有《闲居集》，院本有《一笑散》6种，散曲有《中麓小令》、《四时悼内》等，杂著有《词谑》、《回品》、《诗禅》、《中麓拙对》、《中麓续对》等。解放后，中华书局曾出版路上编的《李开先集》。李开先的诗文及其他著作虽不如戏曲的影响大，但总的看来，在反映现实或评价人物与作品上，也都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和高尚精神。

明嘉靖年间，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有所抬头。由于李开先受到市民阶层追求民主倾向的影响，他的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都是比较进步的。

在政治上，李开先正直刚烈，为官清廉，素有保国佑民之志，一向敢于和恶政权奸做斗争。他19岁那年，因看到家乡徭役奇重，人民生活极端痛苦，曾愤然闯入县衙为民请命，与县令当面辩理。在京为官期间，目睹明王朝腐化堕落，骄奢淫逸，不断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奸臣祸国，忠良受害，致使干戈扰攘，黎民涂炭的黑暗现实，内心充满无限愤懑，因此与当时窃居高位、恣意弄权的权相夏言、严嵩一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曾坚决支持过茅鹿门攻击奸党的正义行动；曾为旱灾遍地、难民流离，夏言、严嵩等一味迎合皇帝朱厚熜崇奉道教，不理朝政，在宫中大兴土木举办斋醮之事，慨然上书进行谏诤，对夏言的腐败内阁提出尖锐抨击，充分表现出他忧国恤民的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在隐居

生活的 27 年之中，表面看他终日盘桓书林，似与现实斗争完全脱离，但实际上他并未忘却国家的安危与人民的命运。他面对北方俺答和南方倭寇的猖狂入侵，写出了不少悲愤忧虑的诗篇。一方面对山河破碎，个人无能为力，表示了忧愁与愤慨，另一方面则对无能将帅那种“虏至避其锋，虏归尾其后，拾得牛马还，边功便借口”的无耻行径表露了无比的痛恨。更值得称道的是，在“所行老骥今伏枥，失水游鱼不跳梁”的困顿失意之中，他满怀铲奸除恶、辅弼国朝的豪情壮志，挥笔创作了他的重要传奇《宝剑记》，在这部使明代剧坛大放异彩的作品中，他借林冲逼上梁山，兵发汴京，迫帝除奸，手刃高俅父子的故事，借古讽今，对朱明王朝腐败黑暗的政治现实，对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权臣奸佞，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笞，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改变痛苦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在文艺思想上，李开先与当时的正统文人也迥然不同。他坚决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文风，并对当时流行于文坛的模拟剽袭古人的假古董风气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主张文学作品应当反映现实的政治生活，应该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别出心裁的独创精神。他曾以诗画为例说：“画宗马、夏，诗宗李、杜，有恒言，而非通论也……他画他诗，宜别有宗，乃亦止马、夏、李、杜可乎？本木强之人，乃效李之赏花酌酒；生太平之世，乃效杜之忧乱愁穷，其非本色，非真情甚矣。”他要求文艺创作表现作者个性，反映具体生活，这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李开先对民间文艺尤其喜爱和重视，隐居乡里之后，曾搜集编纂过许多民间歌曲和谣谚，作品有《市井艳词》、《南北插科词》、《傍妆台小令》等等。在创作中，他非常注意吸收民间文艺的营养，所以他的诗文、散曲乃至传奇，在语言风格上，都比较朴实清新，浅近活泼，极富民间文学的色彩，与当时的所谓台阁体、拟古派、复古派的偃滞文风，绝非同流。

当然，由于封建阶级和官僚生活方式的影响，李开先的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基本上仍属于封建正统的范畴，在哲学观念上也有比较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但即使如此，遵照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的基本原则，我们却不能不对李开先——我国文学史上较早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进步作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张蕾）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

李攀龙(1514~1570年)，字于鳞，历城韩仓(今济南市东郊)人。自号沧溟，世称沧溟先生。明代“后七子”领袖，著名文学家、诗人。于明嘉靖、隆庆年间主盟文坛20余年，诗名高于当代，影响及于清初，为一代诗文大家。

李攀龙先世无所称名，其父李宝“以资事德庄王为郎，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攀龙9岁而孤，家无余资，赖母张氏纺织度日。18岁入县学为诸生，廪于郡庠，与尚为少年的殷士儋(后为大学士，有文名)、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诗人)约为知交。平日奋发向学，然不甘“帖括之业”，“耻为时师训诂语”，而爱好古代诗文，疏狂任放，人目之为“狂生”。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李攀龙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是其入仕之始。此后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因不

党附权臣严嵩，官凡三迁，辗转郎署，未得重用。其间，与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酒唱和，情趣相投，遂结为诗社；其论诗主张，与“前七子”相倡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

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出为顺德（今河北邢台市）知府。三年任期中政绩卓著，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而又给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如请蠲民税，减轻百姓负担；政刑宽简，民无诉讼；增设驿站，减轻人民劳役之苦等，表现出一个正直官吏为民请命、视民如伤的品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夏，李攀龙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到任不久，由于不能忍受陕西巡抚殷学挟势倨傲的作风，遂以母老归养为由，上疏乞归，未获批复，即拂衣辞官。自此隐居济南10年未能起复，直至严嵩父子受到惩治，隆庆改元，始起复为浙江按察司副使，转河南按察使，卒于官。

李攀龙志操耿介，仕官期间，不党附权臣严嵩；隐居之后，不阿附权贵，对于附庸风雅的“绣衣直指，邢国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纳履错于户”，一概谢绝，“以是得简贵声”（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或仕或隐，他都时刻关心国事。为官时，体察民情，视民如伤；隐居时，仍系念沿海抗倭斗争。应该说，李攀龙是一个关心国事、廉正不苟，性情孤傲而又极富正义感的封建官吏，因此他才能创作出一些激扬着爱国情感和关心时政的诗篇。

李攀龙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与其仕官生涯相始终。在其入仕之初，“七子”结社，李攀龙树起文学复古的旗帜，明确提出“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的文学主张，并大力进行诗歌创作；由于诗才超逸，受到王世贞等人的标榜、称引，声誉渐高，遂居“七子”之首，成为文坛泰斗。当时“天下推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李攀龙更被尊为“文苑之南面王”（虞淳《徐文长集序》）。

李攀龙诗歌今存 1380 余首，其中拟古诗 210 余首，模仿痕迹较重的古体诗 190 余首；拟古、古体相加，约占《沧溟集》的三分之一。在其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近体诗，而且数量也占《沧溟集》中诗歌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评价李攀龙的诗歌艺术成就，理应以这部分近体诗为主。在李攀龙近体诗中，五言律数量较少，艺术上警绝者少，而七言律则一向评价较高，虽其极意规步唐人，而气骨风神自具，曾被认为对明代诗坛“有起衰之功”。这部分诗歌中，无论赠答、写景或悯时忧国，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赠别如《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等；写景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酬张转运龙洞之作》等；悯时忧国如《春兴》、《送张肖甫出计闽广》、《大阅兵海上》等。

李攀龙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哲学领域王阳明的心学运动相呼应，力图冲破程朱理学的桎梏，改变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文学“台阁体”的统治地位，以挽救正宗文学（诗文）的危机，从而达到现实政治起衰救弊的目的。因此，他们标榜的“复古”，实则是改革形式主义文风，以及产生这种文风的文化专制政策和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有着积极意义。只是由于封建社会已日暮途穷，李攀龙等希图通过“文主秦汉，诗规盛唐”唤起人们对汉唐盛世的期待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由于盲目尊古和一味拟古，也使正宗诗文日益失去创造性的生机，且更趋势衰微，这是李攀龙所难以预料、也无法预料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后起之拟古和形式主义的诗作，拾李攀龙之余唾，每况愈下，虽为其流弊所致，然并不应该由李攀龙负责。

李攀龙于嘉、隆之世被尊为“宗工巨匠”，蔚为一代词宗，“有起衰之功”；迄于清初，“家有其书，人耳其姓字，传诵其流风余韵不衰”（施闰章《沧溟先生墓碑》），自为一代诗文大家。其诗文创作瑕瑜互见，而其优秀作品，亦可列入我国历代优秀文学作品之林而无愧。其诗文，在隆庆年间，由其友人王世贞编辑为 30 卷，题

《沧溟先生集》，其后屡有翻刻。今有《李攀龙集》（李伯齐点校，齐鲁书社即出）《李攀龙诗文选》（李伯齐等，济南出版社出版）。

（李伯齐）

明代名臣、诗人殷士儋

殷士儋，字正甫，又字棠川，其先世系武定州人。曾祖衡，以永平训导入德府为德庄王教授，后随德庄王迁至济南，遂落籍历城。

殷士儋生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八日，自幼聪颖过人，5岁时，其父殷汝麟曾教他天干地支、月建时遁之术。有时宾客满堂，各将所生年月问他，他屈指演算无误，众皆惊叹。7岁从师读书，其父为使其成才，不惜一岁三易塾师。10岁能著文论事，14岁为秀才，19岁中举。殷汝麟得知儿子中举，在病榻上且喜且泣地告诫他：“你幸而试中，将来为吏，不可虐待百姓而负朝廷。”这庭训使殷士儋终生不违。

殷士儋父歿守孝，暂不能赴京会试。此时家境渐衰，只得设塾糊口，收入微薄，生计窘迫。逢年过节再鬻书对联，夫人崔氏售花彩，以补家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殷士儋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同年母丧，扶柩归济，守制5年不出故里，但诸儒生执经从学者众。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殷士儋回京,适嘉靖帝精心简选太子(裕王载厚)师,殷士儋中选,为讲读官。他想到以经艺事太子,关系到将来治国的大事,所以每当进讲,都斋戒、沐浴,非常认真。希望通过讲授使太子未来成为一位贤君。当讲至君德、治道所关,或理乱兴亡,以及权奸、女宠、宦寺、外戚为患等,语常激切,甚至用危言急词,来感动听者。裕王每听一篇,常敛容首肯。左右侍从,也都肃然变色。他敢于直言进谏,循例冷热天罢讲,他请求讲经要四时不辍,还要添讲祖训及《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嘉靖允其所请。

1567年,裕王登基,改元隆庆,殷士儋已46岁了。是年“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进礼部右侍郎,未几改吏部。明年(隆庆二年)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其冬还理部事。”(《明史》)居官中见酷吏贪黷,就列举古时贪黷遇祸,宽仁遇福之例,编撰了《鉴惩录》、《读法需知》,意在教化,以正劣风。殷士儋还两次“疏请‘布德’、‘缓刑’、‘纳谏’、‘节用’”,飭内外臣工讲求民瘼”,可见他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刚直清正之官。

“隆庆四年十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俄(俺答)封事成(按:指‘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事),进少保,改武英殿。”(清黄大华《明宰辅考略》)此时殷士儋已鞅掌了重权。

明代末季,党争甚烈,殷士儋与张居正、赵贞吉等主张为政廉明,体察民间疾苦,反对侵略,励精图治。隆庆五年高拱为首辅,与张四维沆瀣一气,徇私舞弊,陷害忠良。当时面对“俺答”的入侵,殷士儋力主抵抗,高拱等人则姑息养奸,委曲求全。最后“俺答”失败降明,在外族人侵时,殷士儋表现了过人的远见和胆识。

奸佞高拱、张四维等人不容刚正不阿的殷士儋,对他排挤、陷害,先劾他“进由陈拱,不可以参大政”,复劾“始进不正,求退不勇”。殷士儋知朝事不可为,于隆庆五年十二月疏辞回里。

殷士儋回济后，卜居万竹园，后易名“通乐园”，取“万民同乐”（或谓“通泝”）之意。在园内垒山叠石，疏泉筑亭，柏柳栽花，建“川上精舍”，著书讲学，从者如云。

殷士儋博学渊雅，文采斐然。明代嘉、隆年间，历下诗人号称：边（贡）、李（攀龙）、殷（士儋）、许（邦才）。殷士儋著有《金舆山房集》，惜乎传世甚稀。论者谓其诗曰：“体齐鲁之雅驯，兼燕赵之悲壮，稟吴越之婉丽，是吾乡一巨手。”他的《题蕃马图》很出名，诗曰：“玉塞无声夜有霜，橐驼五万入渔阳，平沙落日北风起，马上横梢四百狼。”气概雄伟，音节洪亮，实堪与沧溟（攀龙）树旗鼓。清王培荀评曰：“即以诗论，亦足辟易千人。”

万历九年（1581）冬，殷士儋突发股疾，翌年六月八日卒，年61岁。葬济南西南凤凰山之阳。墓至今犹存，上有参天古柏一株，枝干苍老发如虬龙，足令人凭吊。附近原吕王庄因毗墓而更名“殷家林”，现村民中不乏其后裔。

（王春贵）

文才为“一时之冠”的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7年），字可远，又字无垢。东阿县人（今属平阴县东阿镇）。其父于玘，弱冠中举，曾任平凉府同知。兄慎言，17岁举为省魁。于慎行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又受其父兄之影响，10岁即通经书，能诗。17岁入乡试列榜首。明隆庆二年（1568年）

23岁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为修撰,充日讲官。

万历五年(1577年),明神宗以御府藏画命各讲官题诗。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之,并以实相奏,神宗嘉其诚,御书“责难陈善”赐之。慎行为感“钦洒宸翰”,即赋《钦赐责难陈善》一诗答谢,一时为词林所艳称。

万历七年(1579年),御史刘台,因弹劾权相张居正被捕入狱,同僚故交多畏嫌避匿,独慎行去刑部探监。张居正父歿,按制应停职守孝三年,拥张之人倡“夺情”之议,居正为帝之师,且念帝年幼,不愿弃权离京,朝野对此议论纷纭。于慎行亦欲偕同僚疏谏居正,为吕调阳所阻,张居正闻之大怒,而责慎行说:“你是我十分看重信任的人,为何也这样做?”慎行刚正不阿,从容不迫地说:“正因为你厚待于我,所以我才这样做。”居正怫然。这时,慎行认为得罪权臣必有后患,遂告病还乡。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卒。不久,慎行应诏回京,起故官,进左谕德,日讲如故。后擢礼部右侍郎,转吏部,掌詹事府。旋迁礼部尚书。以其明习典制见长,宫廷诸大礼多由其裁定。

万历帝因皇后无子,迟迟未立太子。宫内外流言郑贵妃阴谋立己子。慎行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疏谏早建东宫,出阁讲读。万历未纳,及冬再疏,帝怒,严旨诘责。慎行不慑圣威,复言:“‘册立’乃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若不准,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不得已慎行决定引罪乞休,经允准,遂返乡。

于慎行归里后,就住在谷城山下倚山面水风景秀丽的黄石山庄,过起闲适的田园生活。他在《侯将军过访黄石山庄》诗中写道:“谷城山畔旧山家,坐客开樽对晚霞。种秫新陪陶令酒,为圃近接邵侯瓜。”(见《谷城山馆诗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始立王皇后所生之子常洛(后为光宗)为太子。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诏慎行回京,掌詹府事,慎

行疏辞不就。二年后，朝廷推阁臣7人，首为慎行，加封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慎行再辞不允，随旨入京。这时他已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觐见时已无力按礼仪行朝拜之礼，上疏请罪，归卧于家，不久去世，卒年63岁。歿后钦赠太子太保，溢文定。葬于故乡群山环绕、风景秀丽的洪范池畔。

于慎行仕途40年，有17年放闲归里。这期间，专心读书，考究历史，勤于著述。流传于世的有《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20卷等。他还以5年时间主持编纂了《兖州府志》，其中艺文部分为慎行所撰。

《谷城山馆诗集》中存诗1000余首，洋洋洒洒。他曾多次游曲阜、谒三孔，登泰山，对不少名山胜水留下了众多的诗篇。以其清丽的笔触，抒发了他对故乡景物的热爱和眷恋。诗格豪放雄廓，苍劲森秀。《谷城笔麈》以散记的形式记述了明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以及明嘉靖、隆庆、万历时内阁排挤倾轧与官场弊端的情形。史料多出于于慎行的亲历或耳闻目睹，对后人研究明史很有参考价值。

于慎行是明神宗万历时期的一位刚正不阿、清正自持的名臣，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等身的学者和诗人。《明史》称：“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之冠。”

（孔令才）

《齐音》作者王象春

在明朝末年的诗坛中，济南有一位负有“奇情孤诣，绝才异骨”之誉的名诗人，即《齐音》的作者王象春。

王象春(1578~1632年)，字季木，山东新城(今桓台，明、清时属济南府)人。他的祖父、父亲均是进士，胞兄和堂兄弟中有8人成进士，三代都历显宦，是一个有浓厚书香气的宦宦家庭。王象春自少年即聪颖好学，在兄弟中尤为突出。

他的家庭虽正在鼎盛时，可明朝的统治已是最腐朽阶段。神宗昏聩贪利，居然20余年不见臣僚，任用太监，专务搜刮，内外交困，百政废弛，朝廷上的官僚兴起党争，各种矛盾都在发展，已濒于崩溃的边缘。王氏面对的是这样的飘摇局势。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到北京应进士科考试，因文章优异，已初步拟为第一名(公元)，有人做了手脚，被抑置第二。殿试时，因对策直言当前弊政，又被压到榜尾倒数第三。榜发后，事实传出，许多人都为王氏不平，在王氏本人，失去鼎甲和玉堂翰苑，当然更为愤懑。当科场舞弊事揭发，中了会元、状元的人竟是从落卷中检出反而高中的。朝廷上群情哄动，东林党人主张追究严办，而以汤宾尹为首的浙党则百般袒护回避。在激烈的党争中，王象春也卷入这次政争漩涡，成为群小蓄意打击的一个目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顺天乡试(考举人)，王象春受任同考官。这一科又一个属于浙党的同考官

被揭发舞弊，而且核实。群小两次露丑，他们遂群起诬陷王象春，并把矛头指向主考以作报复。这次几兴大狱，经东厂、刑部追查审理，历时两年，方弄清所诬都非事实。可王氏已饱受精神折磨与迫害，结案后，暂请告病回乡休养。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王氏移居济南，购得原诗人李攀龙在大明湖畔的故居白雪楼，权且住下，游览湖山，读书赋诗。但眼前的现实，却使他激愤难平。山东已大旱两年，饥民遍城野，卖妇鬻女，树皮草根剥掘都尽。而官府还在追缴钱粮，贵族官僚依然在歌舞、酬酢中过着荒奢生活。他在4个月的时间里，写出了《齐音》这卷杰作。

《齐音》又名《济南百咏》，共107首七言绝句，分咏济南的山水泉湖、名胜古迹、节令风俗、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社会现象等。每首诗后，附有注说，以发抒诗中不尽之意。薄薄的一本，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贯穿着整个的济南地方史，成为济南的一部史志诗。在当时就有人说：“况历旧无专志，今百咏所载，千秋之作备矣。”确非虚谏。

《齐音》吟咏了济南每一处湖山、溪流、泉水，吟咏了济南每一处名胜古迹，以深挚的感情描绘赞美这些景物，表达出对大自然、对乡里、对国家的热爱，令读者的情感与之共融共鸣。

《齐音》也赞颂了给济南留下诗文的诗人李白、杜甫，文学家苏轼、苏辙及曾在济南任地方长官、文采风流的曾巩、晁无咎、赵孟頫，也赞颂了祖籍济南的李易安、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刘亮采等著名诗人。

《齐音》中较重要的部分是揭露痛斥黑暗的暴政和官僚们苛虐奢淫的诗作，也生动地勾勒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形象：有大灾之年，“委巷低门立小鬟，青衫竖草惨愁颜”，忍痛出卖儿女的穷苦市民；有“猾须怒吏声填巷”、“舆皂喧闾釀酒欢”的官衙皂役；有“今日放舟明日酒，笙歌声里失民愁”的地方长官。对照之

下，真令人深思。告诉给读者，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诗人的头脑是冷静的，他已预感到动乱将起，明朝统治之将倾覆，在《元宵》、《百花池》两诗里明言不讳地指出。

除《齐音》外，王象春还有诗集《问山亭集》和《续集》，他的七古和七律在写景、抒情、咏时事等方面，更能发挥他那不拘常格的天才，当时的人即称许他是“人奇、情奇、诗亦奇”。他的侄孙、清初大诗人王士禛也说他是“天才排奁，日空一世”。特别是，他敢于直对现实，反映现实，为人民而歌吟，充分表达出对黑暗统治的痛恨与对受苦群众的同情。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王氏由济南又回到官场，较长期是在陪都南京任职，历任大理寺评事，兵部、工部员外郎，擢至吏部郎中。其实，陪都的官位并无实权，形同虚设。这期间，神宗病死，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又病死。光宗长子，还是顽童的熹宗继位，改元天启。经过这个变故，两党的斗争更达白热化，王氏虽在南京，但他“善善恶恶”，遇事持正，又“意气太盛，肝肠太热”，必然更招邪党之忌。

熹宗只贪嬉戏，统治权落入太监魏忠贤手中，权势熏天，满朝大臣，有很多成了他的义子义孙，浙、齐、楚三党中人，一齐依附到他脚下，分居要职，世称“阉党”。

属东林党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请正典刑。奏疏传到南京，王象春细加圈点评语，刊印传布。东林诸人，也广造舆论。阉党诸邪，知魏忠贤必有动作，纷纷编列东林黑名单呈献。《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天鉴录》、《东林朋党录》等等，都列有王象春名字。如《东林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排名之例，将杨涟列为天勇星大刀手，称王象春为天损星浪里白条、分守南京汛地头领。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下毒手了，派缇骑逮捕杨涟、左光斗等6人，继又逮捕黄尊素、周顺昌等6人，均酷刑惨死狱中。接

着又宣布《东林党人榜》，凡榜上有名的，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削夺者禁锢。全榜共309人，王象春是第五十九名。刚直不阿，才华出众的王象春削职回籍，在政治禁锢下，只能读书赋诗，遁居家园。抑郁数年，于崇祯五年（1632年）含恨病逝。王氏的同年钱谦益为撰墓表，弟子张世伟为撰行状，均镌立碑石。后来王氏外孙诗人徐夜有诗赞之：

问山亭子高屹屹，中有吾翁翁神明。
湛湛江水上有枫，死生门生张先生。
先生笔写秋毫及，吾翁耿耿当中立。
想其下笔风雨来，灯火欲灭风吹入。

（张昆河）

“卓然经师”张尔岐

顺着济阳县大寺河长堤向西望去，绿树掩映，瓦房栉比，那依稀可辨的古宅旧院，蓊蓊郁郁的古槐老柳，可看出这小村的悠久历史。这里便是店子回族乡张稷若村，它曾养育出一位操行卓著、学识渊博的经学家——张尔岐。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南市济阳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其家世代务农，至其父张行素始习儒，曾为湖广石首驿丞小吏，仅到任3日而告归。他与诸弟皆从父习儒读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明王朝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清军

铁骑大掠山东，张尔岐之父张行素率乡民抗清兵而惨遭杀害，三弟失踪，四弟遇害，经此大难，26岁的他“忽狂作”“欲蹈水死”“自焚所业书”“欲著道士服，弃家人山”，只因念及老母，才“强自抑制”“教授乡里”（见《白叙墓志》及《蒿庵集》），自此号“蒿庵”。取《诗经·小雅·蓼莪》，寓哀念父母“昊天罔极”之意。

张尔岐好学不倦，惜时如金，每日闻鸡而起，夜半方息。平生除常到济南和章丘外，没游历过更多的地方。终不过是一位“乡里句读师”，用现代话说，就是乡村小学教员。但他在其60余年岁月中笃志经学，覃研钻极，独立思考，使顾炎武这位江东大儒一见倾服。顾在《广师》篇中云：“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其实，张不仅精于“三礼”，对《易》、《老子》也研究颇深，抉幽摘微见解独到。实际上，他跨着句读之学、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三个方面，并且在天文、算术乃至风角、壬遁方面也多有涉及。

《仪礼郑注句读》17卷是其耗半生心血，至59岁才完成的重要著作。《仪礼》是记先秦上层社会的生活、饮食、婚丧、宴宾、器服、祭、射……等等，从中可追索先秦礼俗。它的17篇，高堂生传本与鲁壁传本相合，在“三礼”中可靠性最大，也最有价值。但一般人工苦其难读，故自宋王安石罢《仪礼》不置学宫以来，问津者少。张尔岐对这一古籍作了精心的整理。他首先把郑玄的《注》弄清楚；然后把贾公彦的《疏》加工，其漫衍者芟之，见解不同者详加按语，最后以“监本”和“石经本”一一校勘，这样，初学者可入门，畏难者不却步。为古籍整理做出了一个典范。顾炎武评其书曰：“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书实可传。”清乾、嘉以来，凌廷堪、张惠言、邵懿辰诸人，是在张尔岐的基础上各做精细钻研的。

他的好友李象先说他：“盖以理胜辞者”。长山刘孔怀评曰：“先生是以经术为根本，以程朱为阶梯，而疏越质朴之气，直逼春秋以上，不蹈六朝靡丽之习，复不袭宋人理学窠臼，知其寝食于

古者滌矣。”张尔岐晚年则留意历代典章制度,白云:“予今年五十,于华艳之文,渐不喜观,唯朝家制度名物之详,犹欲稍志其一二。”(见《蒿庵集》)可以说张尔岐是以经学和理学著名于世。

张尔岐品德高尚,明亡,不仕清,一生寒素,耿介自持,“于人少违多顺,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曰三复之”(《蒿庵闲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他22岁时曾系济南府狱,为了何事,已难究明了。故他在文中时时流露出“深念及祸”之惧。一生心情是抑郁苦闷的。

张尔岐性孝,母多病,遂习医。远近乡民有求医者,从不惮烦,深得乡里崇敬。兄弟析产,乃将上好田庐让之于弟,二弟身残,他代纳赋税20余年,嘉德感人。

清康熙十六年十二月(1678年1月),张尔岐病故,享年66岁。其好友顾炎武有悼诗云:

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黄泉。
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十袭绝韦前。
衡门月冷巢鸾室,墓道风枯宿草田。
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

诗意悲怆,评价亦高,足见二人之谊。

张尔岐遗嘱中有云:“吾平生所著,各录一本收藏,以待后之君子或同志必能为吾传布。”他著述甚丰,某些见解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文气曲折奥衍,表里洞达,直入昌黎之室”(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著有《天道论》、《中庸论》、《周易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集》、《蒿庵闲话》、《篋中集》等,现济阳县图书馆、档案局及民间还藏有《书经直解》、《府君事实状》、《蒿庵处士白叙墓志》、《济阳县志》9卷以及印章、手迹等,为后人研究张尔岐提供了珍贵资料。

(张稚庐 张家增)

蒲松龄与济南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年),是淄川城东满井庄(今属山东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清代,淄川是济南府属县,蒲松龄自少年以至垂老,几乎年年都到济南,济南秀丽的湖山、繁华的市井、淳厚的风俗以及悠久的历史不断启迪着蒲松龄创作的灵感,那贡院的巍峨宏丽的大门也记载了他一生科举蹭蹬的辛酸和悲慨。济南,可以说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凝聚了他的无限深挚而又复杂的感情。

在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诗文集》里,有关济南的题咏,保存了数十篇之多。明湖轻舟、佛山翠嶂、鹊华烟云、趵突涌泉,都曾在蒲松龄笔下呈现出了无穷的魅力。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山东布政使喻成龙,久慕蒲松龄的大名,饬令淄川知县周兴安敦请蒲松龄赴郡,有意聘他人幕。喻成龙对他“礼仪有加”,蒲松龄也为喻成龙赋《梅花书屋》一诗答谢。此间,适逢山东盐运使李兴祖捐资重修历下亭竣工,那正是“蒹葭挹露”“荷芰连天”的初秋季节,一时宦宦缙绅、才士名流雅集大明湖上,宴饮赋咏,以示庆祝。蒲松龄作为布政使的客人,躬践盛会,作《重建古历亭》七律一首,并以生花妙笔,洋洋洒洒写了千余言的长篇《古历亭赋》,这是堪与杜甫陪宴历下亭并传的一桩文坛佳话,为济南山水胜地千古增辉。

蒲松龄傲居济南,更多是为科举应试之事。《聊斋志异》中的

《偷桃》一篇，就记载了他“童时赴郡试”随友人观“演春”的情景。时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东西相向坐。时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闻人语嘈嘈，鼓吹聒耳”。接下来便绘形绘声地描绘了一场奇妙的戏法，表现了少年蒲松龄的活泼好奇的心态。蒲松龄19岁以县、府、院三试第一入学为秀才，此事当在其中秀才之前。中秀才后，三年一度的乡试（举人考试）在济南举行，蒲松龄是必然要来参加的，而每年例行的“岁考”或“科考”，有时也须要风尘仆仆地赶赴济南。岁月倥偬，年渐老大，而功名不成，济南之行带给蒲松龄的，更多的是失意和辛酸了。

“年年作客茈菱乡，又是初秋送晚凉……意气平生消半尽，唯余白发与天长”（《聊斋诗集·稷门客邸》）。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蒲松龄已经69岁了，为了功名之事，他不得不冒着二月料峭春寒，骑了匹瘦马，一日躅行百余里，赶赴济南，“两股受蹬如受械，老骨欲碎殆颇极”，垂老奔波之苦，真是难以言状。这年，正值童生院试，蒲松龄以亲眼目睹的事实，写了《历下吟》长诗，揭露了科举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描绘了士子们所经受的蹂躏与摧残，“此中求伊周（伊尹、周公，代指贤才），亦复可恻怆！”他对科举是彻底失望了。

除科举应试之外，蒲松龄也经常因其他事项来到济南。康熙三十年（1691年）九月，他受东家毕际友委托，到济南东流水一带，物色菊种，这是风雅之事，他的心情当然是轻松愉快的，他写了两首七律纪此事，诗前“小引”中描绘东流水一带的风光，清丽可喜，宛然如画：

朱门西向，绿水东流。竹坞白筠，辋川相似；烟波亭榭，金谷还同。绕栏之径三叉，入户之溪九曲。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裊垂杨，时系达官之马。

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到济南，情景就截然不同了。连续

两年旱蝗之灾，家乡百姓逃亡，饿殍遍野，为了救助灾民，他拟定了《救荒急策》，不顾年老衰惫，来到济南，呈献给布政使。他在济南看到的竟也是一副“五月横屍满郡城”的惨不忍睹的景象。

济南也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提供了灵感和素材。《聊斋志异》中的《鹰虎神》、《偷桃》、《公孙九娘》、《林氏》、《寒月芙蕖》、《上仙》、《狐谐》、《木雕美人》、《云翠仙》、《跳神》、《何仙》等写的都是发生在济南的故事。其中尤以《公孙九娘》最为脍炙人口。小说以清初栖霞于七领导的抗清斗争失败后，清廷残酷屠戮无辜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扑朔迷离的笔法，描写了一个人鬼相恋的爱情悲剧，幽恨绵绵，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小说开篇，作者即以史笔秉直而书：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莱阳县志·兵革》也记云：“省城南关有荒冢，曰‘栖莱里’，杀戮之惨可知也。”

如今济南的南郊，已是楼宇林立，笑语熙攘了。有谁还知道，三百年前，蒲松龄曾徘徊在荒坟蒿莱之间，为那些屈死的冤魂洒下悲愤的泪水呢！

（李永祥）

二十四泉草堂主人王莘

王莘，字秋史，号蓼谷山人，诗名王黄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生，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享年60岁。

王莘出身于官宦人家。先祖系临山卫人。其父钺官江南上元后卫守备，始迁居济南。

济南有座万竹园。那里楼、台、亭、榭、曲径、回廊之中有一潺潺流泉，名为望水泉。在七十二名泉中此泉名列第二十四，故亦称二十四泉。

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殷士儋在泉上修筑别业，“苍葭篠簇以万竿计”，故以“万竹”名之。嗣后，大约百年，此园归于王莘，名其堂曰“二十四泉草堂”。王莘很喜欢这个地方，欣然赋诗云：“百年竟落书生手，满郡犹呼阁老亭”；“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他自称二十四泉草堂主人，但是这园林到王莘为主人时，“斤竹已尽，大石犹存，正生数椽在焉”；“屋前后蔬畦茨塘，流水映带，墙外老柳数株，苍皮空腔，高垂屋顶，长条碗地，茅茨灯火，吟诗声与泉水争响”。这时，虽不及殷相国时之繁华喧嚣，笙歌妙舞，却另有一番幽静野趣。秋风雁过，山缺斜阳，霞抹横天，老圃黄花，柳溪风影，倒教王莘娱情怡性，平添诗兴。

王莘一生赋诗3000多首，传世诗集《二十四泉草堂集》12卷，辑诗1026首。王莘的文章辑为《蓼村文集》，《历城县志》本传载谓

其文“雅洁，有义法，骈体尤工，手定四巨册，格在其诗之上”。

王莘坎壈终生，郁郁不得志。他青年时期，为衣食奔走曾西涉黄河，南渡钱塘，行程三千里，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王莘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46岁时中进士，授知县。王莘性孝，不愿赴任，改就成山卫（今山东荣成市成山头）教授。后终以难于迎养80岁老母为由辞官回到历下。他虽霜发覆顶，但侍母抚幼仍若少时，从此以后，王莘更是嗜古好学，尤致力于诗，闭门苦吟，绝交游，把毕生的精力专注于诗歌和散文的写作。

作为在清初诗坛上享有盛誉的王莘，他的性格、爱好、志趣、道德素养等方面，是独具特质的。

其一是狂狷。王渔洋评其为人曰：“狂狷之士不见绝于古之圣人，而今，乃不容于流俗无惑乎？举世相率于声利媵媚之徒，而不知所底也。秋史自其少已负奔轶之才，嗜古好奇，视乡里间举无足当其意者，类狂；闭门苦吟，息交绝游，类狷。乡里之人亦遂群起而噪之。秋史自信顾益坚。”其实，王莘的狂狷是对污浊的社会、炎凉的世态的一种蔑视和对抗，是他高洁的人格和才情的外化。而他对恩师、挚友、才德高洁之士，是敬重之不暇的。“举场逢挚友、恭敬莫轻佻”。他被世人目为狂狷，常显出无奈和遗憾：“肃然必事村夫子，偏得狂名到处传！”

其二是孝。王莘性孝。他的孝与狂狷齐名。王莘对生母、前母、伯母均颇具孝心。他40岁那年曾去前母墓地——淮南黄上桥祭祀，诗中写道：“河上荒原冬草肥，累累搔首是耶非？雪残墓左频来路，纸剪桥南正掩扉（守家人住所），片石凭将榛莽在，一杯准拟鹤华归。即教旧器无从识，四十年来泪自挥。”诗中孝思感人。

其三是他视功名为敝屣，视利禄如浮云。王莘的狂狷，决定了他不能随风附俗，也决定了他宦海迍迳。当他中进士后去拜见

老师王士禛，王士禛高兴地告诉他：“今年此榜真无异议，惜名上少，惟子与朱字录耳。”他听后并没有像凡夫俗子那样飘飘欲仙，赋诗曰：“曾踏槐花十九年，今朝休道上青天，半生寂寞真如此，一第峥嵘亦偶然，榜下声闻同嚼蜡，眼中朋辈任登仙，只余老母泥金喜，拄杖开门水竹边。”金榜题名乃人生大喜，他为什么如此漠然呢？这是因为他看透了仕途的险恶，官场的腐败，“浮去宦海须臾变，落日名扬尺寸虚”。他是只求诗名而不要官位的，可谓有识之士。

其四是爱故乡。王莘爱泉城济南，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热情讴歌“济南似江南，山水天下无……鹊华刺青天，泺河绿模糊，垂杨二十里，天桃一万株……游子慕清晖，何时一跨驴？”“七十二泉上，人家多清晖，巷口种白菜，夹路菜花肥……”“湖边山乱柳毵毵，是处桃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新涨暖，可怜只说似江南！”真情弥漫，韵致隽永。

再则是尊师、敬友、爱徒。王莘的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有三个：一是启蒙老师莱芜县叶廷璋，二是新城王士禛（渔洋），三是德州田雯。

当年，王莘虽负诗名，但未得名人赏识，德州田雯由江南公干归，过历下，见到了王莘的诗，盛称其才。后来，王渔洋很赞同田雯对王莘诗的评价，认为王莘“诗有别才”。特别喜欢他的“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呼之为“王黄叶”，并荐于山东巡抚张南溟，张廷见之，与其结布衣之交，此后，王莘诗名大振，“于是，秋史之名往往在人之口”（王渔洋语）。王莘感念王田二公，寄诗曰：“得名自公始”，“人间也白呼黄叶”。田雯曾教他“泉气粘不冷，山光贴地寒”句，他镌刻心扉。在他的诗里每行原句或有托化，都在文下加小注：“余少时受知德州公”。他对恩师是永不忘怀的。

王莘有个得意门人、爱徒，是东去教书认识的，此人叫于熙

学(亦称于无学),家居文登大水泊。结识后与之论诗数日。分别时王莘赋三十六韵长诗留别:“……往返喜倾倒,书尺慰别离,标举望吾子,期待非吾私……”传世的《二十四泉草堂集》,就是由于熙学在京师所刻。他们二人师徒情深,成为美谈。

另外,王莘喜饮酒,爱与僧道交往。他近游于佛山,北游京郊西山,西游长安,南游江浙。写了一些与佛门弟子同榻而眠、举杯对饮之作。王莘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是从行为和作品看,他并非对孔孟之道信仰的那么虔诚笃实,带有明显的崇尚佛道清静无为、退隐遁世的思想,时有非儒之句:“读书二十年,儒说未足恃……”

万竹园里的树石亭台、回廊曲沼依旧,斯人去矣,而他的诗文却长留人间。

(赵鹤祥)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首倡者周永年

济南的东南郊有一处喀斯特式突兀险奇、千峰万壑的龙洞风景区,秀美的佛峪就坐落在那一带。佛峪被四周的峭壁环绕着,有洞壑,有高峰,有溪流,有清泉瀑布,有茂密的林丛,一座几十丈高的山峰悄然挺立山谷中,这就是禹登台。不过现在有些人已讹读为钓鱼台了。顺着禹登台蜿蜒的蹬道攀上峰头,可以看到一座简朴的亭子。在岚光翠色中,举目四望,那山峰面对的瀑布

一定会首先吸引你。瀑布悬在浓绿的长满苍苔的危崖上，喧腾着，沫飞珠溅地直泻于下面的碧潭之内。这就是有名的林汲泉。清代著名学者周永年少时曾读书于此。因自号林汲山人。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活动于清代乾隆年间。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故居在今济南市的东流水街。父亲为了改换门庭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学塾去读书。幼年的周永年在那些布函线装的书卷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立志要读尽所有的好书，可是他家里除了账簿子之外，有什么可读呢？他于是买，据说他平生买的第一部书是《庄子》，那时他不过是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永年渐渐大了，买的书也渐渐多了，但仍满足不了他那贪婪的求知欲。当时书籍的价格和今天比较起来是昂贵得不可想像，稍精些的书，需要几钱银子，甚至要一两二两，若是善本则高至 10 两以上。那时一个中农倘把全部家产出售也不会变卖到 100 两的。小康之家供一个青年读书就很吃力了，怎么能让他论两的称出银子去买书！于是周永年节衣缩食，典当衣物来购求。到他在济南泮源书院读书时，终于搜集了几千卷书，而他的家也因此败落了。他的老师，当时泮源书院山长沈起元曾说：

余来主泮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業乃已。今所藏经史子集三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

题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后

一个寒素的知识分子，竟能收藏到数千卷书，要经过多少辛酸艰难啊。

后来，他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文字学家、书法家的曲阜人桂馥，有藏书家、诗人益都人李文藻。他们有共同点，即主张实事求是的治学，反对理学空谈；还有就是酷爱读书的嗜好。他们后来都先后成了进士，也都做了中下级官僚，但数十年来如一日，仍是书生本色。周永年知道寒士求书的辛苦，他建议

创办一个书库，公开出借，为他们服务。这建议得到了桂馥的大力赞助，初步由永年和桂馥把两家大量的藏书全部拿出来，公开借阅，并把这图书馆名之为“借书园”。并计划将来募款筑屋、买田作为图书馆的基金。李文藻和周永年同样都有书癖。他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周书昌和他都能不囿于流俗之见，喜收残书；又说他虽也好书，但到底不及书昌的善读。李文藻刻印的一套丛书，最后是由周永年继续编辑刊刻完成的。这就是《贷园丛书》（“贷”即“借”），共12种。其中有山东学人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张尔岐的《蒿庵闲话》、赵执信的《谈龙录》等。值得一提的是久已绝版的杰出散曲家张养浩的《归田类稿》，在当时就已罕见，也是周永年重刻的。刻书，当然也是他的借书园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周永年并不以此为满足。

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与周永年的在野活动有关，这是不无道理的。清代统一后，政治稳定已百年，经济得到了发展。系统全面地总结文化遗产工作，不期而然地成了朝野的共同要求。周永年实是在野的推动这一工作的积极分子，不过他的目的与乾隆皇帝却不相同。他是想把知识公开给更多的人，而不是篡改禁锁，进行垄断。永年竭尽全力来创立公共图书馆事业，认为明代曹学佺（石仓）搞一个《儒藏》的想法，真是“先得我心”，受到很大的启发。石仓的主张是：“尝谓二氏（佛教与道教）有《藏》，吾儒无《藏》，欲修《儒藏》与之鼎立。”他想仿效佛家的《大藏经》的办法把所有的佛、道以外的书加以整理编辑，成为套大丛书，储藏起来。曹学佺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个想法。而周永年则把这个念头加以扩充，使之具体化条理化。他写了一篇《儒藏说》，并附《条约》18则，到处宣传奔走，号召大家为此而努力。他的建议创修《儒藏》，实际上是号召民间各地都搞一所文化机关，这机关——《儒藏》兼有公共图书馆、文献馆、自修大学的作用。在18世纪60年代竟有这种思想，实在值得称叹。他希望有钱出钱，有

书出书,每个地方都建立这么一个“儒藏”,把文化公开,使更多的人占领文化阵地。当然,他这种天真空想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捐出书来的除他以外,只有桂馥一人,捐钱和田产的则一个也没有。中年以后的他于1770年中了举人,第二年中了进士,当了一员穷翰林。他自己是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个事业的。他毫不灰心,想尽了种种办法,但却一事无成。虽然做了官还是穷,《儒藏》还是搞不起来。为了买书,把祖业搞完了,而当了官却又负了债。青年时买书负债,还有老子代为偿还。(济南流传一个故事:他父亲周堂在商店中,有个朋友愁眉苦脸地说:“我要替儿子还输账。”原来他有个赌徒儿子。周堂也诉苦:“我也要替儿子还书账哩”)但老子死了,永年只有长穷而已。朋友赵渭川帮助了他些钱,并戏赠他一首诗:

髯翁贫病今犹昔,时欠长安卖药钱。

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

熟人们都以为这是一幅酷肖的周永年的肖像。

永年学问宏博,早在成进士前就曾与李文藻共修《历城县志》,而为朱筠所推重。成进士后,又与纪昀、邵晋涵等往来甚密。因此,《四库全书》开馆时,便荐永年为翰林编修,调四库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他主要是担负了部的编辑工作,据说了部的提要初稿,特别是释、道两家大都出于永年的手笔。陈垣同志曾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疏漏之处不少,但在释家部分,却大体可读,这和周永年的学养是不无关系的。”(见《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周永年一生弃产购书,仍然没有完成他的《儒藏》的志愿,他的借书园的几万卷书也由于封建社会的天灾人祸,化为一空。

永年成进士后,曾想回乡读书,研究他所好的《周礼》、《仪礼》。因幼年曾在佛峪读书,他一心向往故乡的山林之美,很想在秀丽幽静的林汲泉畔筑屋治学。但是由于他接着就任于四库馆,

一直拖牵未果，连这个小小的志愿也没达到。他只好来个精神安慰法，请人画了个《林汲山房图》，实际上这山房是不存在的，他只是画梦而已。

（徐北文）

《玉函山房辑佚书》著者马国翰

1838年，马国翰（1794~1857年）从陕西省知县任上告假回家了。这一年是鸦片战争的前两年，可是这位书呆子并没有感到时代的脉搏，长期居留内地，与朝官闻人也没有交游，在社交上他是个耳目闭塞的人，因此他的回乡，只是与个人有关。马国翰家住济南城东的南权府庄（现名南全福庄），靠近现在的山东大学一带，不过那时却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他请假的具体原因不明，如果不是在陕西的官场上有什么碰壁的事，就是家中出现什么亲人的纠葛。总之，他悄悄地回来了。回来后，他并没有与当地官府交往，而是在管理农田（他当然也是个地主）之余，写了一本《农谚》。其自序云：

岁戊戌（1838年）乞假家居，亲督仆佣种苜桑麻，得与邻父纵言，备闻田间耕作之务。因辑《汉志》农家诸佚篇，自神农野老以逮范子计然凡十余种。又据古今农谚编为一帙，藏诸篋中。

这位进士出身的七品官，搞学问却也特别，竟然兴趣如此广泛，一面和老农纵谈，一面又寻求古代农业的传统资料——农

谚：自己虽没有直接参加劳动，却在农田中督促长工、短工干活，有亲眼亲耳接触到的农业生活。这么一结合，就编出了这本书。

马国翰还注意地方土产、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他撰写的《竹如意》就是大半记载民间的传闻，白云：“山邑荒僻，昼长无事，追忆所闻，泚毫条记，凡得百余事。”是类似《聊斋志异》，但更朴实一些的书。在《玉函山房诗集》中他作有一首《驴驹嘴谣》，是咏济南山野中一种野菜的。这野菜现在乡村中仍然很多，不过已叫做“历历嘴”了。他在此诗的序中道：“吾乡山野中有菜似荼，而茎少长，叶在茎端，初生如张吻状，俗名驴驹嘴，味美甘可茹。周书昌（永年）先生修《历志》，收入蔬类；他书未见也。余馆冶山，食而美之。”其诗略云：

二月晴雪杨花飞，岩野青青春草肥。
有物茁芽出土浅，奋张齿吻含生机。
书生惯嚼菜根味，不学商山采芝人。

只有亲吃野菜，并留心现实生活的学者文人，才能写这类书和吟这类诗的吧。我觉得在马国翰身上体现出山东学者惯有的那种质朴而富生活气息的味道。

清代，山东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是他们不懂得通声气，互相标榜，只是质朴地做学问。总之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不行，因此名声不扬。但正因为不注意社交和宣传，才能专心致志地学习，才能眼珠向下看，对于实际生活有较多的体会吧。当人们看到一位默默无闻的人物，后来竟然出版了一部 700 多卷的浩博巨著《玉函山房辑佚书》时，在当时学术界真是感到愕然。人们总是忘了“无默默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的道理，于是出现了种种推测。

人们对马国翰能否自力完成此一巨著有怀疑，是事出有因的，请看他的履历：

马国翰，字词溪，号竹吾。原为章丘人，其曾祖父时才在济南

定居。其父马锦，是个捐班出身的官吏，任山西省汾州府经历，历署宁乡、武乡、天镇等县的知县。马国翰自幼就跟着父亲在山西任上读书。16岁时，其父病死于太原，连书也不能很好地读了。这期间曾两次去北京谋生，但到底还是靠读了几年八股文、试贴诗的本领，在19岁时进了学，成了一名秀才。当了秀才就可以坐家馆、开私塾，取得教儿童读书的资格了。不到20岁的马国翰那时在家乡一带农村教书，当私塾先生近20年，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才中试第三名举人，其时他已经38岁了。第二年进京赶考，他连捷中了三甲第六十七名进士，得以发陕西省任知县官职。马国翰在20年教书生涯中，应该是相当勤奋的，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也应该起草并有了相当部分的定稿。《续修历城县志》载：“国翰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当秀才时就搜集书，正和他的乡前辈周永年一样，周永年在书院当学生时就积累了数千卷，服官以前积累至5万卷。马国翰一生购买了57000卷书，比周永年搜集的少。根据马的《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共25卷）来看，善本及孤本书是很少的。据济南张景拭先生的统计，其中“类书”（介于百科全书与词典之间的工具书）就有39种计4000多卷之多。这就显示了马氏治学的特点；显然这种书籍，有利于他的辑佚的工作。

马国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分发陕西省后，历任敷城、石泉、云阳等县知县，但于1838年时请假回籍，除了辑著了上述的《农谚》之外，还有《月令七十二候诗白注》（4卷）、《夏小正诗白注》（12卷）这类有关农业的季节、物候的著作。

1844年，马国翰升任陕西陇州知州，离开济南赴任去了。他在知州任上，正式开雕自己的著作，他是一面继续修订，一面刊刻的（如他自称：“己酉（1849年）春刻经、子辑佚工竣。”）咸丰三

年(1853年),他正好60岁,于是告病还乡。4年之后,在64岁时死于济南老家。

《玉函山房辑佚书》的木版曾印过几十部,因此被人注意。在马氏死后的13年,即同治九年(1870年),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请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楨协助,从章丘李家借来书板,但已散失。本来这部书马氏没有编辑完毕而死,又经过转移、壁藏,增加了混乱,所以已刊印者有目无书的尚有40多种,在马氏条序中所说已著录的也有9种散失。匡源经过整理,“参校汉、隋、唐《志》,补为目录”。于1874年连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分订一百册行世。此书印行后,不久即被湖南书局翻印为袖珍本,又有琅嬛馆等依原版新刻本出现。这才引起海内学者的重视。

民国以后前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曾收购马氏所辑的活字印本《刘歆三统历谱》三卷、《钟律书》一卷,系为《辑佚书》刊本所漏收者,现藏山东图书馆。前山东图书馆又从章丘李家购得马国翰的古钱考证的印版,是把古钱嵌在木版上,旁边刻考证文字。从李家买得610板,又在市肆中零买了散失者,共724版,陈列在该馆汉画堂楼上,署名“罗泉楼”。此印板七七事变以后下落不明。

总之,马氏的大量著作,包括草稿及定稿抄本,颇有散失,虽经多次搜求整理仍不是全璧,这是很遗憾的。

《玉函山房辑佚书》到底对学术有何贡献呢?我国是个悠久的历史文化之邦,自先秦以来出现了大量著作,代有增加。但是其中有许多著作经过诸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战乱兵火等天灾人祸,毁失了。这对研究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巨大损失。但是有些古籍,原书虽失迷了,但在失迷之前或被学者的著作所引用,或被注释者引来作另一古书的注释,或被类书(工具书)辑录在它的门类条目中去。如果搜集起来,虽不是全书,但总能更集中地体现原书的大体轮廓。因此,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非常方

便的研究资料。

清代以来,盛行考据之学(古文献学),济南也不例外。如康熙年间邹平(当时属济南府)的马骥所著的皇皇巨著《绎史》,即将大量的古佚书的资料搜集起来编写一部上古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古史辑佚书”。乾隆年间历城周永年参加《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曾将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中的各门类中的引文,辑出许多种已经失传的古书。此外,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学者做过这种辑佚的工作。马国翰在这种学风之下,特别是受了同乡先辈马骥、周永年的影响,大规模地辑录起佚书来,而且做出空前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

(徐北文)

历下亭上留墨迹的何绍基

何绍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代诗人、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蝮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官国史馆编修、四川学政,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历主山东泮源书院(在今济南市)、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勗以实学。

何绍基著有《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钞》。何绍基作诗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倡导宋诗运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强调“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他说:“温柔敦

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底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凡刻薄齐齋两种人，必不会做诗。”（《题冯鲁川小相册论诗》）他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他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己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人与文成，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使黔草自序》）他认为诗人应写自己的“真性情”“说自家的话”。他说，“诗是自家作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与汪菊士论诗》）

何绍基生当清季之末。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内忧外患，连绵不断。这些社会现实在他的诗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表现了他对时政的关注。《次韵答歧农水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严加痛斥，无情鞭挞：“近者粤东及鄂渚，夷艘群窜如奔狼。”《沪上杂书》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盘踞租界，深表愤慨：“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后，给中国的社会政治造成了严重破坏，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君不见滇黔吴越未止戈，横流改道嗟黄河。旱蝗南北几千里，兼以外患来英俄。太仓粟少币金乏，赈需军饷难蹉跎。”（《题沈小如丈〈津门拯溺画〉》）“但见城郭破坏，人民夷伤，猛将损折，庸臣逃亡。衙廂化焦土，妇孺如驱羊。国帑民脂膏，剪肉难补疮。”（《普贤西向》）在有些诗中，何绍基还具体描绘了人民遭受的灾难：“谁知昨夜溪水恶，大雨一天千涧赴。悬流十丈梦中来，树飞屋走无人路。男漂女没不相知，鸡犬猪羊并同去。”（《溪水恶》）

在何绍基的诗作中，如上关注现实的作品并不多。而其分量较重的是那些登临唱和、书画题跋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的篇什。其中尤以他的山水、景物诗更具特色：

山转滩正拗，滩吼风又作。
风力胁滩起，百丈不可落。

声喧百雷霆，白舞千鹤鹤。
扁舟赴的猛，不费半篙著。
十里一瞬间，瞥似轻燕掠。
念彼上滩人，保处稳船脚。

——《滩行》之三

全诗用朴实自然的语言，白描滩行的客观景物，十分生动形象。似此佳作甚多，如《山雨》、《望飞云洞》、《舆夫》等等。

何绍基不独是位诗人，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成就甚高，能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卓然自成一家，被人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黄俊山《奕人传》卷十八）。其行草尤为一代之冠。其平生学书尤得力于颜真卿，参以欧阳询、李邕笔法，而对周秦两汉古籀篆至六朝碑版，无所不习，功力深厚。

何绍基作书采用回腕法，取汉李广猿臂弯弓之义，故晚年自号猿叟，他用此执笔法写出个性极强的字。咸丰间在济南主讲泮源书院，曾为历下亭书杜甫联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还写了《重修历下亭记》和《历下亭诗碑》。镌刻至今犹在，为济南人士所珍爱。

（王延梯）

刘鹗和他的《老残游记》

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清末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后来定居江苏淮安(今淮安市)。青年时代到南京参加乡试,未能录取,遂专心阅读家中藏书,其中有父亲刘子恕关于治河的专著《河防刍议》和哥哥刘孟熊收集的西洋及日本有关科学技术的译本。这些书籍使刘鹗扩大了眼界,以后干脆放弃科举,专门致力于治河、天算、医药和乐律等实际知识的研究。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第二年他根据自己的专长,到河南投效。他在工地上短衣匹马,不辞劳苦,和民工们一起干活,得到河道总督吴大澂的赏识。黄河合龙后,又负责测绘豫、鲁、直(今河北省)三省黄河图。光绪十六年(1890年)河患移到山东,刘鹗被山东巡抚张曜调来济南,充任黄河下游“提调”。他提出“束水攻沙”的办法,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曜病死,福润继任山东巡抚,推荐他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后来的外交部)“考验”,得以知府任用。当年刘鹗的母亲去世,他回南方奔丧。守孝期满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北京总理衙门报到,从此离开山东。

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刘鹗到扬州师从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李龙川。之后恪遵学派教义“立功、立言、立德”和以“兴利养民”为本,主张开矿筑路,兴办实业;并提出借用外资,引进国外技术开矿,“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的大胆设想,

结果被当时守旧派官僚视为“汉奸”，主张没能实现。同时他个人先后开设过书局、商场、织布厂、制盐公司等，也都以失败告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俄、法、德、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一时粮运断绝，北京发生粮荒。刘鹗主动捐凑银两，参加以李鸿章为后台的救济会，由沪到京，办理救济，并掩埋被侵略者惨杀的无主尸体。当时俄军占领了清政府的粮仓（太仓），他们不吃米，准备烧毁。刘鹗以贱价买出，平糶给老百姓，解决了北京居民的粮荒。等到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撤出北京之后，刘鹗竟被袁世凯等挟嫌诬陷盗卖仓米，并说他在浦口为外国人购地，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南京将他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即溥仪宣统元年（1909年），刘鹗以脑溢血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刘鹗除《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黄河变迁图考》等学术著作外，还写了被鲁迅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老残游记》初集20回，续集9回，外编残稿约一回。影响最大的是初集20回。这部小说是刘鹗根据他在山东和济南的3年间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撰写的一部章回小说。他写的张宫保即当时山东巡抚张曜、玉贤即毓贤、聊城藏书家柳小惠即海源阁藏书家杨绍和、泰安府知府白了寿即曾在泗水等县任知县的刘鹗好友黄葆年等等。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此外他盛赞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江南风景更为有趣”，写了济南的许多古迹、名胜和街道、商店等。其中有大明湖、历下亭、铁公祠、历山、舜井、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鹊华桥、高升店、日升昌汇票庄以及山东巡抚衙门、天主教堂等等。这些地方今天大部分还都存在；有的虽没有了，但也有遗址可以指认。

《老残游记》一书，应当特别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刘鹗写了他在山东亲眼目睹的玉贤等酷吏之后，提出“清官”比脏官更为可恨的论点：“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

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是刘鹗的创见，使《老残游记》成为中国第一部“揭清官之恶者”的小说。

二是他在写大明湖的铁公祠时，还写了过去济南的特殊景观：“佛山倒影”，即在铁公祠前面的湖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千佛山的倒影。不少人认为这是刘鹗的虚构，在大明湖水里绝对不可能看到千佛山。实际上这是济南的八景或十六景之一，从元代诗人元好问以迄清代不少诗人都有吟咏这一奇特景观的诗句。如元好问诗句：“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苍烟收不起”；明代历城县令张鹤鸣诗：“佛山影落镜湖秋，湖上看山翠欲流”。清人的诗就更多，如朱畹：“城头临北极，水底见南山”；王初桐：“平涵千山碧，倒见数峰青”；周乐：“半城烟出林梢白，隔郭山从水底清”等都是。后来之所以看不到倒影，当是由于空气和湖水的逐渐被污染以及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多而造成的。

三是他写了自己在大明湖畔明湖居听白妞说书的感受，刻画了白妞其人和她演唱的山东犁铧（后作“梨花”）大鼓。白妞本名王小玉，是光绪年间说唱犁铧大鼓的著名艺人。清末署名凫道人的《旧学庵笔记》称她为“红妆柳敬亭”；和刘鹗同时客居济南的晚清诗人王以敏（梦湘）写有长诗并附小序，表示他对白妞的倾倒和关心。刘鹗的描述给山东和济南的曲艺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老残游记》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作者刘鹗深入生活，热爱山东，熟悉济南是分不开的。他既以山东巡抚幕僚的身份周旋于上层社会分子之间，又能深入民间，经常与老百姓接触，因而能写出这部深刻反映清末社会现实和如实描绘山东与济南景物的长篇小说。

（严薇青）

清代著名工匠魏祥

在济南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文人学士，也有不少能工巧匠。清代著名建筑工匠魏祥，就是其中的一位。

魏祥字致和，其先人自章丘迁至历城。他小时家贫，无钱上学，十多岁就苦学建筑技术，很年轻便学得一手高超技艺。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称，魏祥在工程设计施工中“艺杰构巧，运以精思，遂成伟工”。

清乾隆庚戌年（1790年），皇帝东巡，盐运司几次让魏祥在巡幸之处建造行宫。乾隆驾回天津，驻在柳园，于行宫外赐安国王宴，直隶总督急令魏祥，在一夜间扎起豪华彩楼。魏祥按时而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而更加远近扬名。嘉庆十四年（1809年），魏祥应聘去山西清凉山承建行宫，因办事认真，工期无误，建造优良，受到奖赏。

魏祥虽然少年时难得读书，但成人后好学习、重人品，一生有很多义举。山东一些大的工程，如曲阜的孔林、孔庙等重大的维修和新建，当地官府都倚重于他。在济南，魏祥领建和大修的有府、县学宫，节孝祠、魁星楼、文昌阁、城隍庙，以及贡院号舍与齐河大桥等建筑工程。

由于勤奋好学，魏祥已有相当的文化。所以，他去山西五台山工作时，见到《靠天吃饭图碑》拓片，感到“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便带回山东，与“同人展玩之余”，于嘉庆癸酉年（1813年）六

月，“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魏祥刻《靠天吃饭图碑》，上书一个人“天”字。在天的最后一画上，坐一手持饭碗的老者，下面是魏祥所写文章《靠天论》。他在文中讲到，重刻此碑，是与人“共质之”，即共同研讨。他还说：“非天难靠，人自难靠故也”。颇有些靠天更靠人之意。该碑曾立于济南大明湖畔铁公祠内，早已丢失，但其拓片在北京图书馆和山东文化部门尚可找到。

1935年7月1日，鲁迅先生曾依据魏祥所刻《靠天吃饭图碑》等，写杂文《靠天吃饭》，发表于当年《太白》半月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批判宿命与惰性。

（任远）

孟洛川兴办“祥字号”

“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两个财神爷，抵不上旧军孟洛川”。这是山东巡抚福润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为孟洛川奏请准授江苏即用候补道（未上任）的一次宴会上说的话。迄今，在章丘许多老人中，还不时谈起。

孟洛川（1851~1939年），原名孟继笙，字洛川。幼年丧父，赖母养育成人。他精明睿智，讷于言而敏于行。少年时代就在治家理财上崭露头角，18岁便代伯父孟传珽管理各地祥字号。莅任伊始，就感到父辈所创的庆祥、瑞生祥、瑞蚨祥等字号古老保守，慨

然立下除旧更新,锐意开拓,振兴祥字号的志向。为此,他聚集资金,延揽人才。他慧眼独具,高薪聘来了经纶满腹、治店有方、人称“活财神”的沙文峰,待之以礼,用之以信。沙文峰颇受感动,决心图报,为展鸿猷,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偕孟洛川外出考察,北去京津,南下沪苏,视野顿开,遂决定首先发展瑞蚨祥(该号为孟母私蓄所建)。

1875年,在北京、天津同时开设了瑞蚨祥布庄,让精通买卖、善于交际的孟覲侯和老成持重的孟访溪分别管理。两号一开张,生意就十分兴隆。与此同时,他又对济南瑞蚨祥进行整顿,将德才兼备的逯秋圃晋升为经理,装修门面,广开货源,使这个老字号焕发出时代的风采。

1891年,福润擢升山东巡抚,因他曾任山东盐运使和布政使,常到瑞生祥钱庄密存私款,因此与孟洛川多有过从。今一旦荣升,免不了一番铺排,府署上下内外均需焕然一新。其所用物品皆由瑞蚨祥承办,这笔生意利润可想而知。通过福润,孟洛川不仅获得了江苏即用候补道的官衔,而且还为他引进了许多王公大员的巨额存款。孟洛川除以此大量存款增加进货外,还在北京大栅栏一条街连设5号,其建筑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十分豪华。同时,又在天津、烟台设立了瑞蚨祥分号。至此,瑞蚨祥(含泉祥)计有12处分号。在商品上除了布匹、绸缎、绣货、茶叶外,又附设了金柜和皮柜。每年经营额、红利额滚雪球般地成倍增长。

为加强店务管理,孟洛川委任沙文峰为全局总理,掌管全部瑞蚨祥的业务;孟覲侯任北京地区总理;孟访溪为天津地区总理,逯秋圃为济南地区总理。各地区所辖商号各设一经理,形成层层管理的系统。

瑞蚨祥的每个商号都立有统一的铺规,计27条。不管任何人都须遵守,以确保业务的正常开展。凡管理人员必须明确:“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祥字号的经营方针和宗旨,务必遵循,以取信

顾客,维护祥字号的声誉,又建立旬报、月报、半年总结、年终决算制度,掌握下情、沟通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裁处。年底,经理以上人员齐集孟府(1925年在旧军,后在天津)总结、写账、按股分红。凡管理人员实行厘股制,最高者为10厘,当时只沙文峰1人;其次为9厘、8厘不等,最低不少于2厘,一般在4~5厘之间。这对激发吃股人员的积极性有很大作用。

1916年,沙文峰去世,孟洛川悲痛地说:“沙公之歿,如断我右臂。沙文峰对祥字号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充分显示了孟洛川的用人之明。”1917年,孟觐侯接任全局总理,但他足不出京畿,专致力于北京瑞蚨祥。当时军阀混战,盗匪蜂起,孟洛川与他的祥字号于兵燹匪患中,靠着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经营方针,不仅保存了瑞蚨祥,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

1927年,祥字号发展到顶峰,之后,逐步趋于衰落。先是孟觐侯恣意享乐,挥金如土,各经理群起效尤,孟洛川远居天津,且年事已高,鞭长莫及;其后人虽众,然大都沉湎烟、色,坐吃山空,致使祥字号江河日下。“七七”事变后,孟洛川更是国忧家愁交集于心;忧郁成疾,1939年病死,享年89岁。

孟洛川是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驰骋商场70余年,终日眼不离账册,手不释算盘,精心经营,勇于开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得到官府和权贵的庇护和支持,他一生曾和12任巡抚及6位督军有过交往,定居天津后,又结识了不少前清遗老和民国新贵,这在他看来,主要是一种审时度势,以谋发展的经商手段。应该说他对我国近代民族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者秀)

周总理的老师高亦吾

1936年，周总理在西安对当年他在沈阳读书时的同学、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陆文勤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至今思念尤甚。”建国后，有记者问：“总理是如何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总理答：“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到山东高亦吾先生的教诲与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可以说没有高亦吾先生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

1950年，周总理将高亦吾的儿子高肇甫介绍到政务院工作；1961年12月，周总理亲笔写信以师母相称问候高亦吾夫人，并寄上保存多年的高亦吾照片；1962年，总理给师母汇寄100元，让其滋补身体；1963年高夫人病故，总理致书唁慰并附100元，作为安葬补助。为什么周总理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一生中总念念不忘高亦吾先生呢？这就需要从头谈起。

高亦吾，字盘之，原名高守铭，亦吾是他的化名。1881年，他出生在原章丘城西关一个颇有名气的耕读之家。自幼敏而好学，少有大志。年甫弱冠，岁试，名列榜首，成为生员。1902年，通过府考被选送山东大学堂（后改高等学堂）历史科深造。他从农村书院走进城市学堂，新的天地和环境给他反清爱国的理想插上了翅膀。进校不久，与志同道合的热血男儿吴次风、楼辛木等十余人结成知友，常在一块评论时政。他们认为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国人涂炭，罪归慈禧，以她为首的满清政府已腐败透顶，必须推

翻而后国始能强。于是高亦吾等组织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乐群学会”和“玫瑰诗社”。他们写诗撰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唤起民众。1904年,蔡元培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高亦吾等投书请求参加。是年,以“乐群学会、玫瑰诗社成员为主力,发起了轰动省城的高等学堂反清斗争。他们脱下长衫,剪掉发辫,游行演讲。巡抚周馥亲率兵弁到高等学堂搜捕镇压,在珍惜人才的学堂总办陈恩焘的掩护下,高亦吾等方免于难。嗣后获悉当局准备密令通缉所谓带头“闹事者”的时候,高亦吾连夜奋笔疾书了痛斥满清王朝祸国殃民的《伊奴出关》一文,离开山东,只身去了东北,后到奉天(今沈阳),经在此谋生的族兄高敬之的介绍,去城东关模范学校任史、地教员。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较好的小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社会名流。光头布衣的高亦吾,被“长袍马褂”们视为“怪物”。初进课堂,欢迎他的是哄堂大笑。高亦吾泰然自若、亦庄亦谐地指着自己的光脑袋说:“你们笑的是它吧?这很有意义,它将来会进入历史课本的。”就在这时,一位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少年学生向先生质疑发难了,一连提出许多耐人沉思的问题,他就是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的少年非常赏识,顿生爱慕之心,从此30岁的高亦吾竟同13岁的周恩来结成了忘年之交。高亦吾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向周恩来灌输革命思想,如介绍他读《革命军》等进步书刊,游览参观时,即景生情地讲述日、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等。有时两人一桌吃饭、同榻而眠或并肩散步、共同锻炼。少年周恩来从老师的教诲中看到了光明,高亦吾从这位雄姿英发的少年身上似乎望见了中国的未来。

1913年,周恩来毕业后南旋天津,别前,高亦吾为他命字“翔宇”作念。“翔宇”者,展翅翱翔天际之意也,这可看出高亦吾对周恩来寄予的希望。不久,高亦吾也离开沈阳,去北京京兆尹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次赴京探望。其中一次,高老师密嘱他:

“天津的《觉悟社》刊已震动朝野，当局要严令取缔，并逮捕其一切成员，务希当心。”周恩来回津果然被捕，高亦吾多方奔走参加营救，迨至周恩来释出，师生天各一方，再没见面。

1941年，高亦吾在弥留之际还念叨着周恩来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师重教的周总理于国事繁冗之中，始终把老师高亦吾挂在心头。

（牛汝章）

名胜古迹篇

龙洞、佛峪和禹登山的传说

龙洞和佛峪，是济南南郊风物最为幽雅秀美的胜境。

乘车沿济(南)工(村)公路东行，至孟家庄折向南数公里，绕过烟霞岭，便到了龙洞入口处——龙洞村了。村落四面环山，一条宽阔的涧谷由南而北，涧旁丛生茂树，涧底密布白石，澄澈的溪水在晶莹的白石上潺潺地流淌着。举首南望，两岸对峙，环拱如门；西为老君崖，峭壁撑云，危峰坠水；东为凤凰台，山岚翠微，苔色斑驳。前行不远，山路斜分为二：西南至龙洞，东南通佛峪，无数奇景幽致，就藏在这层峦叠嶂之中。

龙洞一带是喀斯特地貌（即岩溶地貌）发育区，可溶性的石灰岩被水溶解以及伴随发生的机械运动，造成了千姿百态的奇山异石。登高纵眺龙洞诸峰，或环如拱壁，或展如翠屏，或危坠如累丸，或峻峭似列戟，鬼斧神工，叹为观止。其中有座山，页岩层叠，似书册累积，山形上粗下细，昔人形容它状如“累甗(yǎn)”。甗是古代的一种炊具，上部似甗(zhēn，古代的蒸锅)，下部似鬲(gē，圆口，三足、中空，架于火上)，甗大鬲小，形容此山，宛然似之。《春秋·僖公十八年》载：“宋师及齐师战于甗。”注云：“甗，地名，在历城境内。”或即指此山。

龙洞诸峰中最美的要数独秀峰和三秀峰了，这里有锦屏岩、鹞栖岩、演老岩、仙人桥等奇观。独秀峰锦屏岩，峭崖陡立，石壁横展，高不过八九十米，而宽则有百余米。岩石或呈苍青，或为绀

黄，石纹纵横，交错如画，古松倒挂，茂草厚苔，又为石壁抹上一层墨绿，春日，山花盛开，点染其间，确实是“烂如披锦”，前人誉之为“锦屏春晓”，列为“历城八景”之一。锦屏岩壁上有“壁立千仞”“白云无尽”“锦屏春晓”等巨字，皆为清人所刻。其下有“敕龙洞寿圣院”6个大字，康熙年间叶承宗所修《历城县志》说是北宋熙宁年间苏轼所书。寿圣院是一座龙王庙，故址在锦屏岩下，据载始建于西晋，北宋英宗时，赐号寿圣院。神宗时，庙中龙王赐封为“顺应侯”，金皇统年间又晋爵为“灵圣公”，当时，庙中香火很盛，“珠宫宝刹，金碧相辉。清梵钵声，响振空谷”。历朝济南的府县官员，每遇大旱，都要盛排仪仗到这儿祈雨。如今，龙王庙早已废圮，旧址之上，千年银杏树依旧枝叶扶疏，北宋元符三年（1098年）所刻的《敕封顺应侯牒碑》及《顺应侯碑》还矗立在那儿，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锦屏崖左侧石岸上刻有宋元以来题名十余种，其中最早的是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齐州知州范纯仁等人的题名。范纯仁字尧夫，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之子，后官至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也是北宋一代名臣。锦屏岩右侧为鸞栖岩，上有七级石塔，建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塔侧有金皇统三年（1143年）所立《白云庵主庆八十礼塔会碑》；都已有800余年的历史了。

锦屏岩迤东，巉岩之上，有洞窅然，是为东龙洞，此洞无路可登。据元代于钦《齐乘》所记，说洞口有做饭的锅灶。清初曾任山东学道的施润章在《游龙洞山记》一文中也说洞中有石瓮两个，后失其一。可能古代曾有人避战乱于洞中，以绳索攀缘上下吧！锦屏岩之西有佛刹山。佛刹山北坡另有一洞，称西龙洞，游人所至者即此洞。洞口上方，镌“诚应岩”三个大字，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何洪辰所书，字径60厘米。洞口两侧各有一镇石，镌“真气森敷薄，神功接混茫”一联。进洞有一石室，可容数十人，两壁

有佛及胁侍菩萨像 3 组，佛像高约 4 米，是东魏天平年间（534~538 年）所造。再往里走，洞身越来越狭，光线越来越暗，萦回曲折，游人须匍匐而行，洞顶及两壁上的钟乳石如瘤如柱，水珠渗滴，寒气袭人。倏促向前，忽见微光，渐行渐亮，倏然洞口豁然在目，脱身而出，已至佛刹山南麓了。

关于龙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上古之时，历山周围一片汪洋，有孽龙在此兴风作浪。大禹由应龙以尾画地做前导，神龟驮负息壤（一种自动生长的神土）为随从，疏通了济、漯二水，泄洪于海。孽龙现形，急忙逃窜，禹登高山寻找，见那龙窜入东岸石洞中，才待要捉，龙又长啸一声，破崖而出，窜入西山石壁，穿山而过，潜伏于山涧之中。禹将它捉住降服了它，从此，那孽龙便也改恶向善，时常应人们的请求，给干旱的土地洒些甘霖了。所以这龙洞山又称禹登山，山下那条幽深的涧谷，称为藏龙涧。

藏龙涧两旁的叠嶂峭崖，巉峨嵯峨，千形万状，有的似奔马陡立，有的像山猿摘桃，有的宛如长鲸弄波，有的俨然似仙女临风，令人目不暇接，游人至此，大有舟行长江三峡的情味。

由锦屏岩向东南而行，不久，便到一处四山环抱的椭圆形峪谷，一座红漆三门木牌坊，闪现在密林之中，上题“佛峪胜境”，牌坊俯临深谷，有桥横架。过桥拾阶而上，便是幽谷古刹般若寺。般若寺始建于隋代，依崖而建，山根为墙，庙堂虽早已荡然无存，但旧日寺院风貌还大体可辨：寺南北狭长，有前后两院。前院东为殿堂，西为长廊，下临深谷，护栏尚存，依栏凭眺，谷中绿树如涛。后院为僧人食宿之处，岩壁凸伸，状如披厦，泉水由石隙中渗出，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落在岩下白石上，日久天长，石面变成白形，贮起一泓碧池，此泉称“露华泉”，又名“乳肖泉”，崖壁之上刻了“云殿泉厨”四字，可谓形容恰切。又有隋唐以来造像和题记多种。更奇的是北面山崖有一巨形钟乳石，若悬若坠，附于峭壁之上，状如莲台，色呈棕红。

般若寺南，奇峰孤挺。峰不甚高，但苍黑色的巨石错杂磬确，形态玲珑而气势浑莽，这就是南灵台山。山顶是一处半山方圆的平台，传说禹曾登临，故称“禹王台”，俗名“钓鱼台”。山上有亭，称为“环碧亭”。对面石崖之上，有飞瀑飘然而下，崖下石潭，绿波涵映，溢为小溪，缓缓流向密林之中，此即为林汲山泉，是清代大 学 者 周 永 年 的 读 书 之 处。

佛峪景致，以深秋最美。金风萧索，白露凝霜，那满山满谷的柿子树、黄栌树、枫树、楝树，变成一片朱红绛紫，艳艳如火，而古松老柏，却依然苍翠，白石偶露，衰草暗黄，缤纷烂漫，花团锦簇，山风徐来，瑟瑟有声，实在令人陶醉。昔人把“佛峪红叶”列为“历城八景”之一，确实有很高的审美眼光。

（李永祥）

西王母和玉函山

唐代祖籍济南的著名诗人段成式在他的笔记体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了关于济南玉函山的一个优美传说：

齐郡（即济南）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颡，名玉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

在我国上古神话中，西王母本来是一位掌管瘟疫刑罚的怪神，《山海经·西山经》中说他：“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嘯，蓬发

(蓬乱的头发)戴胜(戴着一种叫玉胜的首饰)。”那状貌是十分可怖的。传说他住在极西的昆仑山上，山上生着一种不死之树，有三只青鸟供其役使，都是“赤首黑羽”的猛禽。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人所作的《穆天子传》(一说为西晋人伪撰)中的西王母却成了一位雍容和平的女王了，她在昆仑山上设宴招待乘八骏西游的周穆王，互相咏诗倡和。秦汉以后，方士们又把她进一步美化成淑穆慈祥的女神，她所居住的昆仑山也成了琼瑶仙境，而为她服役的凶猛的青鸟，也化做鸾凤仙禽了。人们怕她寂寞，又为她寻了个伴侣——东王公。据《神异经》(题东方朔撰，实为六朝文人伪托)记载，西王母年年都要站在稀有鸟的翅膀上来会东王公，她的侍者捧着长生不老的“三珠树”。嘉祥武梁祠后室汉画像第二石画云雾神仙之状，有男女二神，即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的情景。济南玉函山盛放不死之药的玉函，或许就是西王母到东方来会东王公时留下的吧！

汉武帝时，山东的方士特别活跃，像李少君、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深得武帝宠信。方士们怂恿武帝说：“见了蓬莱山上的仙人，再到泰山封禅，就可以长生不死。”于是，武帝数度东巡海上，封禅泰山，然而却毫无效验，他在玉函山得到不死之药，恐怕是惟一的一次幸运，可惜又化做白鸟飞走了。这个传说对于妄求长生的皇帝来说，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玉函山位于济南南郊十六里河村之东，循西麓进山，不远，便走进一处林木丛茂的幽谷，这里叫做西佛峪。西侧山坡上，是灵官庙旧址，今仅余庙门石柱，欹斜欲倾。由此东行，转过一块苍苔斑驳的巨岩，山腰间有一新月形天然石窟，北临深谷，东、西、南三面峭壁陡立，其上巨岩外伸，状如重檐，覆盖着弓形平台。此处原有寺，名“岩若窟”，又名佛峪寺，始建于隋，“文革”时破坏殆尽。南面岩壁上，有泉渗出，淋漓如雨，名“蕊珠泉”，又有佛教造像百余尊，最早的是隋开皇四年(584年)刘洛所造，距今已有

1300 余年了。其他多为唐代作品，对研究隋唐雕塑艺术有很高的价值，可惜也多已残破，难辨面目了。

玉函山主峰海拔 523 米，是泰山北麓较高的峰峦之一。山顶平阔，原为唐兴隆寺旧址，明清以来，改建为“碧霞元君祠”。碧霞元君传为泰山神之女，嫁为东海妇（见于宝《搜神记》卷四），北宋真宗封禅泰山，立石像祀之，称为“玉女神”。明洪武年间，重修泰山玉女庙，赐号“碧霞元君”。此后，各地纷纷兴建碧霞元君庙，称为“泰山行宫”，民间则亲切地称做“泰山奶奶庙”。据乾隆时所修的《历城县志》记载，玉函山的碧霞元君庙当年建筑相当峻伟，有南天门及三大殿，其中一殿，是座 12 米见方的无梁殿，全以巨石砌成，可惜，今已荡然无存。明清两代，这儿香火繁盛，每逢庙会，四方香客云集。有的香客将成筐的铜钱倾倒在正殿元君像前，称为“钱进”。神座前悬挂着一个磨盘大的铁钱，进香的站在大门栅栏外，用银锭或铜钱向大钱钱孔投掷，投中的就会“得福”。东殿神灵掌管子嗣，求子得了的人家，用银铸小儿献给神前作为酬报，叫做“银小儿进”。西殿神灵司眼病，患眼疾者求神得愈，则要用银子铸成眼睛献神，名为“银眼光进”。官府每季度都派吏员来查收香钱，是地方上的一笔很大的收入。

站在玉函山主峰，俯视北坡石壁，巨石纹理都是由南向北倾斜，可以想见在地质史上的造山运动中，泰山隆起斜拉地表的情景。而脚下碎石中，不时会发现水草和蚌壳的化石，远古时代，这里曾是浅海地带啊！峪谷西侧有一小山，顶端隆起，成方形，石色白，寸草不生，宛似玉函。其下又密布林莽，通体苍翠，很像一只鸟儿衔着玉函飞翔！

（李永祥）

鹊 华 秀 色

济南城北，有两座秀丽的山，即鹊山、华山，两山皆为“齐烟九点”之一。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曾以两山为题绘《鹊华秋色图》，留传至今（现在台湾）。至明代，有“鹊华烟雨”之称，列入历城八景。《历城八景》诗描述说：

鹊华秋色画图传，好是涵烟欲雨天。
每到汇波桥上望，两山似断复相连。

鹊山，在黄河北岸，斜对泺口，元代于钦《齐乘》记载说：“扁鹊炼丹于此。俗又谓每岁七八月鸟鹊翔集，故名。”此山无主峰，远望如翠屏。山石奇异，有的悬空，有的壁立。山下原有钟鼓二石，以石撞击，如钟鼓声，声传数里。过去，山上树木蓊郁，尤以桂树最佳，每至秋日，清香盈野。唐宋时，这里一片汪洋，称鹊山湖。南望群山抹黛，北眺荷塘稻田，古人誉为“独占济南湖山之胜”。山凹中，昔有砖砌矮墙，墙上挂有篙帘，内砌炉灶，相传扁鹊炼丹药于此。时有缕缕青烟，袅袅上升，隐现绿阴之中，景观奇特，人称“翠屏丹灶”。为历下十六景之一。明刘敕咏《鹊山》诗云：

西北开青嶂，无峰山自奇。
丹灶还历历，明月故迟迟。
桃李春开口，楼船水涨时。
许多寻胜者，到此好衔卮。

鹊山名胜很多，山西旧有鹊山寺，为宋时创建，南北两院，内

有佛陀、菩萨、罗汉等神像。另外，还有万善寺、扁鹊祠、鹊山亭、黄桑院、二郎炕等。现在寺院已毁，仅存扁鹊墓，墓前立一石碑，上刻“春秋卢医扁鹊墓”“乾隆十八年十二月曾友寿重整”。墓上植有合欢树，枝叶繁茂，花开胭红。山下垂杨拂波，鹅鸭戏水，把山映衬得更加俏丽。

华山，位于大明湖东北小清河边，全称“华不注山”，伏琛《三齐记》载：“不，柎的本字，读如跗，谓花蒂。言此山孤秀，如花柎之著于水也。”宋以前，华不注山周围也为鹊山湖水域，远远望去，此山像在水中含苞欲放的一支荷花骨朵。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二十首中写道：“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芙蓉，即荷花）。”

这山景色壮美，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描述说：“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此间，“花鸟之盛，不下虎丘”。山侧，一派山野景象，可谓“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唐时，四周水域也称莲子湖，浅水稻溪，沼泽芦荡，水村渔舍，胜似江南。山上，藤攀蔓连，盘根错节。草中乱石横亘、蹊径芜寒。由小道而上，多憩方能登其巅。极目远眺，南连泰岱，东接海溟，云气苍茫；稍近，点点秀山，铺金描翠，九曲黄河百舸争流。

华山之所以著名，不仅是风景壮美，而且还因为它是春秋时期的古战场，“齐晋鞌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顷公亲率大军在北马鞍山摆出阵势，与郤克率领的晋军进行决战，结果“齐师败绩”，齐顷公被晋军追逼，“三周华不注”，幸得大臣逢丑父与他更衣换位，并佯命其到山脚华泉取水，始得趁机逃脱。

山上古迹甚多，金兴定四年（1220年），全真教宗师丘处机的弟子陈志渊在山南建华阳宫，内祀五帝：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巡抚袁宗

儒改建为崇正祠，正殿祀逢丑父、闵子骞；两庑分别祀铁铉等 12 人、黄福等 19 人。明万历时仍改为华阳宫，祀四季神。明清两代，还建有泰山行宫、三元宫，分别供奉碧霞元君和天地水三神。山半腰为吕公祠，祀纯阳帝君吕洞宾。整座庙宇，有殿有庑，有亭有台，脊连檐牵，历来为香火胜地。

如今，华阳宫尚存，墙垣相围，院内古柏参天，虬盘鳞结，郁郁森森，四季鸟鸣。宇侧、岩壁、林间，碑碣林立，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现已辟建为华阳宫公园，华泉复涌，建筑修复。

（孔宪雷）

锦屏秀障千佛山

千佛山，古称历山，相传虞舜曾耕稼于此，故又称舜耕山。隋开皇年间（581~601 年），佛教盛行，随山势凿窟镌众多佛，始称千佛山。该山海拔高度 285 米，东西伸展，山上有近百种木本植物，40 多万株树，松柏满坡，林木蓊郁，花草遍布，野菊溢香。有桃花园、樱花园、流苏林、唐槐、宋柏等。寺院殿堂、亭台楼阁掩映其中，风光秀美。清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着力描述道：“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低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今日更美于当年。此山与大明湖、趵突泉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

坐落在山腰密林中的兴国禅寺建于隋开皇年间，距今已1400多年。始称千佛寺，唐贞观年间（627~650年），改称兴国禅寺。明清时曾整修扩建，解放后于1957、1972、1979年又三次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建。现寺分前后两院，面积约3000平方米。寺院正门朝西，上额镌“兴国禅寺”，为赵朴初书。两边嵌“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石刻楹联。门厅南北两侧有钟鼓楼。进寺院，南面是峻峭的岩壁，有隋唐时期雕凿的佛像，称千佛崖。佛像多毁于“文革”中。1979~1980年修复了100多尊佛像。岩壁下部自西而东有：龙泉洞，这里岩壁陡峭，气势险峻，洞顶丛树覆盖，山风吹来，呼啸作响。洞内悬清代诗人刘大绅咏龙泉洞诗：“千尺高岩万树林，时时洞口老龙吟。不知几夜清秋雨，并作寒泉一水深。”洞内南壁有山上最早的雕于隋开皇七年（587年）的造像。雕像下有半圆形的洞门，门上雕“龙泉”二字，入洞门沿石阶而下有长、深约2米左右的方池，水自石壁渗流，四季不涸，昔日为寺僧饮用水源。与龙泉洞相通，东侧是极乐洞，是千佛山造像群的主窟，洞内有大小雕像80余尊。中间阿弥陀佛盘膝而坐，身高3米，宽1.5米，左右各立观世音、大势至菩萨，高均3米，宽1米。极乐洞再东为黔娄洞，洞深约20米，洞壁湿润，内嵌石碑，记载了齐国高士黔娄子修身清节，隐居山洞的身世。此洞东侧为“洞天福地”石坊，横跨在通往对华亭的石阶上。由石坊下登40级石级向上约10米处是建于明代的一独院。院北昔有“对华亭”，院南侧峭壁上，松柏忌生，藤蔓覆盖，下有吕祖洞。后院迎面是近年修复的大雄宝殿。南北配殿皆供观音菩萨。寺院北面连接殿堂的廊壁上有赵朴初所题“齐鲁青来”四字，还有董必武和郭沫若的七绝手书石刻。整个寺院，殿宇亭廊错落，松柏苍翠，钟磬盈耳，香烟缭绕。

东部有形状、规模与兴国禅寺相同的一处院落，集儒教、道教、佛教于一体。西门额嵌“历山”二字，人称“历山院”。院内南

侧临山崖自东而西有舜祠、鲁班祠、文昌阁等名胜古迹。舜祠又名“重华殿”“重华协帝殿”，是纪念传说中的虞舜的祠堂。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的记载，可知祠始建于北魏之前。祠堂背后依山，坐南朝北，五楹出厦，红墙青瓦，雕花椽扉，造型简朴。祠堂内有1983年10月重塑虞舜坐像，头戴冕旒，双目瞑闭，须髯垂胸，神情庄重。两边塑娥皇、女英二妃。鲁班祠是为春秋时建筑工匠、被木工尊为祖师的公输班建的祭祠。相传祠建于宋代，现祠堂建于清咸丰年间。东与舜祠并列，四楹出厦，红墙青瓦，花椽门窗。祠堂内原有塑像，废圮，1983年重塑。塑像头绾发髻，面貌和善，衣着简朴，身旁设锛、锯等工具。左右各有童男侍立，一个捧书，一个捧墨斗。文昌阁在院内石砌高台上，建于清康熙甲戌年（1694年），1983年重修。塑像久废，现仅存石台空阁。一览亭，1979年建，为四面长亭，飞檐起脊，玻璃门窗，宽敞明亮。北面基部探出崖外。亭两侧各有曲廊延伸，亭廊皆有立柱支撑，如栈桥高架，气势壮观。亭东南有桧柏一株，树干胸径78.8厘米，传为宋代所植，人称“宋柏”，因施工伤根1984年枯亡，后植五叶地锦，沿枝干攀缘，古干新绿，复现生机。院有东门，门额“千佛山”石刻。门外是新建索道站房。

沿登山盘路还有传为“秦琼拴马槐”的“唐槐”及建于1957年的“唐槐亭”、建于清代又于1985年改建的“齐烟九点”“云径禅关”坊、乾隆题诗碑、丁宝楨所书的《历山铭》碑刻和1984年新建赏菊阁、乐云亭、望岱亭，1987年建成的千佛山石坊等。山北有1992年利用人防山洞建造的万佛洞，洞内采用仿造方法，精选我国四大石窟中的艺术瑰宝进行浓缩、重构，分别为“莫高集锦”、“龙门精华”、“麦积奇观”、“云岗荟萃”四部分，雕塑25000多尊佛像，为千佛山增添了新的景观。1981年，济南市人民政府把山东麓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划入千佛山公园，其后又增添了桃花园、瀛芳园、石图园、卧佛及十八罗汉大型花岗石雕塑等景观。同时

还建起了客运架空索道、奇能滑道、历山居等游乐服务设施。

连接千佛山的有金鸡岭、佛慧山、平顶山、黄石崖、燕子山等,或峰岩峻峭,或文物荟萃,或清泉叮咚,林茂谷幽,构成一处融山岩、林木、名胜古迹于一体的游览胜地。

(徐家茂)

泉城明珠大明湖

大明湖在济南市区中部,有“泉城明珠”盛誉,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

大明湖历史悠久,其名始见于1400年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其水北为大明湖”。不过郦道元所称之大明湖,在今五龙潭一带,后来,“半为街市”。今日之大明湖,古称:历水陂、莲子湖、西湖等。宋熙宁五年(1072年),齐州知州曾巩为防水患,浚湖修渠,建北水门,遂成今日基本雏形,金代以后,袭称大明湖。明清两代,修筑亭台楼阁,植荷种柳,形成“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其面积俗称九顷十八亩(合61.2公顷),至1948年,湖面缩小为45.27公顷(每公顷为1万平方米)。湖内荷、蒲、苇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占湖面的80%以上。

解放后,人民政府征购湖田为国有,仍租给120户湖民使用,并疏河浚湖,修砌湖岸,湖面界定为46公顷。随着城市园林建设

事业的发展，铲除田埂，净化湖面，植物种植面积逐渐减少。1971~1973年，又大面积清淤挖湖，深度达2~4米，除历下亭、南丰祠南侧、稼轩祠西侧保留8公顷浅水区外，不再适宜植物种植。

大明湖地势低洼，湖底由不透水粘土和火成岩构成，湖水由市区泉水、地表径流汇聚而成，1973年挖湖前后蓄水量分别是27万和90万立方米左右。

大明湖湖面浩淼，碧波潋滟，湖岸杨柳垂翠，湖上艇船游荡，荷花溢香，亭台楼阁等古代建筑隐现其间，景色秀丽，当代文学家郭沫若赞美大明湖是：“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蓉秋月一片大明。”昔日明湖有船数十只，供游人乘坐游览。较大的画舫，前后有平台，顶有篷，旁有雕花木窗，舱门镂空精美，有匾额楹联，舱内设床榻，上置红木茶几，放青瓷茶具，有的船头置灶，舱内设八仙桌。比较简陋的游船，四角装木棍，撑起一块油布，遮阳避雨，两种船都由人工操作，船工们站在船尾部，手握木篙插入湖底或渠边，猫腰一撑，再提篙，如此一撑一提，撑船在芰荷之间狭窄的水道上向前行驶。60年代以来，先后增设了双桨小船、游艇、脚踏船、动物造型船，画舫也改用机械作动力了。

滨湖游览区内的名胜古迹主要有：

历下亭。在湖中小岛上，四面环水，人们只能乘船登临。古历下亭，本为大明寺客亭，在古大明湖上（今五龙潭一带）。唐天宝四年（745年），著名诗人杜甫陪北海太守李邕宴历下名士于此，即席赋《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传颂千古的名句。今日大明湖的历下亭，始建于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八角重檐，攒尖宝顶，红柱青瓦，蔚为壮观。亭檐下悬清乾隆皇帝书“历下亭”匾额。亭北有名士轩，轩内墙上嵌杜甫、李邕线描石刻画像及清代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历下亭》诗碑。亭南有碑亭，内立乾隆皇帝咏大明湖诗碑。南门两旁悬何绍基所书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楹联。岛

上亭轩台廊,参差错落,花木扶疏,古树参天,秋日清波拍岸,凉风徐徐,令人心爽,故被称作“历下秋风”,旧时为历下八景之一。

铁公祠。在大明湖北岸,1955年改建,占地面积6386平方米,是一处玲珑秀丽的园中园。其中铁公祠是明初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铁铉的祭祠,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建,坐北朝南,前有出厦,红柱青瓦,简洁古朴。临湖有小沧浪亭,与铁公祠同时建成,仿苏州沧浪亭式样,面阔3间,四面出厦,红柱青瓦,宽敞明亮,亭体半浸水中,门窗迎湖,周植荷柳,环境幽雅。西门内旁壁上有清书法家铁保所书“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石刻楹联。

南丰祠。在大明湖东北岸,是清道光六年(1436年)为纪念北宋文学家曾巩而建的祭祠,称曾公祠。解放初扩建成四面封闭的古典式庭园。因世称曾巩为南丰先生,故又称南丰祠。该祠占地面积2190平方米,大门朝西,入大门北侧大厅,系1994年7月21日新立的祠堂,门额悬“南丰祠”木匾,两边楹联是:“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二字属先生”。厅内迎门立高2.2米的曾巩樟木雕像。周围陈列曾巩著作及世人研究评价文章。四壁悬着省市书法家赠送的书画。祠堂对面,以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于1987年的戏楼。楼呈方形,内有红柱承托,南为戏台,周有双层看台,内塑历代帝王群像。园内东边,为建于明朝末年的晏公庙旧址,今仅留晏公台,台基为石砌,高4.2米,上存古柏、古槐各一株。1993年于台上建亭,悬重8吨的金代明吕大钟。台南侧,临湖有四面敞亭,红柱青瓦,花格门窗,周有环廊坐栏,三面环水,整个院内松青竹翠树绿荷红,典雅清幽,景色宜人。

稼轩纪念祠。在大明湖西南岸,为纪念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而设。该祠原为李鸿章的祭祠,称李公祠,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61年改建为稼轩祠。该祠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门额系陈毅元帅手书,祠内迎门立稼轩塑像,四壁挂名人字画,

祠门两侧是郭沫若题写的“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楹联，周有透花墙碑廊。

北极阁。又称北极庙，在大明湖北岸高7米的石台上，门前有35级石阶。占地面积1078平方米，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修。庙内有正殿、启圣殿、钟鼓楼。正殿内原有元代修造的真武和龟蛇二将塑像及明永乐年间（1403~1425年）的木雕侍像。这些均毁于“文革”中。1980年，在殿内重塑了真武及火、水、龟、蛇四将和立于两边的12尊神将塑像。墙上绘有真武大帝学道成神事迹的彩色壁画。启圣殿塑圣父母坐像及侍童立像。

汇波楼。在大明湖东北侧北水门上，始建于元初，后曾重建。因失修，于民国时期倒塌，1982年重建。歇山飞檐，绿瓦花窗，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整个建筑由圆柱撑托，上下两层，上层檐下悬艺术大师刘海粟手书的“汇波晚照”和黎雄才先生书写的“汇波楼”横匾，周环回廊，宏伟壮观。登临其上，举目北望，鹊华二山分列东西，南眺千佛诸山，连绵起伏，俯视明湖，碧波荡漾，游船争渡，洲岛竦峙，亭阁掩映，历历如画。

遐园。在大明湖南岸，占地6900平方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建山东图书馆时，山东提学使罗正钧仿宁波天一阁形式倡建。进门以假山为屏障。园内有读书堂、海岳楼、明漪舫、汉画堂等。楼堂以曲廊相连，前后凿池塘，植莲养鱼，既可观赏又可备防火。建筑曾毁于“五三”惨案时日军炮火中，1965年进行改建，园门朝东，门旁石碣镌罗正钧亲笔题写的“遐园”篆书。园内有假山，山北、西两侧有池塘，池上有船形建筑，即“明漪舫”，围绕小溪，沿溪两岸有半壁长廊，壁上嵌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碑刻。廊北跨溪架“玉佩桥”，桥北方塘内植莲。塘东有读书堂，现为山东省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阅览室东临湖岸的假山上，有浩然亭，于亭内可尽览明湖风光。

此外，大明湖还有汇泉堂、明湖居、月下亭、秋柳园等名胜古迹(注：大明湖现正扩建中)。

(徐家茂)

济南泉水甲天下

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南部为山区，石灰岩层形成的济洞内，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北部是平原，地势低。南部潜流顺势北下，遇济南北部数座火成岩质的山根堵截，于是便从市区喷涌出来，形成众多的泉池，故济南亦称“泉城”。

济南泉水历史悠久，历代典籍多有著录，《春秋》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就有“公会齐侯于泺”(泺即趵突泉)的记载。北魏著名大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对趵突泉的声势做过生动的描写：“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北宋文学家曾巩在《齐州二堂记》中说：“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元朝于钦在《齐乘》中说：“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明朝王象春在《齐音》中说：“考之《一统志》，水自内而外出者，天下唯济城己耳。”到了清代，记述济南泉水的典籍就更多了，兹不赘述。

济南的泉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数量众多。早在金代，济南民间就曾立有《名泉碑》一方，列举了七十二名泉。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一数字。清乾隆时盛百二在《听泉斋记》中就说：“历下之泉甲海内，著名者七十二，名而不著者五十九，其他无名者奚啻

百数。”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说有名的，有名而不显著的就有 131 处，其他无名的更不下百余处。

济南市区泉池分布比较集中，习惯上分为四大泉群。趵突泉泉群在旧城西南隅，有趵突泉、金线泉、漱玉泉等 30 余处。其中尤以趵突为胜，三窟鼎沸，浪涛翻滚，声如隐雷，称“趵突腾空”，为历下八景之一。其他清泉也各有特色，形成著名的风景胜地，1956 年这一带被辟为以观泉赏鱼为特点的水景公园。珍珠泉泉群在济南旧城内，有泉 40 余处，珍珠泉、王府池等泉最为著名，也形成著名的风景区。“白云雪霁”即为旧时历下著名八景之一。所以历代王公显贵多于此置别墅、建府第。其他泉池多藏在居民院内，清代刘鄂《老残游记》所描述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就是指的这一带。居民烧茶煮饭，弯腰汲水。诸泉汇流成溪，绕院穿屋，小桥流水别有情趣。黑虎泉泉群在旧城外东南隅，沿护城河两岸，东西向排列着 15 处清泉。其中黑虎泉最为著名，形成“洞前飞瀑”的景观，为历下八景之一。其他各泉也都流进河内，河水清澈见底，沿河山影树影倒映水中，景色十分清幽秀美。1965 年在这里辟出一个玲珑别致的滨河公园，河内设画舫，人们荡舟在柳暗花明之中，其乐融融。五龙潭泉群在旧城西侧，有五龙潭、古温泉、贤清泉等 27 处。这里也是著名的水景区，昔日名之为“苍生霖雨”，是历下十六景之一。这里泉池以五龙潭最大，且水深达 4 米余。潭中蓄有大鲤，唼喋畅游，人们沿岸赏看，称“龙潭观鱼”，为泉城一大景观。这里在 1985 年扩建为公园，潺潺众泉，蜿蜒曲溪，或流水当门，或廊浮水上，或阶上听泉，或柳岩纳荫，韵味无穷。四大泉群的水，有的流入东西泺河，有的流入护城河，然而大部分汇入大明湖，湖波浩淼，澄碧如空。

不仅城内泉多，而且城外也不少。例如章丘明水镇就被誉为小泉城，那百脉泉可谓潇洒俊秀，池底冒出串串水泡，犹如滚动着的颗颗珍珠，更有数尾锦鲤在绿藻深处戏游，显得生机盎然。

百脉泉和邻近的众泉汇流成河，名叫“绣江”，两岸杨柳婆娑，水中鹅鸭戏游，甘甜的泉水，浇灌着万亩稻田，滋润着十里荷香。这里的香稻全国著名，清朝乾隆帝就吃过这里的香稻米，人们把它称为“贡米”。平阴洪范池更是出奇，四周重峦叠嶂，沟壑连绵，中间高出地面数尺，可这泉却四季常流，它和其他各泉流进狼溪河，岸上的翠柳、洲中的芦荡映在水里，形成水乡画图。东阿镇（旧东阿县城）闻名中外的阿胶，就是狼溪河水浸泡熬制而成的。此外，历城区四门塔，长清县灵岩寺、五峰山，平阴翠屏山等宗教圣地，也分布着许多著名泉池。

济南泉水甲天下，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还因为它水质清冽甘美。就拿趵突泉和五龙潭公园内的玉泉来说吧，经化验，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标准，为优质矿泉水，可以直接饮用，所以济南市民仍有用桶提取附近泉水烧茶煮饭的习惯。据载，乾隆下江南时，沿途所用的水皆为北京玉泉水，当至济南，品尝趵突泉水以后，便立即换为趵突泉水，并把玉泉改为“玉泉趵突”。济南泉水用来烹茶味醇色鲜，北宋大文学家曾巩曾咏《趵突泉》诗赞美：“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真。”另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咏《金线泉》诗赞道：“旗枪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解放前，趵突泉四周围摆满了茶摊，试茶品茗，故有“不饮趵突水，空负济南行”之说。如今，饮泉品茗的风气更盛，“蓬莱茶社”里经常是茶客盈室。

（孔宪雷）

名震古今的趵突泉

趵突泉,在济南旧城西南隅,坤顺桥外,南临泺源大街,周围泉池众多,形成趵突泉泉群,为济南四大泉群之一。著名的有趵突泉、金线泉、漱玉泉、马跑泉、卧牛泉、阜华泉、柳絮泉、老金线泉、洗钵泉、尚志泉、螺丝泉、满井泉、浅井泉、白云泉、望水泉、东高泉、白龙湾、登州泉、杜康泉、混沙泉、灰池泉等,其中趵突泉为泉群之首。

趵突泉历史悠久,《春秋》载: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公会齐侯于泺”。“泺”即趵突泉。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俗谓之娥姜(英)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北宋时称“槛泉”,取《诗经·小雅·采菽》中“鬯沸槛泉”之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齐州二堂记》中始称趵突泉,并云:“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故又谓之温泉。”

趵突泉,历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多有赞美,诸如宋代曾巩、苏轼,金代元好问,元代赵孟頫,明代王守仁,清代王士禛、蒲松龄、何绍基等都有咏泉佳作。就连康熙、乾隆皇帝也曾在趵突泉边写诗刻石,颂扬名泉。

趵突泉,三足鼎沸,声如隐雷,景观奇特,称“趵突腾空”,为历下八景之一。同时,附近还保存着许多名胜古迹,如泺源堂、娥英祠、观澜亭、来鹤桥、望鹤亭、蓬山旧迹坊、尚志堂、李清照故

居、白雪楼、万竹园及众多的咏泉碑刻等。因而给造园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1956年，这里被辟为公园，当时面积不足4亩（每亩666.67平方米。下同）。1964~1965年进一步扩展，将附近泉池名胜划归公园。疏浚泉池，改造地形，凿池叠山，修建亭榭，广植花木，增添文化和服务设施，面积扩大到51亩。1984年收回万竹园重新翻建，并新建西花园。1999年再予扩建，西部将白龙湾、万竹园与趵突泉连为一体，东部扩大到趵突泉南路，北部将大板桥、小板桥（即广会桥、夹河桥）地段直至共青团路并入，遂成现在的规模，公园面积扩至11万平方米。

该公园以趵突泉为中心，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采用我国传统造园的手法，沿着泉水的历史文脉，范山模水，再现自然山水之美，以观泉、赏鱼、品茶、山石为特色，创造古朴、清幽、含蓄的境界，把全园规划为15个景区：趵突泉景区、尚志堂景区、漱玉泉景区、东门入口区、枫溪景区、沧园景区、白雪楼景区、万竹园景区、南大门景区、通乐园景区、白龙湾景区、望鹤亭景区、娥英祠景区、齐州遗风景区、北大门景区。

趵突泉景区在公园内西侧，是全园构图中心，由亭、堂、廊、榭、桥组成一个封闭空间，高低错落的建筑像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着喷突腾涌的趵突泉，人们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泉景。泉池北面是“吕祖庙三大殿”，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大殿“泺源堂”和第二大殿“娥英祠”均建于宋代，改建于明代，第三大殿“三圣殿”系清代建筑，三座大殿由院墙相围，形成独立的景区。泉池西侧是观澜亭，伸入水中，盛夏可于此避暑。趵突泉东为“蓬山旧迹”坊，坊北为来鹤桥，均为明万历初年历城县令张鹤鸣创建，历经改修，乃成现状。这桥横架泉池之上，景域开阔，是欣赏冬景的理想场所。桥东为望鹤亭茶社，依水而筑，窗明几净。这里，内外景色交融，似在图画之中，清代文人施闰章曾有《趵突泉

来鹤桥记》云：“仰而见山之青，俯而见泉之洁”；“清流激湍兮，孰浚其源？潜蛟出蛰兮，飞虹蜿蜒”。

趵突泉东侧为尚志堂景区。四周溪流环绕，濒水曲廊蜿蜒。尚志堂原是“金线书院”（亦名尚志书院），由金线泉得名，书院性质，时至明清为专门培养科举人才的机构。近几年来，尚志堂院中栽植了白玉兰、紫玉兰，初春花开，芳香扑鼻，所以人们又把该院称作“玉兰院”。院中有一奇石，叫“待月峰”，属宋代寿山艮岳遗物。上面布满月形透洞，每当皓月当空，月光穿过洞穴，洒在池边水中，景观奇特。故有诗赞曰：“精灵俊逸玉玲珑，神工鬼斧浑然成。一年三十六轮月，变幻俱在此石中。”（竹石轩）

漱玉泉景区与尚志堂景区相邻。该区东侧有一高4米的太湖石，名叫龟石，系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别墅——云庄中的遗物，具有石品中皱、瘦、透、漏的优点，为当今济南第一名石。它立于苍松翠竹之间，宛若一幅立体山水画轴。龟石北面隔路处的假山，1964年建成，泉溪环绕，山径盘曲，青松垂荫，为公园内制高点，于上可观览园内外景色。龟石西面漱玉泉，呈长方形，泉水由南面溢水口注入自然石砌的池内，池周叠以山石，花木扶疏，夏日乘凉观鱼，可称佳境。漱玉泉北面的李清照纪念堂，1980年改建，建筑面积362平方米，古典风格，由正厅、溪亭、叠翠轩、回廊、大门构成，院内奇峰耸立，松竹掩映。整个院落显得朴实清幽。正厅楹柱悬挂着郭沫若撰书的对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堂内陈列有李清照各种版本的书籍和名人字画。新近又增建展厅、蜡像馆、新建花园，定名枕流小苑。

漱玉泉景区东侧是东门入口区，该区采用障景手法，迎门叠山，避免一览无余。山高4米，宽13米，长30米，气势磅礴，青条披扶，松柏储洞。山后溪流环抱，山中洞壑幽深。游人可绕山穿洞进入南侧景色开朗的枫溪区。枫溪开阔狭长，透视线达120余米。

前景为岛榭，中景为曲桥，远景是假山，山后跌瀑布，沿岩植花木，景深悠悠。枫溪南侧是沧园区，1965年，为纪念明代嘉靖年间济南著名诗人、“后七子”之一的李沧溟(攀龙)而建，故名。有厅有庑，曲廊环绕，院内植有奇花异木，陈列各种盆景。冬季，苍松滴翠，修竹婆娑，腊梅盛开，恰似一幅立体岁寒三友图。沧园景区西侧是白雪楼景区，以娱乐为中心，是一开阔自然水面，沿池叠牡丹山，山上设牡丹亭，并植红枫、耐冬、青松、翠竹，优美、和谐、自然。

(贾祥云)

北方标准庭院万竹园

在风景秀丽的趵突泉公园西部，有一座环境清幽，景色宜人的园林胜景——万竹园，它占地18亩(1.2万平方米)，以13个不同院落组成，园内外有白云、白龙、东高、望水、登州、杜康诸名泉，是一处独具风格的私人庭园。

万竹园之名始见于元。据于钦的《齐乘》记载：“登洲泉、望水泉在万竹园内。”隆庆四年(1570年)宰相殷士儋归隐济南，居万竹园易名为“通乐园”，又建“川上精舍”。清康熙年间，济南名诗人王苹购得此园，又易名为“二十四泉草堂”，取园内望水泉居济南名泉二十四位之意。到了民国初年，军阀张怀芝占据此园，他为满足居住、办公、娱乐、宴客的需要，邀集江南、江北的能工巧

匠,并动用军队,历时5年之久,始建成今日之规模。

解放后,该园归省卫生厅等单位使用。“文革”中毁坏严重。“文革”后,为保护名泉、名园,在园林局的支持下,趵突泉公园全力投入了万竹园的恢复工作,经过日夜突击,1984年5月1日正式开放。1985年又恢复和改建了西花园,并正式启用原名——万竹园。1985年8月,将著名画家李苦禅纪念馆设在园内,展出李苦禅收藏的书画、文物及其本人作品共400余件。

万竹园由四部分组成,前、东、西三院成品字形排列,花园居于西部。该园充分利用泉水丰富的条件,在北方四合院的基础上,借用江南古典园林之造园手法,在有限的面积内,仿效自然,移天缩地,小中见大。根据功能要求,把全园划分成若干小景区,每区都具有主题和特色。空间构图则突出对比效果,组合成有大有小、有开有合、有高有低、有明有暗、丰富多彩的空间。各空间互相穿插、渗透,运用借景和对景手法,增加丰富空间层次,达到步移景异之妙。水的运用更是别具匠心。泉水穿庭入户,环绕于建筑物之中,将房屋、花木、山水融为一体。有溪流,有池泉,动静相映。形成院院相通、渠渠相连、楼堂层层、流水潺潺的景观。万竹园的建筑物均古色古香,朴实雅致,厅、堂、馆、榭遣意赋形,兼顾点缀湖山,体量虽多,却以轻快、玲珑为胜。既体现城市的物质文明生活,又具林泉之趣。这儿有宴客聚友轩敞之厅堂,也有起居幽静的别院及读书作画的斋馆。庭院的主要建筑物都规则地排列在轴线上。若门户洞开,自南而北,形成一条优美的透视线。园中空间一环扣一环,建筑、庭园一层深一层,使人有深邃之感。建筑物的地面都适当的升高,登阶入室。室内以隔扇、花格窗、屏风进行划分,使之有变化有层次。院内回廊逶迤,起到了联系与交通的作用。院落之间的联系,多采用垂花门或异形门,门洞都能形成优美的框景,具有虚实对比的空间变化。关闭门户,各院自成一体,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致。建筑物的装修,色彩淡雅,

雕刻精美，富有变化，挂落、屏风、长窗构图得体。木刻题材广泛，如丹凤朝阳、鲤鱼跳龙门、花草瓜果、喜鹊登梅、八仙过海、松竹梅等。石刻刀法流畅，造形逼真，门类繁多。有象征文的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象征武的虎、豹、狮、象，枪、刀、剑、戟。也有历史人物，如米元章拜石图、陶渊明隐居等，以及飞禽走兽、神话传说，乃至耕、樵、渔、猎、太极、八卦等。砖刻艺术，如鸳鸯戏水、鹿衔灵芝等，也是巧夺天工之作。

万竹园作为私人庭院，建筑密度大，更显得空间闭塞。所以在西花园的改建规划上，以绿化为主，以疏朗、开阔为特色，与其他区形成鲜明对比效果，并为游人留出充足的活动空间。花园建筑采用周边式布局方法，沿北部和西部边缘修一曲廊，错落于山池林木之间，颇有自然之趣。廊子的东端通过洞门与西院相通，并有竹林曲径通往后院。“知鱼亭”作为廊的起点，南端以“白云轩”临泉而筑作为廊的终点。曲径、曲廊灵活运用，互为借景，达到分而不死，隔而不断艺术效果。花园东侧原为水沟，现改为自然式溪流，有收有放，曲折自然。溪西岸林木葱郁，风景幽邃。溪水自南而北潺潺流入，靠近墙面，墙面留出自然式种植池，大小高低错落，疏密相间的丛丛翠竹。以白墙为背景，映出一幅幅别致的画面。园林空间有限，所以要过进行空间分割，以使人有空阔感。花园中间利用自然式道路系统，以树丛进行分隔，创造出自然起伏的草坪，使人们进入花园后，宛如置于碧草如茵的大自然之中。园林艺术妙在含蓄，南部入口建一垂花门，通过门洞，可看到起伏的山石，掩映的修竹，园中景物似漏非漏，耐人寻味。入门后，绕过山石，有一桥亭横于清溪之上，古雅别致，于此可纵览西花园全貌和白云泉优美的景色。园内竖向设计上，广泛应用起伏地形，并与叠石有机结合，形成自然多变的地形，有壁峰，有叠石，有岗阜，有溪流，有竹径。山石的运用，采用点石的方法，以少胜多，以简胜繁。

植物是组成园林的主体，顾名思义，万竹园的植物配植以竹为基调树种，既有大片竹林渲染气氛，也有疏竹簇簇，翠竹摇曳，风生修篁。在庭院内部，选植一些有色、有香的名贵花木，且每个院落各有不同。如玉兰院、石榴院、海棠院、木瓜院等。

万竹园，这一古老的庭园，像一块璞玉，一经雕琢就露出它那瑰丽的光彩。1993年，万竹园被收入《中国传统民居图集》。它无论从园林艺术，还是从历史文物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贾祥云）

黑虎泉与解放阁

济南旧城东南隅，沿护城河两岸，长约1公里，东西排列着近20处清泉，形成黑虎泉泉群，为济南四大泉群之一。从东向西依次为白石泉、玛瑙泉、九女泉、黑虎泉、琵琶泉、南珍珠泉、豆芽泉、五莲泉、一虎泉（缪家泉）、金虎泉、胤嗣泉、汇波泉、对波泉、鉴泉、舜泉（舜井）、香泉（已填埋，可恢复）、杜康泉等。其中最大的为黑虎泉。

黑虎泉位于南护城河东端南岸陡壁下。昔日，泉水声势浩大，明朝人刘敕曾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泉溢而出，轰轰下泻，澎湃万状，像喷珠，像飘练，像飞雪，像挂帘，像下雾，像瀑布，水石相击，其声如昆阳巨鹿大战，万人鸣鼓击缶，十丈外蒙蒙洒人，不寒而栗。泉为一天然洞穴，高2米，深3米，水由洞中通过暗道由

蚩螭（亦作霸下）嘴中喷出，取“口内悬河”之意。然后流进长13米、宽9米的石砌方池。池内泉水清澈，青藻飘浮，锦鱼戏游。池北为一水闸，水漫过闸泄入河中。

黑虎泉的名字，始见于金代《名泉碑》。在济南地区，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从前某日午夜，深涧中嗷嗷叫声惊醒了酣睡的居民，他们前来围观，只见两猛虎格斗，一只黑色，一只金色。虎见众人，心生惧意，黑色的钻进东泉，金色的钻进西泉，于是便有了“黑虎”“金虎”的称谓。不过，据元代于钦《齐乘》记载，黑虎泉得名是因为此处深邃的洞穴内有一巨石盘曲伏卧，石上生满黑苍苍的苔藓，犹如猛虎深藏。泉水从巨石下涌出，湍击巨石，发出粗犷的鸣响，再加半夜朔风吹入石隙裂缝，惊人的吼声回荡于洞中，酷似虎啸，所以人们给它起了“黑虎”这一名字。明代诗人晏璧曾有《黑虎泉》诗：

石蟠水府色苍花，深处浑如黑虎藏。
半夜朔风吹石裂，一声清啸月无光。

黑虎泉一带风景佳丽，明朝人胡纘宗《过泉留题》诗赞道：

济水城南黑虎泉，一泓泻出玉蓝田。
巨鳌伏地米河内，灵液流云到海边。
杨柳溪桥青绕石，鸱鸢烟雨碧涵天。
金汤沃野还千里，春满齐州花满川。

清末文人唐尧卿，又把品泉山房（现清音阁处）及黑虎泉周围的景色拟为八景：山房门外，柳丝飘荡，偎依短墙，墙上置花异草，称“柳岸花明”；窗外两岸，堆山叠石，峰峦突兀，洞壑布其间，称“窗外奇岸”；两岸人家多植石榴，如锦似绣，称“榴林锦簇”；溪上石桥狭窄，行人如织，“仿佛蚕从路，骑驴过剑门”，称“石栈骑驴”；春日水暖，溪中鹅鸭追逐，称“春波浴鸭”；夏日傍晚，常有壮士浴马溪中，称“晚凉洗马”；泉水涌流，声如洪涛，浪花飞溅，称“洞前飞瀑”；夜雨人静，三皇庙钟声悠悠，称“夜雨闻钟”。

这里，水面宽阔，地形起伏自然，是极佳的造园场所。1965年，疏浚了河道，石砌了河岸，堆叠了假山，新建了亭台廊榭，栽植了各种花木，被辟为滨河公园，成为秀丽的风景区。1985年又增建清音阁、五莲轩、伴月亭等几组园林建筑，因地就势，与花丛翠树相映成趣，颇具江南风貌。尤其是新建的解放阁，更为景增色。

解放阁，与黑虎泉隔河相对，为纪念解放济南而建。阁址位于当年（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城突破口处。1965年建成台基，“文革”中停建，1986年9月落成。

解放阁连台基高达34.1米，占地1637.2平方米，建筑面积617.2平方米，采用中国古典建筑形式，金黄琉璃瓦，外用花岗石贴面。阁分两层，四面方形。下层环廊，廊内梁枋绘有山水、花卉、鱼虫、飞禽、走兽等小品。廊外为平台，台周饰石栏。阁名为陈毅元帅题写。鎏金的“解放阁”三字石刻和匾额，分别镶嵌台基西南两侧和高悬于阁的二层门额上。台基东侧，贴壁立有《解放济南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3764位烈士的英名。台基西侧嵌《解放阁修建碑纪》，记载了济南战役的概况。廊内侧阁外壁上，镶有8组反映济南战役的灰色大理石浮雕，画面生动逼真，笔调雄健遒劲。内容丰富深刻：《水深火热》反映了人民在痛苦中渴望解放；《支援前线》《战前动员》《登城》《巷战》《攻打伪政府》《欢庆胜利》6幅，集中描绘了战役的全过程，讴歌了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军民鱼水深情；《继续前进》则是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胜利进军的勃勃英姿。阁内，大厅中央矗立着一组高大的雕塑——济南战役中我军民的英雄群像。四周陈列着济南战役革命文物。上层，攒尖宝顶，翘角重檐，斗拱承托，吻兽飞动，风铃扬韵。四周设汉白玉石护栏，可凭栏观览周围景色：阁西，水光潋滟，石林秀出，亭榭隐现；阁北，护城河有春夏秋冬四季花园，似彩色锦带上镶嵌的颗颗珍珠；向南远眺，千佛、佛慧、会仙等山，

青葱遥连，蔚为大观。

（孔宪雷）

珍珠泉与德王府

济南大明湖以南，泉城路以北，约1.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带内，有泉池40余处，尤其曲水亭街附近，泉池则更为集中，形成“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景观。这里的主要泉池有：珍珠泉、溪亭泉、濞泉、散水泉、濯缨泉、灰泉、朱砂泉、云楼泉、腾蛟泉、珍池、王庙池、雪泉、芙蓉泉、玉环泉等，形成珍珠泉泉群，为济南四大泉群之一。诸泉汇流成溪，流入百花洲、大明湖。

珍珠泉，坐落在院前街省人大常委会大院内西南侧，略呈长方形，面积1240平方米。池内泉眼众多，涌出串串水泡，参差错落，与日光相映，如同珠玑，故称珍珠泉；又因旧城东南隅护城河内有南珍珠泉，所以又称北珍珠泉。珍珠泉自古以来颇负盛名，历代文人多有题咏。金代的雷渊，明朝的晏璧、边贡、李攀龙，清朝的蒲松龄等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阴历正月十六日，清圣祖玄烨南巡经过济南，观赏珍珠泉后，赋《观珍珠泉》诗一首：

清浅漾珠圆，细浪潏洄小荇牵。
偶与诸臣闲倚槛，堪同渔藻入诗篇。

诗前并有小序：“济南多名泉，趵突、珍珠二泉为最。昔经过趵突，

曾赋篇什；今临珍珠泉上，爱其澄澈，题曰‘作霖’。”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三日。清高宗弘历也题《珍珠泉》诗一首，刻碑立泉北岸，至今尚存。

北魏时，珍珠泉一带，溪流纵横，依照古代风俗，每逢阴历三月上旬巳日，为消灾去忧，人们常在环曲的水渠旁流觞取饮。故隋唐以前称流杯池。《水经注》记载：“历祠下，泉原竞发，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宴，公私多萃其上。”宋朝曾巩的别墅曾建于此，内有名士轩，以杜甫“济南名士多”句得名。金末元初，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张荣于此建府第，其孙，元大都督张宏建“白云楼”。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朱祁镇封皇子朱见潏为德王，成化初年（1465年）在这里建德王府。

德王府，也称德藩故宫，规模宏大，占当时济南城的三分之一，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南至院前街，北至后宰门（即厚载门），府前建有牌坊，上写“钦承上命，世守齐邦”。宫院四面各辟大门，南面为正门，叫“端礼”，东叫“休仁”，西叫“遵义”，北叫“广智”，四门皆有牌坊。府内大殿为“承运殿”，后殿叫存心殿，并有正宫、西宫及王子居住的东宫。另有斋宫、御书阁、渊澄阁等。院内众泉汨汨，汇流成濯缨湖。湖旁泉边建有濯缨亭、白云亭、玩月亭，并有参天古木，郁郁葱葱，森森大院，威武庄严。平日，王府显贵常乘龙舟荡于湖内，赏景看戏，饮酒作乐。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攻陷济南，第五代德王朱由枢被俘，显赫一时的王宫旧院改换门庭。清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巡抚周有德将旧王府改建为巡抚公署，面积虽有缩小，但建设得却很华丽。周氏又把青州明衡王府宫殿的木石、装饰品及花木、太湖石等运来，加以利用，使其更为堂皇。公署不仅保持了德王府的旧时模式及泉石花木之胜，而且建筑也大都延用了旧时的名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韩复榘将衙门放火烧掉，故仅存“承运殿”，即现在所说的清巡抚院署大堂。

巡抚大堂，面阔五间，进深16米，歇山九脊，翘角飞檐，前为卷棚式，6根大红柱支撑着错落的云头斗拱，楹柱之间为落地栊扇，檐角脊端皆饰吻兽，整个建筑金碧交辉、宏伟壮观，1979年被列为济南市重点保护文物。

如今，珍珠泉泉区、德王府旧迹，已焕然一新。珍珠泉已疏浚整修，岸边假山秀立，绿柳成荫；山脚池塘环抱，溪水潺流，荷花艳开，小桥卧波。泉水由玉带河注入濯缨湖。湖南岸为海棠园，是一古典形式的二进院落，院内有宋代海棠，枝繁叶茂，花期盛开，芳香四溢，周围有翠竹、梧桐，葱郁成林。园东一泓碧水，岸石嵯岈，槐柳杂生，百花争辉。水中有岛，岛上有亭，与亭相对隔岸南面即为清巡抚大堂。整个亭园，浓荫蔽日，时鸟欢歌，显得庄严清幽。

（孔宪雷）

五龙潭的今昔

五龙潭，在今共青团路东首之北百余米处，长70米，宽35米，水深4米余。周围有近30处泉池，形成五龙潭泉群。著名的有五龙潭、天镜泉、古温泉、贤（悬）清泉、濂泉、月牙泉、蜜脂泉、玉泉、虬泉、显明池、裕宏泉、官家池、青泉、回马泉、东流泉、北洗钵泉、七十三泉等。其中五龙潭居群泉之首。

相传，昔日五龙潭“其深莫测，每遇大旱，祷雨辄应”，所以元

朝初年，当地有好事者在潭侧建小庙，内塑五方龙神，从这时起，便称五龙潭。关于五龙潭的形成，元朝大散曲家张养浩在《复龙祥观施田记》中说：“闻故老言，此唐胡国公秦琼府第遗址，一夕雷雨，溃而为渊。”后来有醉后人潭的人，见深水中水晶宫，门额上书“胡国公府”四字。当然这不过是一种传说。此潭汇集诸泉水经生产渠至西泺河，最后由小清河入海。

北魏时，这里水域很大，是古大明湖的一角，称“净池”，宋称“四望湖”。元时水面缩小，仅剩泉池及纵横溪流。此水域历来景色清幽，杨柳依依，鸣禽啾啾，荇藻漂浮，锦鱼戏游，修竹婀娜，拂云蔽日，夹岸杨柳，恍若仙境。北魏著名大地理学家酈道元《水经注》中就有“左右楸桐负口，俯仰目对鱼鸟，极水木明瑟”的赞誉。景色的秀丽，曾引得历代文人来游。杜甫、苏轼、桂馥等均曾咏诗赞美。

潭周，历代多有建筑，北魏有大明寺、客亭。唐时有“水练寨”之称，建秦琼祠堂，遂有秦琼府第的记载。元初，潭侧建凝碧宫，明末建霖雨亭，清初建蛟人馆、我忆阁，乾隆时又建潭西精舍，著名学者周永年、桂馥曾在此辟借书园。解放前，建筑大都倾圮。

济南解放后，政府曾多次整修，并于1985年重新规划、扩建，将五龙潭泉群周围的泉池连为一体，浚池砌岸，堆山叠石、植花木、建亭阁、修馆园、设碑廊，焕然一新，遂成为以潭、池、溪、港等景观构成，质朴野逸为特色的园林水景公园。

五龙潭居公园中部，为全园构图中心。潭水清澈碧绿，岸边翠柳多姿，假山危峰兀立。依山建有水亭，名叫“渊默”，于内可赏潭景。潭西是武中奇书法展览馆，位于原潭西精舍旧址，由名士阁、展厅、碑厅、会友亭、得月亭、碑廊、古历亭等构成一所玲珑清雅的四合小院。名士阁内设龙潭画廊，经常进行名人书画展，并一年两度举行“龙潭诗会”。三展厅于1985年辟为“武中奇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室”，陈列武中奇的历年作品多件。碑廊嵌碑刻35方，

内容为唐朝李白、杜甫，宋朝曾巩、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金朝元好问，明朝李攀龙，清朝孔尚任等大家的诗词文章，皆武中奇所书，还有今人画的松梅等。

五龙潭东南隅是中共山东省党史馆，由“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王尽美、邓恩铭雕像”“党史陈列馆”三部分组成。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5~1927年初，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处在此秘密办公。现在室内按当时面貌摆设着桌椅、茶具、办公用品等。机关旧址北侧松林处，立有王尽美、邓恩铭雕像，红色花岗石质，上刻中共“一大”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七绝一首：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陈列馆在机关旧址南侧，1991年“七一”前夕落成，建筑面积1273平方米，造型新颖，古朴庄重，按建筑层次设三个展厅，展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的内容，生动地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程。

尽园、余乐园，系一组革命历史纪念性建筑群，总占地面积1800多平方米，由楼、台、亭榭等组成一体双院。两院相连，隔而不断，一静（尽园）一动（余乐园），步移景迁。尽园北侧建有“美铭”亭，形为双亭式，取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名字中的“美”、“铭”两字命名。它亭亭玉立在古温泉澄澈明净的水面中，寓意深刻，象征着革命先烈并肩创业、党群鱼水深情。余乐园在尽园西侧，环廊迂回错落，依地势造形。长廊起伏曲折，给人以水动、鱼动、廊动“鱼乐我亦乐”的动态美感。院内花木多为松竹，以寓革命前辈傲霜雪、守贞节的高尚革命情操。

五龙潭的东侧为“曲池观鱼”景观，池内植荷、蓄鱼，池上架曲桥，桥上设石栏、石凳，游人可凭栏小憩。五龙潭西北侧为濂

泉,岸上、水中建有水榭、曲廊、小亭。榭名“濂轩”,亭名“寒玉”。泉水蜿蜒北去,与贤清泉相接,溪岸植花木,形成花溪港湾的景观。港中有岛,岸上有亭,岛名“绿屿”,亭名“壶亭”。贤清泉北,临岸建有“揽泓轩”,内设茶座,人们可于内品茗赏泉。

(孔宪雷)

百脉寒泉珍珠滚

日夜吐珠溅玉、喷涌不息的百脉泉,位于旧明水镇东北,原龙泉寺内的梵王宫前,即今章丘市园林处内。因“水源方百步,百泉具出”(《水经注》),故谓之百脉泉。水出泉底,如碎而复圆的翻滚的珍珠,故而又名珍珠泉。

明水向有水乡之称。域内群泉密布,溪流纵横,形成绣水、明水和西麻湾三个水系,其中百脉泉为诸泉之冠。它和位于济南市区的趵突泉,遥相媲美,堪为姊妹泉。“盖历下众泉,皆岱阴伏流所发,西则趵突为魁,东则百脉为冠”(于钦《齐乘》)。因此,人道百脉泉水甲齐鲁,可谓不虚。

古之百脉泉,为一方池,深数丈,水清见底,锦鳞追戏,出入芹藻之间。池壁雕石,上镌名人题句,如“一泓清沁尘不染,万颗珠玑影自圆”、“空明通地脉,活泼见天机”等。泉北,拾级而上,是肃穆庄严、香烟不断的“梵王宫”。其门匾横额“梵王宫”和两旁楹联“台榭屯阴翡翠半涵兜率殿,池涛漾玉水云深锁梵王宫”,出

自明代词曲家兼工草书的雪蓑之手。

珠泉的奇观，禅房的清幽，吸引了历代雅客骚人，他们或临泉赋诗，或即景抒怀，炎凉荣辱，皆成华章。明代杰出戏剧家李开先《游百脉泉》(5首)诗写道：

水劲无过桥，脉泉更著名。
不霜清见底，漱石寂无声。
颗颗如珠碎，泔泔(yūn,水流回转之貌)比镜平。
不能容小艇，只可濯长缨。

可谓词清语俊、形神毕肖，为名泉增色。

百脉泉汇诸流之水，蜿蜒北去，乃为绣江河，流程32.8公里，注入小清河。两岸良田万顷，尽收渔米灌溉之利。源头榆柳夹岸，芦篁竞翠，芰荷飘香，更有那饮誉遐迩昔日进贡皇家的“泉头米”，具是百脉泉水所蕴养。

建国后，特别是1985年，县治迁至明水后，百脉泉一拂历史的埃尘，在人民政府的管理下，更加焕发出她那绰约的风姿。改革开放以来，章丘市政府对百脉泉景观进行了整修营建，既保持了传统风采，又增添了时代特色：泉栏涂丹漆彩，益发生辉。北面的梵王宫形体依旧而轮奂一新。昔日之龙泉寺，今已辟为风光旖旎的章丘园林。其西面，就势建起了古色古香的百脉泉宾馆。吐珠溅玉的泉水，日夜不息地迎送着中外佳宾。东面的东麻湾，已辟为占地276亩(18.7万平方米)的百脉泉公园(现总面积25万平方米)，诸泉汇集的地方开拓成平明如镜的明水湖。一只只游艇载着欢歌笑语穿梭于湖面，不时惊起一双双“鸥鹭”；荡至湖心，俯仰天地，顿觉心旷神怡；岸上白杨参天，垂柳拂面，芳草如茵，百卉竞秀，游人如织。浓荫深处，台榭掩映，错落有致，虹桥卧波，远山凝翠，真是仪态纷呈，风韵无穷！

(明兆乙)

平阴山中的明珠洪范池

平阴县西南部的洪范池镇素以泉乡著称，在狭窄的山谷地带，即有9处名泉，其中洪范池（亦称龙池）是久负盛名的九泉之首。据《东阿县志》（洪范池旧属东阿县，县城即今平阴县东阿镇）载：“池在城南十五里群山之中，突起一高阜，周围咸巨壑，泉仰吐其上，甃石为池。”池为正方形，深广各7米，面积近50平方米。水从池底散吐而上，澄澈空明，泉涌不见动，水泓不闻声，若游人掷钱其中，飘飘旋转，浮光耀金，久久不坠，谓之“洪范浮金”，为东阿八景之一。

洪范池方池内水清澈见底，不显喷涌之状，水面平静得像镜子，俯观天光云影、碎石青苔，其乐无穷。因泉水上涌，若向池中投掷硬币，可见飘摇旋转、浮光耀金，经久不沉，景色奇丽。昔有诗云“戏掷一钱清澈底，随波荡漾似浮金”。

池内外壁均以青石甃砌。池上有供游人赏池的回台，回台内由雕刻精细的立雕座狮望柱和花卉栏板构成封闭式方形石栏围护。池北有一拱形石桥，横跨渠上。游人可过桥登回台观池。池水从龙口涌出，绕池与众泉相汇为浪溪，注入大清河。

池水雨涝不增，天旱不减。明万历进士米维京题洪范池云：“常将潭影照天地，不以消长随春秋。”池水常年流淌，除供当地居民饮用外，还可以灌溉农田数百亩。泉水甘甜纯净，取之烹茶，胜似虎跑龙井。盛称于世的阿胶即用此水浸皮熬胶。

洪范池又名龙池。因传说当地在此“祷雨辄应”，故此得名。今有清代恩贡秦维翰行书“龙池”嵌于池上。池北为金末尚书右丞、行山东省事、东平路兵马都总管侯摯建的龙神祠。殿前有金代古柏两株，一株挺拔苍郁，亭亭如华盖；另一株苍劲古朴，枝杈槎枒。两柏均二人不能环抱。

洪范池之名的由来，据《重修洪范池碑记》所载：“……盖取规模洪大，范水使之不滥也。”是取洪水就范之意命之。池的始建年代无文字可考。但据《东阿县志》载：“金明昌间，萧国公侯摯建龙王庙于其上。”可见，金代以前就已建成了洪范池，距今至少也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了。

洪范池附近，文物古迹众多。北有周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明礼部尚书于慎行的陵园；南有春秋扈城遗址和传为东汉严子陵隐居的子陵台、元代“全真派”道教领袖丘长春修炼的邱子坪；东有天池山唐代石窟造像。

洪范池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平阴西南部的青山碧水之中，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乔修罡 杨书杰）

翠屏山胜景

平阴县城西南 12.5 公里处，是层峦葱翠、沟壑纵横的山陵地带。其主峰翠屏山，是闻名遐迩的名胜区。其山石嶙峋，玲珑嵌

空，古柏槎枒，苍郁茂密，宛若绿色屏障。

水是山的精灵。翠屏山的山石与泉相伴，泉水众多，难以数清。有“一条岩缝一处泉”之说，每逢雨季，则“暗泉到处听潺湲”，故又称“水山”。其中浸润泉、有本泉、杨枝泉皆有铭刻题记。

沿翠屏山南麓盘山而上，奇景异物，历历在目。首先可见一方形巨石，齐整地裁为三截，传为“关公刀劈豆腐石”；继之是石崖上的状若鞋印的一个石坑，传为泰山元君的足迹，谓“仙人遗迹”；山南陡坡上有古柏一株，枝体俯探，右枝槎枒前伸，状若一位慈祥老人，向游人微微致意，谓“迎客松(柏)”。三者昔日皆列入“翠屏八景”。

然而翠屏山的幽雅引人处当以山西麓为最，昂首凝视，则见整山碧绿叠翠，浅绿、深绿、墨绿，层层加深。山巅巍巍宝塔直插苍冥，山腰数千株古柏“皆根无寸土”，附着于岩缝间，或昂首挺立，或偃伏盘桓。更有奇者是那悬崖峭壁间，两块巨石上下相叠，高约数丈，有一古柏生石缝间，体扭枝曲，古朴苍翠，这自然生成的奇景，谓之“水山叠翠”，列翠屏八景之首。古树还有山榆、刺槐等。山菊花、二月兰、迎春柳丛丛簇簇，点缀林间。山上还有百部、远志、沙参、五味子多种药材。若登临宝峰，立足玉皇阁绕台远眺，则东见泰山余脉峰峦叠嶂；北见万亩玫瑰园花放如海；西见“黄河金带”横亘于碧绿无垠的华北平原上，令人心旷神怡。

翠屏山以其幽、雅、奇、秀著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骚人羽士前来游览观光，留下诸多胜迹。随着佛教的兴盛，唐代慈净和尚来此开山创业，灵岩寺高僧了慈主持建塔修寺。闻名的多佛塔即矗立在山巅宝峰。此塔始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历唐逾宋，几度兴废，金大定三年(1163年)告准礼部敕曰“宝峰寺”，塔后倾圮。明嘉靖元年(1522年)，保宁院住持僧保办禀奏知县批准，县民姚福政偕东阿县僧人同心重建，镌石为记，是为今塔。塔为13级八角形实心石塔，高19.7米，塔周围各层

均镶嵌立雕石佛，共104尊。现存84尊中，唐、明两代各约一半。佛像造型优美。塔顶冠刹，上有铸文，系著名金火匠杜文剑、杜思温于明嘉靖六年三月铸造。

翠屏山顶有明清时期修筑的玉皇阁、八仙阁、钟楼等建筑。西崖山腰有造像两处：一为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佛弟子鹿崇贞为父母敬造，一为明成化年间摩崖大窟造像，窟内有摩崖碑刻《重修宝峰院记》，还有弘治年间的诗刻。清代以来，翠屏山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建，先后有白衣阁、天王殿、三圣神祠、玉皇阁、护林阁等，并重修了宝峰寺，新建了八仙阁、灵官阁、蓬莱阁；道光年间又建翠屏元君殿及戏楼。山上寺院观阁鳞次栉比，殿宇望衡。四方高僧不断云游来访。每年三月三传统庙会，届时寺中举办法会，寺外演戏说书，四方货物，来此交易，鼎盛一时。山上多佛塔于1977年定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曾有两次重修。日前，山门、八仙阁、玉皇阁也修葺一新，每年初夏，翠屏山麓玫瑰花开放时，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乔修昱 杨书杰）

莲台山与娄敬的传说

莲台山位于长清县张夏镇境内，以其山形似佛座莲台而得名。相传西汉初年谋臣娄敬（即刘敬）隐居于此，故又名娄敬山，俗称小娄峪。

莲台山层峦叠嶂，山势嵯峨。山巅石崖上刻有两丈多高的佛像，以一巨石雕镂空椽护之。这里也曾是道教胜地，山上旧有洞虚观、蓬莱观、云台观等庙宇，白鹤泉、仙台、聚仙塔、八宝玲珑树等胜景。山尤多岩洞，大小72处，呈现出喀斯特地貌特征，大者有青龙洞、王母洞、娄敬洞、三清洞、八卦洞、火龙洞、朝阳洞等。每洞各有景观，如王母洞上下两层，洞上叠洞，幽峻奥曲。洞口楹联：“壶中灵药山中采，宴内蟠桃洞内寻”，额曰“西望瑶池”。登山顶洞口，莲台山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危崖凌空，天风习习；群山黛色，欲袭人衣。

莲台山最著名的是娄敬洞，该洞贯穿东西，长600多米，宽约10米，高达30余米。从洞望去，深邃幽秘，怪石嵯峨。娄敬洞传说先后是范蠡和娄敬隐居之处。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后，认为与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舟载西施飘然远遁，易姓埋名，从贾致富，晚年隐居此洞之中。

娄敬是西汉初齐人，从军陇西，过洛阳，由齐人虞将军引见而得识汉高祖刘邦。其时，刘邦正与群臣商议定都之事，群臣多主张建都洛阳，他却力陈关中之利，与张良共主建都长安。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郎中并赐姓刘。他还建议将各地豪族迁徙关中，可加强对豪族控制，且能充实关中人口，巩固汉朝统治。刘邦欲赴平阳亲征匈奴，他极力劝阻。刘邦怒，将他囚于广武。刘邦果然大败而归，遂亲赴广武将他释放，并赐爵关内侯。娄敬在朝与张良过往甚密。传说张良辞官后隐于历城南之扶山子房洞，而娄敬辞官归里，隐居娄敬洞。据清康熙间所辑《灵岩志·娄敬洞》记载，娄敬洞东洞门口旧有范蠡、张良、娄敬塑像，像前有石香台，刻“大金国泰和四年造”（即1204年造）。南壁还有金人摩崖题记，据题记说，洞中原有古塑，不知始于何时，住洞道人徐真道与禹城张彦等人又将它们重修。可见，在金以前，此地便是道教活动之处了。有趣的是，石香台旁，还塑一短褐少年，跌坐于地，

当地人称“油博士”。相传昔时有一卖油郎叫王质，推车卖油至油房屋，车脚断裂，执斧上山伐柯修车，经娄敬洞，见洞口古槐下有两白须老人对弈，王质本是个棋迷，越看越入神，把伐柯修车事已忘了。日到中天，一老者递给王质一个枣核，令其含口中，王顿觉清气沁心，饥渴之感全消。夕阳西下，棋尚未完，王猛忆修车事，回头取斧，真怪，斧柄已朽烂，急下山寻油车，车已杳然。山下村舍田庐全非，亦无一人相识，细一打听，才知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王质知道遇见了仙人，忙回身返山，老人已去，只剩空山寂寞，古槐瑟瑟。

这个故事是古代流传很广的一个神话，暗喻人世无常，流年似水。与丁令威化鹤归来寓意相似。最早见于祖冲之所撰《述异记》。《述异记》说王质乃一樵夫，信安郡人，信安郡在今广东省高要县一带。而长清人却把王质衍为卖油郎，移于娄敬山了。王质所遇两老者，显然就是张良与娄敬。洞前石头棋枰犹在，当地人说，傍晚人们把棋在枰上布好，翌晨去看，棋局凌乱，看来仙人是在月下对棋了。

1992年长清县政府对莲台山进行了重修，春秋佳日，游人络绎不绝。

（张稚庐 于宝臣）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及汉画像石艺术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在长清县城西南 20 公里的孝堂山，山上有单檐悬山顶的石祠两间。就祠内题记和画像风格判断，建筑年代约为公元一世纪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

“孝堂山一名巫山，《春秋·传》：晋师伐齐，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即此，因山有孝子堂而改今名”（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二卷）。旧说，石室为郭巨墓前之祭堂，此为附会，不足为信。郭巨为西晋河南温县（今河南沁阳）人，一说为隆虑（今河南林县）人，而此石室建成于东汉，时间、地域皆与郭巨事不合。郭巨为养老母而埋子得金事，列入“二十四孝”，是封建统治者为宣扬“愚孝”而编造的一个荒谬的故事，属于应加以批判和剔除的旧文化的糟粕，不应再加以宣传。但沿袭旧说，仍以“郭氏墓石祠”称之。

郭氏墓石祠全部石筑，室内宽 3.8 米，进深 2.13 米，墙壁均以厚约 20 厘米的整块石头砌成。东西山墙上端为三角形的大石，顶端直抵前后坡屋顶的交叉点上，以承托屋顶两头的重量。屋顶两面坡的石板刻出脊背、瓦垄、勾头、椽头、连檐等形状，为单檐悬山顶式。瓦垄到顶作卷背式。屋顶瓦垄为筒、板瓦两用，板瓦仰铺。檐头的结构，是在挑檐枋之上出火连檐，刻出椽子头和卷刹。椽子头上承托小连檐，小连檐刻出仰置的板瓦和瓦当。椽头与瓦当数目一致，但上下并不对齐，板瓦也没有滴水。

前檐设置高 86 厘米的石柱三根，均八角形，上下刻成斗形。

两端各一根，直径较小，中间一根最大。八角柱上下两端均有大斗一个，上下斗高均为27厘米，斗与柱高约为三之一比。下面的大斗斗口向下如柱础；上面的大斗斗口向上，承托巨大的三角石梁和挑檐石。上下斗与八角石柱系一块整石雕凿。这三根八角石柱，特别是中间一根，在力学上起的作用最大。因此，石室非常坚固，近两千年来石祠没有坍塌，皆与此柱有关。

在八角柱大斗、山墙、瓦当以及内部石台上，均刻有极为简朴的花纹装饰雕刻。一为蕨纹，瓦当刻几何形蕨草纹，当中为十字形，在十字与外周圈成的四外角，刻内卷蕨纹4个。二为垂帐纹，在石祠正面八角石柱顶上，大斗中和山墙上均有垂帐纹，所有的垂帐纹在二垂帐间有垂珞和垂带。三为菱纹，在大斗、山墙、八角柱上以及画像之旁，均刻有连续的菱纹。这种雕刻装饰很简单而又具有几何形图案的意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郭氏墓石祠内部分为两间，祠内石壁和三角形石梁上雕刻有精美的图画。据金元好问《东游记》及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所载：“郭巨庙在长清西南四十里处路旁小山之上，齐武平古齐州胡仆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马、车、像三壁皆满。衣冠之制绝与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记幞头，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仆射刻颂，規制如磨崖状，字作隶书，文齐梁体，而若不佳，后题云。‘居士慧朗侍从至能草隶书’，世为朗公书者是也”。祠内汉石画像涉及内容广泛，有蛇身人首的伏羲氏作造书契、教民佃渔牧畜；有蛇身人首持规状物的女娲氏，伏羲与女娲下部蛇尾交缠于一起；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桓娥窃以奔月”的神话故事；有日、月、星、辰及织女、南斗、北斗星座等天文星象；有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生活的受礼朝会、出行外巡、迎宾送客、征战献俘、生产狩猎、生活庖厨、百戏娱乐等场面。雕刻多为平地线划法，形象逼真，风格苍劲，人物画像栩栩如生，在汉画像中独具一格。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汉永建以前造，四壁皆刻画像，汉晋六

朝人多有题记，今半佚，仅存北齐武平元年（570年）《陇东王感孝颂》及唐宋人题字数则而已（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卷二）。据现存资料记载，祠内最早的游人题记有东汉永建四年（129年）、东汉永康元年（167年）、北魏永兴二年（410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的平原湿阴邵善君、泰山高令明、孟世雍，广陵王及广陵王太妃，青州刺史郑伯猷，山荏县刘贵、刘章等人的题记。此祠自载宋赵明诚《金石录》后屡见著录，是研究汉代历史和社会生活以及汉代服饰的参考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

（丁志金）

海内名刹灵岩寺

坐落于泰山北麓、泉城西南郊的灵岩寺，早在唐代即为海内名刹。明代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称此为“泰山之北最幽绝处”。当今香港著名作家彦火讲，这里的“文物古迹之多、之美、之迷人，真是罕见”。1982年，灵岩寺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灵岩寺初建于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灵岩志》载：“苻秦永兴中（357~359年），竺僧朗卜居于此，始建精舍数十区。”据传，朗公在此说法，岩石为之化解，连连点首，因而得名灵岩。朗公所建精舍，毁于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法定禅师先于方山之阴建神宝寺，继于方山之阳建灵岩寺。

至今,尚流传法定由“白鹤导向,青蛇引路,双虎驮经”前来之说。现存灵岩寺,系唐贞观年间,由高僧慧崇自甘露泉边西迁此处。该寺在唐宋最兴盛时,曾有僧侣 500 余人、殿阁 40 多处、禅房 500 余间。慧崇大概建寺有功,其有精美雕刻的高大单层方形墓塔,至今巍然耸立于塔林之首。

寺中现有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千佛殿和御书阁等古建筑。其中,千佛殿始建于唐代初年,宋代扩建,明代重修,现为寺中主体建筑。殿内,自左至右为卢舍那、毗卢遮那和阿弥陀佛三佛,中为宋代木刻,余为明代铜铸。殿中东西及后壁,环列 40 尊泥塑罗汉。这些罗汉,坐高 1.23 米,个个音容笑貌迥然不同,喜怒哀乐神情感人,是极富人情味和真实感的宋代泥塑之珍品,为世所十分罕见。所以,不仅有许多美术专著都给予高度评价,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此,还亲笔题词为“海内第一名塑”;书画大师刘海粟,更题词为“天下第一名塑”。两题词石刻均列殿前。

在千佛殿西侧,为高插云端的辟支塔。这座楼阁式高塔,初创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据塔内石刻记载,现存塔实为宋淳化五年至嘉祐二年(994~1057年),历时 63 载,前后有 23 州、3000 多人进行捐助,方才建成。石筑塔基四周有浮雕和碑刻。塔身为八角 9 层。每层有 6 窗 4 门,雕有窗格与花纹。塔自下而上,收分得当。9 层之上,每角有一金刚,拽一铁链,紧拉塔刹。全塔高 54 米(一说 55.7 米),耸立于青山白云之间,为济南地区最高之佛塔,被宋代大文学家曾巩誉为:“辟支灵塔冠层峦”。当代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将此塔彩照作为其专著《中国古塔》的封面。

从辟支塔西行不远,就是墓塔林。这是由灵岩寺历代住持僧的墓塔所组成的一重要景观。现有塔 167 座、墓碑 81 幢,时间跨度自唐至清,长达上千年。众塔高低不等,造型各异。塔身多有精美雕刻。一眼望去,松柏笼罩,洋洋大观,堪称一墓塔博物馆。据讲,国内只有河南少林寺之墓塔林可与此媲美。但少林寺多砖

塔,此处主要为石塔,因而各具特色。林中,尚有日本僧人邵元撰书之碑。他来华21年,所撰书的《息庵禅师道行碑》,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中日文化之交流。

要登方山,在寺东侧的松柏深处,有蜿蜒而上的台阶。沿此攀登,不仅可到白云洞、一线天、可公床、鹤巢岩等有趣之处,还可达方山之巅的积翠证明龛。这里有唐代初年依山而雕高达5米的释迦牟尼像。自寺中仰望,佛龛红门掩映于翠峰白云之间,十分壮观。

在灵岩寺的众多文物中,还有一些珍贵碑刻。像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所书《灵岩寺颂碑》、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蔡卞所书《圆通经》、金代党怀英篆额的《十方灵岩寺田园记并碑》,以及汉藏文对照的元代石碑等,皆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为古今人士所重视。

金代诗人赵秉文讲:“济南山水窟,岩寺风景最。”灵岩寺不仅藏有宝贵的文物古迹,那青山秀水、古树名木等自然景色,也如诗似画,不只令无数游人流连忘返,就连当年的乾隆皇帝也曾连来多次。

(任远)

五峰山洞真观

五峰山在长清县五峰山镇。它由聚仙峰（一名迎仙峰）、望仙峰、会仙峰、志仙峰、群仙峰五峰组成。据康熙年间的《长清县志》云：五峰山与泰岱、灵岩并称三山。其上古松苍柏，重崖叠嶂，奇石嶙峋。清道光年间，礼部候补主事李雨霖朝山时曾叹曰：“五峰其形若仙人壁立，其势若碧鸾飞舞；且茂林郁葱，漩水瀑布；而远迩士女咸不惮千里而来瞻者，盖数千年于斯矣。”战国时期，五峰山属宓邑石涧，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东封泰山祭地后，北行路经石宓邑（今石窝村），宰相李斯于石涧（今五峰仙庄）立一小篆碑。汉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武帝东封泰山后，也来此作封禅篆碑一幢。足以证明，五峰山已在秦汉时期就为名山。

洞真观在五峰山怀抱之中，为道教名观，道教在汉代形成后，其发展历尽沧桑，派别繁杂。至金、元时期，逐渐演变为正一和全真两大道派，后来全真道又划分为遇仙、南无、随山、龙门、昆山、华山、清静等七大支派。五峰山洞真观属全真道龙门支派。

道观旧址占地 2000 多亩，殿堂楼阁及耳房百余间。整个布局分为南北两观。南观为玄都观，包括一天门、迎恩阁、灵官殿、德王府大厅及德王陵墓等。北观自南向北包括：迎风壁、木枋门、十三太保（13 株古柏）、迎仙桥。其北即为洞真观。洞真观为金朝贞祐初年所建，一名神虚宫，一名大庵。它包括：三清殿（左右碑碣十余幢）、龙神殿、玉皇殿（为金兴定初年羽士王志深自栖霞来此

创修)。其左为龙王殿,其右为虎神殿(内有五音石),千年白果树、清冷亭(一名志仙亭)、碧霞宫、真武殿、隆寿宫大石阙(一名大石坊)、91级青石台阶、大月台(一名大戏台,旧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和十月十五日各举行连续3天的香火大会)、护国隆寿宫(一名隆素宫,为明万历年间敕建)、更鸡桥。其左右有御碑及功德碑30余幢,最后为三元大殿。其西小山头为青帝宫,西北为九莲殿(系明神宗为其母李太后建造)及伏魔宫。

金石除秦汉封祭碑碣外,还有东魏武定五年(547年)134名比丘(僧人)和维那(僧官)造像记,齐乾明元年(560年)比丘尼(尼姑)慧冰等45人造像题名,宋元祐七年四月张吉妻尹氏题名记,宋嘉祐九年正月张庆等题名记,金大定十年礼部牒碑,金尚书礼部牒济南府长清县于大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并记,金奉敕赐万寿院牒准,金刺故牒,元定宗三年十一月元好问撰、王万庆书、严中济立石碑,元好问、刘祈、杜仁杰等各礼书作崔先生像赞,定宗二年正月崔先生传碑(为杜仁杰撰文、高翻八分书),元至元四年五月洞真观住持王氏葬母亲碑,至元十年十二月洞真观宁真子墓碣,元元贞二年十二月普光大师墓志,延祐三年二月松岩纯真子墓碣铭,明嘉靖十六年洞真观建亭桥记碑,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颁藏经敕谕碑等等。颁藏经碑云:“皇帝敕谕:山东五峰山三官宝殿住持及道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大藏经》480函颁施在此供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渺,躬康泰,宫闾肃敬。忤己往愆尤,乞无疆祝寿,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清静善教,朕成恭己无为治道焉。今特差全真道士周玄真赉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礼知照。钦哉!故谕。”可见万历年间是洞真观的鼎盛时期。

道观在明末清初归长清县管辖,后来又多次修缮。1913年农商部在此设立林业试验厂,1920年国民党军与晋军在此交战,道观损失严重,破败荒凉,后又重修多次。建国后在此设立林场时,

还有两名道士居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投资300多万元进行了整修，另建11处小别墅，定名为五峰仙庄，它不仅接待中外游客，还能安排中小型会议。到此观光旅游避暑，均不失世外桃源之风蕴。

前人有五峰山“内八景”“外八景”之说，内八景是：仙人台、七星泉、迎仙桥、更鸡桥、无影庙、青龙峪、白虎峪和清冷泉。外八景是：青崖积翠、明泉早照、凤山烟雨、滚粟朝霞、鱼台钓月、杏堤春晓、薛岭牧樵、润玉七峰。

（房泽水）

柳 埠 三 塔

济南市南郊柳埠镇的四门塔、龙虎塔和九顶塔，年代久远，具有重要历史与学术价值。我国当代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所著《中国古塔》，以及日本学者于20世纪20年代编著和出版的大型《世界美术全集》等，都高度评价这三座古塔。1961年，国务院公布四门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龙虎塔和九顶塔也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四门塔坐落于神通寺遗址附近的青龙山麓，因塔设有四门

故自宋以来即名四门塔。原依据塔内杨显叔造石像四躯石刻，人们认为该塔建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1972年，维修该塔时，在塔顶内发现一块拱板石，上刻“大业七年造”，从而认定此塔为隋大业七年（611年）建成，系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

该塔为单层方塔，用当地大块青石所砌，石上全部都刻有几何花纹。塔高15.04米，四边各宽7.4米，墙厚0.8米。塔檐挑出，叠涩5层。塔顶有23行石板，层层收缩叠筑，成四角攒尖方锥形，顶端由露盘、山华、蕉叶、相轮组成塔刹。该塔构筑简洁古朴，落落大方，颇有汉代建筑遗风。塔后古老的九顶松（柏），郁郁葱葱，与古塔相辉映，增加了两者的苍劲典雅之美。

塔内，有一石砌方形塔心柱，上为16根三角形石梁。四面各有一大理石镌雕的佛像，背靠塔心柱，面对半圆形拱门而端坐。四佛皆螺髻、盘膝。有的双手叠于腹前，有的两手抚膝。塔内原东魏杨显叔造像记石刻，被清末官僚端方盗走，流入日本。现佛座下的杨显叔造像记，是依据原石刻拓片重刻。

四门塔顶因年久严重风化，建国后曾屡加缮修保护。1972年，国家又拨款对该塔及附近文物进行认真维修，并建管理所和展室，使之成为一重要佛教游览胜地。

二

屹立于千佛崖下、神通寺祖师林（墓塔林）以南的龙虎塔，为一砖石所砌唐代方形塔，因塔身雕有龙虎而得名。

该塔高12.2米。塔的下部为三层平台大檐的须弥座，以覆莲、伎乐、狮子等精美雕刻为装饰。塔身用4块石板砌成，都刻有火焰状纹样券门，以及龙虎、罗汉、伎乐、飞天等高浮雕，刻功精细，形象生动，华美壮观，与古朴的四门塔形成鲜明对照。

塔室内，四面迎门各雕一佛像，突胸细腰，面形瘦长。塔身以

上,为仿木结构之砖砌重檐。檐下有双挑华拱承托,上置覆莲、相轮、宝顶为塔刹。优美造型与绝妙超群的浮雕相辅相成,使该塔成为一杰出的古典建筑。

龙虎塔以东为一较小唐代石塔,原在柳埠以西阜姑庵,后移于此。该塔雕刻精美,被称为小龙虎塔。

三

位于柳埠镇东南灵鹫山腰的九顶塔,是一座唐代砖砌佛塔,造型十分别致。明代著名诗人许邦才撰文、李攀龙手书的碑文《重修九塔寺记》称:“其塔一茎上而顶九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

该塔单层,高13.3米。塔身为内弧等边八角形。腰线以下砌筑较粗;腰线以上为磨砖对缝砌筑,十分精细。檐部叠涩挑出17层,从外檐又叠涩收进16层,上面形成八角平台。每角各筑一高2.84米的3层叠涩挑檐小塔,塔门皆向外。平台中心筑一与小塔同形而高5.3米的中心小塔。整座塔顶犹如花朵一般。离地3.16米处,主塔向南设拱门,内为塔室,有一石佛及残存壁画和天花藻井。塔身外有宋代游人题刻。

解放前,九顶塔年久失修,塔顶之众小塔多倒塌或残缺不全,主塔下半部被淤土所埋,砖亦多损坏。1962年,政府拨专款,在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的指导下,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调集能工巧匠,进行精心维修,博得各方面的广泛好评。

(任远)

齐长城与孟姜女的故事

孟姜女姓孟吗？她是哪里人？她哭的是秦始皇筑的长城吗？追究起来很有趣味。

比如说，孟姜女不姓孟，而是姓姜。原来战国以前，中国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姓和氏。一个家族的男性用氏，女性用姓。氏冠在名字之前，而姓置于名字之后——犹如现代欧美人的习惯。秦始皇家族的氏为“赵”，姓为“嬴”，始皇是男姓，所以应叫“赵政”，如果是女性，就该叫“政嬴”了，后世呼他为“嬴政”，是不符合当时的习惯的。例如舜的家族姓妫，其后人封于陈国，因此以陈为氏，陈氏的一支又到了齐国，把陈写作“田”（陈、田在古代同音），又为田氏。齐国君主原是姓姜（姜太公之后），后来被田氏篡夺了，从此齐国人被称为“田齐”，田齐君主后来称王，其子孙又以“王”或“王孙”为氏。可见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可以因地、因官爵、因时而改变。孟姜，按先秦的女子称呼，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她与春秋时的齐国君主为同族。“孟”这个名字是排行的称谓，老人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老小称“季”。孟姜就是“大姜”。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这是《诗经》中的两句诗，朱熹注云“孟，长也，姜，齐女”。按现代的习惯称呼就是“姜大姑娘”。古代诗歌中的“孟姜”一名常常出现，只是一个年轻貌美女子的代称，不一定落实到某一个人身上。所以孟姜女一名也应按朱熹注解

所说，是指一位齐国女子。

她哭长城，是在何时何地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列国都曾修筑自己的长城。战国时齐国确曾修了一道长城。据《史记正义》引《齐记》说：“齐宣王乘山岭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齐州千余里，以备楚。”这道长城，最早记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以前（据《鲁编钟铭》：“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完成于齐宣王时期，约在公元前310年左右，历时二百来年，共长五百多公里。它西起于今济南市平阴县和长清县交界的广里乡，经今泰安和济南市的历城、莱芜和济南市的章丘，以及博山、临朐、沂水、莒县、五莲等10县至胶南县——即今青岛市黄岛区的于家河庄东入海。现今济南市历城、章丘市、长清县都有齐长城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清道光修《长清县志》载：“县治迤南七十里五道岭，岭入东为长城铺。土人因长城而建姜烈女祠。”道光修《章丘县志》也有章丘与泰安、莱芜接界的长城岭上“旧有孟姜庙”的记载。显然，清代以前的济南居民都认为孟姜女哭的是齐国长城，而不是秦筑长城，而作为齐女孟姜女也应是济南人了。

根据古文献记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与战国时齐国的杞梁妻的事迹有密切关系。编辑于汉代的《列女传》就记载了杞梁妻哭城的事，说杞梁为齐国伐莒而战死城下，“杞梁之妻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左传》于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记载齐国袭莒国，齐将华周、杞梁与莒军交锋，杞梁被俘，齐君曾派使者吊问其妻。这一年，齐长城尚未修建，看来，杞梁妻所哭之城，据《列女传》的记载，应是莒国之都城，虽然齐长城修筑后也经过莒国，但这时的城则应指为都邑之城而非长城。不过，在《孟子·告子》中载：淳于髡曾列举战国以前的声乐流行的情况：“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那时的传说似是华周、杞梁同时战死，他俩的妻

子同哭的，后来，就只传下杞梁妻一人，而且由哭莒城，转化为哭齐长城，从而落实她在章丘的长城岭或长清的长城铺的长城之下了。

淳于髡把杞梁妻和歌唱家工谿、绵驹并举，说明她的“哭”，应是挽歌、哀歌一类。旧题东汉蔡邕撰辑的《琴操》，载有《芭梁妻歌》：

乐莫乐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别离。
哀感皇天兮，城为隳。

并记云：“芭梁妻歌者，齐邑芭梁殖之妻所作也。”她在夫战而死后，表示殉节之志，“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此歌词，前二句与《楚辞·九歌·少司命》相同，后一句的“城为隳”，似指她的愿望。看来，是后人的拟作。崔豹《古今注》则又说：“杞植（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战死，（妻）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如果是真实的话，早在2500年以前，齐国就出现了一位名叫明月的女诗人了。

杞梁妻哭齐城，城为之崩塌一事，在汉代已引起怀疑。王充《论衡·感虚篇》就评论说：“传书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虚也。或时城适自崩，杞妻适哭于下。”王充认为这是一次巧合而引起的误会。其实最初的记载根本无哭城一事，后来的种种细节都是口头文学传播中的创造。杞梁妻原来连姓名都没有，后来传播者因为她是齐国女子，就令她从当时齐国君的姜姓。又因为“孟姜”是诗歌中常见的美女名字，因此也就顺口命名为孟姜女了。而其夫杞梁的杞，《琴操》中已写做芭梁，而在后代的唱本中误读为“范”，又讹读为“万”，于是就有了范杞梁，范七郎，甚至万喜良之称了。而其发生的地域由莒城，变化为齐长城；由齐女变化为济南地区女子；最

后其时代由春秋而延至战国建齐长城之后，又延至秦始皇修筑长城之时。这正是通俗文艺演变流传的普通现象，不足为怪的。

当年齐国修长城分隔了泰山南北居民的交往。秦始皇修长城，工程巨大，劳民伤财，民夫死于道路和工地上很多，父母妻子远寻哭丧者当然不少。这就是孟姜女先作为齐长城的识咒者，又作为秦长城的诅咒者，使《孟姜女哭长城》的民歌一直到20世纪还被民间传唱的原因。但在对于这一传说流变的追踪中，我们得知它是济南地区重要口头创作之一，既反映了齐长城这一重要背景，又得知早在李清照之前，我们又有一位名明月的女诗人，而孟姜女原来是古代的声乐家——女歌星，比《老残游记》中的白妞又早了两千多年。这些，平添了济南的野史逸闻中一段佳话。

（徐北文）

济南地区的佛教摩崖石窟造像

公元1世纪，东汉明帝时，佛教由天竺（今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魏晋以来逐渐盛行。南北朝时期社会混乱，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耽溺佛教，为一时风尚，故营造了许多华丽的佛寺，开凿了大量的石窟。据记载：前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竺僧朗（俗姓李，冀人）在历城柳埠的琨瑞山，“大起殿宇，连楼累阁”，建朗公寺。从此，济南（当时为齐州）南部的泰山山区，就成为山东佛

教的中心，出现了许多石窟造像和摩崖造像。造像起初吸取了外来影响，后来逐渐创造出新的雕塑风格，它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济南地区的佛教石窟造像究竟有多少呢？据考察，济南（含历城、长清、章丘、平阴等县）共存有雕凿佛像 1292 尊。最早的为北魏正光四年（523 年），最晚的凿于明正統年間（1436~1449 年）。

北魏、东魏造像主要分布在黄石崖、龙洞和东佛峪，以黄石崖造像为最早。黄石崖位于千佛山南，主峰螺丝顶侧，因山岩呈黄色，故名黄石崖。海拔 357 米。这里有北魏正光四年至东魏兴和二年（523~540 年）开凿的石窟一座。距今已是 1400 多年。石窟的开凿前后共用了 17 年。窟高 9 米，现存大小佛龕 19 个，菩萨高浮雕造像 101 尊。罗列在由东北向西南长约 30 米，高约 10 米的半弧形悬崖上，造像分为 4 区，一般像高约 1.5 米，造型庄穆，刀法简朴浑厚。佛像雕有圆形头光及舟形身光，并有火焰形大背光，外圈饰有卷草花纹图案。在飞天的造型上，展开的裙裾及肩披飘带，迎风起舞，神采飘逸，栩栩如生，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飞天的造型类同，它是我省最早和最重要的造像瑰宝。

在黄石崖东南的龙洞山（亦称禹登山）西峰的悬崖上，下临深谷，造像主要在两个天然洞穴内，共有 55 尊。南壁洞内，高爽如殿堂，洞壁前有魏石刻造像 7 尊，高达 4 米，因年久风化，多半泐损，造像仍保持魏造像风格；西壁洞内有雕佛及菩萨 48 尊，多系隋、唐时的作品。据文献记载，东壁洞内造像的年代是东魏天平四年（537 年），因此说龙洞造像与黄石崖造像的时间是同一时代，造像技法也属一体。

从龙洞东行一里，可达佛峪（亦名东佛峪、佛而峪）。这里四山回合，环境幽深，山谷前拱如厦，岩下有隋代般若寺遗址。在摩崖上尚存隋代造像 6 躯各高约 2 米，跏趺端坐，刻工精细；刀法洗练精湛。有隋开皇七年（527 年）比丘尼静观造像记。唐开成二年

(837年)“金刚之会碑”和唐乾元二年(759年)造像题记。

此外，在济南长清县五峰山西崖峭壁上，尚存有莲花洞石刻造像，凿刻的年代据题记所载大约在东魏至隋之间。洞石窟高3米，窟外另起券门，门额置“天启六年五月圣佛莲花洞”刻石。窟内正壁雕佛一、僧二、菩萨二，四壁及拱门两侧现存原雕小佛224尊，窟顶藻井雕莲花30余朵。据《山东通志》载，这里旧有“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北齐乾明元年(560年)造像题名”。

佛教在济南地区的传播，到隋唐时达到了鼎盛时期。隋朝建立后，曾命令全国计口出钱，下诏各县营造佛寺、佛像。唐代的高祖和太宗李世民，都是尊道信佛的。这时期济南地区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开凿的最多，现存有造像955尊。主要分布在济南千佛山、玉函山、柳埠千佛崖、青铜山、龙洞、东佛峪、灵鹫山，长清石佛堂、五峰山、灵岩寺、王泉峪等处。较著名的为千佛山、玉函山、柳埠千佛崖、长清王泉峪摩崖造像。其中柳埠千佛崖造像保存最为完好。

千佛崖造像，在柳埠东北白虎山崖上，有大小窟龕一百多个，佛造像220尊。从唐初第一个皇帝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起，至睿宗文明元年间(684年)前后连续凿窟造像60年之久。较大的石窟有5个，大佛像高2.6米左右。造像者多为皇亲、贵族、官吏、僧侣。其中有唐太宗第三女南平长公主、驸马渝国公刘玄意等人所造像，刻工精湛、刀法流畅、面形丰满，体态秀丽端庄，充分表现了盛唐时代的艺术风格。

长清县灵岩寺的积翠证明龕，存有唐大中八年(854年)雕塑的释迦像及菩萨二尊，体态丰满自然，身着袈裟，跏趺端坐。长清县孝里乡北黄崖村，还有一座唐代石佛堂，为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建。佛堂全部用石筑，内有高浮雕像共89尊，两旁还刻有天王像各一尊。石像最高为60厘米，宽30厘米，是一组小巧玲珑的盛唐时期的作品，可惜破坏严重。另在张夏镇北王泉村的山峪

里也有摩崖造像。山峪两峰对峙，蜿蜒数里，峰峦叠翠，峡谷中潺潺流水，风景宜人。造像分别开凿在南、北两山腰间，均为自然岩洞稍加工而成。在北面的名朝阳洞，内雕主像释迦佛一尊，高 1.07 米，左右刻立迦叶、阿难各高 0.54 米，环绕主佛周壁又刻有 53 尊小佛，各凿有佛龕，编排成组，统为一体，造型极美，是盛唐时期的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大佛寺造像，它是济南地区最大的一尊石窟造像。在历城青铜山南麓悬崖上，为唐初开凿，像高 9.05 米，水纹流动，线条简约。特别是在左侧菩萨、比丘造像，雕刻得面容丰满，微微含笑，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宛如唐代仕女画像，非常出色。它是现存山东最佳的石佛，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代迄今、元、明各代，造像之风逐渐衰微，造型艺术上趋于世俗化。这时期的佛像无论在雕刻技法、人物造型、体态法度等方面，较之唐代以前的作品，都远为逊色。它们分别在济南地区的佛慧山、柳埠、黄花山、章丘市胡山赵八洞，历城云台山、东龙洞，长清县云头山，平阴县翠屏山等处，有造像 236 躯。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佛慧山石刻造像和元代赵八洞造像。

佛慧山石刻造像，在山顶北侧阴岩峭壁上。“佛慧山，一名大佛头，以岩半有石佛头故也”（《历城县志·山水考二》），窟在峭壁间，仅凿刻一个佛头，高 7.8 米，宽 5.35 米。从整体看，这样大的造型能掌握体面关系，容貌端正，实非易事。但雕刻技法则较前期为差。有的局部没有用刀，只是用钎细打而成。佛头开凿于北宋景祐二年（1035 年），翌年竣工。佛头西壁镌“万历丁未（1607 年）三月吉日重妆”题记。在佛头东侧石壁雕刻方形密檐塔（高浮雕）两座，题记为北宋景祐三年（1036 年）。为保护石雕，1923 年又增修石窟外室一座。平面作方形，高约 9 米，中间半圆形拱门上书“大雄宝殿”四字，系清末民初文人张英麟所书。该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元代的赵八洞石窟造像，在章丘市阎家峪乡胡

山上，洞坐落于赵八洞村南偏西山之半腰处。洞口 8 米，洞深 50 米，宽 10 米，另有小洞延伸入内，深度莫测。据传洞与天苍岭洞口相通，洞顶高 20 米左右，洞中有圆形自然天窗，可透见阳光。有明代书法家雪蓑所书“通天透地”榜书大字镌刻洞口。洞内布满钟乳石，山泉欲滴。造像在洞壁东西两侧 5 米高处，南壁雕佛 38 尊，北壁 46 尊，皆高 1 米左右，全系坐像。有如来、观音、罗汉等像，排列驳杂。从雕刻造型与服饰看，佛有圆形过肩风帽，多系蒙古族衣着（状似喇嘛），据判断应属元代所作。

济南地区的摩崖石窟造像，不仅对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实证，也是前人留下的一份艺术瑰宝。

（乔甦）

济南市内的古建筑

济南市区内的古建筑，随着城市的改建，或已拆毁，或改为它用，现存者日渐减少，有些古建筑因年久失修，损坏者亦颇多。现择其今存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建筑群简述于后。

清真南大寺 原位于市中区礼拜寺巷南口，因民族小区的建设现已临涿源大街西首路北，是我市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它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春，后经明宣德、万历和清乾隆等年代整修、扩建，方达到现在规模。明成化年间，奉敕赐名“礼拜寺”。清乾隆以后为区别于北大寺，故正式称“清

真南大寺”。

寺总体布局以礼拜殿、讲经堂、望月楼、邦克楼、沐浴室、教长（阿訇）室等组成，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教寺殿堂。殿门朝东，教徒入殿礼拜时，面向世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城，这是严守教律要求的。该寺占地4582.4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1.53平方米。1956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重修，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礼拜殿，建于12级台阶之上，高约4.2米，由前殿、后殿、抱厦三部分组成。后殿是元代遗存，前殿系明中期建筑，抱厦则是清代建筑。前后两殿相连，抱厦接连前殿而建。殿内有36根木柱承重，形成一个宽敞的殿堂空间，建筑设计巧妙，结构合理，表现出较高的建筑技术水平，突出了清真寺的文雅、古朴、肃穆、宏伟的建筑风格。

礼拜殿下两侧，是清同治年间改建的7级台阶、前出廊檐的南北讲堂。

望月楼位于礼拜殿前，建于13级高台上，是一座二层外廊式楼房，系1936年重建，单檐庑顶，屋面施青瓦，顶端中央直立一金属制月牙。古时登楼望月，以月亮圆缺确定斋戒日，故名望月楼。底层正门上悬“望月思真”4个绿色篆书；楼上正门上端悬“清真独一”木匾，显示伊斯兰教律信仰之纯洁。

沐浴室位于望月楼南侧，系传统平房建筑，供教徒洗涤杂念，清静心灵，分设大净、小净，室内设备完善。

邦克楼又称“唤醒楼”“宣礼楼”，是登楼招呼教徒来做礼拜用的，为二层楼，面阔3间（约8米），进深约6米，是明弘治年间改建的。单檐庑顶，上盖青瓦，脊有简洁的装饰。门楼上端横匾为石质，雕刻以阿拉伯文。门楣石匾雕刻正楷“清真寺”三个贴金大字，光彩夺目，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清真寺的设计原则是，必须使教徒作礼拜时面向麦加城方

向；大殿内不供偶像，殿内神龛前左侧建宣谕台，室内外常用植物纹、几何形纹或阿拉伯文字装饰，不用动物纹样。无论是花草饰纹，还是几何图形饰纹，都伸向无限处，象征着苍茫高远的宇宙天际，这反映了穆斯林艺术家们超越时空的意念，而植物造型取其艳丽的色彩，以表现自然纯真的喜悦，体现了建筑者留给我们的灵敏、幻想与魅力。

泺源堂 在趵突泉公园内的趵突泉北侧，是一组传统民族形式的阁楼式建筑。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清代重建。堂前抱厦内两柱上刻有元代著名文学家赵孟頫的“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诗句楹联，此系我市现代著名书法家金棻先生所书。该组建筑分前、中、后三殿，早年为“吕祖庙”，自1957年重修后，名为“泺源堂”。中殿辟为娥英祠，供舜二妃——娥皇、女英像，备游人瞻仰。堂前抱厦临趵突泉而建，供游人扶栏观泉。

泺源堂位于城市中心，这组古建筑与趵突泉相映，熠熠生辉，是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属市级重点保护单位。

长春观 在长春观街路北，始建于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据传，元初道教全真派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在此处修真，故名。明、清皆有修葺。古时，此观面貌很大，建筑宏伟，曾有“古殿岿然地宏敞，朱甍碧瓦如嶙峋”的描述。现尚存正门和后阁楼，中间两座观堂已损，正计划重新修建。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极庙 位于大明湖公园北岸，亦称北极阁。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杨成修兴建。是济南古代最高的高台建筑，建在城区内的最低处（近汇波桥，桥下是城内水之出口），占地约8.6亩，由庙门、正殿、后殿（启圣殿）及庙门两侧钟鼓楼亭组成。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修。成化元年（1465年）于正殿后建“启圣殿”。台阶35级，高约7米，台阶尽处以短窄平陛与庙门相接，经庭院甬路可

至大殿。殿内供奉真武大帝像，神龛前有泥塑龟蛇二将，东西壁为真武修道传说之壁画；后殿为真武父母之神位，所有神像都是近年修复的。据考，毁于“文革”期间的龟蛇二将泥塑系元代作品，国内少见。神龛前还有明嘉靖年间铸造的铜质龟蛇，形象生动逼真。

历下亭 在大明湖内一小岛上有一亭，也称“古历亭”。唐天宝四年（745年），诗人杜甫、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宴会于历下亭。此后至宋、元、明均有历下亭的记载，但非此址。今存历下亭始建于清，八角重檐，悬清高宗弘历书“历下亭”匾额。亭前回廊临水，并建有临湖阁。正门两侧有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所书杜甫诗佳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亭北有名士轩，前抱柱上悬挂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所书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蓉秋月一片大明”。亭外碧波荡漾，绿柳垂丝，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大明湖内风景最佳之处。

升阳观、题壁堂 位于老城区西北角，北临寿康楼街，西靠西公界街。升阳观创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是供奉吕洞宾之庙观，现仅存一正殿，前为卷棚，后为硬山顶，残损严重，内置明天启石碑一通。

题壁堂，始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张景堂等人捐资扩建，是目前老城区内较为完整的一组古建筑群；由正堂、戏楼、大罩棚、三星楼、吕祖庙及附属建筑组成。后多次整修，规模形式结构基本保存完好，是市级重点保护单位之一。两处共占地约3750平方米（5.6亩）。据传，升阳观建成后，一日，住持道人刘道让见一道人进入殿内，觅之则无踪，惟见殿内左壁上题诗一首，曰：“曾否当年旧酒楼，松亭水色静悠悠。熏风日躋蓬莱岛，筇杖常经此地游。世法须从身上想，机关宜向个中求。离离青草会心处，何事浮生空白头。”末署名：木石道人。墨迹淋漓，挥毫洒脱，信为祖师化身而书，故取其名曰：题

壁堂。昔日，此处是民间庙会娱乐场所。

城隍庙 位于古城区内，北邻县学街，西靠泮宫街，南对东华街，建筑年代不详。据记载，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天启七年（1627年）皆曾重修；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遭火毁，又于十三年（1640年）重建。总占地3150平方米（约4.7亩）。庙内有门房、阁楼、厢房、戏楼等，布局完整，计有房屋36间，系传统古建筑对称布局。后为市百货批发站职工宿舍，现正拟搬迁居民，恢复旧貌。

山东省博物馆陈列室 位于上新街51号，原济南道院，创建于1921年，与世界红卍字会同属一个社团。该院南北长215米，东西宽65米，占地13900平方米。院前设影壁，分设东西两门，后设三个院落，为对称布局，是一组宫殿式仿古建筑群，其形式沿袭清式营造则例。这是济南最早把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技术应用于宫殿式建筑的木结构工程。以正殿为例，从屋顶构架、柱式、斗拱、庑殿堆山及重檐处理，均把传统的木构件改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件，但在立面造型上仍保留古代宫殿的特点。整个建筑群体布局得当，比例匀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古朴典雅，空间和谐，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济南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于书典）

济南的碑刻和题记

历史文化名城济南，自古以来留有大量碑刻和题记。有些既

是书法艺术珍品，也是济南市文物古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我国历代著名文人和大书法家所撰、书之碑文，也有国际友人、少数民族人士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笔迹。

这些碑刻和题记，大部分集中在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些分散于全市各处。历史最久远者，当属一些文物单位的题记。在长清孝堂山石筑享堂中，有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和永康元年（167年）游人刻于石壁上的题字。再就是北魏正光二年（521年），法义兄弟姊妹为其父母祈福，刻在千佛山南黄石崖上的造像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杨显叔造像记，存于柳埠四门塔内。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刻在孝堂山石室西山墙外的《陇东王感孝颂》碑。至于隋唐以来的造像等题记，在千佛山、佛峪、龙洞和柳埠的千佛崖等，存有多处。刻者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

济南今存的名人所书石碑，最早者为初唐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房彦廉墓碑》。房彦廉为名相房玄龄之父，其碑立于唐贞观五年（631年），现在历城区彩石乡小龙堂西北、凤凰山南麓的房彦谦墓前。此碑曾为来访的日本等书法界人士所重视。房彦谦墓东《唐陇西李氏清河夫人碑》，据分析亦为欧阳询所书。唐天宝元年（742年），大书法家李邕所写《灵岩寺颂》碑，现存该寺鲁班洞内。灵岩寺之方山北麓，原有神宝寺，李邕所写《大唐神宝寺碑》后被移至泰山岱庙，现仍保存。另在灵岩寺内，尚有武则天吋碑刻。在市东南郊佛峪，有刻于唐开成二年（837年）之《金刚碑》。

宋代石碑现存较多，仅灵岩寺就有几幢。内有立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立于元丰二年（1079年）的苏辙所题《灵岩寺并跋》；立于元符二年（1099年）的王安石之婿蔡卞所书《圆通经并楞岩偈》行书刻。该寺崇兴桥畔，也有立于宋元丰年间的修桥石碑。济南的宋代石碑，除灵岩寺所存之外，主要有苏轼写于元丰八年（1085年）的《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该碑原立长清县城真相院。“文革”中，该院和宋碑被毁，后在塔基之

下发现同一石碑。龙洞锦屏岩上的“敕龙洞寿圣院”6个大字，也传为苏轼所题。近年，在平阴县东阿镇亦发现一苏轼所写石碑。龙洞寿圣院旧址，尚有宋元符三年（1100年）所立《敕封顺应侯牒碑》和《顺应侯碑》。50年代，陈毅元帅和著名作家王统照，携手同游龙洞，曾共赏元符碑。陈老总并有诗为记。

金、元之碑，有赵孟頫篆书诗二首石刻，出土于城北孙氏园中，现存济南市博物馆。灵岩寺《十方灵岩寺田园记并碑》，立于金明昌六年（1195年），党怀英为之篆额。五峰山洞真观的《真静崔先生画像赞并碑》，立于元定宗二年（1247年）。此碑不仅为济南少见之画像碑，碑阴还有著名文人元好问、杜仁杰等的题字。日本僧人邵元和尚，于元带来华，一住21年，曾任少林寺、灵岩寺住持。灵岩寺墓塔林中，邵元撰文并书写的《息庵禅师道行碑》，已立600余年，至今完整。我国当代杰出学者、诗人郭沫若，曾写诗称赞这一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碑刻。灵岩寺的《大元国师法旨碑》，为藏族喇嘛大元国师所颁谕旨。1908年，法国人所编《通报》中的蒙古时代的石刻及档案，曾选此碑。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也展出了此碑拓片。

明、清两代的碑刻就更多了。在灵岩寺、神通寺、九塔寺、千佛山、五峰山、女郎山、华山、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书院泉等，不仅有两朝名人李攀龙、边贡、于慎行、何绍基、施愚山、阮元、桂馥和雪蓑等的笔迹，还有康熙、乾隆等帝王所写之碑。仅灵岩寺，乾隆碑就达十多幢，而成为各地少见的御碑崖。

在近代和当代名人中，灵岩寺千佛殿前，有梁启超所题“海内第一名塑”碑，刘海粟所写“天下第一名塑”碑，分立左右。解放阁和五龙潭，有原籍长清的书法家武中奇所写有关济南的多幢石碑。

毛泽东主席所题“革命烈士纪念馆”石刻，耸立于英雄山巅。陈毅元帅所写“解放阁”三个大字，镶于巍峨的解放阁上。

济南也有少数碑刻为重刻或复制，如在章丘明水发现的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所书《廉先生序》，为元代重刻。四门塔“杨显叔造像记”，被清末官僚端方所盗，现为据拓片重刻。至于灵岩寺中苏轼的《黄茅岗》诗碑，以及大明湖趵突园内岳飞所书《满江红》石碑，皆为据他处之作复制。

（任远）

济南八景与十六景

自北宋“潇湘八景”之说开始，历元、明、清朝，各州县相继都标出八景之名。名称都很清雅，既有诗意，又有画境，突出本地独得的大自然景色与人文之美，宣扬提高地方乡里的声誉，充分表达出人们爱自然、爱乡里的醇挚情感。

据明、清两代的各济南地方志及明人的八景诗，济南八景（旧时称历城八景）是：锦屏春晓（龙洞锦屏岩）；趵突腾空（趵突泉）；佛山赏菊（佛慧山、开元寺）；鹊华烟雨（鹊山、华不注山）；会（汇）波晚照（汇波楼下晏公台）；明湖泛舟（大明湖）；白云雪霁（珍珠泉白云楼）；历下秋风（历下亭）。

锦屏春晓：奇峰叠嶂四周环绕的龙洞，东边独秀峰的右面是“壁立千仞”的锦屏岩，岩下是宋朝寿圣院庙宇故址。翠崖峭壁上杂生着松柏山花蔓草，碧叶葱茏。暮春时野花争放，姹紫嫣红，晓日普照，灿烂如锦绣画屏。水旺时，岩下泉水绕流，清冷幽绝，是

济南风景绝佳处，故为八景之首。龙洞之东的佛峪，有石窟雕像，悬崖台亭，并为奇景。深秋时，从岭群峰中，红叶烂若丹霞，野菊遍生涧谷，竞放黄花，两处景色，可谓双绝。

趵突腾空：泉水三窟喷突奔雷，雪浪翻腾。元赵孟頫诗：“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明叶冕诗：“千年玉树波心立，万点冰花浪里开。”形象地咏出名泉的状貌声势。

佛山赏菊：佛慧山，俗名大佛头、楸山，近山巅处有北宋时石窟雕一大佛头像。山麓有开元寺，原名佛慧寺。寺后北崖下有甘露泉、南崖下有秋棠池，崖壁上多宋人镌刻的题记。原来涧谷山坡间，多柏、枫、栎树，遍是野菊花。每到重阳日，济南人要到佛慧山登高赏菊。开元寺早已毁废，野菊也近绝迹。今济南市正开始重建其寺院，整修大佛头，并植树种菊，恢复这一景点。

鹊华烟雨：济南北郊，鹊山横列如画屏；东北，华不注山孤峰突起。两山之间，农舍疏林，荷塘菜畦，溪流湖水相交错，烟雨霏微时宛若一幅绝妙的平林烟村山水画。

会（也作汇）波晚照：原来大明湖水，汇流至湖东北隅晏公台下的券门穿过，折至会波桥、会波门出城，夕阳余辉斜射券门，倒影入湖，故名。明中期后湖水径直出会波桥，券门填塞，此景移至会波桥、会波门下。如今新建的汇波楼上，楼西面仍题有“汇波夕照”匾额。

明湖泛舟：大明湖占济南旧城的三分之一，一湖碧水，绿柳绕堤，楼亭掩映，荡舟其中，山光水色，如临画中。金代诗人刘勋有“人行著色屏风里，舟在回文锦字中”之句咏明湖泛舟，可谓恰切。

白云雪霁：元朝时珍珠泉、濯缨湖北岸有白云楼，楼前山石花木环绕泉湖。冬日雪晴，白雪与阳光交映，如琼楼玉宇出现于淡云萦带波光明闪间。楼始建于元初，本为行山东尚书省事、济南知府张荣的宅第，明初为山东都指挥使平安的居第，后为德王

府西苑，白云楼改建为白云亭，犹存此景。清初，楼亭俱废，此景亦消失。

历下秋风：宋、元时的历下亭在明湖南岸，建在一高台之上，面山背湖，可览全城山湖之胜。亭下多老树古木，每至秋日，湖水微波，南山隐约，芦荻瑟瑟，西风萧萧，故标为“历下秋风”。明代时建贡院，亭台俱半毁，此景空留其名。清康熙时，重建历下亭于湖中，历下秋风一景又移到湖亭，至今。

济南八景之说，约始于元代，沿至明清，载于府、县地方志书，有文献可考，传至近代而弗辍，常常为人们所艳谈。

济南十六景之说，始于明末万历至崇祯时的刘敕。他将八景扩为十六景，载于他著的《历乘》，并辑有《济南十六景诗》，也刊刻传布。十六景是：锦屏耀日（龙洞）、玉鼎翻云（趵突泉）、幽涧黄花（开元寺）、白云弄雪（珍珠泉白云亭）、石洞绝尘（千佛山黔娄洞）、明湖泛舟（大明湖）、清流入海（济南城北大清河。按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道，即今黄河河道）、孤嶂凌霄（华不注山）、松韵南薰（南门内舜庙。今在其故址建第六十五中学，南部建舜园）、荷香北渚（大明湖水面亭）、苍生霖雨（五龙潭，原有五方龙王庙，为旧时祈雨处。今辟为五龙潭公园）、翠屏丹灶（鹊山，传说战国时名医扁鹊曾在此炼药）、岩畔飞泉（黑虎泉）、会波返照（会波桥、汇波门）、竹港清风（大明湖畔小淇园。此园系明末赵世卿所筑，有楼亭花石，种竹万竿，为明末觴咏胜地，清初即荒废为民居）、鲍山白雪（在王舍人庄、韩仓间的明诗人李攀龙的白雪楼，南邻鲍山，西眺华不注。明末清初楼圯废）。

《历乘》成书仅数年之后，即遭崇祯十三年正月清军攻破济南的兵祸，刘氏以耄耋之年遇难，书版均毁。以后的地方志书，仍主八景之说，幸有孤本传留至今，影印行世，十六景方又广为人知。

清代中期以后，有的人以八景不能完全概括济南景物，又创

出内八景、外八景的十六景之说。内八景增添了佛山倒影（大明湖小沧浪亭西畔）、古楼钟声（旧学院西南隅，高台三层，上建四级崇楼，中悬巨钟，声闻全城。楼毁于40年代，现台址尚存，钟移大明湖公园）等；外八景增黄河远帆（洛口）、九华拥翠（药山有九峰，号小九华）等。不过未载于志书，仅口传，略附于此，以志遗闻。

（张昆河）

济南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济南，南依泰岱，北临黄河，是黄河下游的一座古城。考古发现表明，济南早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这里也有最早出现城市的地方，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始建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是我国的早期城市之一，并一直发展到夏代。而在其东邻东平陵故城，晋之前则是济南郡治所，晋永嘉年间，济南西迁历城（即今济南市）。济南，有一部4600年的城市发展史，故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分别占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1%和10%。另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和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800余处，被确认为省内存古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古文化发展脉络最清晰最完整的区域之一。济南地区的先民，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留给人们数不尽

的物质文化宝藏，小白薄如蛋壳的黑陶器，大到西起长清广里、东达青岛海滨的齐长城，无一不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济南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绚丽多彩的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1986年，济南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章丘发现并发掘了位于龙山镇附近的西河遗址和位于刁镇韩家庄的小荆山遗址，从而，拉开了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研究的序幕。遗址出土的大批石、骨、蚌器等遗物，说明早在9000年左右这里已是济南最早的农业经济文化区，所以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市大汶口镇的一处典型遗址而命名的。目前，这一类型文化遗址在济南境内已发现多处，如章丘的焦家遗址，长清的张官遗址，平阴的周河遗址等，都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济南地区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它是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命名。以龙山文化命名的城子崖遗址，已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年代的发掘，使城子崖获得中国考古圣地之殊荣。90年代的发掘，因发现了龙山、岳石、东周城址，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取得重大突破而使它再增光彩。通过对城子崖遗址的再发掘，证明了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现在，该处已被列入1990年和“七五”期间全国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文物普查和考古发现表明，商文化遗址遍布全市。济南东郊的大辛庄就是一处较重要的商代遗址，对它曾作过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石、骨、蚌、陶、铜器等遗物，其特点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典型器物一样；该处也有和郑州二里岗上层器物相近的较早的遗存。长清县小屯，是出土青铜器的重要地点，曾多次发现精美的青铜器。70年代末，这里出土了斝和爵两件商代前期铜

器。这足以说明，小屯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商代前期，上述遗址证明，济南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的商文化的中心，已被分批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那时的济南隶属称雄东方的齐国。而南方的楚国逐步向北方发展势力，构成对齐国的极大威胁，为防御楚国的入侵，齐国构筑了西起今长清广里，东达青岛小珠山的千里长城，现长清一章丘段已被列入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济南东郊的东平陵故城，为汉代济南郡治所。当时，这里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晋永嘉年间济南郡治所由平陵迁至历城，建国后，平陵城经常出土铜、铁器和瓦当等物，当年这座城周7.5公里的城垣，现仍保存了部分残迹，据说该处即将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清孝里镇孝堂山上的汉石祠，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面房屋建筑。石祠坐北朝南，长方形，悬山顶，石砌成，祠内布满了精美的汉画石，画像内容丰富，雕刻技法细致，这种纯熟的技巧与生动的写实程度，在汉代画石艺术中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该处已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对峙局面后，中国出现了隋的统一和空前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这时期，济南又有不少重要的文物被保存下来，其中有不少绚丽多彩的历史艺术品。进入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发掘了位于东郊马家庄的北齐道贵壁画墓。墓室中保存有精美的壁画，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是传世的古代绘画作品难以比拟的。列入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造像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济南是山东西部的佛教中心。至今，这里佛教遗迹较多。如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四门塔，造型优美。与四门塔古朴的风貌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龙虎塔，距此1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造型别致，构思奇特的九顶塔。在这些佛教遗迹中，千佛崖石窟造像是山东地区

唐代石刻造像艺术的主要遗存，现有窟龕 100 余个，造像 224 尊，题记 44 则。造像中最著名的是南平长公主显庆二年造像窟，窟内刻坐佛一尊，面部丰满，秀丽端庄，口角眉梢，透着笑意；衣纹细密，刀法流畅，是镶嵌在千佛崖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以上几处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南南部山区的佛教遗迹灿若群星，这里有自北魏至隋唐的黄石崖造像、龙洞造像、大佛寺造像、莲花洞造像、灵岩山积翠证盟龕等，均列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这些仍然点缀着济南大地的锦绣山河。

济南的古文化遗迹星罗棋布，除闵子骞、房彦廉、张养浩、李开先墓外，还有一批古建筑，如佛教建筑灵岩寺、兴国寺，道教建筑长春观、洞真观，伊斯兰教建筑清真南、北大寺等。还有被称为南方庭院与北京王府、北方四合院风格融合一体的古建筑庭院万竹园。上述各处均被列入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济南保护了一批革命遗址和历史纪念建筑，如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解放阁等，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只是济南古文化已被发现的部分，显然，还有许多未被发现和未被认识的瑰宝，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和认识。

（张传英）

历史掌故篇

济南地理及名称沿革

一、济南名称的演变

济南是个古老的城市，它的名字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因为它位于古济水之南，故名“济南”。济水也叫大清河，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占有了大清河的河道，东流入海，大清河就成了黄河，它过去的名字便不复存在，而“济南”却未因济水（即大清河）的消失而更改名称。

两汉时期，济南曾先后被称为济南郡、济南国，曹操便曾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南北朝、隋、唐及北宋时期，济南的名称叫做齐州，北宋文学家曾巩便做过齐州的知州。北宋中叶以后，齐州升格为府，称做济南府；元朝一度又将济南称做济南路。明、清两代，山东划分为济南府、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武定府、东昌府、泰安府、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等10府及济宁州、临州2州，济南是山东的首府。民国以后，自1912年至今，济南还屡屡被改称为济南道、济南市、济南特别市等等。

二、济南的地理概况

济南是黄河下游最大的城市，它位于山东省中西部，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泰山，正处于鲁中山地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带。现在，济南是个副省级城市，辖历城、历下、市中、天桥、槐荫5区及章丘、长清、平阴、济阳、商河5市、县，总面积达8227平方公里，人口530余万。济南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山东的政治、文

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是山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中心，是山东半岛经济开发区之一。在黄河下游众多的大城市中，济南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现代化城市。

济南的地理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其自然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在其由南向北倾斜的地势上，自西向东流动着黄河、徒骇河、小清河三条大河。主要湖泊则有白云湖、大明湖，和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两大人工湖。济南地区的年降水量在 650 毫米以上。所有这些河流、湖泊及自然降水，为济南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灌溉水源。济南地区平原面积较大，且多为比较肥沃的褐土。所有这些较好的灌溉条件、较充沛的降水以及比较肥沃的土地，为济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稻谷、小麦、玉米、谷子、大豆、花生、地瓜、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均较高。在南部山区丘陵地带，还盛产柿子、苹果、山楂、梨、杏、桃、葡萄等果品。应该说，济南是黄河沿岸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除较发达的农业外，济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铁矿已探明的储量近 6000 万吨，煤矿已探明的储量达 6 亿吨；此外还有储量丰富的建筑饰材，如储量达 1500 万立方米的“济南青”，储量达 360 万立方米的“柳埠红”，以及分布在南部山区的“万山红”“鲁青红”花岗岩石材等等。还有名贵的长清木鱼石。在北部的商河县还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分布。

济南地区除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外，其旅游资源既十分丰富，又具有自己的山水特色。南部山区风光秀丽，多名胜古迹，如与天台国清寺、江陵玉泉寺、南京栖霞寺并称为唐代“天下四绝”的灵岩寺，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四门塔，以及千佛山、五峰山、九顶塔、小娄峪、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还有新近开发的跑马岭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红叶谷景区。除了这些名山大刹外，济南的泉水是名扬天下的，这是因为济南整个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石灰岩广泛分布，岩层微微由南向北倾斜，且多

裂隙，这样，当南部广大丘陵山地接受大气降水后，地下水沿含水层北流，至济南城区周围受到阻水岩体的堵截，地下水即沿裂隙上涌，遂形成济南众多的泉群。城内有趵突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五龙潭泉群，城外章丘还有百脉泉群，为著名的北国水乡。这些水泉仅载于金代《名泉碑》的就有 72 处之多，因此，济南被人们称为“泉城”。

既有青山，又有绿水；既有名胜古迹，又有现代城市景观，这就使济南成为一个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城市。加上济南地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14 度左右；而且交通方便，铁路有京沪、胶济连结南北东西，公路密如蛛网，连结全省各地，空路与全国各大城市相通，并可转接海外，所以说，济南是一个在我国独具特色的旅游和贸易城市，

（崔力明）

富有戏剧性的齐晋鞌之战

春秋时期，济南位于齐国西疆，是出入齐国的门户，居重要的战略地位，齐国与晋、楚等诸侯国之间的许多重大战役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生在公元前 589 年的齐晋鞌（即今济南北马鞍山一带）之战。

公元前 6 世纪后半叶，中原地区以齐、晋两国国力最为强大，而南方的楚国也兴盛起来，渐成与齐、晋逐鹿中原之势。楚庄王

时，楚国先后出兵伐陈、降郑、逼宋为城下之盟，控制了今河南大部分地区，威胁着晋国的霸王地位，中原的鲁、曹、卫等与晋同姓（姬）的小国更是惶恐不安，他们想与齐国联合共同抗楚。而齐国则另有打算，希望借机削弱晋国势力，使鲁、卫等小国依附于自己。齐顷公七年（前592年），晋、鲁、卫、曹各派使者至齐，商谈会盟之事。齐顷公却对会盟之事很不重视，甚至视同儿戏，于是发生了在外交上大失礼仪的事件：晋国使者郤克瞎了一只眼，鲁国使者季孙行父头秃，卫国使者孙良夫是个跛子，而曹国使者公子首驼背。齐顷公接见使者时，预先安排他母亲萧同叔子和后宫嫔妃在台上观礼，他派了一只眼的官员去迎陪一只眼的使臣，秃子迎秃子，跛子迎跛子，驼背迎驼背，台上的妇女见了这滑稽场面，哄堂大笑。使者们受了戏弄，非常气愤。晋大夫郤克发誓说：“我如果不雪此耻，再也不渡过黄河！”回国后，郤克两次请求率兵伐齐以雪耻，晋景公为了大局，都没有同意。

齐顷公十年（589年），齐国背盟伐鲁，占领了鲁国的北部龙、巢丘等地，卫国出兵相救，为齐所败，于是鲁、卫派使者赴晋求救。此时郤克已在晋国执政，于是自领中军，以大夫士燮领上军，栾书领下军，韩厥为司马，率战车800乘，联合鲁、卫之兵伐齐。与齐国军队在鞞（今山东鞞县）相遇，齐军迅速将军队撤回国内，六月十六日到了靡笄山（今济南千佛山）下。晋、鲁、卫联军赶到济南。齐顷公派人下战表。齐将高固领精兵闯入晋军，以石击敌，捉住晋将，登上晋军的战车，车上拴了根桑树，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阵中，大呼：“想要勇敢的，我卖给你们一点多余的！”

第二天，齐、晋两军布阵于鞞，齐顷公登上战车，邴夏架车，逢丑父立于车右以保护顷公，晋军主帅郤克的战车，由解张驾驭，郑丘缓为车右。清晨，齐顷公呐喊道：“我姑且消灭这些敌军再回来吃早饭吧！”没给马匹披上衣甲便冲向敌阵，其轻敌至此种程度。晋主帅郤克被箭射中，血流到战靴上，但仍然坚持击鼓

指挥作战,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呻吟道:“我受伤了!”驾车的解张应道:“两军会战之初,箭就从我的手一直射到肘,我把箭折断继续架车,流的血把左边的轮子染得通红,哪里敢喊一声痛,我的大人您要咬紧牙关忍住啊!”车右郑丘缓说:“自战斗开始,只要有险阻,我就一定跳下去推车,你难道没看见吗!而你却喊什么伤痛!”解张又说:“大军的耳目,是靠我们帅车上的旗帜和战鼓,进退都靠它指挥。这车只要有一人镇守,就能成功,怎么能因自己的伤痛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披甲提枪上战场,本来就是慷慨赴死啊。受伤只要还死不了,我的大人您就要勉力战斗啊!”说罢,解张把辔绳并在左手中,右手抓起鼓槌擂动战鼓,马拉着战车飞奔向前,大军紧随车后冲锋。齐国军队溃败,晋军猛追,围着华不注山(即今济南华山)跑了好多圈。晋军司马韩厥驾战车追齐顷公的车,为齐顷公驾车的邴夏喊道:“快射那驾车的,他定是个有身份的君子!”齐顷公却说:“既然说他是君子,还要射他,这是不合乎礼仪的。”于是,先射死车左之将,掉于车下;又射中车右之将,倒毙车中。晋将綦毋张丢了战车,请求上韩厥的战车,韩厥让他站在身后,又低下身来将已被射死的车右之将稳放在车中。

这时,齐大夫逢丑父见形势危急,就与齐顷公换了位置,自己站在主位上冒充国君,车跑到华泉附近,旁边驾车的马挂在树上停住了。逢丑父昨晚睡在车中,有条蛇爬到他身下,他挥臂击蛇,受了伤,因此不能下去推车,于是被韩厥追上。韩厥跳下车来上前抓住齐顷公的驾车的马。逢丑父以国君的口气命令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取水饮用。齐顷公趁机跳上郑周父驾驭的副车才逃脱了。韩厥捉住逢丑父,以为就是齐顷公,献于郤克,郤克见是假的,要杀逢丑父。逢丑父说:“自古至今,没有自愿代国君承受危难的,现在有了一个,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赦免了他,以鼓励为君效忠之人。

这一战，齐军大败。晋军追赶齐军，从丘舆一直追到马陞。齐顷公派人求和，晋主帅提出两项苛刻的条件，一是要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做人质，二是要求齐国境内的田垄全改成东西走向，以便晋军出入，这显然是故意侮辱齐顷公。齐国使者据理力争，鲁、卫两国也从中调解，晋军才放弃了这两个条件。七月，晋与齐在爰娄会盟，订立了和约，齐国把侵占的鲁国土地都退还给了鲁国。第二年，齐顷公亲自到晋国谢罪，并提议以朝周王之礼朝见晋君，晋景公不敢接受。

傲慢而迂腐的齐顷公自取其辱，为国家和百姓带来灾祸，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永祥）

鞭打芦花与闵子骞墓

在姹紫嫣红、群芳争艳的百花公园西侧，有一个略嫌冷寂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孝子闵子骞的墓地。

闵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名损，字子骞。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15岁，是孔门著名弟子之一。

闵子骞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续弦后，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渐渐地，继母开始嫌弃起子骞来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子骞经常遭虐待。炎炎夏日，他吃的是继母和弟弟的剩菜馊饭；凛凛寒冬，弟弟和继母围着炭火玩笑，而他却得顶风

冒雪干活。

一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继母给两个弟弟絮了新丝棉衣，摸着虽然不厚，却很暖和。给了骞絮的是芦花衣，看上去鼓鼓囊囊的，却一点不保暖。

一天，雪下得特别大。子骞的父亲要子骞赶车同他一起外出。子骞刚出门，一阵风扑来，冻得他打了个寒战。继母挑拨道：“明明他穿着最厚的棉衣，却还装冷。你看他两个弟弟，穿得那么薄，也没像他那样。真没出息！”父亲听了，以为子骞装冷，不愿为自己赶车，不由生起气来。子骞只得咬着牙驾车上了路。

路上，雪越下越大，风也越刮越猛。子骞的小手冻僵了，到了转弯的地方，没扯住缰绳，马儿跑错了路。子骞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车调过头来。

这下，子骞的父亲可火了，夺过鞭子就抽打起了骞来。不料，一鞭子下去，就把子骞的“棉衣”抽破了。从破绽处纷纷扬扬飞出来的竟是芦花！

子骞的父亲顿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他下决心要休掉后妻。子骞一听，连忙劝阻道：“有继母在，只我一人受冻；若是继母走了，我们兄弟三人就都没有棉衣穿了！”子骞的父亲听了，叹了口气，只好作罢。

子骞的继母得知这事后，感动不已。从此，她对待三个儿子就像都是亲生似的了。

闵子骞长大后，跟随孔子学习。他尊师敬长，品德优良。《论语》曾记：“闵子侍侧，阊闾如也”。意思是说，闵子骞跟在孔子身旁时，总是恭敬而端正地站着。孔子称赞他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意思是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别人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从无异议。

鞭打芦花的故事被后世传为美谈。宋代人又将之编入《孝行录》。千百年来，这个故事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少年儿童

进行德育启蒙的重要教材。

相传闵子骞死后，葬在齐地。即今济南百花公园的西侧。他的后代，也搬到了齐国居住。今章丘市党家镇西沟头村聚居的闵姓，传说就是闵子骞的嫡传族系。他们年年岁岁为闵子骞守墓。

唐宋之际，因闵子骞墓前“坟而不庙，秩祀不至”（苏辙：《齐州闵子祠记》）闵子骞墓也就渐渐被冷落了。时至北宋，程朱理学兴起，崇儒尊贤。对先秦贤哲尤其是儒学名流，人加褒扬，到处为之建祠修坟，树碑立传。熙宁七年（1074年），济南太守李肃之在闵子骞墓前立碑并建立祠堂。竣工后，由人文豪苏辙撰《齐州闵子祠记》五百余言，记叙建祠的经过，以及堂成后学子士大夫瞻观的言论。其兄苏轼书丹，此碑是苏轼存留于济南的四处书迹之一，为闵子骞墓增色不少。至明代，原碑已渐损。明天顺四年（1460年），又重刻苏碑立于墓前。

北宋之后，历金、元、明、清各代，对闵子骞墓、祠均有修葺。至20世纪60年代初，闵子骞墓方圆十五六亩地，周围建有院墙。墓的封土直径约七八十米，高30余米。其上有合抱粗的柏树30余株。封土前为闵子祠，内供闵子骞的塑像。祠前树立着历代碑刻10余通。守墓者是章丘西沟头村闵氏族人。他们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四时祭祀，日日洒扫，将墓园整治得洁净、肃穆。

十年动乱期间，闵子骞祠和墓被严重破坏，碑石被捣毁，1979年，当时的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将闵子骞墓重新公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使之避免了彻底毁灭的厄运。现在，济南市的文物部门正在规划设计，准备堆培闵子骞墓封土，恢复墓前祠堂，陈列与闵子骞有关的史料，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场所，向游人开放。

（刘伯勤）

霸王坟为何在平阴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述征记》曰：“项羽墓在谷城西北三里许，毁坏，有碣石：‘项王之墓’。”

谷城即今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项羽，祖籍下相（今江苏宿迁县境），封地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兵败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境），其墓为什么会在平阴呢？其中自有一段缘由。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的叔父项梁，因杀人，和项羽一起避仇于吴中（今江苏苏州）。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在会稽（今江苏苏州）起事反秦，率部北上，征战于苏北、鲁南一带，后来势力发展到六七万人，驻扎在家乡下相。又采纳范增之计，立楚怀王之孙心为怀王，都盱眙（今属江苏），自号武信君。数月之后，引兵在东阿（今平阴县东阿镇）大败秦军，东阿遂成为项氏集团的根据地。不久，项梁战死于定陶，兵属项羽。怀王迁都彭城，自领项羽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封地即在今山东鲁西南一带。

秦亡后，项羽势力最为强大，已成为各路抗秦义军的实际首领，于是，他将楚怀王尊为“义帝”（名誉帝王），在戏（今陕西临潼县境）大分天下，封诸将为王侯，刘邦封为汉王，而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以彭城为中心，控制着江苏、山东、河南的9郡土地。他强迫“义帝”徙居郴县（今属湖南），又派人在途中杀之。随后便率部东归，至彭城。由于他曾被封为“鲁公”，其亲近部卒多驻于鲁西南

一带。

此后数年，楚汉相争，逐鹿中原，至公元前206年。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亳县境)，随从仅余26骑，他本可东渡乌江，回到彭城，重整旗鼓，但却认为“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遂将乌骓马赠于乌江亭长，命随从皆下马步行，与汉军短兵肉搏。项羽独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余处，便对围捉他的汉将吕马童、王翳喊道：“我听说汉王以千金重赏、万户封邑来买我的头，我把这个好处给你们吧！”于是自刎而死。汉将王翳先抢到了他的头，其他将士也一拥而上，争抢项羽的尸体，自相残杀，死了几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一部分尸体，加上王翳先抢的头颅，5个人把项羽尸体凑在一起，献于汉高祖刘邦，刘邦遂将项羽故地分为五部分，赐给他们，并将5人都封为侯。

项羽死后，各地诸侯纷纷降汉，惟独鲁地项羽旧部坚守不屈。汉高祖刘邦本打算统率大军加以屠灭，后来考虑，鲁地军民能为故主项羽死节，坚守礼义，忠贞可嘉，便派使者捧项羽之头至鲁，让军民传视，鲁国的父老们遂归汉。汉高祖刘邦以为项羽最初被怀王封为“鲁公”，而鲁地军民又如此效忠项羽，于是决定以“鲁公”的礼仪把项羽安葬在谷城。刘邦还亲自前来为他奠祭，在项羽前哭悼而去。

《述征记》一书，当为隋唐以前的作品，已佚，据其记载，项之墓当时已经毁坏，如今更是迷失难觅了。平阴东阿镇西北，现有古墓，当地人俗称为“霸王坟”，是后人附会的。

(李永祥)

王莽与济南王氏家族

西汉末年，自成帝即位始（公元前32年），外戚王氏家族以太后（元帝王皇后，成帝之母）为靠山，势位逐渐显赫起来，一门封侯者，共10人，其中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先后出任大司马之职，控制汉朝实权达数十年之久。最后王莽竟篡汉，建立了“新”朝，自己做了皇帝。

王氏家族本是战国时齐王之后，原为田氏，齐王（田）建为秦所灭。秦末，田建之孙田安参加了抗秦义军，被项羽封为济北王。汉朝建立之后，废免了田安的王号，但齐人仍习称其家为“王家”，于是，田安便以王为姓了。

汉文帝、景帝年间，田安的孙子王遂（字伯纪），定居东平陵（今济南章丘市平陵城）。王遂之子王贺，字翁孺，汉武帝时任绣衣御史，受命在魏郡（今河北大名）一带镇压竖卢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查究当地对农民造反镇压不力的官员。他为政宽厚，多所存活，却落了个奉使不称职的罪名，被罢免了官职。

王贺免官归乡之后，与东平陵另一豪门大族终氏结怨，于是，便携家迁到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委粟里。王贺之子王禁，字稚君，少年时在都城长安学习法律，后任廷尉史（廷尉的属吏。廷尉，九卿之一，掌刑狱）。王禁不重小节，好酒色，妻妾众多，生有四女八男，其次女政君后来成了汉元帝的皇后。

政君成为皇后是很偶然和侥幸的。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

54年),她被献入宫廷为家人子(没有名号的宫女),地位低微。时刘奭(shì)为太子,其所宠爱的司马良娣得了重病,将死之时,对太子说她是被太子的妃妾们诅咒死的。太子从此便憎恶身边的妃妾。宣帝见儿子郁闷不乐,使命皇后从没有名号的宫人中另选新人,以充太子妃妾。皇后挑出5个人,政君在其中,太子朝见时,皇后让5个宫人出来给太子过目,并暗中指使侍从问太子喜欢哪一个,太子对5个人都不感兴趣,但为了应付皇后,便随便说了句:“其中有一个还可以。”恰巧,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自穿了一件绛色的大掖衣,皇后的侍从便以为太子看中的是政君,于是便把她送进太子宫中。太子妃妾数以十计,进宫最长的七八年,没有一个有孕的,而政君进宫不久便怀了孕,后来生了皇孙刘骜(ào)。宣帝崩,刘奭即位,是为元帝,政君立为皇后,封其父王禁为阳平侯。王禁死后,由其长子王凤继承封号。

元帝死后,成帝刘骜即位,尊元帝皇后王政君为太后,任命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此,王氏一族便发达起来。王凤独掌朝政11年,连皇帝都怕他。有一次,成帝欣赏刘歆才学出众,任命他为中常侍,临拜之时,侍从们说:“此事还没禀告大将军(指王凤)呢!”成帝答道:“这是件小事,何必去禀告大将军!”侍从们叩头力争,皇上于是便对王凤说了此事,王凤果然不同意,皇上也只能作罢。

河平二年(前27年),一日之内,太后5个弟兄,都被封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世人称为“五侯”。其他王氏子弟都在朝廷各部门担任要职,连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李参也被任命为侍中水衡都尉。“五侯”竟为奢侈,广收贿赂,珍宝充库,姬妾满堂,僮仆成百上千,宅第宏丽。不过,他们也都通达人事,广施财物以网罗人才,争相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王莽是王太后同母弟王曼之子,王曼早死,未及封侯。堂兄

弟们都是大将军“五侯”之子，声色犬马，奢靡无度，而王莽却家境清寒，他表现得廉恭节俭，勤奋好学，衣着像个寒素的儒生，尽心侍奉老母和寡嫂，教养已故兄长的儿子，行为谨慎而周到。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他在床前侍候，亲自尝药，蓬头垢面，一连几个月都没有脱衣睡觉。而对其他叔父也都孝敬有礼，因此深得太后和叔父们的欢心，不久，被封为新都侯。他爵位愈尊，愈发谦恭，广交将相公卿和当世名士，很快他的声誉便超过了他的叔父们。为了沽名钓誉，他能做出许多矫情过度的事情，而毫不羞愧。

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年老，举荐王莽自代，于是，皇帝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成帝死，无后，立定陶王之子欣为嗣，是为哀帝，王莽一度失势。不久，哀帝死，太后与王莽定策，迎立中山王刘衍，是为平帝。太后临朝听政，大权都交付于王莽。于是，王莽外表装得正直端方，而实际上却大肆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培植势力，广施恩泽。不久，他被加封为安汉公，又以女儿配帝为皇后。王莽羽翼丰满之后，便逐步架空太后，自专朝政。平帝死后，他擅自迎立年仅2岁的广成侯之子刘婴为皇帝，又伪造符命，指示大臣上奏，逼迫太后封他为“摄皇帝”。三年之后，他便篡汉自立，建新朝，登基为帝了。

王莽在位15年（公元8~23年），他违背历史发展趋势，托古改制，恢复“井田”；实行“王均六管”，由官府控制垄断工商业；屡改“币制”，使钱法混乱；并且不断征伐外族，大兴土木；政令苛细，徭役繁重，民不堪命，终于激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23年，义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王氏家族从此也就衰败了。其中红阳侯王立，封地在南阳，他的儿子王丹，投降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战死。东汉建国之后，刘秀封王丹之子王泓为武阳侯，余脉又传。

（李永祥）

檀道济“唱筹量沙”

我国南北朝时期，烽火遍地，兵连祸结。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伐魏败北，乃命太尉檀道济继续征魏。檀系山东金乡县，人，勇猛善战，足智多谋，与魏军三十余战，连连告捷。正月，又败魏军于寿张。二月至历城，军中乏粮，不能再进，欲回师南下。这时，投降北魏的宋卒就将檀道济粮罄无援的军况告之魏将，魏将闻之大喜，紧紧追逼宋兵于历下，企图一举歼灭。

檀道济身陷危境，并没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所处险境：外有伏兵，内无粮草，士卒忧惧，军心惶恐。此时如突围，势必全军覆灭，如不突围，即使魏兵不进攻，亦必困死寨内。那么，用何良策退兵？

檀道济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妙想奇计，没死伤一兵一卒，终达到从容退兵。

某晚，夜色沉沉，寒风萧萧。营里忽然亮起灯笼火把，闪闪烁烁，传出宋营士兵高喊“粮食”的计数之声：“一斗、二斗、三斗……”嘈杂喧阗，彻夜不绝。这都被伏在寨外魏军的探子听得清清楚楚。翌日天亮，探子眺望营内，只见堆囤的“粮食”竟如小丘，四周寂静，晨光熹微中有些雀鸟儿在粮堆上飞来飞去啄食。探子将所见所闻报告魏营，魏将大惊，本来慑于檀道济的威名就已心怯，今又知其军粮丰足，以为前来投顺的宋卒乃是诈降，诱使他们去上当受骗，不禁大怒，斩了降卒，速速撤兵北窜，檀得以全军

返归。

一夜之间，莫非这些“粮食”从天而降吗？

原来，多智善谋的檀道济察看了营中地形，顿生一计：何不以沙充粮，称沙而唱数计筹，以示储粮充足来迷惑敌人呢？于是，茫茫夜幕下，他亲率一批士兵以斗量“粮”，另一批士兵则手拿竹筹（即筹码，计数用）高声计数，最后把仅余的少许粮食散在沙堆上，饰无为有，魏军果然中计。

檀道济奇智果敢，以独特的指挥形式产生的军事效果，对后世颇有影响，尤为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所借鉴。史称这一谋略为“唱筹量沙”，遂成一典故成语。

宋元嘉十三年（436年）离“唱筹量沙”不足5年，檀道济被宋文帝无罪杀害。临刑前，他对宋文帝高呼：“你毁了自己的万里长城。”清董芸有《粮冢》一诗悼檀，诗云：

萧萧故垒暮云平，食尽量沙剧战争。

可惜弓藏高鸟在，公然万里坏长城。

当年“粮冢”究竟在何处？历城县西梁旺庄有沙堆两座，相传就是檀道济遗留的“粮冢”，庄后还有一座檀公庙，供后人祭祀，看来“唱筹量沙”发生于此。

不过，还别有一说，据清顺治乙未年安徽《蒙城县志·山川形势》载：“蒙城北有檀城山，在县北四十里檀城内，高七十丈，周二里，昔檀道济唱筹量沙于此”。从地域上来看，很难使人相信。因为魏军似不可能深入宋境的蒙城来追逼围困檀军的。《南史·檀道济传》：“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已说的很明确。至于《蒙城县志》所云，或是附会也。

（张稚庐）

《水经注》中的济南山水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年)为汉代桑钦著的《水经》作的注。《水经》原仅3卷,记水道137条,叙述简略。《水经注》全书40卷,所记的水道增至1253条,并详叙每条河的源流,流经的山陵、湖泽、城邑、古迹及其地的物产、水利设施,有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说谣谚等,成为一部以水道为纲,全面综合性杰出的地理学著作。郦氏文笔简练俊峭,有的章节,如精妙的小品文,又很有文学价值。

在《水经注》中的《济水》卷,写了济南的山水,因古代的济水,中下游正经今平阴、长清、历城、章丘而东北入海,这些市、县近几年都属济南市。

《水经注》中济南山水,首先叙述的是玉水(今玉符河)和朗公寺(故址在今柳埠四门塔一带),记载了朗公寺建寺的缘故:

“济水又东北,右会玉水。导源泰山朗公谷,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苻坚时,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尝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叠阁,虽素饰不同,并以静外致称,即此谷也,水亦谓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经玉符山,又曰玉水”。竺朗是十六国时的名僧,这是关于朗公谷建寺传世的最早记载。隋朝时更名神通寺。今神通寺故址的四门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水上游的琨瑞溪,今名锦阳川,是历城

区南山风景秀丽的三川之一，玉水下游今名玉符河，经济南西郊北入黄河。

依水道顺序，其次写的是泺水（泉源即今趵突泉）、大明湖（北魏时的大明湖，今五龙潭乃其故址）：

“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俗谓之娥英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日对鱼鸟，极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湖水引洩东入西郭”。用了极简练的辞句，描述了趵突泉喷涌之势和当时的大明湖的幽静景色（北魏时的大明湖，是当年以五龙潭为中心的湖水，北宋时名四望湖，金代时渐湮涸，半为街市，大明湖之名方移给城内之湖）。

再依次写到历水（今舜井）、流杯池（今珍珠泉、王府池子）与历水陂（今大明湖）：

“历祀下泉源竞发，其水北流”“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经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合”。历祀（祠）即舜庙，这里原有东西两个舜泉（也名舜井）、香泉、杜康泉等，原来各泉竞发，泉水西北流，至唐、宋、元、明初犹然（明初以后，水位降低，各泉方不能外流）。流到今珍珠泉、王府池子，当时汇成流杯池，成为“州僚”们的游宴觞咏之景点，再北即历水陂，亦即今日的大明湖（湖水北出，今入小清河）。

最末写的是华不注山、华泉：

“济水又东北，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华泉，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又是以精练的骈句，写出了孤拔峻秀的华不注山的特色。

《水经注》就是这样以当时的玉水、泺水、历水、华泉这4条入济水的溪流为脉络，分别叙述描写济南市区的水山泉湖之胜。

《水经注》对处在济南上游的平阴、长清的水山，和处于济南下游的章丘的水山，都作了较简短的记叙。在这两部分，景物描写少，而侧重在记叙古迹。

平阴的东阿镇，也即是古代的谷城县城。《水经注》记载：“济水又北过谷城县西，……故春秋小谷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谷有黄山台，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也。又有狼水，出东南大槛山”“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家，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现在东阿镇还有这口管仲井。狼水今名狼溪河，沿镇北流。谷城山上那块十几丈高巨大的赭黄色石岩仍巍然耸立，谷城山现又名黄石山。项羽初封为鲁王，自刎垓下后，鲁地不降，刘邦以项羽头传示之，乃降，遂葬项羽于此，事见《史记》，都是平阴的著名古迹。在另一章里，也写到东阿的“大城北门内西侧阜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现在，原东阿县黄河以南地，划归平阴。胶即阿胶，现在仍为平阴的名产。

《水经注》也记叙了平阴的齐长城：“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玺防门，即此也。其水引济故渎尚存”。今平阴故城南，防门及引济遗迹、长城遗迹，仍可辨出。

由防门遗迹而东，便入今长清县。《水经注》记叙了广里这个村名。自春秋至今未变。由广里再东，记叙了“巫山在平阴东北”，“今巫山之上石室，世谓之孝子堂”。巫山今名孝堂山；石室，它是我国现存惟一的汉代地面房屋建筑，石祠内壁雕刻着画像，为最珍贵的文物。《水经注》是最早记载这个石室的典籍。

济水由济南而东，经今章丘市界，《水经注》也是依序从西先记叙的。它先叙出于鸡山的巨合水，北流经巨合故城西，“又北与

关卢水合”。巨合故城在今龙山镇附近，关卢水即在龙山镇东坡下北流，是一条清浅的小溪。又记叙在关卢水之东是谭城，即春秋的谭国故地。在谭城东是武原水，“水出谭城南平泽中”；“径谭城东，俗谓之布城也。又北径东平陵县故城”。按：武原水今已干涸，水道犁为农田，但流向尚可辨出。平陵城的遗址还存在，几米高的板筑城墙，还断断续续地立在那里。在此最早发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城子崖，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经注》也是最早记叙了章丘的百脉水（百脉泉、绣江河）。“百脉水出上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还记载了女郎山。《水经注》对济阳、商河河水也有较详细记述。

《水经注》里所记叙的济南山水与历史古迹，确切如实地反映了济南山水泉湖的秀丽与历史文化的悠久。现在济水虽已为黄河所夺，可济南的名山依然长青，溪水泉湖依然明媚，名胜古迹也都存在，在新时代更焕发出光彩。

（张昆河）

隋文帝杨坚与济南

隋朝开国君主文帝杨坚（541~604年），母亲是济南人。

杨氏家族，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历世为北朝贵族。杨坚之父杨忠，仕北周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忠年

轻时，曾客居泰山，娶济南庶民之女吕苦桃为妻。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年)，杨忠时任西魏征西将军之职，妻子吕氏寄居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佛寺中。这年六月，她生下了杨坚。适逢有位尼姑智仙从河东(今山西永济县)来到这里，智仙很喜欢这个孩子，就为母子另外安排了清静的房舍，亲自照管抚养。

杨坚成人后，继承其父亲爵位为隋国公，又嫁女于北周宣帝为皇后，逐渐掌握了北周的大权，宣帝死后，静帝继位，年仅8岁，杨坚以外戚辅政，为大丞相、上柱国，称隋王。此时，他的母亲早已去世，因为家世低微，不知其宗绪。早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之时，杨坚就曾派人到济南寻访吕氏族人，没有找到。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做了皇帝。这时，济南郡守上奏，说有个叫吕永吉的男子，自称有个姑姑叫苦桃，嫁与杨忠为妻。经过反复查验，确认是杨坚舅父的儿子。于是，才查明了母亲吕氏的家世，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齐郡公，改葬齐州，立庙祭祀，并设置10户人家为其看守坟墓。命吕永吉继承齐郡公之爵位，召至长安居住。后来又任命他为上党郡太守。这位吕永吉，见识鄙陋，品行低劣，根本不会处理政务，后来竟弃官而去，不知下落。吕永吉有个叔叔叫吕道贵，生性尤其愚笨顽劣，言语粗俗不堪。起初，由济南被征召到长安，文帝杨坚见到他，想到母亲，不禁伤感哭泣，而他却没有一点难过的样子，只是一个劲地叫着隋文帝的名字说：“种(儿)么是错不了的，你真像俺苦桃姐啊！”此后，又屡犯忌讳，动辄违礼背义，文帝为他深感羞耻。于是使命丞相高颀给他丰厚的供给，不许他和朝廷官员接触交谈。后来又封他仪同三司，派他出任济南太守，命令他立即上任，不准再入朝。吕道贵回到济南后，摆出大架子，每当与人谈话，就自称皇舅。经常带着仪仗护卫，出入街巷，招摇过市，找老朋友饮酒取乐，济南的官员和百姓都对他又恨又厌。以后，撤消了济南郡，罢了他的官，他老死在家里，子孙也没一个有出息的。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禁断佛、道二教，强令僧尼道士还俗。杨坚执政后，反其道而行，崇尚佛教。为了纪念生母吕苦桃，他在济南大兴佛寺，自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间（587~593年），仅在历山一处，就开石窟9座，摩崖造像百余尊。又修了山腰的极乐洞，塑佛及服侍菩萨立像3尊，洞壁浮雕佛像教十尊，从此，历山就有了“千佛山”的俗称。

早在西晋永嘉年间，一说前秦皇始元年（351年），名僧朗公就在柳埠金舆山创建了佛寺，规模很大，“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成为海内名刹，世称朗公寺。隋文帝建国之后，特命重修朗公寺。开皇三年（583年），又派使者敕封朗公寺为“神通寺”，作为纪念其生母吕苦桃的寺庙。开皇十五年（595年），文帝东巡，封禅泰山，途中驻临齐州（今济南）。据说，曾到寺中祭拜，当他走进寺门时，只见圆光如轮，忽红忽白，时升时降；井水溢出井口，皇帝饮过后，又降回井中；群鹿从山中跑来，与人们安然相处；还有一对大白鹅一连5天跑到辇前俯首听经。当然，这种种奇迹，不过是寺僧们特意安排的不高明的骗术，以讨取皇帝欢心罢了。

（李永祥）

中国北方饮茶风习始自灵岩寺

唐代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

扶持，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自东都洛阳出发封禅泰山，打破了历代帝王通常自兖州而东的东封路线，自齐州(济南)而南，先至灵岩寺拜佛，后到泰山祭典。可见灵岩寺当时在佛教寺院中的显赫地位，此举也扩大了灵岩寺在全国的影响。

佛教禅宗奉弘忍(602~675年)为五祖。弘忍死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代表，提倡“顿悟”说，主张无须长期修行，只要一旦领悟佛性便可成佛。北宗以神秀为代表，则提倡“渐悟”说，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习才能逐步把握佛理而成佛。这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传统说法。

大足元年(701年)武则天召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洛阳。此后神秀往来两京，受到朝野信徒的崇奉，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武后、中宗、睿宗)门师”(张说所撰《大通禅师碑》)。神秀死后，众弟子在北方广大地区继续传授北宗禅法。其中一位俗姓王氏的兖州降魔禅师，尊奉师命来到灵岩寺，数年之后从者云集。

据天宝(742~755年)末年进士封演所著《封氏闻见录》记载：降魔禅师要求跟他学禅的人，务必长时间的不睡觉，不吃晚餐，静坐苦思，以体悟佛理，息灭妄念，但许其饮茶提神。后来这些学禅者走到哪里都怀挾茶叶，到处煮饮。社会上“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山东、河北渐至洛阳、长安。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论和尚、道士还是世俗之人，皆“投钱取饮”。

在此之前，北方很少饮茶，甚至鄙视饮茶。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王肃从江南来到北方，因饮茶甚多，洛阳城中的士大夫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漏卮”(填不满的酒器)。孝文皇帝问他：“茶水的滋味比羊奶如何？”王肃迎合皇帝的心理，答道：“茶水和羊奶不可相提并论，茶水只配作羊奶的奴仆。”于是，人们便称茶水为“酪奴”。有个官员叫刘编，仰慕王肃的风采，专门学习饮茶。彭城王讥笑他：“你不追求王侯的各种珍馐美味，却喜

好下等人如遭水灾的饮茶习惯。古代有专门喜欢别人身上的狐臭味,而昼夜追随不肯离去的人,你就同他一样啊!”当时王公大臣的宴会上虽然备有茶水,都以饮茶为低贱而不屑一顾,只有江南归降的人饮用它。

至唐代,灵岩寺竟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北方的风俗,足见其对唐代社会影响之大。北方盛行饮茶后,茶叶生意随之空前兴隆,茶商舟车相继将茶自江淮运至北方,品种繁多,堆积如山。风气迅速播及塞外,西北地区回纥等少数民族入朝,也用名马到市上换茶。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官方开始征收茶税,税率为10%,一年收入达40万贯,以后每年都有增加,茶税遂成为朝廷财赋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主要方法,一是烹茶时加以粟米、调料等煮成粥状,此称羹饮法;二是将茶叶制成茶饼,饮时捣成末,冲沸水,再放入葱、姜、橘子等。相传,陆羽著《茶经》而首创煎茶法,即煎煮茶叶不加其他,品尝茶叶本味。陆羽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上元(760~761年)初年隐居苕溪(属浙江湖州)时方写《茶经》。所以,据《封氏闻见录》可知,煎茶法在陆羽之前已经创立,且流行全国。《封氏闻见录》全书不涉及荒诞怪僻之事,所记大多详核,论辩精审。宋代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陆羽传》即有大段文字转抄自《封氏闻见录》。

今天的济南人仍喜欢饮茶,并尤爱饮煎茶,可以说是唐代遗风。

(周长风)

李白游济南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元年（742年）夏应召入长安，以翰林供奉的身份等待朝廷授予官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因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敢进兴亡之言，受到大宦官高力士、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女婿、时任卫尉卿的张垪等人的谗毁。李白极度失望，遂于天宝三年春上疏请求返归江湖，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放还。

李白青少年时代即信奉道教，当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遭到这次沉重打击后，便把精神寄托在访仙求道上。他离开长安先是漫游梁宋（今河南一带），约于十月间来到了济南。

唐朝为李氏天下，皇室把春秋时代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名李耳）尊为远祖，并追号“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命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在京师名号玄元宫，在诸州名号紫极宫。李白就是奔济南的紫极宫而来的，他托河南采访使李彦允介绍，特地请著名的道教天师北海（今山东青州）高如贵到这里主持自己的入道仪式。

入道仪式十分烦琐，李白背剪双手围绕神坛几乎不停地行走七天七夜，向神陈说自己的罪错。最后，高天师将用朱文写于白绢上的《道篆》（道教秘文，世所不识）授予李白，佩带在身上。在这之前，李白只是思想上信仰道教，从此就正式成为道士了。他置酒为高天师送行，并赋诗一首《奉饯高尊师如贵道上传〈道

策》毕归北海》。

虽然李白的身体已非常疲惫，但精神得到了大的解脱。他心情愉快地游览了济南美丽的湖光山色，写下了《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
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

湖阔数十里，湖光遥碧山。
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
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古时，济南北部东至华山、北至鹊山、南至标山是一个大湖——鹊山湖，烟波浩渺，气象万千。李白与李太守（姓名不详，唐代人好联宗叙谱以示亲近，此人不一定真是李白从祖）泛舟湖上，尽情观赏佳山秀水，所以李白说，此行不像东晋王徽之雪夜乘舟访问戴逵，匆匆而去，刚到戴逵门前又觉兴致已消，又匆匆而返。

第二首诗里，李白亦化用一个典故。东汉李膺文武双全，为官威严明审，誉满朝野。博通典籍的郭泰游历洛阳，与时任河南尹的李膺相识，结为朋友。后郭泰返乡，诸儒衣冠整齐送至黄河边，车数千辆。郭泰惟与李膺同舟而渡，众人望之以为神仙。诗中李白将李太守比作李膺，自比郭泰。郭泰年轻时，母亲想让他供职朝廷，郭泰说：“大丈夫怎能让见识短浅、器量狭小的人所役使呢？”后来司徒黄琼征召，太常赵典荐举，其他人亦劝其进身为官，郭泰看出朝廷衰败，纲纪废弛，已无可挽回，于是一概不应。他周游郡国，以高尚的节操被世人仰慕。李白此时的心境与郭泰是相通的。

后来，李白忆起这次济南之行，还写过一首古风：

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
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
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
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赤松即赤松子，传说是神农时的雨师，至昆仑山，常人西王母石室，随风雨而上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后，对刘邦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于是便按道家方法演习导引飞升之术。这首诗李白不仅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写其登上华山之巅恍如驾云乘风，飘飘欲仙的感觉，还蕴含着对定国安邦、功成身退的一代人杰张良的敬仰和追慕。

（周长风）

杜甫、李邕欢宴历下亭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712~770年）青年时期，曾先后两度东游齐鲁。

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前后，当时杜甫年仅26岁，他在东都洛阳应贡举落第，其父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至兖州省视父亲，并漫游齐、赵（今山东、河北境），过了一段“裘马颇清狂”的生活。他游兖州、登泰山、访徂徕、宴石门（即石门山，

在今平阴县境，一说在兖州，见杜甫《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写下《望岳》、《登兖州城楼》等名作。齐州（今济南）为大都会，照理，当为杜甫游踪必至之处，惜已无记载，不得其详。

第二次是在天宝四、五载之间（745~746年），前此，天宝三载（744年），供奉翰林院的诗人李白由长安赐金放归，在洛阳结识杜甫，并邀诗人高适一起漫游梁宋（今河南东部），天宝四载，又同至齐州。

杜甫到齐州时，适逢以书法、篆刻、文章“三绝”而名扬天下的北海（今山东青州市）太守李邕有事至齐州。李邕（678~747年）字泰和，扬州江都人，仕历左拾遗、户部郎中，括州、淄州、滑州刺史，汲郡太守等职，其人博学多才，刚直不阿，世以“干将莫邪”（古利剑名）誉之。他与杜甫祖父杜审言为诗文之友，过从甚密。杜甫少年居洛阳时，李邕就见过他，并且很赞赏他的聪颖好学。对于这位世交长辈，杜甫当然要去拜望的。李邕在当时的大明湖历下古亭设宴招待齐州士绅处士等人，也特邀杜甫陪宴，杜甫遂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纪之：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诗中首四句叙李邕驻临济南，设宴历下古亭，亭为海右名胜，客多济南名士，可谓人杰地灵。接下来四句写宴饮之兴致，环境之清幽。末四句则寓盛会难再之感慨。而其“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两句，凝聚了诗人对济南人文景观的无限倾慕之情，传诵千古，使济南人永远引以为荣。

李邕设宴之历下古亭，在今五龙潭一带的古大明湖上，即北

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记之“客亭”：

“泝水出历县故城西南”，“城南对山”，“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引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极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水经注·济水》）

元代于钦所撰《齐乘》也载曰：“池上有亭，即渚池，今名五龙潭。客亭当为历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也。”

元代以后，古大明湖逐渐堙塞缩小，“半为街市”，始移称今日之大明湖。今大明湖，唐代称为历水陂、莲子湖。而今湖中之历下亭，始建于明，重修于清初，并非诗中所称之历下古亭。历下古亭为客亭，即驿亭，本为待客之所，类似于现代之宾馆，亦非专供游览之亭阁。此次宴饮之后，杜甫还曾陪同李邕登游宴饮于李之芳所建的员外新亭。李之芳，宗室子弟，系太宗第七子蒋王李恽的后代，善为五言诗，开元末年为驾部员外郎，时出为齐州司马，后仕至礼部尚书，改太子宾客，所建新亭当在鹊山湖畔、历下古城台观旧址之上，李邕、杜甫皆有诗咏之。杜甫诗题为《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曰：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
迹籍台观旧，气冥海岳深。
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
不阻蓬蒿兴，得兼《梁甫吟》。

当时，杜甫之弟杜颖任齐州属县临邑主簿，主管治河事务，曾有书信寄杜甫，杜甫暂赴临邑探望，行经鹊山湖亭（即员外新亭），时李之芳有事至青州，杜甫有诗怀之，题为《暂如临邑至鹊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章》，诗中描写了风起之时鹊山湖的壮美景色

野亭逼湖水，饮马高林间。
 鼙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
 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
 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

杜甫畅游历下之后，于是年秋，赴鲁郡（今兖州），与李白同游东鲁，二人在石门分手，杜甫旋归长安。而次年李邕即为奸相李林甫构陷成罪，朝廷特派员至北海郡杖杀之，时年70岁。20年后，代宗大历初年（766年）左右，杜甫避乱蜀中，感慨时事，怀念故交，作《八哀诗》，其中之一便是为追悼李邕而作，题为：《赠秘书临江夏李公邕》，诗中热情赞美了李邕轶群绝伦的才华和刚直豪爽的品格，对其含冤惨死表现了深沉的悲愤与哀痛，并忆及他们在齐州的那次相聚。

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
 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

席间，李邕曾纵论当世文人，对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的诗，特予褒扬，使杜甫铭志于怀，终生不忘。

杜甫、李邕欢宴历下亭，是济南历史上的千古佳话，每当谈及，令人齿颊生香。《历城县志》载一名联，赋咏此事：

李北海亦豪哉，杯酒相邀，顿教历下此亭，千古入诗人吐属。
 杜少陵已往矣，湖山如旧，试问济南过客，有谁继名士风流。

（徐志刚 李永祥）

《酉阳杂俎》记载的济南掌故

《酉阳杂俎》是晚唐著名诗人段成式所作的一部笔记体小说。

段成式(约 803~863 年),字柯古。其六世祖段志玄,为唐代开国名将,官至右卫大将军加镇军大将军,封褒国公,卒后陪葬昭陵。新、旧《唐书》有传,皆载其为齐州临淄人。唐齐州即今济南市,唐天宝元年,齐州曾一度改为临淄郡,故段氏祖籍当为济南(一说为邹平,唐属齐州)。成式之父段文昌,穆宗时为相,后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成式以父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他苦学精研,读遍秘书省的藏书,后转为尚书郎,咸通初年(860年)出为江州刺史,终太常少卿。家多藏书,用以自娱,尤精于佛学。他作诗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互相唱和,“时号三才”。又因三人俱排行十六,其唱和之诗体又被时人誉为“三十六体”。成式有诗集 7 卷,今佚,《全唐诗》仅收录其诗 30 余首。另外,《全唐文》也收其文 11 篇。成式还著有《庐陵官下记》2 卷,也早失传。

《酉阳杂俎》以其内容广博而蜚声士林,《四库全书总目》誉之为“小说之翘楚”。近来,它又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英国作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处摘引《酉阳杂俎》的材料,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他的《中国伊朗编》中也给《酉阳杂俎》以很高的评价。

段成式并未到过齐州(即今济南),但因祖籍所在,他对齐州

的山川、风物、传说颇为关注，《酉阳杂俎》中多有记载。

关于济南的山水胜地，见载于《酉阳杂俎》的有大明湖、华不注泉、玉函山、历山（即千佛山）、灵岩方山（即玉符山）、金榆山（即金舆山，亦称金驴山）、大明寺（遗址在今五龙潭）、虎窟山、历城房家园、章丘长白山等多处。

卷十一《广知》篇记唐代大明湖（时称莲子湖），景色秀美、历历如画：

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罟（gǔzōng，鱼网）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

文中还记载了北魏袁翻湖中宴集的佚事，说明早在1500年前，大明湖就已经是游览胜地了。

又，卷七《酒食》：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240~249年），郑公恣“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杯。历下裂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使君林今已不存，据其方位，当在大明湖畔。郑恣，三国时魏国人，事迹不详，时任齐郡刺史。大明湖至今盛产莲荷，以大荷叶包裹鱼、肉蒸食，是济南特有的风味食品。而以荷叶为杯饮酒，郑恣真可谓巧思妙想，情调风雅。

关于历山、玉函山、方山，《酉阳杂俎》分别记载了三则优美的传说：

卷十四《诺皋记》：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人臂，绕其峰再浹（jiā，再浹，绕两周）。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米于此矣。

历山（即今千佛山）铁锁，古时实有，今已不见。顾炎武《山东

考古录》中把它和府学铁牛、灵岩寺铁袈裟(今存)称为汉代“铁官”遗物。济南早在汉代就是冶铁中心,专门设“铁官”管理。可见章丘出铁匠也是由来已久的。

卷十六《羽篇》:

王母使者。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

玉函山在今济南十六里河村东,隋唐时是佛教圣地,有岩窟古寺及摩崖造像多种。明清以后为道教所据,山顶建有碧霞元君祠,香火甚盛,如今都已倾圮。当时武帝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数度东巡大海,封禅泰山。这则传说对这位贪婪狂妄的皇帝隐含了嘲弄和讽刺。

卷十《物异》记灵岩方山的“镜石”:

镜石,济南郡有方山,相传有兔生得仙于此。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南燕时,镜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恶其照物,故漆之。

方山即灵岩主峰玉符山,山形方似符架,崖壁光滑如镜,故而有镜石的传说。

《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济南地区的特产和奇物:

卷十八《木篇》:

汉帝杏,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至今济南南部仲官、柳埠山区仍盛产甘甜大杏,俗名为“水杏”。

续集卷八《支动》:

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蛱蝶,土人往往见之。

卷三《贝编》:

历城县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赋光若滴。扣之，声及百里。北齐时移于都内，使人击之，其声杳绝。却令归本寺，扣之声如故。上人语曰：“磬神圣，恋光政”。

光政寺旧址今已迷失难考，磬石发声实际上是一种共鸣现象，并不神秘。

其他还有“钟坑之鱼”卷十七《鳞介篇》“鹅浦之鹅”卷十六《羽篇》等，则都有神异夸饰成分。

《酉阳杂俎》中还记载了一些故事曲折、文笔生动的济南传说，如卷二《玉格》记史论出猎小憩一寺而得仙桃的故事。而卷十二《语资》中所载魏明寺（即北魏大明寺，旧址在今五龙潭）中的“韩公碑”条，“历城房家园”条，则是两则文坛轶事，文笔清雅隽永。

《酉阳杂俎》中保存了有关济南的许多文献资料，对研究济南历史文化有较大价值，限于篇幅，只能摘要引述数条，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去阅读原著。

（李永祥）

黄庭坚的济南梦

北宋黄庭坚的一句“济南潇洒似江南”，不知勾起多少历下名士对济南风光的眷恋。然而，他自己却并未到过济南。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

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其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论诗宗杜甫,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开创“江西诗派”;其书法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北宋四大家”。又因与张耒、秦观、晁无咎同出苏轼门下,故世称之为“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于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调叶县尉。神宗熙宁初年(1068年),举西京教官,升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其舅父李常任齐州知州。两地相距不远,舅甥书信频繁。李常及子侄多次于书信诗中形容济南风光,这便牵动了黄庭坚的济南梦。

黄庭坚之兄大临赴济南探望舅父,在信与诗中对庭坚形容济南湖山胜景,黄庭坚羡慕不已,和韵作诗一首:

西来黄犬传佳句,知是陆机思陆云。
 历下楼台追把酒,舅家宾客厌论文。
 山椒欲雨好云气,湖面逆风生水纹。
 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

他以晋代陆机用黄耳犬传竹筒书给弟陆云的典故,来赞美哥哥大临与他的手足情。想像大临如何游历下亭台,观赏山顶云气,湖面涟漪,山亭争棋,俯视飞鸟,林木掩映,闻声而不见其人。

后来,李常的六侄秉彝到了济南,给黄庭坚寄来信与诗,极力形容济南风光及桥亭的美好。激发起黄庭坚的想像与向往,写下了一首《次韵寄李六弟济南郡城桥亭诗》,开头四句是:“客心如头垢,日欲撩千篔。闻人说江南,喜气吐晴霓。”意思是:听说济南像江南那样秀丽,我的喜悦如同雨后彩虹。畅游济南的欲望,就像头垢发痒必须篔一千遍那样难以抑制。接下去又写:“伏枕梦归路,子规吟翠微,济南似江南,旧见今不疑。洗心欲成游,王事相夺移,弩马恋栈豆,岂能辞繁縲。”诗意是:我梦回江南,看见杜鹃啼鸣于青山。但济南像江南的传闻使我深信不疑。一心想去游历,教务缠身,总是离不开。下边六句说自己本无封侯骨

相，处事不会见风转舵，只想得一叶渔舟遨游于浩渺烟波。接下去的八句，设想自己如能亲至济南，观赏胜景：“矫首历下亭，朱栏转清溪。春风吹桃李，三月自成蹊。翠叶张口幄，红英铺地衣。此中有佳兴，不醉定自非。”结尾八句写济南物产丰富，郡治清明，夜不闭户，政事完后可与民同游。当月照郡城，夜空如青琉璃那样动人，六弟骑着矮马畅游归来，那情形多么惬意，连吃饱新草的马也在高兴的嘶叫。

尽管想像得很有情趣，毕竟没去亲身畅游。黄庭坚怀着遗憾，希望于任满时绕道东看望舅父，以偿游历济南宿愿。

但是，黄庭坚任满时没能离开，北京留守文彦博十分赏识他的文才，挽留他续任国子监教授之职。

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投寄给徐州知州苏轼二首古风诗，表示仰慕。苏轼作书回答（《答黄鲁直书》）从此两位大诗人结下友谊。

就在这一年，黄庭坚写了《同世弼韵作寄伯氏在济南兼呈六舅祠部》一诗。世弼是他的妹婿王世弼。伯氏是他的哥哥大临。六舅祠部指李常。李常曾任礼部员外郎，祠部即礼部，故此称呼。诗曰：

山光扫黛水接蓝，闻说樽前惬笑谈。
伯氏清修如舅氏，济南潇洒似江南。
屡陪风月干吟笔，不解笙簧醉舞衫。
只恐使君乘传去，拾遗今日是前衔。

他于诗中想像，济南的山色青翠，如扫了黛黑，水色碧蓝如刚接出的蓝草汁。得知哥哥与舅家在吃酒时惬意地笑谈当地胜景，羡慕哥哥像六舅一样清修来的福分与机缘，能够生活在风光秀丽多姿像江南般的济南。屡次陪伴清风明月写诗写得笔尖发干，虽不解乐曲，也能乘着醉意畅舞一番。只是担心六舅乘坐驿站马车离任，使至今仍做教授的他无法去济南。

这首诗意境洒脱,诗句优美。“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意一直影响着后世前米历下的名士们。金代元好问的“羨杀济南山水好,几时正作卷中人”。“口口扁舟藕花里,有心常作济南人”。清代宋荦的“济南人说胜江南,菱叶荷花户牖参。无数山光收不起,月明染得水托蓝”。以及王莘的“七十二泉春涨暖,可怜只说似江南”。如果细细品味,岂不皆有黄诗的余韵?

“只恐使君乘传去”,想不到黄庭坚的担心竟成现实,李常任满离开济南。黄庭坚于元丰三年匆匆入京改官,被任为吉州太和县令。此后,他入京城参加校正《资治通鉴》,曾主持编写《神宗实录》。几年后,被章惇等人诬告“修录不实”,贬为涪州别驾。他性格中本有沉着、幽默与傲骨不屈的特点,又受佛家禅宗影响,虽受贬谪,仍能自我解脱,不作愁苦之相,自号“山谷道人”。

徽宗时,曾被召任知府的黄庭坚,因写的《承天院塔记》有“幸灾谤国”之词,遭受第二次贬谪,被除名,“羁管宜州”,等于流放。1104年夏,他到达宜州(广西宜山),因地方官不许借房给他这“罪人”住,他只好住进城头破败的戍楼。

崇宁四年(1105年)9月30日,61岁的黄庭坚重病于戍楼中,身边只有一个敬慕他的外地文学青年范寥。他就这样悄悄离世,再也没圆了畅游济南的梦想。

(王欣)

宋代刘家针铺的白兔商标与印刷广告

宋代济南经济空前繁荣。欧阳修说：“齐州赋税最多。”（《归田录》卷一）北宋熙宁年间曾任齐州知州的曾巩在《齐州杂诗序》中也提到：“今其地富饶，而介于河岱之间，故又多狱讼”。打官司的多，从侧面说明人们经济交往频繁，而频繁的经济交往亦说明济南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与集中。

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广告印刷铜版，就是当时济南发达的手工业、商业的珍贵遗存和有力证据。

该版长 18.4 厘米，宽 13.2 厘米，四周以双线为框，框内分上中下三部分内容。上层为阴刻楷书“济南刘家功夫针铺”8 字，“功夫”系精心制作之意；中层的中间是白兔持杵捣臼图案，该图案源自月中白兔为嫦娥捣药的古代神话传说，两侧各有 4 个楷书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这说明“白兔儿”并不是装饰性图案，而是商标；下层乃广告词，7 行楷书阳文，每行 4 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

这块铜版既有生产单位、商标，又有对产品原料、制造质量、使用效果的介绍，还有对销售方式、优惠条件的宣传，其内容与现代产品广告，可以说毫无二致。这块铜版还向我们透露两个信息：一是这家针铺具有相当规模，否则不会着意于批发和刻版印制大量招贴广告；二是类似的店铺周围为数不少，所以这家针铺

将白兔商标招牌高悬门前，便于顾客认记。

商业招牌在我国出现得很早。战国《韩非子》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帜”就是招徕顾客的酒旗，也称酒帘、酒幌。古代的商业广告招牌(包括布、木、竹、纸、金属等各种材料制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有4种：第一种是文字招牌，如当铺写“当”字；第二种是实物招牌，卖什么挂什么，大多是挂实物模型；第三种是图画招牌，卖什么画什么，如唐代长安一姓钟的刀铺老板，画了幅钢刀斩断铁索的图画贴在店铺门前；第四种是象征招牌，如寿衣铺门前挂只大黑靴模型，颜料铺挂儿根彩色木棍。像刘家针铺以商标作招牌的，实属鲜见，应列为第五种。

以招牌负载信息，传播地域总归狭小，而印刷广告便可大大突破空间的限制。南宋杭州泰和楼大街金箔铺的40字招贴广告印记，见于一张薄纸，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新疆吐鲁番文物管理所在柏孜克里石窟发掘出土。由此可见印刷广告传播之广。

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商标，比欧洲商行、商会的商标印记早了200年；其印刷广告亦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广告，比1473年英国宣传宗教书籍的印刷广告早400年左右。这充分说明当时济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也居于前列。

根据这块铜版，有一位台湾学者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商标，建立品牌形象的民族”。宋代的济南人以其先进的市场经济意识、高度的商业智慧和经营才干，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这份光荣。

(周长风)

大刀关胜和马跑泉

如今的趵突泉东北角，有座松柏掩映的假山。山后悬崖西北，那汪显眼的绿水便是马跑泉。

据县志府志记载，明清之际，马跑泉与关圣庙在一起，庙中有泉，民宅环庙，外有马跑泉街。不知何年起，这里建起座观音堂。庵堂西墙将此泉分开，一半在街上，供居民用水；一半在庵堂院内，而原来的关圣庙则被缩建在庵堂西门里边，只有两间北房。关圣庙中有泥塑赤面长须坐像。西有马佚立像，一手执大刀，一手牵马，东有座卧碑。过去人们都以为供奉的是关羽，把这里叫做关帝庙。1928年编的《历城乡土调查录·名泉》中也记载：“马跑泉在县城外马跑街关帝庙内”。

然而，细看庙中碑文，对照《历城县志》，可以证明这本来是纪念抗金将领关胜而建的庙宇。历经变乱，庙堂坍塌。后人重修时，将“关胜”误为“关圣”，便改建为关羽庙了。清历城人朱照在《关公祠》诗的序中曾指出这种讹误，并写明关胜是济南将官，不随刘豫降金，战死，乘马怒哮，刨地出泉。其诗一首曰：

祠宇空存神位更，泉源徒博马跑名；
何干汉寿关侯事，流水声中带不平。

关胜是守卫济南的勇将，屡败金兵。靖康之变后，金兵虽然侵入河北、河南，晋陕齐鲁还由宋军驻守。这种钳形态势对金兵很有威胁。1127年，赵构在宋南京归德当了第一个南宋皇帝，年

号建炎。第二年冬，金兵为扫除东面的威胁，兵临济南。知府刘豫惊恐不已。他儿子刘麟率军迎敌，在郊外被围困数重。通判张柬增兵救援。传说是关胜率部下杀人重围，救出刘麟。

济南城高河深，易守难攻。金兵派奸细进城诱降。刘豫动摇欲降，便对主战派将领、他儿子的救命恩人关胜下了毒手。

关胜之死在史书中记得很简短。《宋史·叛臣录》记载刘豫接受金人诱降，“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刘豫只好爬下城墙到金营递降书。据此记载，关胜是在城内遇害。但济南民间传说都把他的死形容得很壮烈。县志府志的记载，往往受这些传说影响。

一种传说是刘豫故意命令关胜出西门攻击金兵。关胜率部下久战，人困马乏，回军城下。刘豫不开西门，下令放箭。关胜猝不及防，身中数箭，一只眼也被箭射中，他悲愤怒吼，大骂刘豫，拔出眼中箭，将箭杆带出的眼珠一口吞下，舞刀向金兵冲杀，壮烈牺牲。战马见主人死去，悲嘶怒号，用蹄子奋力刨土，竟刨出一汪清泉。后人在泉边建起关爷庙纪念关胜，把那汪清泉叫做马刨（跑）泉。

另一种传说将关胜描绘得更加勇猛：刘豫率投降派出城降金，关胜率领爱国将士民众守城。刘豫来城下劝降，被关胜射中脸。刘豫指引金兵攻破外城。关胜将金兵赶出城，率军追杀，中了暗箭，战马跌倒，关胜牺牲于战场。那负伤的战马悲嘶不停，急得用蹄子猛刨地面，要唤醒主人，竟刨出一汪清泉，被后人叫做马刨（跑）泉。

还有一种传说只讲泉的来历：关胜率士兵出城痛击金军，被困于城郊，没有水喝。他的战马暴跳长嘶，用蹄子刨出一汪清泉。关胜的兵马喝了泉水，倍增神力，打了大胜仗。

此类传说表现了济南民众对关胜的敬仰与赞颂，也包括对他的战马的美化形容。在民间传说中，有时整个传说维系于一种

美好愿望，而忽略其他因素。后一种传说便忽略了地理因素。宋代西门外泉水众多，关胜的兵马不可能被干渴所困扰。带着这个疑问，有人就怀疑这不是关胜的马刨出的那个马跑泉。清光绪时重修的《山东通志》，说马跑泉在历城南郊渴马崖。清人范垌认为渴马崖有关胜墓，是关胜战死的地方，甚至在那里找到了据说是关胜用过的大刀刀环。但传说毕竟更多的是反映民众的美好想像与意愿，将传说与现实中的事物对号入座，往往很难解释得通。

事实上，无论趵突泉公园中的马跑泉，还是渴马崖的马跑泉，出现的年代要久远得多。在关胜之死以前，恐怕还有别的名称。但金元年间激剧的民族矛盾，促成对于民族英豪人物的强烈思念。于是大刀关胜的种种传说，便带着巨大的生命力形成于济南地区，那原来的泉名就被马跑(刨)泉取代了。两个马跑泉名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景况。

由于三国故事受讲史话本的影响，唐宋以来关姓武将多用大刀。关胜是否水泊梁山的大刀关胜？他是否被招安重为宋将？对此，还是不要陷入分辨史书与说部人物真伪的误区为好。千奇百怪的说部话本已经捉弄过许多有考据癖的史学家。《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虽对曹操一褒一贬，差异甚大，却并行于世，便是极好的明证。《水浒》人物受讲史类书《大宋宣和遗事》很大影响。《遗事》序集中首次出现天罡三十六将名单，排名十二的是“大刀关必胜”。《遗事》流传于宋末元初，距关胜之死约150年。又过了百余年，施耐庵著《忠义水浒传》，才将“大刀关必胜”改为“大刀关胜”。虽是一字之差，亦可看出这个说部人物形成的历史痕迹。关胜是在话本流传中被逐渐演化为梁山好汉的。施耐庵出于对这位抗金英雄的敬仰，有意将说部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名字合二为一。

如今的马跑泉，位于趵突泉公园东路诸泉的出园水闸旁。关

圣（胜）庙虽早已荡然无存，那日夜奔流的泉声，还可提醒世人思念这位历史传说中的济南英豪大刀关胜。

（王欣）

刘豫开掘小清河

刘豫是被写进《宋史》叛臣传的重要人物。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他在济南杀害大刀关胜，叛宋降金，充当金兵进攻江淮宋军的帮凶，可以说干尽了坏事。传说济南北郊有座蝎子坟，不断往外爬蝎子，那就是刘豫的坟墓。蝎为五毒之一，坟中出蝎，则是恶人恶坟。这则传说表达了济南民众对刘豫的憎恨。其实，他的坟是不可能是在济南的。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刘豫被金国废去“齐帝”称号，强制迁徙到数千里之外的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在那里被软禁到死（1143年）。即使迁葬，也只能迁到他的祖籍景州阜城（今河北）。

据《宋史》记载，刘豫字彦游，父祖辈“世业农”。他年轻时行为不端，常偷同学的财物。在元符年间（1098~1100年）他考中进士，到1112年（政和二年）才谋得殿中侍御史职位，便被人告发了过去的劣迹。宋徽宗当时很宽大，“诏无问”，没有追究。后来当刘豫再钻营求任礼部高官时，徽宗不但不批准，反把他降为“两浙查访”的外官。到宣和六年，即北宋灭亡的前两年，又将刘豫调任河北提刑。金兵南侵时，刘豫弃官南逃，潜居于真仪，投靠中书

侍郎张恣。由于张恣的努力推荐，南宋建炎二年春，宋高宗派刘豫出任济南知府。他怕“山东多盗”，政局不稳，要求改任江淮职务，遭到拒绝，他只好带着怨恨到济南上任。这年冬天，他杀了关胜，叛宋降金。

刘豫降金，没有立即当上儿皇帝。在此之前，金人曾封宋降官张邦昌为“楚帝”。不久，张邦昌又叛金归宋，使金人计划落空。所以，金人要先对刘豫考察一番，先封他为东平知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封他儿子为济南知府。刘豫父子组织军队，充当金兵进攻南宋的帮凶，非常卖力，金人很满意。在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封刘豫为“齐帝”，封刘麟为“齐太子”。刘豫在宋的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正式称帝，两年后迁都汴京（开封）。但他这个儿皇帝当得很不容易，国政方面事无巨细皆须申报金兵元帅府裁决，财政方面拮据得难以支撑。由于金人纵兵劫掠，民间财物搜括殆尽。要向金国进贡，要供养对宋作战的“齐军”，还要维持小朝廷官员和后宫的耗费，刘豫必须与富庶的浙江沿海做生意来支撑财政。但江淮一带是宋金鏖战之地，难以安全运输，于是山东的海运便成为秘密贸易的重要通道。正是这种背景 and 需要，促使刘豫下令开凿小清河，扩大商贸通道。

根据小清河航运局的河志资料，可知刘豫开河并非平地开出新河，而是疏浚利用了古济水南水系的一条旧河道。《水经注》记载，此残河源头在王莽称帝时干涸。自汶河以下的河道也有变化。唐代中叶以后断流，雨季仍能分段行船。其北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即古济水。古济水像黄河一样不安分，时时泛滥，侵占别的河道。大、小清河相距最近，都做过古济水的河道，是不是为奇的。

这次开河，大部分工程是疏浚挖深河道，但在济南挖掘了一段新河，截断泺、历二水，使济南诸泉的水不再经鹊山湖、泺口入大清河，而是直接导入小清河。利用济南充沛的泉水保证河运水

位，货船由莱州湾羊角沟河口上驶济南，可停泊于西门码头。

小清河的通航，给刘豫带来很大经济好处。与南宋的秘密商贸往来，渐渐引起金国统治者对刘豫的猜疑。据说，后来刘豫被废，抄没财物，是由于南宋施用离间计，制造了刘豫秘密商谈“叛金归宋”的假相，从而加深金国的猜疑，使这位千古罪人得到“流（放）死临潢”的下场。

由于小清河的挖掘使济南城北的自然风光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此之前，济南诸泉汇成泲、历二水，流往城北，汇成一个美丽壮阔的湖泊，其中心约在今北园镇一带。经此湖乘船可去华山、标山、鹊山。湖水与泲（洛）口相通，流入大清河。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莲子湖”篇中写道：“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罟（gǔzèng 鱼网）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南燕晏谔的《三齐记》称此湖为鹊山湖。李白在《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一诗中写：“湖阔数十里，波光摇碧山。”此湖在北宋大旱时一度干涸。但正常年景济南诸泉仍可维持这里的湖光水色。据《历城县志》记载，自济南泉水被导入小清河，鹊山湖便渐渐“莽然田壤，不复烟波”。从此，“潇洒似江南”的济南便减少了一处胜景。

小清河通航后，又有几次断航和疏浚。明末清初曾长期淤塞，清中叶作过较大疏浚，遂通航至今，成为山东境内与黄河、运河齐名的河运干线之一。

（王欣）

顾炎武与济南“文字狱”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在学术上也是开一代风气的巨擘。清康熙七年（1668年）他客寓北京慈仁寺，忽然莫名其妙地被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起文字狱所牵连，无故蒙冤，身陷囹圄达半年之久。

康熙四年（1665年），有姜元衡者，乃山东即墨人，进士出身，当了翰林。其祖父原是明末兵部黄宗昌尚书家的奴仆。这年他省亲回籍兴讼告发故主黄家的后人黄培、黄坦等14人曾作“逆诗”。官司打了三年终没结案。

康熙七年正月三十日，山东抚院继续审讯此案，姜元衡又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新罪证：“黄家还藏有‘逆书’——《忠节录》”。一口咬定此书是顾炎武在黄培家精心搜辑刊刻的。书中多是“悖逆”之词，并记有黄尚书“家居二年握发以终”，表明他至死不曾剃发归顺，犯大逆罪。姜在上抚院禀文中奴颜十足地写道：“此书削我庙号，仍存明号。且感愤乎鸱张；虎豹乎王侯……职系史臣，宜明日张胆秉笔诛逆，逆刻种种，罪在不赦。”抚台见状大惊，赶忙咨文捉拿顾炎武归案。

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铁骑横扫江南，七月破昆山，他两个弟弟被杀，生母被砍断手臂而亡，嗣母王贞孝绝食抗争，弥留时遗训：“勿为异国臣子”。顾炎武因此不仕清朝，并参加了抗清斗争。明亡时他31岁，此后近40年的

漫长岁月，他一直不忘国恨家仇及抗清复明的大业。45岁时渡江北上漫游，至济南小住章丘长白山下，讲学、著书、结社，意图联络声气，作归复明室的打算，为士林所敬重。

康熙七年他正在北京，忽闻济南一案牵连到自己，遂于二月二十五日在森森春寒中匆匆离京，三月四日赶到济南，投案入狱。

在狱中他详阅了这本《忠节录》，发现这是将沈天甫的诗集改头换面后的一本伪造书。原来，奸人沈天甫与吕中、夏麟奇、叶大4人撰伪诗2卷，罗列的作者多是故明的遗老旧臣，达176人。沈天甫利用文字狱的恐怖，混水摸鱼，到处向这些人敲诈勒索。东窗事发，4人于康熙六年处斩。顾炎武万万没料到姜元衡竟仿效起他们的鬼域伎俩。

公堂对簿，顾炎武条分缕析，指出这本伪书不伦不类，纯是沈天甫炮制，姜元衡加工而成。他沉着镇静，据理反驳。至于黄尚书“握发以终”一事，经抚院取质对证，也全是捏造。抚院要姜元衡再提供实证，这时，他面色如土，张皇失措，冷汗涔涔，无言以对。于是，案情急转直下，姜反而成了诬告。当追问他为何要栽陷害不相识的顾炎武时，他供称是受章丘地主谢长吉唆使而诬告的，只因顾炎武与谢长吉有一桩债务纠纷，故欲以“逆书”置顾于死地。至此似真相大白。可是顾炎武并没有被姜元衡花言巧语的供词所迷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姜对他诬陷的真正卑鄙目的：姜家是奴仆出身，尽管姜元衡已成翰林，侧身“清华”，但不足掩其家世微贱，这是他的一块“心病”。如推翻“主仆名分”，就非将“黄氏之十二君一网而尽杀之”不可，且又奴告主之罪，律在不赦，遂丧心病狂索性阴谋构成一起文字大狱。因顾炎武名气大又住过济南，便将相识的与不相识的300余人诬陷进去，冀以使黄家灭族，脱去奴仆身份。

案情澄清后，顾炎武本应释放出狱，但是刑部偏偏还要宣称

“穷追究竟”，说穿了无非是压压顾炎武的抗清意识。在狱中他备受磨难，“债主断绝，日用艰难，庄田之麦俱为刘棍割去”，以致每天只靠数文钱的烧饼度日，饱尝了铁窗风味。

顾炎武入狱，在当时学者名士中引起震动，后来由朝中的外甥及朋友朱彝尊、李因笃等人奔走疏通，迟至九月二十日才保释出狱。

经此忠难，他感到文人中败类的险恶狠毒，“斯人且鱼烂，士类同禽骇”。他在《赴东六首》中更坚定地表示：“稟性特刚方，临难讵可改”，“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他是决不会因无中生有的迫害而改变忠于故国初衷。

（张稚庐）

王渔洋大明湖畔赋秋柳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济南大明湖还是一片烟水葱茏，但水面亭旁那十余株垂柳，已经叶显微黄、乍染秋色了。古色古香的水面亭中，酒肴飘香的方桌旁坐着8位名士。首座是新城的青年进士王士禛。那7位是东武的邱石常、清源的柳 熹、益都的孙宝桐，任城的杨通久及其兄弟通睿、通俊、通傲。

王士禛，字子真，别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家是济南府新城（今淄博桓台）的望族，祖父做过河南按察使。他自幼聪慧过人，尤喜赋诗，12岁写出《题明湖诗》，15岁刻印了诗文集《落

笺堂初稿》。做秀才、举人时便已诗名在外。两年前，他在北京考中第五十六名进士。

如今，这位青年新贵诗兴大发，特邀诸位文友会饮水而亭，结社赋诗，正斟酌诗社名称。

座上的名士们面对“水亭”“山影”“明湖”……等等社名，不知挑选哪个才好。惟独王士禛没有说话，默默望着亭外那十几株垂柳。

东武的邱石常说：“子真有何高见，请讲。”

王士禛说：“秋柳一名最能发人诗思，看那些柳枝，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岂不令人有感。”

众人随他所指，细看那柳条柳叶形态，都说秋柳为社名甚好，推举王士禛为社首，即席赋诗，然后众人咏和。

其实王士禛早已胸有成竹，以《秋柳》为题撰好腹稿。他对众人稍作谦让，便到诗桌旁坐就，执笔挥毫疾书，写下第一首《秋柳》诗：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鹂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名士们吟哦着这些诗句，品味其独特的诗思与韵味，不禁为其倾倒。好啊，写得多么超脱、巧妙。西风，白门柳，春燕春柳与秋柳烟痕对照。远行前折柳赠别带出黄鹂曲的典故，由乌夜啼让人想到柳下藏鸦，加深了哀怨气氛，最后点出面对秋柳莫听秋风怨笛，长久别离、迟暮衰老的哀愁多么难以述说。

正当大家品味诗句，纷纷低声赞叹之际，王士禛挥笔潇洒，又写出第二首《秋柳》：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指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众人接过诗看罢，水面亭中一片啧啧赞叹之声，佩服诗有神思，更佩服写了三首《秋柳》，不曾出现一个“柳”字。诗意深广不俗，虽用典故而不雕凿，境界优美：凉露欲霜，柳丝拂着玉洁的湖面。如镜的青荷旁，秋柳像待嫁女儿，像板渚的隋堤水那样可怜，空等着爱抚者前来。就像经过洛阳要关心探问永丰坊的白家小蛮那样，应当安慰秋柳。

大家在赞叹、低声品诗之时，王士禛又将第三、第四首《秋柳》诗写罢。第三首是：

东风作絮糝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此诗比前两首写柳更加拟人化。诗思更加深远空灵奇丽。柳曾因春风吹絮而增色，因秋景萧条叹息往日逝去。在汉代扶荔宫、梁代灵和殿受过赞赏的柳树，面对秋天的冷落萧条，听见雁鸣南飞都带哀愁，好语祈求西乌不要飞去。只有写《梁园赋》的枚乘知道柳树过去多么风流可爱。如今回忆梁园美好时光，方知违背了平素的心愿。

第四首是：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

诗意仍继续前边对柳的拟人化比喻：秋风中棵棵柳株如同姐妹根叶相怜，眺望原野像要化作云烟。即使在秋色中依然娇柔多姿，所以柳树能够招致少妇产生悔叫夫婿从军的春怨。曹丕曾

写《柳赋》感物伤情，汉宣帝刘询回忆童年旧事也与柳树相关。不知柳树你还记得长安东门外的珠络鼓歌儿吗？夕阳下你与松柏相映，牵动着人们灞陵柳色伤别的离情。

四诗写罢，座中诸人拍案叫绝，都说末首诗收得好，仍是句句暗写柳意，不见柳字。写柳与两位皇帝的牵连，用“记否”两句反问而结束，真是大家手笔。

接着，诸位名士虽自叹不如，也各自咏哦起来，为暗写柳意不见柳字苦苦搜寻着诗句。

王士禛是清初的著名文学家，一生著述甚多，有诗、文、词 270 余卷。主要成就是诗。他的诗风流洁净，意境优美。其中的写景诗造诣尤深，缥缈淡远，含蓄空灵。他首创诗论“神韵”说，主张诗要“得其神，忘其形，留其韵，而遗其迹”。改变清初诗坛一味仿古的倾向，对当时和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写《秋柳》四首时，王士禛才 24 岁，“神韵”说尚未完全形成体系，但此诗完全体现了“神韵”说特征，意味含蓄，境界优美，韵节一唱三叹，句句写柳，通篇不见柳字，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功力。

《秋柳》诗是王士禛的成名诗作，影响很大。当时应和者数十人。顾炎武自京返济也写了《赋得秋柳》以示唱和。三年后，王士禛到扬州做推官，吃惊地发现，他的《秋柳》四首早已在大江南北流传开了。

王士禛是他生前的名字。在他死后 12 年，胤禛当了皇帝，为避帝讳，给他改名王士正。又过了许多年，乾隆皇帝又给他赐名为王士禛。

渔洋是他的别号。他做扬州推官时，很感慨那里的渔洋山风貌，自号“渔洋山人”。由于清廷将他的名字改了又改，王渔洋的别号得以无碍流行于世，反倒比他的本名更要家喻户晓。

（王欣）

丁宝楨智斬小安子

慈禧太后終生最寵信的太監有兩個，一個是人們呼之為“小安子”的安德海，另一個是繼安德海之後的“小李子”李蓮英。小安子“英年早逝”，二十幾歲便被斬首；李蓮英却得其善終，一直活到清朝的滅亡。這裏專門來談談小安子在濟南被殺的事。

小安子是河北省南皮縣人，因為家里貧窮，所以幼時便被他的父親割去了生殖器官，托人送到清宮當了太監，所謂“自宮為宦”。小安子生來聰穎乖巧，口齒伶俐，善察人意，所以入宮後深為帝后喜愛。

1861年咸豐皇帝病死熱河（今河北省承德）行宮，懿貴妃（即後來的慈禧太后）的6歲兒子載淳繼父位當了皇帝，肅順等八大臣攝政輔佐幼君，定年號為“祺祥”。被尊為皇太后的懿貴妃不甘落寞，遂伙同咸豐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及咸豐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發動政變，誅滅了八大臣，改原定年號祺祥為“同治”，慈安、慈禧兩太后垂簾聽政，此即所謂“祺祥政變”。在這次政變中安德海串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他雖然只有18歲，可是他却屢出奇策，參贊密謀，幾次風塵仆仆於熱河、北京道中，為兩太后及恭親王奕訢牽線搭橋，秘密傳書，為這次政變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此他更得到慈禧太后的寵信，不久，便被提拔為太監總管。不過，也有人说，小安子之所以為慈禧所寵愛，是因為幼時“自宮未淨”，是個假太監，慈禧從26歲就青春守寡，小安子便扮

演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般的角色，说是他们还生了个儿子，被慈禧暗送给醇亲王奕訢抚养，即后来当了皇帝的光绪。然而这是传说而非正史，不足为信，这里只是聊备一说罢了。

小安子既然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慈安太后生性懦弱，皇帝幼小，所以安德海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他骄横不法，弄权纳贿，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因此人人切齿，连小皇帝也嫌他常在慈禧面前拨弄是非而对他不满意。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小皇帝载淳已14岁，年逾成童，按清皇室规定，该为他纳后预备大婚了。小安子久居深宫，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亲往江南为皇帝督制新婚所用之龙衣，他觉得此行一则可以取宠太后，二则可以纳贿发财，三则可以游山玩水。主意已定，于是他向慈禧太后自荐南下苏杭。可是按清皇室祖制，太监不准出京，因此慈禧初时未准。无奈小安子巧舌如簧，软哄硬激，后来竟将慈禧说得心动，准他秘密出京。临行时慈禧谆谆告诫他说：“沿途勿肆张扬，速去速回，万勿被人察觉，到那时谁也救不了你！”小安子唯唯听命。

1869年7月（同治八年六月），小安子带了男女人等，束装就道。一离京师，小安子便将慈禧的话置诸脑后，他自恃是西太后的红人，皇帝还让他三分，谁能将他奈何。于是他命人弄了大船二只，船头堂而皇之高悬“奉旨钦差”“采办龙衣”大旗二面，威风凛凛，浩浩荡荡，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真是一路笙歌盈耳，筵开珍馐，地方官争相献纳，小安子宦囊充盈，加之沿途水光山色，风景如画，小安子高踞船头，好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不一日小安子一行到了山东地面，早惊动了德州知州赵新，他对小安子此行甚为纳闷：安德海既是“奉旨钦差”，为何事先没接到军机处公文？看来有诈。然而自己官卑职微，不敢冒犯盘诘，于是他轻装简从，快马加鞭直奔济南府，密报山东巡抚。

这时任山东巡抚的是贵州人丁宝楨，此人幼读诗书，进士出

身，生性刚直，不徇私情，对安德海恃宠横行不法，早已恨得牙痒。这次忽得赵知州密报，小安子违制出京，心中暗暗欢喜：庆幸诛灭权阉的良机到来。可是他也深知小安子是慈禧太后的宠监，如将此事禀报慈禧，诛死权阉的目的必不能达到。他想，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不睦，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对慈禧的专权跋扈也深为不满，如按正式公文渠道密报军机大臣，奕訢必将暗报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他们对慈禧太后所宠信的人自然不会加以庇护。主意已定，于是他立具奏折密报军机大臣。奕訢接得丁宝楨密折，心领神会，即径去宫中晋见慈禧太后，小皇帝恰也在座。慈禧太后看了奏折，沉吟半晌方道：“这小安子违制出京，本该正法，无奈他是西太后喜欢的人，却得与她商议方妥。”奕訢道：“西太后也不便违背祖制，还是请太后速即裁夺。”这时小皇帝也在一旁撺掇，请东太后速行裁决。慈禧太后见他二人都这样主张，才说：“既是如此，可即拟旨颁发山东。”奕訢听了连忙拟定御旨，令山东巡抚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再说丁宝楨具折密报军机后，即命人暗访安德海行踪。待接得将安德海就地正法的御旨时，小安子一行已经行抵泰安府地面。丁宝楨即派下员速将安德海缉拿归案，押送济南。小安子被解到济南后，丁宝楨即升堂开审，命将安德海带上。这小安子自恃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哪里将丁宝楨放在眼里，还挺胸仰面盛气凌人地对丁宝楨自称“安老爷”。丁宝楨也不屑理他，却大声宣读御旨，当安德海听到“就地正法”四字时才慌了手脚，大嚷道：“我是奉了西太后懿旨出京督办龙衣的，丁抚台，还求你老人家复奏一本，我安德海死而无怨！”说来也巧，这时忽有人向丁宝楨禀报，说西太后密旨到，命将安德海送京讯办。原来在缉捕安德海时，走掉小安子亲随一名，此人急急如漏网之鱼，直奔京师，禀报慈禧太后。慈禧闻报大惊，即命人速去山东将德海送京讯问。丁宝楨闻报，沉吟片刻，忽然大声宣告：“前门接旨，后门正法！”可

叹这小安子被斩首时年仅 26 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却没想到：半生雌威凌霄汉，未料一命染黄沙！

丁宝楨杀了安德海后，命令暴尸三天，任人观看。因慈禧与小安子之间的秽闻早已传遍天下，好事者多欲趁观暴尸之机以观究竟，看小安子是不是真的是个“假太监”。结果发现小安子裸尸确无男具。于是群疑顿释。有人就此评论说，这便是丁宝楨的“智”处，因为他为慈禧“秽乱春宫”之事“平了反”。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说，真正的男子死了，生殖器官也会缩得无形的，何况这小安子是个“自宫未净”的人呢？不管怎么说，丁宝楨确实因为杀了小安子而名震华夏了。

（崔力明）

袁世凯与济南自开商埠

举世周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曾妄图改中华民国五年（1916 年）为“洪宪元年”，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其罪状早已载入史册，为万世唾弃。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袁世凯还曾为济南办过一件“自开商埠”的好事。

埠，本义是指有码头的城镇。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繁荣的对外通商之地也称为商埠，即含有集中的大市场之意。

自鸦片战争后，在英帝国主义胁迫下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以来，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要与中国“约开商埠”。

这一严酷的现实,提醒了清政府,不得不注意“商埠”对国家的重要性。与其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商埠,把财税拱手让洋人赚去,何不主动地自开商埠,自己来掌握自己的经济权益?

在清末统治集团中,曾有一部分人,为了缓和危机,主张推行“新政”,搞一些改良措施。在“自开商埠”以繁荣经济的问题上,已呈现一致认同的趋势。曾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热心。

1898年清廷与德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德国把持操纵下,于1899年开工修建胶济铁路,1904年正式通车,济南成为全线的终点站。外国人经营的各种商品,从此大量涌入,对古老的封建经济封闭式的济南,形成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冲击。有鉴于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联名奏请自开济南商埠,并同时开设周村、潍县两处分埠。他们拟定的《济南自开商埠章程》主要内容有:(一)准有约各国在商埠设立领事;准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商埠定界以外,洋商不得租赁房屋、开设行栈;(二)济东泰武临道,就近监督商埠事宜。省城济南设立商埠总局,派一熟谙交涉大臣任局总办,亦可约派洋员帮同办理;(三)商埠开办经费,如购买地亩、举办工程及常年经费,由省署筹拨专款,随时动支;(四)由官方设立邮政、电报、电话,并严厉限制,不得由外人开设;(五)济南商埠捐税,照各埠通例,依次征收(见《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

当时,就全国来说,已有自开商埠的先例,如直隶(今河北省)的秦皇岛,福建的三都澳,湖南的岳州。这类商埠的行政管理及税务权,都掌握在清政权手中。清廷认为“为主国者得以设机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裨”。对商约大臣吕海寰“广辟商场”的奏章,批示:“应由各省督抚详细查勘,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口岸之处,随时奏明办理”。由此看出,清朝廷对

自开商埠，一直采取许可的政策。因此袁世凯、周馥的奏章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当时规划确定的济南商埠，设在西关外。其范围是：胶济铁路以南地区，东起西关外的十王殿（今小纬北路），西至大槐树（今槐荫区的北大槐树街），南沿去长清的大道（今经七路），北以铁路为限。东西长3公里，南北长1公里。此后，其范围又逐渐扩大。在商埠区，设有：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货场），西人住家处（外侨居住区），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驻军）等，完全是近代城市的格局。

经过一年多的积极筹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十二日，济南正式开设所谓“华洋公共通商之埠”，举行了隆重的开埠典礼。

开设商埠，标志着济南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化城市转变的开始，使济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从此，济南成为华北主要商业中心之一：

第一，开埠后，济南的城市人口骤增。开埠前仅有14万人，开埠后，几年间即达25万人。

第二，开埠后，促进了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官办的“工艺局”，原先只有铜铁、毛毯、花边、织布、机器、洋车等6个厂，大多还是手工生产。后将“工艺局”改为“工艺传习所”，又增设了电镀、染色、矿金、手巾、洋烛等厂，并逐渐采用机器生产，聘请了中外技师，改进工艺，以提高生产水平。

开埠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出现，几年内迅速发展到了16家。如：庄钰、刘福航，投资银70万两，创办了济南电灯公司，供应了全城及商埠的照明用电。丁道津投资银26万两，官商合办了涿源造纸厂，并附设印刷厂，垄断了官纸印刷。唐荣诰投资银10万两，开办了小清河轮船公司；张采丞投资银15万两，兴办了兴顺福机器油房。另外，还有山东树艺公司（资银30万两）、

东兴货栈有限公司(资银30万两)、大经丝厂有限公司(资银20万两)等。

第三,开埠后,促进了农产品的经销。外商对其所需工业原料和手工业品的大量购买,刺激了农产品的大宗经销,尤其是大量采购棉花,使济南成为华北棉花贸易的最大市场。使原来很少种棉的济南地区,出现大面积商品棉田,棉农人数急剧增多。小麦、花生、大豆均大量出口。洋商对肉牛大量需求,大批牛栈纷纷设立,仅商埠内即达45家。同时,羊毛、猪鬃、杂骨、杂皮也大宗出口。肉食鸡的养殖、草编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

第四,开埠后,促进了济南商业的大发展。原先的城内商业区(自芙蓉街至西门、西关,主要经营国药、杂货、绸布、鞋帽等业),与新开的商埠连成一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如章丘旧军孟家所经营的“祥”字号的买卖,开埠前虽有锅店、布店、茶庄、金店、钱庄、当铺等,已积累相当数量的资金,而开埠后,由于多种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较短时期内,成为资本最雄的孟氏商业财团。其中属孟家“矜恕堂”经营的有,瑞蚨祥布店,泉祥茶庄;属其远支“进德堂”经营的有隆祥、谦祥、鸿祥布店,属其近支“三恕堂”“其恕堂”“隆恕堂”经营的有庆祥、瑞生祥、瑞增祥等店。尤其是“矜恕堂”一支,在资东孟洛川经营下,不仅在济南广设商店,还相继在京、津、烟台、青岛开设分号,总资本达银300万两,从业人员近千人,年纳铺捐达银1万两,成为山东首富。

第五,开埠后,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市容发生很大变化。原来濒临黄河、水陆码头的商业集镇洛口,由于开设商埠与铁路通车,而逐渐冷落衰退,其商店大多迁至商埠。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场的繁荣兴旺,使原有的东门、南门、西门三个城门行人拥挤,交通不便。尤其是面向商埠的西关一带,素来商业集中,行人拥挤不堪。为此,经巡抚部院批准,在整修外城(圩子,俗称“围子门”)的同时,新辟西北门(迎仙桥)、东南门(南围子门)、东北门(小北

门,菜市街入西南门(坤顺门),使全城四通八达,市容大大改观。

第六,开埠后,外国商业资本大量涌入,洋货充斥市场。商埠一带,洋行林立,主要有:德国的“礼和”、“哈利”、“瑞记”、“善全”、“捷成”、“顺和”等洋行;英国的亚细亚煤油公司;日本的日华公司、日华分公司、东南公司书药局、东亚分公司分局、三好堂、华和公司、中华公司等。这些外商,经销石油、煤油、烟草、棉布、砂糖、火柴、纸、麻袋、木材、日用品等。同时,这些洋行大量采购工业原料、农产品、手工业品,包括小麦、棉花、花生、花生油、大豆、豆油、生牛、牛皮、牛骨、猪毛、羊毛、麻、大麻子油、草编、水果、丝、染料等。受此影响,一些华商也相应地开办了许多小型洋货铺、西药房,以推销洋货。当然,这也对民族工商业起了排斥冲击作用。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济南开设商埠对山东乃至北方各省的近代经济发展无疑是起了巨大推进作用的。

(徐志刚)

辛亥革命在济南

1911年(辛亥)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湖南、湖北、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宣告脱离清王朝独立。山东省城济南的各派政治力量也围绕独立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同盟会为促成山东独立，积极聚集力量，他们以设在济南的山东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高等学堂等为基地，在学界、商界、立宪派、旧官吏和新军官兵中开展活动，准备联合各派举事。其骨干有徐镜心、刘冠三、蒋衍升、丁惟汾等50余人。

立宪派不主张革命，但他们在山东咨议局中受到旧官僚和劣绅的压制和排挤。同时，对清廷顽固派的蛮横专制也极为不满。武昌起义后，山东立宪派骨干分子也分别从日本、北京回到济南，他们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上绅、学界、商界、官场中加紧鼓吹“中国不可一日无君主”的谬论，妄图遏制山东的独立。

其时，坐镇济南的山东巡抚孙宝琦，是一著名的洋务派，号称“政治开明”“通权达变”。他对清廷的腐败深为不满，但又决不赞成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以其灵活的政治手腕既操纵着顽固派，又笼络着立宪派，还欺骗着革命派，乃一典型之“滑吏”。

武昌起义后，孙宝琦想出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对革命派“怀柔”，虚与委蛇；另一方面暗中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准备伺机镇压。

当时，济南政局的微妙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都需要一位能够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最合适的人选大家公认为夏溥斋，此人在知识界也小有名气，其时夏正在北京吏部候差，各界遂连发两通电报，敦促他火速来济。

11月2日，夏溥斋到济。下车伊始即开始了他穿梭般的往来于各派之间的政治活动，俨然成了一个领导山东独立、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角色。

当初，济南各界突然盛传清廷准备以山东土地做抵押，向德国借巨款，这一消息立即激起社会各界的义愤。同盟会中有人主张利用有利形势立即组织暴动，但其主要领导人对孙宝琦还抱有幻想，且虑暴动或将导致群众“乱萌”，犹豫不决。这样，夏溥斋、丁世峰等人的作用更加重要了。

11月5日,济南各界人士在咨议局召开座谈会,会上,革命派提出了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等人拟定的《山东独立大纲》(草案)七则,坚决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夺取政权。但遭到立宪派和旧官僚们的反对,提出不少修正意见,两派唇枪舌剑,不相上下,终于敷衍散会。会后,夏溥斋、丁世峰将大纲改定为“劝告政府”八条,它阉割了革命派所提出坚决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精神,代之以温和的妥协性条件。即使这样,还是丁世峰与孙宝琦反复论辩,夏溥斋从中斡旋,孙才勉强答应“上奏”清廷的。

翌日,各界继续在省咨议局开会,孙宝琦应邀出席。会上推举孙担任山东独立交涉长,他断然拒绝,扬言“我系清国官吏,清政权一日不倒,我即为之尽一日责任”,此语已将其政治面目暴露无遗。多数人认为,咨议局完全听命于孙宝琦,腐败无能。是日,各界散发传单,齐集大布政司街的山西会馆,酝酿推翻咨议局。

11月7日,各界再次在咨议局开会,争相发言,历数咨议局斑斑劣迹,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取消了被顽固派把持的山东咨议局,宣布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推举夏溥斋为会长,丁世峰为秘书长。联合会成了全省立法、监督和行政的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山东独立运动。

“山东各界联合会”,是革命派、立宪派、顽固派中的投机分子组成的一个涣散的政治联盟。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同盟会会员庄陔兰、王诤也为联合会的领导,但其实权却被立宪派所掌握,暗中仍有孙宝琦插手,这对山东的独立形成了极大的阻力。

11月上旬,上海、贵州、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相继宣布独立。济南各界代表及同盟会山东负责人丁惟汾、王诤等与孙宝琦多次交涉独立事宜,均被孙拒绝。

11月13日,联合会召开大会,议决独立问题,孙宝琦应邀参

加。同盟会、新军五镇军人代表和青年学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慷慨陈义，呼吁立即宣布山东独立。顽固的孙宝琦执意不允。这时，同盟会方面派人守住会场各门口，不准任何人出入；新军第五镇参谋黄治坤猛然站起，拔出手枪，厉声喝道：“孙某不赞成独立，即以短铳相加！”全场高声附会。孙见状，吓得脸色煞白，支支吾吾，夏溥斋趁机登台，朗声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孙宝琦只得见风转舵，摘下顶戴花翎，承认既成事实。随后，宣读并张贴了《山东独立宣言》。

11月24日，以吴鼎元为首的五镇上层军官架起大炮以武力胁迫取消独立，此举正中孙宝琦下怀，12天的山东独立遂告失败。

此次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却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鼓舞了人民为争取民主共和的斗志。

（崔宏国）

“五四”运动在济南

1919年初，历时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协约国于1月18日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曾对德宣战，遂也以战胜国资格参加和会。中国专使在会上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等合理提案，却遭到悍然否决，反而规定将德国在山东

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人“如雷电劈脑，痛不欲生，奔走呼号”，怒不可遏，终于，首先在北京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山东问题关系国之存亡，山东人民尤感有虎去狼来之痛。早在当年4月，山东各界就公推二名代表赴巴黎，向和会及中国专使恳陈山东民意。4月5日，山东省教育会、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致电中国专使，严正指出：“此事关系中国存亡，务望力主取消，勿使千载一时之机，败坏一二宵人之手”。同时致电美、英、法、意专使，要求他们主持正义，维护公理。4月20日，济南各界10万余人在演武厅举行国民请愿大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惩办祸首；再次致电中国专使：“勿惑奸计，据理力争，必达目的”。种种举措，强烈反映了山东人民的企盼。不幸的是，4月29日，在和会上，中国外交彻底失败，一场革命风暴来临了。

学生是运动的先锋。5月4日以前，济南各校就组织一大批学生去北京奔走呼吁，随之参加了北京的“五四”示威游行。济南的学生为唤起民众，声援北京，纷纷走上街头，在商埠、城里演讲。5月7日，学生们参加了济南62团体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省立一师学生张兴三演讲时，慷慨激昂，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良心救国”4个大字。35000名与会者“无不陨涕，皆指天誓日，固结团体，决定此番举动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全省人民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当晚，济南中等以上21所学校学生代表70余人在富官街（现名府馆街）开会，议决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办曹、陆、章诸贼，并恳于两日答复，否则一律罢课。5月9日，省立女师决定以“五月七日，我国之耻，誓死必雪，勿懈厥志”16个字为朝会时师生诵词，各校闻知，相继效仿。其时，齐鲁大学学生发表了掷地有声的《为力争青岛敬告全国各界书》，内云：“各地各界，同心同德，思来日之大难，惧山河之不复，际千钧而一发，合众志以成城，出以决心，持以毅力，使巴黎和会能解决吾青岛也”。随

之日人所办《济南日报》发表其经理田中的文章，诬蔑谩骂齐大师生，师生限其五日内停刊。别具脏脏的督军张树元却偏袒日方，令济南道尹唐柯三前往齐大，请校长严禁学生集会演说。遂被学生包围，愤怒斥责，说：“你的卖国资格尚浅，不配为某某之续，殴之适足沾手，且放你的狗命。”唐即狼狈抱头鼠窜而去。

5月10日，21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不顾督军、省长的禁令，冲破军警拦阻，汇集省议会，要求致电北京政府：速电巴黎专使，据理力争，勿轻签字等三项提议。会后成立了“济南学生外交后援会”和“济南学生联合会”。5月23日学联宣布全市总罢课。

济南的工人阶级自运动伊始，即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斗志。5月2日，3000多名搬运工人及其他人士在北岗子举行了演说大会。工人领袖李凤林、工人赵强东慷慨陈词：我们生于此，食于此，居于此，“即为该地之主人翁”。“有此土即有此人，有此人即有此权是也。如有丝毫毁坏，寸土损失，皆是吾辈之奇耻”。5月8日，劳动界千余人又再次集会，提出“以死力争”的口号。5月22日劳动界与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南门大校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控诉了劳动人民饱受日人欺凌的苦况。发起“劳动五人团”、“救国十人团”组织。6月14日在普利门外青年会召开了济南工人千人大会，议决凡为日人做工者，立即罢工，不买日本货，誓与日本斗争到底。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6月9日，大部分商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万人大会，为支持学生运动，宣布自10日起罢市。翌日，商店无一开门营业，市廛冷清，迄至15日，罢市斗争迫使省当局答应了学生提出的七项要求。

爱国热情汹涌澎湃，为取得最终胜利，6月19日晨，各界组成的第一批赴京请愿团一行85人登车北上，万余群众前往送行。20日上午抵京，列队前往总统府，冥顽的徐世昌竟拒而不见，全体代表冒倾盆大雨，齐跪新华门前，直至深夜。不得已徐世昌迟至

23 日上午才在怀仁堂接见,终“含混搪塞”,“毫无诚意”。28 日山东各界第二批请愿团到京,壮大了力量。

同时,山东各界在济召开万人国民大会,议决“再组成第三批请愿团,以待后命,如再无圆满效果,山东省人民誓心悉数赴京,尽死阙下而后已”。表现了我省人民舍生取义的坚强斗志。30 日晚,传来中国专使拒绝在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第三批由济南女学生 160 人及各界人士组成的请愿团才未成行。

7 月后,英勇的济南人民更深入地展开了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妄图牺牲山东主权的斗争。经过 5 月、6 月两个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北京政府与山东当局恐慌不安,露出凶相。7 月 25 日北京政府宣布济南戒严;8 月 5 日,亲日卖国的戒严司令马良制造了“济南血案”,杀害了回族爱国领袖马云亭等 3 人,为取消戒严,惩办凶手,山东学生及各界人士又组成第二次赴京请愿团,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对济南爱国运动镇压有所收敛,也迫使段祺瑞政府放弃了与日“直接交涉”的企图。

“五四”运动在济南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促使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刘长发 崔宏国)

王尽美邓恩铭与济南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济南是全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的发祥地。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初步形成；1922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的建立，标志着中共济南地方组织的正式诞生。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满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使中华民族濒临灭亡。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和1905年济南开埠以后，济南的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的三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以后，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逐步兴起和发展。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极大关注。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各种思潮也随之传入中国。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化运动。1919年夏天，济南著名进步人士、山东省议员、中国国民党党员王乐平创办《齐鲁通讯社》（后改称《齐鲁书社》）并附设售书部，广为推销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这促进了济南学术界新文化思潮运动的发展，并逐步成为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围绕关于“改造社会”的

探索与争论中，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对改造社会、迎接新思潮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以书社为基地，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读书活动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遂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研究探索共产主义理论。

此后，马克思主义在济南日益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济南的文化界分化成左、中、右三派。王尽美、邓恩铭旗帜鲜明地站在左派一边，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们以研究新文化为内容，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并发表《创刊宣言》，阐明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激励青年的文章，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剖析社会现实，抨击封建主义。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宣告成立，王尽美、邓恩铭等通过罗章龙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取得了联系，陈独秀也通过王乐平函约王尽美、邓恩铭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便着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康米尼斯特学会”和“励新学会”的基础上诞生了，成员主要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用章等人。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导下，立即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五一”节，小组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王翔千任主编，这是一份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深受工人的欢迎，他们深入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工人中成立工会和基层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

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济南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业已成熟。1921年7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来函，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奋斗目标，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党成立了公开从事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共“一大”后，王尽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会员发展到五六十人，并在活动中考查和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研究会的中坚和核心，为济南党组织的建立做准备。

1922年初，王尽美、邓恩铭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他们亲眼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面貌，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1922年3月，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回到济南，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于5月正式建立济南地方党组织——中共济南独立组，王尽美任组长。随后，在中共济南独立组领导下，在济南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王尽美兼主任，并发表成立宣言，在山东工人运动中，首先使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济南地方党组织成立后，即着手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深入工矿，组织工会，发动罢工。1922年6月，山东第一个产业工会——津浦大厂工会成立。不久，济南理发工人罢工，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2年7月，王尽美代表济南独立组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以后，中

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来济南，指导党的工作，于7月底在中共济南独立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济南地方支部，王尽美任书记，邓恩铭是支部委员。

民主革命时期，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共济南地方支部遵循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和原则，历尽艰难险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走过了光辉而曲折的道路，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王尽美、邓恩铭等为了党组织的建设，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无私地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许延廷）

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与党史陈列馆

中共山东省党史陈列馆坐落在西门桥迤西、共青团路东首路北，其东、北、西三面与环城公园、五龙潭公园相依。这里地处繁华闹市区与著名风景区的结合部，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是观瞻游览的大好去处。

党史馆始建于1988年，当时以五龙潭公园内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秘书机关旧址为依托，开辟了四个展室，共150多平方米。1990年，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为迎接建党七十周年，决定扩建省党史陈列馆。新馆于1991年“七一”前夕在现址落

成。新馆门额上是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馆名。正面上方镶嵌着金黄色的镰刀锤头标志，侧翼的磨光红色花岗岩墙面上饰有紫铜火炬浮雕，建筑物的顶部覆以淡蓝色琉璃瓦，新馆整体造型新颖典雅，古朴庄重。建筑面积扩为 1273 平方米。

展馆前厅内陈列着李先念、杨尚昆、万里、薄一波、杨得志、胡乔木等老一辈领导人褒扬先烈、勉励后人的题词。陈列馆按建筑层次设三个展厅。展览的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省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共分四个部分：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抗日战争时期；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期间山东党组织的特点是在直奉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长期处于地下斗争，发展艰难。大革命失败后，省委连遭十几次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其中有不少省级领导干部和著名共产党员。1934 年，省委组织与中央失掉联系，各地党组织仍各自为战，直到济南党组织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当时，山东的党组织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举行过若干次农民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广泛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并肩作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山东部队已达 27 万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士建立了基本上以一省为基础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山东党组织带领山东抗日军民粉碎了日伪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解放战争时期在开展“双减”、反奸诉苦、土地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大力发动群众，支援了东北、江南、中南、西北，对全国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位于五龙潭公园东南侧，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原来是济南老城西门外东流水街 105 号的一所四合院，大门朝东，临街

为一幢青砖灰瓦白粉墙二层小楼，两间铺面，坐西朝东，玻璃门窗。1923~1927年初，中共山东省机关秘书处曾在此秘密办公。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王尽美，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尹宽、邓恩铭、张昆弟，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吴芳等同志先后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山东早期共产党员鲁伯峻等人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转为中共党员，曾在此举行入党宣誓；1925年前后，党中央派任弼时、邓中夏、关向英等来鲁视察工作，也曾在此居住。现室内按当时面貌，摆设着桌、椅、板凳等用品，1985年辟建五龙潭公园时，除保留二层小楼外，又建了东西两所庭院。二层小楼在东院——尽园，院内有清泉，曰：“东流”，院北为水池，由古温泉、洗心泉、净水泉汇集而成。池中建双亭（名曰美铭亭）角亭，有水廊相连，亭旁秀古矗立，松竹相映。再北为广场，场畔植松林，松林南侧耸立着高达5米的王尽美、邓恩铭的红色花岗石雕像，底座上镌刻着中共“一大”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手写的《忆王尽美同志》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西院是一曲廊环绕的小院，名曰“余乐院”。院南侧为扇面亭，亭内浮雕，院内花木，皆为松、竹、梅，以寓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院北侧为“余乐池”，由东蜜脂泉、回马泉、净池等泉池扩建而成，池中有水榭，名“余乐榭”。“余乐”均取“鱼乐我乐”之意。池以自然石驳岸，岸上植柳、松、竹、月季、迎春等花木。

中共山东省党史陈列馆、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和王尽美、邓恩铭雕像与幽雅的园景风光融为一体，以丰富的内涵和生动秀美的形式，表现了先烈风采和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战斗里程。中共山东党史陈列馆已成为山东省和济南市长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李肇年）

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1928年初，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国内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蒋、桂、阎、冯四派联合展开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为防止英美势力进入华北，不让蒋介石国民党统一“东三省”，并企图趁中国军队混战之机，占领山东，恢复华盛顿会议以前日本在山东的全部特权，遂借口保护日侨，派兵侵占济南，进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大规模的屠杀肇始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然而，侵略者的暴行并非止于5月3日一天，此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8日起竟以重炮轰击内城，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11日城陷后，日军到处杀掠奸淫，致使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遭到空前的洗劫、破坏。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蒋、冯、阎分别指挥第一、二、三集团军自津浦、平汉、正太各线出兵北伐。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包围济南，张宗昌率残部北逃。

当北伐军进逼泰安，济南指日可下时，日本田中内阁于4月19日通过了“第二次出兵山东案”，命令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5000余人向青岛进发，并派天津驻屯军3个中队于20日先行开赴济南。这是日本政府继上年5月出兵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对中国再次进行的武装干涉。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出兵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将拟派往山东的日军一律停止出

发，但日本田中内阁置若罔闻。21日，天津日本驻屯军首先开抵济南。25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第二天即派斋藤旅团长率600余人开赴济南布防。旬日之间，从青岛开抵济南的日军达3000人左右。日军在济南商埠自行划定“警戒区”，日夜赶修工事，铺设沙垒，架设活动电网、安装军用电话，并架起大炮机枪，加派武装日警（宪兵），禁止华人通行。

5月1日，北伐军进占济南。当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抵济，第二天在旧督署办公，委派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宣布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山东特派交涉员。

北伐军进驻济南后，日军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射杀中国军民，蓄意制造事端。5月2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主力抵济后，日军的暴力挑衅进一步升级，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

5月3日上午，北伐军宣传员在南魏家庄（今林祥街）张贴标语时，遭日军射击，伤亡数人；有一名北伐军士兵徒手走过日兵“警戒区”时，也遭枪杀。10时半，一日本人强行通过隆昌洋行附近的北伐军防地，第四十军士兵予以制止，遂起冲突。日武官酒井暗中指使特务放枪，引起对峙双方的战斗。日兵听到枪声，立即出动，沿街屠杀市民和士兵，顷刻之间，商埠区血肉横飞，尸体满街，惨不忍睹。日军乘混乱之机，将四十军陶峙岳部第七团千余人缴械；又窜至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开枪射击，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扣达18小时之久。下午，邮政局、电报局均被日军占领，交通断绝，全城辍业。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北伐军军用电台被炸毁，守台兵士全部阵亡。是夜11点，日军20余人借口交涉署门前发现日兵尸体，强行闯入交涉署（今经四路370号）收缴武器，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人员捆绑起来，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用日语抗议，日军竟将蔡的耳朵、鼻子割去，继而又将蔡的舌头、眼睛挖去，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麟书等17人惨遭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第二天，济南各界便组织了“外交后援会”调查惨案真相，开展爱国反日宣传。北伐军官兵对日军的暴行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但是当时在济南城里的蒋介石竟然下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并迅速派出 10 个参谋传令班驰往前沿部队，勒令停火。当晚蒋又严令北伐军全部撤离商埠区。5月4日，日军继续滋事挑衅，并派飞机轰炸城里的北伐军总部及旧省长公署，死伤多人。5日上午，蒋介石率黄郛等便装骑马出南门，退驻党家庄。行前令苏宗辙代理济南卫戍司令，率李延年、邓股藩两团留守济南。同日，冯玉祥由河南经泰安北上，在党家庄清真寺与蒋介石商定：绕开济南，继续北伐。蒋决定将北伐军事交冯玉祥主持，自己回南京。

蒋介石一再退让，福田彦助得寸进尺。7日，福田向蒋递交最后通牒：一、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二、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北伐军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各 10 公里；五、开放辛庄及张庄营房。并限令 12 小时以内答复。蒋在泰安车站接到通牒后，立即命人草拟回文，除对通牒第二条未予接受外，其余各条均允照办，并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连夜驰往日军司令部交涉。福田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

8日拂晓，福田借口最后通牒未获答复，下令重炮攻城。济南各城门顿时落弹起火，城厢内外延烧千余家。党家庄和洛口镇是津浦铁路上扼守济南南北的锁钥要地，因而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在北线，斋藤旅团炮击无影山弹药库，进攻新城兵工厂，炮轰黄河铁路桥，截击正在渡河的北伐军；西南线，岩仓旅团炸毁辛庄弹药库，占领张庄、辛庄及白马山车站后，旋即向党家庄攻击，沿途不断射杀无辜居民。8日下午，日军逼近党家庄车站，正在这里休整的北伐军金汉鼎部第八师遭日军袭击，伤亡 80 多

人，350包军米及大批军械物资被日军击毁、掳去。日军在城郊得手后，便集中兵力进攻城区。8日晚，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攻势。守军经过顽强抵抗，于晚10时退入内城自卫，日军也跟踪进入圩子、逼近内城，并随即用煤油纵火焚烧顺城街。当时，正值大风，大片街坊顿时变成火海，日军复虐杀火中逃出居民（这条街后更名“五三街”，即今西门桥护城河一带）。9日晨至黄昏，日军以飞机、大炮，并出动工兵、铁甲车轮番冲锋，始终未能攻入内城。当晚，日军再次强攻，炮火彻夜未停，大西门、大东门等古建筑相继被炮火击中，城内督省两署及省议会、省图书馆藏书楼等公共建筑，一中、一师、正谊中学等处校舍亦遭炮火袭击。安乐街、太平寺街一带，因炮弹落于草房或木料上起火，光焰照天，弹流如雨，及至10日凌晨，“东门楼早已击破，西门楼完全无存，南门楼毁去大半，大好城池遂成了断垣残址！”（参见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济南“五三”惨案纪实》）

10日，蒋介石令黄郛向日方表示，准备向日军道歉，同时又派总参议何成浚为全权代表，携带有“免去贺耀组本兼各职”等以讨好日军的六项条件，到济南与福田谈判。但福田仍坚持以完全接受“通牒”中的五条为先决条件，拒绝与何晤谈。

苏宗辙会同李延年、邓殷藩率守军奋战三昼夜，击退日军多次冲锋。11日凌晨，守城部队奉蒋密令从新、老东门分路突围。李延年团杨冠英排担任后卫，杨排长带领全排战士与日军肉搏5次，重创敌人后，全部壮烈殉国。突围部队于离城3里外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部队，下午6时集合于仲宫。守城之役，李团伤亡失踪约600人，邓团约300人。11日济南失陷。

日军进城后杀掠奸淫，无恶不作。他们对操南方口音者一律刺死，又将街上市民赶到一处，作刺杀目标取乐。夜晚不准市民关门，任意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日军还把中国军民的尸体装入麻

袋投入黄河，或运至青岛，投入海中。不及撤出的伤员也全部被日军屠杀。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案”中国方面，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济南失陷后，日本政府继续派安满钦一率第三师团增兵山东，配合第六师团对济南、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沿线所有重要城镇实施军事占领。

在此后一年多的岁月里，由于日兵暴虐横行，“维持会”横征暴敛，土匪盗贼恣意抢劫；加之津浦铁路被隔断，南北交通受阻，致使济南工商凋敝，金融枯竭，经济萧条，社会秩序紊乱，济南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水深火热的境遇之中。

直至1929年5月12日，日本侵略军撤离济南；5月20日，全部撤出山东。

（丁海燕）

解放济南的伟大战役

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著名的城市攻坚战。当时，济南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国民党军残存在山东腹地的最后一个重兵设防的城市。济南地处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对济南的防守十分重视。

1948年驻守济南的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山东大片土地均已被解放，济南已成为孤岛的情况下，他率重兵10余万，将济南自城北洛口至城南八里洼一线为界分为东、西两守备区。东守备区以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指挥官，辖七十三师两个旅及绥靖区特务旅、省保安第六旅等共5个旅；西守备区以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为指挥官，辖整编八十四师两个旅及独立旅、保安四旅、青年教导总队共8个旅（总队）另以整编二师师长晏子风为指挥官，辖五十七旅、十九旅及即将空运来济的整编七十四师为总预备队。在东、西两守备区的广阔阵地上遍设坚固工事，企图长期固守。蒋介石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17万人则随时准备北援济南。

攻克济南是中央军委、毛主席战略决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人民解放军为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在1948年8、9两个月攻克济南，尔后南下，进一步打开中原战局、夺取徐州的指示，遵照毛主席攻城打援同时并举的战略方针，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攻城兵团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三纵、十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攻城西线集团，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以九纵、渤纵和渤海军区部队组成东线集团，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以十三纵队为攻城集团的总预备队。组成的阻援、打援集团，约18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挥。以四纵、八纵及冀鲁豫独立一、二、三旅组成阻援集团，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阻止由鲁西南北援之敌；以苏北兵团二纵、十二纵及一纵、六纵、七纵、鲁中南纵队之一部、中野十一纵队等组成打援集团，于济南战役发起前进入兖州、邹县以南地区，待援敌进至邹县以南地区时实施突击。

1948年9月16日夜，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向济南发起全线进

攻。攻城东线集团17日晨一举攻克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敌人阵地，给守敌以极大的震动，敌人虽曾多次反击并枪毙一营长示惩，企图制止我军之进攻，但终未得逞。攻城西线集团于战役开始后即分路猛攻，18日夜即攻克了古城、簸箕山等重要阵地，并以强大炮火控制了飞机场，迫使敌人中断由徐州至济南的空运。在攻城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敌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2万余人火线起义，致使敌西线全线动摇。吴化文部起义后，攻城西线集团乘胜疾进，迅速攻占济南市区商埠以西阵地。在此情况下，王耀武曾急电蒋介石及徐州绥靖公署刘峙，告以吴部投共、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向北突围，但蒋介石却严令其坚守待援。这迫使王耀武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除留部分兵力防守千佛山、马鞍山阵地外，集中6个旅的兵力防守内城，3个旅的兵力防守商埠。

在吴化文起义济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一面令王耀武坚守待援，一面急令驻扎徐州周围地区的黄伯韬、邱清泉、李弥3兵团，分经鲁西南、津浦铁路驰援济南；但因他们侦悉人民解放军以强大兵力组成的阻援、打援集团严阵以待，因而顾虑重重，虽经蒋介石再三电促，王耀武待援望眼欲穿，他们却迟迟不敢前进。在此情况下，我军一面命令攻城部队全力以赴速攻占商埠，尔后立即攻击内城；一面命令阻援、打援部队严密监视敌人动态；并令各地方武装及民兵控制要道，加强警戒，防止济南守敌突围溃逃。9月20日我西线攻城部队向商埠突击猛攻，至22日将商埠之敌大部歼灭。与此同时我东线攻城部队已肃清城外残敌，积极进行攻城准备。随后，我东、西线两攻城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相继攻入外城，并立即进行攻夺内城的各项准备。

商埠及外城被解放军迅速攻占，使王耀武心慌意乱，他连忙以较完整的十五旅、十九旅及五十七旅为骨干，重新调整部署，加修巷战工事，妄图作最后挣扎，以待外援。我攻城部队为了不

给守敌以喘息时间，于23日黄昏乘胜向内城发起总攻，经彻夜激战，我九纵、十三纵分别从东、西两面攻入内城，随即我各路攻城部队也纷纷攻入内城，并迅速投入纵深战斗。此时守敌仍节节抵抗作困兽之斗，双方激战至24日黄昏，攻城部队终于全歼内城守敌。王耀武化装简从由大明湖北岸水门逃出，至寿光县境被我民兵俘获。据守千佛山、马鞍山的小股守敌也随之缴械投降。至此，人民解放军的攻城战斗胜利结束，济南宣告解放。

济南战役自9月16日开始至9月24日胜利结束，历时8天，全歼守敌10万余人，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重点防御计划，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的攻克，使山东除青岛以外的城市全部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可以全力南下作战，为两个月以后发起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纪念济南解放，济南人民于解放后在首先被突破的内城东南隅，修建了巍峨壮观的解放阁，阁基东壁镌刻了在战斗中牺牲的3764个烈士的名字，以志怀念，永垂不朽。

（刘长发）

章丘自古多铁匠

章丘向有“铁匠之乡”的美誉，其从事打铁者之多全国无出其右。自古以来，铁匠们为谋生四处奔波，足迹遍及天南海北，故

又有“章丘铁匠遍天下”之说。

章丘铁匠为何这样多？先从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来看，章丘素有“三山六丘一分田”之称，自西南至东北部，山岭丘壑逶迤；巴漏河（季节河）纵贯南北，北部沿黄地带则多沙土，人多地少，每年庄稼收获甚微，又多患山洪，田园淹没，人们只得离乡背井，寻求生路。打铁这营生，本小利大，手艺易学，只要吃苦耐劳，就能养家糊口。这样，师传徒，徒带徒，亲连亲，友带友，代代相传，已成风习。尤其明初时，河北枣强袁氏父子逃荒来此，徙居相公庄东北1公里许。袁氏世代打铁为业，男女都会，丁丁当当，其营生渐及全县。

据史书记载，春秋时代章丘就开始使用铁质农具。齐相管仲曾说：“美金（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耒、斤斲，试诸壤土。”（《国语·齐语》）汉代，全国设铁官，济南的东平陵（今章丘）便设有铁官。《汉书》载，汉章帝曾把祖传的三把宝剑赐给他的三个忠臣，其一就有“济南椎成剑”。据《魏书·辛子馥传》载：“长白山（在章丘境内）接连三齐……诸州豪右多在此山鼓铸……得密造兵仗。”又据《山东通志》载：“唐时铁器，章丘最盛”。现今章丘的大冶、小冶等村，都是那时的冶铁重地。从史籍可看出章丘铁匠之渊源。

“十九郎庄，地处山乡。生计艰难，出些铁匠。三人一伙，五个一帮；驾着小车，走闯四方。辛苦一年，挣来钱粮，抚育儿女，赡养爹娘。年年岁岁，半粮半糠”。流传在章丘的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旧时铁匠流浪贫困的生活。

每年春节一过，山乡穷村的青壮年便三人一帮、五个一伙的驾起二手的木轮车子云游四方了。车上放着一个风箱、两把锤、一个砧子、三把钳以及铺盖、粮米、碗筷等。满满一车。浪迹迢迢，世路艰难。一去经年，直到天寒岁暮的腊月底每人才拖着疲惫和辛酸回乡。

逢做生意时,先由“师傅”选好地点,再“打行炉”,炉有两种,一是支架炉,即风箱、铁炉、炭槽都在一个木架上。这种炉式使用方便,惟行运困难。二是地炉,即是风箱、火炉、炭槽都置地上,在风箱与炭槽之间挖一小坑,坑四周用硬泥砌好,安上风道,排正炉条,就可使用了。安炉时,一人用“响锤”在砧子上砸一铁片“丁丁丁,丁丁丁……”其声可传5里远。人们一听就知铁匠来了,循声而来,或修理,或订做,有铍、镢、镰、锄、刨、菜刀、剪子以及木工用的锛、凿、刨、斧等等。

铁匠有明确的分工:掌钳的一般称掌柜,负责“出样”锻造;打锤的称大伙计或二师傅;拉火的叫小伙计,有的年仅十四五岁。猛力拉风箱鼓风助火。火又分“姜黄火”、“软火”、“硬火”……全凭师傅的眼色掌握,稍有差池,往往挨打。小伙计还要干运炭、做饭、给师傅铺被等杂活。可谓苦矣!铁匠每日两餐,都是小米干饭佐咸菜。如果生意繁忙,早饭则移至中午,晚饭直到掌灯才吃。夜里多宿在廊檐寺庙或碾房磨棚,年复一年,栉风沐雨,劳生草草。生活上无处不俭省,因此,年终也能赚些钱回家,它成了寒门穷户赖以生活并善于经营的热门行业。这也是形成章丘自古多铁匠的重要原因。

章丘铁匠不仅多,而且出了好多技艺精湛的能手。如手工锻打“七九”步枪和掷弹筒的袁绍德,手工制造“枪牌枪子”和转盘机枪的任继述等。此外,徘徊镰、袁庄镢、砚池炒勺都是驰名遐迩的特产。

(袁方桥)

“圣药”阿胶

阿胶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因产在原东阿县城（即今平阴县东阿镇）而得名。我国现存最早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本草纲目》称之为“圣药”，乃中华民族医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阿胶置料考究，做工精良。相传古法：每年春季择纯黑健驴，饲以狮耳山之草，饮以狼溪河之水，冬宰取皮，加参、薯、归、芎、桔、甘草诸药汁，汲狼溪河与阿井水，倒入金锅，银铲搅动，复加冰糖、绍酒、豆油以桑木文火煎炼之，三昼夜后冷凝，切块阴干。成品以呈琥珀色、半透明、味甘咸、气清香为优。清初张隐庵在《本草崇原》中曾予概述。

阿胶既能治病，又能强身，以医疗妇女症候尤佳。内服入肺、肝、肾三经，对阴虚、阳虚、贫血疗效甚高，且强筋壮骨。外敷可治烫伤、烧伤、皲裂。阿胶内含 18 种氨基酸和铁、铜、钙、锰等 20 余种微量元素，被视为高级营养滋补品，名扬中外。

阿胶是一种动物胶质，它作为药物研制和服用，早在秦汉以前就有文献记载了。《尚书·禹贡》篇云：“济水所经、清冽而甘，汲出日久不变味，煮黑驴皮为胶，可疗风疏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也有“以清煮胶”的记载。可见它至少有 2000 余年的悠久历史了。比荷兰 1690 年制造出的动物胶要早千年。阿胶至汉代已成为常用药物，并可根据原料不同分为阿胶和白胶（鹿

胶)两种。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中,有“阿胶一寸,不能止黄河之浊”之说,是现存史籍中称胶为“阿胶”的最早记载。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善以阿胶治疗妇科病及血液病。成书约东汉末期的《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滋补强身的“上品”。魏晋时期的药物集成《名医别录》,又补充了阿胶的性味和功效;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进一步肯定了“出东阿,故名阿胶”。唐《新修本草》、宋《图经本草》、明李明珍《本草纲目》、清《本草求真》等医药学专著都记有关于阿胶原料、质量和疗效等方面的论述。但是,早期阿胶的制作工艺,现已无文献可考。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煮胶法”,为后世提供了仅供参考的依据。1935年,世界书局编印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中,对东阿镇一带,近代制作阿胶的毛驴饲养,驴皮的精选与熬炼,辨别真伪及得天独厚的熬胶用水——阿井水与狼溪河水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建国后颁布的几版《中国药典》均收录了阿胶,并不断对其工艺及质量标准等作修订,进一步使阿胶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是阿胶的正宗产地,素称“阿胶之乡”。这一带的先民们自古就有世代传袭熬制阿胶的技艺,有“妇孺皆通熬胶”之说”。明初的东阿城内,熬胶作坊逐年增多。至明末清初,城内的熬胶业达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医学界名人纷纷前来入籍行医、办阿胶作坊。当时,规模较大的有邓氏“树德堂”、涂氏“怀德堂”、王氏“景春堂”、陈氏“东岳街”、庄氏“太子街”、卢氏“协裕阿胶庄”等几十家阿胶老店。其质量以邓氏“树德堂”和涂氏“怀德堂”为最。邓氏阿胶在清代多次赴京进贡,咸丰帝和慈禧太后曾亲赐“年折子”(现存平阴阿胶厂内)和“黄马褂”。故“树德堂”阿胶被誉为“贡胶”。涂氏祖籍江西南昌,道光年间,阖家迁徙东阿城,前店行医,后店办阿胶作坊,还研制出“参茸阿胶”、“藏红花阿胶”等新品种。该店1914、1916、1922年先后获当时农商部、山东省物品展览会及历史博览会之“最优等”、“一等”、“甲

等”奖牌及证书。

建国后，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传统名产的生产，1952年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国营阿胶专业生产厂——山东平阴阿胶厂。40多年来，这个厂的新一代主人翁继承、发扬、开拓、创新，把传统的熬胶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文明成果相结合，在保持阿胶传统特色的同时，锐意创新，以科技为先导，大胆采用了机械洗皮、蒸球化皮，蒸汽浓缩、机械切胶和在人工控制条件下阿胶常年生产等新技术、新工艺，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熬胶靠手工制作，只能冬季生产的局限性。将阿胶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平阴阿胶厂努力发掘祖国医药遗产，充分发挥胶剂产品优势，开发系列产品。目前，已形成胶剂、膏剂、冲剂、口服液、保健食品等五大系列近30个品种，其“福”字牌阿胶是传统出口名牌，畅销港、澳、台地区，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等。“福”牌“东阿镇”牌商标被评为全国著名商标。这两个牌号的阿胶建国前后，多次获奖。

（赵慎忠）

济南老城的格局

济南地处齐鲁故地，是一座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因老城区内分布着“七十二”名泉，所以形成了城泉相融、城湖相映的格局。它是国家级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老城区系指护城河以内，即今日的环城公园所围之地区。但济南东、南、西三个方向因历史原因形成了一道“圩子墙”，圈围了外城地域，又形成了三个“关厢”用地，与老城相联，现在我们所说的老城区一般也包括此地区。

济南之名初见于汉初。汉代设济南郡于东平陵，晋永嘉末郡城由东平陵移至历城。历城之有城，大约始于汉初。那么历城具体城址在哪里？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县（城）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泺水泉源即今之趵突泉。由此可知历城故城址在今趵突泉之东北。

《管子》一书中，对城市选址及布局有这样的论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历城建城正符合这一标准。它南仰群山（千佛山），北俯大河（古之济水，今之黄河），临水而不泽，借水之灵性，形成湖光山色之美，实属古代“山水城市”规划建设之典范。

宋初济南称齐州。据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对齐州州治历城的四界这样记述：“历山（千佛山），在县南五里；舜井，县东百步；孝感水（即孝感泉，在今趵突泉北路路东，三联家电商场南侧）在县北门；四望湖（指今五龙潭地区）县西二百步。”又据清《济南府志》记载：“古历城甚小，乃今府城西南一隅耳，东不逾舜井，北不逾太平寺街孝感泉。”从上述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知道历城古城在今趵突泉地段。

长期以来，济南府治与历城县治同驻济南，是全国行政区划辖所不多见。

明洪武九年（1376年）全国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济南是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驻地，至此济南升为山东省行政首府。济南历代城址多有变迁，但均在泉水涌出之区域内，可见古人建城对泉水之利用和保护。济南古城，至明代改土城为砖石。据明《山东通

志》记载：“国朝洪武四年（1371年）始内外甃以砖石，周十二里四十八丈。……四门，东曰齐川，西曰泺源，南曰舜田，今改为历山，北曰汇波。”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老城区。在修建砖石城池的同时修建了以“德王府”（今珍珠泉内）为中心的城池，形成了济南城的基本布局。老城面积3.06平方公里。

清朝以德王府址设山东巡抚衙门。清咸丰十年（1860年），在老城东、西、南关厢边缘向外修建了一道土圩，周20公里。同治四年（1865年）改土圩为石圩，因城北多水，故缺北圩。圩长3670丈，高1.2丈，基厚1.5丈，顶厚1丈。并辟有岱安、永固、永靖、永绥、永镇、济安、海晏7门，这就使古城与外城布局形成一体，总面积约7.54平方公里。

济南古城经历代变迁，形成自己很有特色的城市布局模式，即：城借山势，泉融于城，湖汇泉于城，使天然泉水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织于一体，共存于和谐的整体环境之中。

我们在分析了古城形成、扩建的轨迹之后，再分析一下诸泉在老城内的分布，可以清楚的发现，济南古城布局，以珍珠泉为中心，以黑虎泉与趵突泉分布于东西两侧角楼之下，南门居中而开。而趵突、黑虎、珍珠三泉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之构图。大明湖与珍珠泉又正是这个三角形的尖部，南北对峙，在城区内诸泉之水尽入湖内，穿过湖区沿汇波门北流。趵突、黑虎两泉之水分流东西护城河内，沿东、西泺河汇入城北“十里荷香”的北园荷塘，而后入小清河内。古城以北鹊、华二山隔黄河东西遥望，与大明湖构成了鼎足之势，湖光山色，荷莲绿柳，泉水清澈。登千佛山北望，古城布局尽收眼底，因而形成“齐烟九点”特有的风景视线。

济南老城另一布局特点是四门不对，北门不通“车”而通“舟”，这在中国古城布局中比较特殊。四门不对是因古历城邑城址变化和长期县、府治同驻一城之故。因府城的建设沿袭了原历城县邑的布局，所以才形成四门不对的局面。

北门古称“汇波”，这与自然地形有关。老城建设运用自然地形坡度，充分考虑了自然排水方向。古时城区之水称为历水，城外之水称为泺水，两水因地形条件不在城区内汇合。历水汇入泺水出城北流，古人济水，今入小清河。所以至今仍留有北园的“东、西泺河”和“洛口”之地名。这一地区是旧城最低处，利于城区之水北排，而此处设闸又可阻止城外积水倒灌入城，起到缓排和阻排两水之利。故而设北门为“水门”。这便是管子所说：“下毋近而沟防省”的道理。

济南城区路网布局根据《管子·大匡》篇中古代建城的理论，“凡仕者近公，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原则，以明代的济南为例，它以德王府为中心，周围设置各种行政管理机构。从现有的街名即可看出，如榜棚街、按察司街、贡院墙根、天地坛街等，东西街巷被德王府分割，南北通路为多，而这些道路又多与泉水相联，排水坡度又正好南高北低，达到了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之目的。增加外城后，清末开商埠也充分考虑了老城区与商埠区的联接关系。解放前普利门与经二路联接是城区与商埠的主要通路，50年代打通共青团路，使经四路与泺源门联接，1993年又拓宽了泺源大街与经七路相联接。这些道路的确定是沿袭古代建城之框架，经历代规划师的劳动，顺着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而逐步形成。当然，古代之路以轿代步，铜锣开道，人口稀少，毋须宽敞大道，所以古城内院东、院西大街（今之泉城路）也仅有7米宽，而今天要适应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发展需要，规划主干道宽度为50米。

济南老城布局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特点，城内借泉水巧妙布局，城外借山秀入城之景观，历山钟秀，明湖镜平，泉水清澈，杨柳依依，所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成为赞誉泉城济南之佳词。

（于书典）

济南各县(市)区名称的由来

济南，商周时期为谭国所在地，公元前684年，齐灭谭，置平陵，春秋战国时期，称涿邑、历下邑。秦属济北郡（郡治博阳，在今泰安市）。济南之名，始见于汉代初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高后二年（前186年），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这说明在此之前，已设有济南郡。汉代济南郡治所在平陵（今章丘平陵城），境内有济水纵贯东西。济水在古代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济水河道，济水即消失。今山东境内黄河由东平至济南以北的一段，大致就是昔日济水的一段。古济水后来也称大清河。济南，就是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

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年），设立历城县，城址在现在济南旧城内的西南部。《读史方舆纪要》引《三齐记》载：“历下城南对历山，城在山下，因名。”历下城即历城。西晋永嘉年间（307年左右）济南郡治所由平陵迁至历城。其后，历北朝、隋、唐，或置济南郡，或称齐州、齐郡，多有更替，唐天宝年间又曾一度改称临淄郡。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始称济南府。元改设济南路。明代复置为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在青州设置了山东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67年）行省官署迁到了济南，以后又改为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此为济南升格为省会的开始。至此，济南便成了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所在重地，也是省（山东省）府（济南府）县（历城县）三级衙门所在地，逐步成为政治中心。明

天顺元年(1457年)在珍珠泉周围建德王府,以王府为中心,形成济南旧城的基本格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批准在济南自开商埠,形成近代城市的雏形。商埠设在旧城西关外,是规则棋盘形道路网。在此前后,英、日、德相继在济南设领事馆,开银行、商店,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济南开埠后,设有商埠局,后改称市政公所、市政厅。1929年7月,把旧历城县城和城外商埠合并设立济南市。1937年11月,历城县由旧城迁出。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几经区划调整。至1993年12月,辖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历城5区,章丘市(县级)和长清、平阴、济阳、商河4县。

济南解放初期,设立济南特别市,沿用旧有边界,北界黄河,南界千佛山,东界洪家楼,西界大饮马庄。全市分为11个区,有城市区、农村区和半农村区。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适应各时期需要,城市区划时有调整。1955年9月区划调整,始有各区(历城除外)现名。各区名称的由来大致情况如下。

历下区,因位于历山之下,历史上曾有“历下城”之称,故取名历下。它由原来历城县老城扩展而成。1960年曾建立历下人民公社,1966年曾称为红卫区,1973年复称历下区。

市中区,因位于市区中心而得名。辖区系开埠后,由西关外逐步拓展而成。1959年一度撤销,1960年恢复并成立市中人民公社,1967年改名“红旗区”,1978年恢复为市中区。

天桥区,以辖区内有横跨津浦、胶济两大铁路干线的立交桥——天桥而称为天桥区。范围主要在铁路以北地区,1960年建立天桥人民公社,1967年更名“向阳区”,1973年后又称天桥区。

槐荫区,以辖区内有槐荫街,即古大槐树庄而命名。槐荫区早年为历城县乡区,解放初曾为第七区。1960年建立槐荫人民公社,1966年称为“东风区”。1973年复称槐荫区。

此外,1955年9月还设有泺源区,因地处趵突泉附近而得名,

1956年7月撤销，划入天桥、历下、市中3个区。1980年3月建立济南市郊区，辖东郊、西郊、华山、北园、吴家堡、姚家6个公社。1987年4月撤销，分别划入各区。

历城区，系由原历城县和郊区合并调整，1987年4月设立，历城一名，仍沿用古历城县名。历城原为山东首县，历史悠久。自公元前153年建县到1987年撤县设区，有2140年的历史，治所旧址在济南旧城，1937年迁出。1958年11月济南原市郊各区并入历城县，历城县划属济南市。1980年3月建立郊区，辖6个公社，1987年4月，郊区、历城县均被撤销，始设历城区，位于城郊地带，从北、南、东三面环绕城区。

随着城市中心作用的加强，为有效的解决工农业生产的矛盾，搞好济南市副食品和蔬菜供应，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5个邻近济南的县先后划属济南市，成为重要的卫星城，各县（市）名称由来大体情况如下：

章丘市是济南所辖县级市。商代为蒲姑国、谭国地。秦属济北郡。西汉属济南郡。公元前153年第一次建县，名阳丘。后历经变迁至北齐置高唐县，县治回村（今章丘绣惠镇回村）。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县治由回村移章丘山（亦称女郎山）前新建治所（今绣惠镇，旧章丘城），因城北有章丘山，改高唐县为章丘县，属齐郡。唐贞观元年属河南道齐州济南郡。宋、金属济南府。元属山东东路、济南路总管府。明清皆属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1945年8月划分为章丘（县治埠村）、章历（县治旧章丘城）两县。1953年8月章历并入章丘（县治旧章丘城），1958年8月县治由旧章丘城迁明水，1979年1月由泰安专区划属济南市，1992年8月撤县设立章丘市。

长清县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地。秦立卢县，县治在卢（今广里），两汉时境内张夏镇曾为茌县和山茌县治。隋开皇五年（585年）于升城（已废，今为卢城洼地）置长清镇，隋开皇十四年

以镇置县,始设长清县。《太平寰宇记》载:“隋置长清县,因清水以为名,又县东南三十里即齐长城距防之地,兼取其义云。”宋至道二年(996年)县治自升城迁至刺榆店(即今县城),再无变动。后归属时有变化。1927年废道后直隶于省。1941年8月,以黄河为界划长清为峰山、长清两县;1946年3月,峰山县改称长清县,长清县改称河西县。1950年8月,长清、河西两县合并复称长清县。1959年撤销,分别划归历城、肥城、平阴,1961年恢复建制。1978年10月由泰安地区划属济南市。

平阴县春秋属鲁地,战国属齐邑,秦代为济北郡卢县地。隋初属肥城郡。隋开皇十四年(594年)置榆山县,隋大业二年(606年)废榆山县,以其地处东平(古称东原)之阴而设平阴县,治所今址。唐大(太)和六年(832年),废平阴归卢县和东阿县;开成二年(837年)复平阴县。先后分别属东平府、山东西路、东平路总管府、东平州、泰安府、济西道、东临道,1927年废道属省。1958年11月平阴县并入东平县,1959年10月恢复平阴县,1985年3月由泰安专区划归济南市。

济阳县商代为诸侯逢伯陵、蒲姑氏之地,春秋时为犁邑。秦代为济北郡濰阴县、著县地。金天会七年(1129年),割临邑的故著县及章丘一部分置县,因地处济水(今黄河)之北(水之北为阳),故名济阳县,属济南府。至民国4年(1915年)属济南道。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划为齐济县。建国后先后属德州专区、惠民专区、聊城专区。1958年12月并入临邑县,1961年10月再度复置济阳县,1990年1月,由德州地区划属济南市。

商河县,春秋战国时属齐国麦邱邑,秦属齐郡地。隋朝建立后,于滴河流域置滴河县,属渤海郡,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县治于滴水镇,因地处滴河,故名。宋元祐元年(1086年)改滴为商,属棣州。从此县名固定,但隶属多变。金、元时期一度并入无棣,明属济南府,民国初年属武定府,1927年直隶于省。

1942年11月，割商河县一部分与惠民县一部分成立商惠县。1945年11月撤销商惠县。1958年12月乐陵县与商河县合并称乐陵县，1961年9月，恢复商河县。1990年1月，商河县由德州专区划归济南市。

（许延廷）

文化蕴藏篇

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

南倚泰岱，北临黄河。济南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带上。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济南先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济南的史前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60多年来，济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几经高潮，基本上搞清了距今8400~3500年间，先后承袭、持续不断的西河类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史前文化发展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表明济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西河类型(距今8400~7300年左右)。目前在济南发现西河类型遗址5处，即长清张官1处、章丘西河和小荆山等4处。西河类型的陶器造型古朴，制作较为规整。陶色以红褐色和青灰色为主，陶土未经淘洗。器类有叠唇釜、圈足盆、深腹碗、鼓腹罐、匝形盆、直口壶、陶支脚和轮轴等。有的陶釜高达50厘米，有的陶釜口沿下饰一圆锥刺纹或指甲纹，有的陶釜颈部饰一周菱形或半圆形或鱼刺状的刻画纹。石器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支脚。在西河遗址发现一座50余平方米、方形圆角的大型房址。居住面经烘烤硬化、中间有3组石支架灶，每组灶由3个石支脚组成。西北组石支架上还放置着一件陶釜。在小荆山遗址发现21座西河类型阶段的墓葬，排列整齐，是一个氏族公共墓地。

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目前在济南地区发现北

辛文化遗址 10 余处。北辛文化的陶器较前有了较大进步。陶色多灰褐色和红褐色，陶质以夹砂为主，有相当数量陶器鬲和蚌壳碎屑。器类有垂腹鼎、圜底深腹罐、小口双耳罐、红顶罐、支座等。鼎类器相当发达，在章丘董东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深腹圜底、圆形柱足，腹下部有三段齿状附加堆纹。在济南西郊山家庄发现的陶支座，有的像猪嘴、有的像窝头。石器有石斧、石铲和石磨盘。在济南田家庄采集到一件完整的花岗岩石磨盘，条形圆角，中间略凹。北辛文化时期遗址的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章丘王官遗址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 5 米左右。在该遗址还发现房址和灰坑。这一切表明北辛文化时期人口不断增长和生产水平逐步提高。

大汶口文化(距今 6100~4600 年左右)。目前济南公布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30 余处。陶器颜色从以红色为主逐步转向以灰黑色为主，泥质陶上常饰镂孔、刻纹，有彩陶和朱绘陶。陶器制作工艺完成了以手制到轮制的阶段性飞跃。器类有觚形杯、釜形鼎、敛口钵、背壶，袋足鬶，镂孔圈足豆和鼓腹罐等。在章丘董东遗址发现一件彩陶罐，尖唇矮领、腹有二耳。腹部施白陶衣，其上饰朱色弧线三角连点纹。石器普遍磨制，有斧、镑、铲、刀和钺等。在济南柳埠出土一件穿孔石斧。在章丘焦家遗址发掘 6 座大汶口时期墓葬，土坑竖穴、仰身直肢、头向东。器物组合主要是罐形鼎、喇叭圈足深盘豆、折腹罐等。还有一墓随葬有玉环。

龙山文化(距今 4600~4000 年左右)。目前济南公布的龙山文化遗址近百处。陶器颜色以黑色为主，也有少量白、黄、灰陶。普遍采用轮制，制作精湛。袋足器、三足器发达。器类有鬶、甗、罐形鼎、三足盘、高圈足豆，折腹盆、筒形杯、蛋壳高柄杯、折肩罍、大口瓮和鼓腹罐。章丘城子崖出土的鬶、瓮、罐，形体庞大，为龙山文化时期罕见。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一件盆形鼎、鸟喙形足、口外沿有两桥形纽，是龙山文化典型器。石器有穿孔石铲、双孔

石刀、石镰和石镞等。在济阳邛冢发现一件石镰，曲前弧刃、镰首尖垂。在章丘城子崖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堡及其周围分布的4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印证了《史记》关于聚、邑、都的记载。

岳石文化(距今4000~3500年左右)。目前济南公布的岳石文化遗址30余处。岳石文化的陶器开始走向衰落，陶胎增厚，重归古朴。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居多。器类主要有鼎、罐、甗、豆、盆等。章丘王推官庄遗址发现的夹砂罐、卷沿盆、浅盘豆、尊形器极有特色。在章丘城子崖出土的陶罐，绳纹横饰，与其他地区岳石文化陶器有较大区别。章丘火化厂工地出土的豆柄上饰红色彩绘，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石器主要有斧、凿、半月形石刀、方孔形石器。在城子崖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时期城址为全国仅见。

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连绵五千年，博大精深，绚丽多彩。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追寻，被历史风尘掩埋了的文明会重新走到人们面前，肯定会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传佩华)

城子崖与龙山文化

1928年春天，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第一个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从此城子崖遗址石破天惊，饮誉世界。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西部，地处泰山北麓的山前

冲积平原，海拔50余米，土地肥沃，水系发达，气候温和，是古代先民理想的居住地。

1930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930、1931年秋天两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个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走到了世人面前。李济先生在《城子崖序》中说：“由于这个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工作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可循的轨道。”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命名的龙山文化的确立，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中国人自己发现、采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发掘、迅速编辑出版考古学报告专著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0、1931年进行的第一次发掘面积15648平方米。文化堆积一般厚4米左右。发掘者们将堆积分为上、下两期，即上层的灰陶文化期和下层的黑陶文化期。在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中，色泽漆黑、造型灵巧、器类繁多的黑陶最具特色。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的黑陶高柄杯，被人们赞誉为蛋壳陶杯，成为中国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在1931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南北长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的夯筑城墙，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城墙的时代问题。

星斗变幻，天地轮回。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之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0、1991年，第二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通过勘探和发掘，搞清了城子崖遗址存有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和周代文化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城墙。验明60年前发现的夯土城墙时代属于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600~3900年）。新发现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下还有龙山文化时期城墙，面积约20万平方米，时代约在龙山文化中期（距今4200~4300

年左右)。

60余年来，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累计已达六七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也有30余处，发现墓葬数百座、出土器物数万件。这一系列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为龙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的实物资料。现在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年代分期、源流族属、制陶工艺、经济形态、社会性质及与周围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包括古运河以东的山东大部和苏北地区。

山东龙山文化以黑色陶器群为主要特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造型规整。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比较发达。蛋壳高柄杯、高颈陶鬲和鬼脸式足陶鼎独具匠心。城子崖遗址出土的甗、瓮、罐，形体庞大，颇有王者风度。龙山文化制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人类制陶史上的奇迹。

根据碳十四测定，山东龙山文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600~2000年左右。在分期问题上，有的学者分为三期，有的学者分为四期。但其基本顺序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基本要素，在哪里划线。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主要有胶东半岛的杨家圈类型，潍河流域的姚官庄类型，徒骇、小清河流域的城子崖类型，汶、泗河流域的尹家城类型和沂、沭河流域的大范庄类型。

山东龙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在曲阜西夏侯、日照东海峪和泗水尹家城等遗址的发掘中找到了依据。龙山文化之后就是岳石文化，已被10余处遗址的地层关系所证明，只是这方面的资料尚少，其演化的链条上还有缺环。山东龙山文化是东夷族人创造的，这在大量文献中都有记载。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稳定的种植农业阶段，兼营

家畜饲养及渔猎。各种手工业,如制陶、制玉、冶铜的生产已专业化。城子崖遗址出土的石铲、石斧、石刀等种植和收割工具,说明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1990、1991年在城子崖发现的两口水井,口大底小,井壁规整,井底留有完整的汲水双耳陶罐。解决饮用水问题是人群定居和发展手工业的需要,有效地推动早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在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田旺等5座龙山文化城堡,从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大型墓葬,使我们看到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也使我们听到人类文明的脚步正在向我们走来。

60多年来,在河南、河北、陕西、湖北等地也相继发现了众多的近似“龙山黑陶文化”的同时代文化遗存,统称为龙山时代。现在龙山时代已作为公元前21~26世纪年间,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占据了500多年之久的那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总括。

(佟佩华)

关于济南是一只金船的传说

在济南城内的大明湖一带,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讲济南城是在一只巨大的金船之上,或说济南就是一只金船。

这只金船是怎样被人发现的呢?说法不同。有的说是一位南方人,梦中上了一只金船,畅游仙境。但是,醒来却不见那只金船,便四方寻找,最后沿黄河来至济南。他忽然觉得身子微微晃

来晃去，他这才发现济南就是那只金船。另一种说法讲，有天晚上，突然阴云密布，尘土飞扬，伸手不见五指，并有惊天动地之声传来。人们全藏在家中，惊恐万分，一动也不敢动。有个人胆子特大，他暗中从门缝里向外看，见一位仙姑飘飘然高坐云端。这时，一只金船从天而降，转眼之间，一座巨城将全船盖住了，这座巨城就是济南。从那，人们就传说济南是在一只大船之上，并叫济南为“水托城”。

至于这只金船是怎样保存下来的，说法也不完全相同。大体是说，那个双目善识财宝的南方人，一心想将济南这只金船暗中开走。这样，济南无疑将会落入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当南方人千方百计寻找那能打开金船的钥匙，等到良辰吉日要暗中开走那金船之时，被一位热爱济南的年轻人发现，就紧跟不舍。南方人盗船的法术被识破，便没能把金船开走。济南这座“水托城”才保存至今，并且益繁荣，兴旺发达。

另有人说，那保护金船的年轻人，是梦中被仙人告知，那南方人要将金船偷偷开走。他心中一急，醒来后见床前竖有一根烧火棍，拿起来就急忙去追赶那南方人。他随赶随用棍子捣地，突然捣出一个洞，随之就流出了清水。年轻人想，船中流满了水，船不就没法开走了吗！于是，他就连捣不停，也都流出了清水。随后，人们数了数年轻人所捣之洞，共计72个，这便成了济南的“七十二名泉”。

这传说，大概与济南泉水众多，又有大明湖和黄河、小清河，号称“北国江南”有关。人们不仅说济南是只金船，还说那船尾上的缆绳，就拴在济南城南那高插云端的礅山之上。20世纪30年代，老舍在济南教书，他腿不好，难得登山，还将礅山上那高大直立的石礅，误认为是一座塔哩。

这则优美的传说，不仅为国内人士所注目，早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的日本著名民俗学家直江广治教授，对此也很关注。他

在其专著《中国民俗文化》一书中，就曾收入这一传说。

（任远）

济南最早的诗篇《大东》

诗城济南最早的诗人是谁呢？我们说是一位失逸名字的谭国大夫，他生活在距今3000年之前，是一位早于荷马的人物。他写的优秀诗篇，至今赫然存在，就是《诗经·小雅》中的《大东》一诗。

谭国，是殷商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它的遗址属于现在的济南市区，在东郊平陵城附近（参见前中央科学研究所：《城子崖》一书）。它在殷、周两朝交替之际，仍然保持下来，一直到公元前684年，才被刚即位不久的齐桓公吞并而划归齐国的版图（见《春秋》鲁庄公十年的记载）。这位谭国大夫是生在什么时期呢？最早注解《诗经》的是汉代儒者。汉儒分为两大派系，早期是今文家占上风，后期是古文家逐渐兴盛。今文家以为他是周厉王（约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在位）时期的人（据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古文家的《毛诗》则把《大东》编排在其所认为的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年在位）时期的诗篇之中，自然是把作者当作西周末期的人物，但是，汉儒的意见并不是很可靠的，我们根据《大东》原诗反映的内容，并联系历史背景来看，应该把作者的年代更往前推：我们以为《大东》一诗大约作于公元前1020~前1015年左右，

即周公旦营建洛邑不久之时。

公元前 1207 年这一年，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使用的周武王攻灭殷王室的年代界线。从这时起，周王朝正式成为华夏共主。周王室为了扩大、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兄弟子侄和结为婚姻关系的联盟部落领袖分派到全国各地，进行“封侯建国”。这是一种较原始的“殖民政策”，新封的诸侯率领着军队、部属，并裹挟着周王赐予的一些殷人旧属，开赴各地。然后在新封的疆土之上修筑城堡，建立宗庙和政权，作为一个个政治军事根据地来监视原来殷王所属的旧诸侯，镇压散居各地的尚未接受华夏文化的所谓夷狄戎蛮。这些诸侯国，在殷周构成的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祖国大地上星罗棋布，像众星捧月一样，拱围着周王政府。谭国在此时以及其后，逐渐被新封诸侯四面环绕：它的南面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治理的鲁国，北面是武王的另一兄弟召公的儿子统辖的燕国，东面是周室的联盟姻亲由吕尚（即太公望，通俗小说中的姜子牙）统治的齐国，西面是稍后封的武王兄弟之一的康叔管理的卫国等等。

武王统一华夏不久就死去，因儿子成王幼小，由其弟周公旦执政，为了争夺王室的最高统治权，各地诸侯中以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为首发动了武装叛乱。殷王室旧部也以纣王的儿子武庚为首趁机参加，想借以复国，据文献所载，原来殷朝的东方归属国如徐、熊、盈奄、薄姑等地区也纷纷响应。奄在今曲阜一带，居于谭国南方；薄姑在今博山一带，居于谭国的东方。因此，谭国极可能也参加了旧殷属国的叛乱行列，周公旦立即率大军东征，并且一直打到了薄姑地区。经过了三年的征讨战争，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终于平定了叛乱。周公鉴于王朝首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太靠西面了，不便于控制殷朝旧部东方，一面继续在东方分封诸侯，一面在今河南洛阳建立了新的统治中心：洛邑。让召公留驻镐京，管理周室旧辖地，称为“宗周”，周公则居住洛邑，

管理今陕西以东的广大地区，称为“成周”。当时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的，为了充分发挥战车的效能，也为了便于联系四方，周公很重视修筑道路，于是以洛邑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通路。这种道路，那时称为“周道”或“周行”。周道，是周政权专用的道路，为保证战车和辎车（载货车）的畅行无阻，要求修得既平坦又径直，而平民是不准使用的。

周王朝修筑周道，要使用大量的繁重劳役。修完了周道，各诸侯国还要负维修保养的责任。而这个周道，却又为周王更频繁的搜括准备了便利条件，战车过去之后，运载贡赋的辎车却开了来。王室又在经营洛邑，需要地方的人力支援，而新建侯国尚不具有支援的余力，于是负担就重重地落在包括谭国在内的归封国肩上，于是新兴的西方周贵族和殷属东方的侯国的矛盾，不能不尖锐剧烈地表现出来。东方诸国人民已疲惫穷困到极点，即使当地贵族成员也因所属人民的贫困而减少了收入，何况他们在西方贵族面前又感到矮人一等呢。于是，我们这位3000年前的诗人——谭大夫也不能不提出抗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抗议是代表全体居民呼声的。这样，他写下了一首感情充沛、形象动人、情文并茂的《大东》。为什么叫“大东”呢？当时人以洛邑为中心，称距离较近的东方为“小东”，最远的东方为“大东”，谭国当然是属于当时的大东地区。

这首诗，利用形象鲜明而又贴切的比喻，表现了对周王室贪婪掠夺东方各地人民的不满，手法是很巧妙的。诗人用满满的一碗饭来比喻东方的财富，用长柄羹匙来形容漫长的周道，暗示周王室及其新贵们正是利用周道当做长柄勺子来刮取人民的财富的。然后又用对比的手法暴露了“东人”和“西人”的不平等。随着情绪的激昂，诗人把人间的现实转移在天空之上，首先他利用银河附近的星座，恰切地、辛辣地进行了比喻和讽刺：织女星不织布，牵牛星不拉车。其次，他巧妙地把星空的黄道比喻为周道，

又从而利用黄道列宿（即二十八宿）和在黄道经过的行星来加以比拟和暗示：金星（长庚和启明）每天早晚都在黄道两端虎视眈眈地监视，而那天网星（毕宿）就横列在黄道上在网罗物资，簸箕星（箕宿）不替人民簸扬，却张嘴吸舌地贪婪地吃喝，勺子星（斗宿）不替人民舀酒浆，却把长柄朝向西方，被周王操纵着来挖取贡赋。诗人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暗示着：你周天子不是自诩“受命于天”吗？你们的确是天上的星宿，不过是些有名无实的不劳而获的牛郎织女，是捕捉人民的天网星，是吞吸搜刮民膏的簸箕星和勺子星，都是些对人民有害无益的家伙。

周公旦不愧是上古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本诗写出后，传到了朝廷中去，因而“赋敛重而谭告通”（王符：《潜夫论·班禄》）。周室当即采纳，并且将此诗留在朝廷，作为今后的诫鉴。这表现了新兴王朝的敢于正视现实的气魄，具有政治的远见和坚强的自信心。

从本诗描绘的情况来推测，本诗当是在秋收之后写作的。如“履霜”、“有冽酒泉”等都是深秋现象。特别是它表现的黄道上出现的星座更是明证。古人日测天象，通常以每日下午8时到10时作为观察时间。而金牛座的毕宿（天毕）和人马座的箕宿和斗宿同时在南天出现，根据星图正是公历10月15日前后的下午8时至10时。我们知道，10月中旬正是华北收获已毕，统治者开始赋敛的时候。这时节，也正是人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年劳动的成果被掠夺的时候。诗人在此时写出这一首诗，也必然与劳动人民愤懑的心情相一致。

3000年前的这首诗歌，写作水平如此之高，保存得这样完整，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除了文献记载标明是谭国的作品外（3000年以来没有异议），也许并不算是偶合，诗中也竟然出现了“酒泉”的描写。这应该是济南多泉的地理特色在作者笔下的不自觉的反映。济南的最早的诗篇也反映了泉城的自然特点。

这真是：“泉城自古是诗城”啊！

（徐北文）

无影山西汉杂技陶俑 与济南悠久的杂技艺术

近年来，济南杂技艺术健儿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屡获大奖，他们在精湛优美的杂技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民族风格和特色，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济南杂技艺术的悠久历史。

我国杂技艺术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飞剑、弄丸、扶卢（即爬竿）等富有特色的节目。西汉时期，乐舞杂技艺术日益丰富精进，蔚为大观。史载：汉武帝时曾在长安两次举行乐舞杂技表演盛会，当时称为“角抵戏”或“百戏”。两汉时代，杂技艺术风靡城乡，久盛不衰，这在汉代文献和造型艺术中都有十分丰富的反映。其中年代久远、内容丰富、场面完整的杂技艺术立体形象，首推济南无影山出土的一盘西汉初期的乐舞杂技陶俑，它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观赏杂技表演的生动场景，是济南杂技艺术悠久历史的物证。

杂技陶俑是1969年4月在济南无影山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1971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开展出，引起了中外观众瞩目。此后又先后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展出，历时10年，载誉而

归。

陶俑共21人,乐工、演技人和观赏者各为7人,他们固定于一个长方形陶盘上,表演者居中,后侧一排为乐工,观赏者分列左右侧,整个场面可表示如下:

吹笙	吹笙	鼓瑟	击鼓	敲钟	击磬
观赏人	舞者				击鼓人
观赏人	舞者	倒翻	柔术	樽	观赏人
观赏人		倒立	倒立	樽	观赏人
观赏人	演扶人				观赏人

陶盘右侧观赏者的面前,置有两个酒樽,表示是在宴会上观赏乐舞杂技演出。《汉乐府·相和歌辞》:“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尊酒,坐使邯郸倡。”可与无影山杂技俑场面相参证。

陶盘上后侧的一排乐工,展示了当时乐队组合及其演奏情景。乐器有钟、鼓、磬、瑟、笙等中国传统的古乐。乐队右首树立一面瓮形大鼓,即建鼓,乐工1人正举槌演奏。建鼓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中的主导乐器。依次是击磬和击钟,钟和磬是悬于架上的打击乐器,磬架出土后已经残失。再次是击小鼓,鼓瑟及吹笙者。

钟鼓齐鸣、笙瑟悠扬,伴随着乐曲的节奏,两个身着花衣的女子,挥动长袖,翩翩起舞。舞俑右侧,4个青年表演者作精彩的杂技表演,他们头戴尖顶小帽,身穿紧身短衣,腰束白带,神采飞扬。前面两人,双手着地,举足倒立,“拿大顶”;后边两人,一人仰身后翻,作翻筋斗,另一人作柔术表演,全身下伏,昂首,两腿由身后前屈,双足自背后上举置于两肩之上,双手握住足胫,意态自若。我国杂技艺术素以顶、翻功夫见长,顶即倒立,翻即翻筋斗,无影山杂技陶俑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传统的顶、翻功夫,而其中的柔术表演,则尤为精彩,今天杂技艺术中常见的顶碗、叼花一类高难度的技巧动作,正是这种汉代柔术的进一步丰富和发

汉代杂技艺术丰富多彩，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曾有详细的记述。文中提到的杂技节目有走索、扛鼎、寻橦（顶竿、爬竿）、跳丸、飞剑、冲狭（钻圈）、悬空倒挂等惊险技巧，有吞刀吐火、画地成川、兴云作雾等神奇莫测的幻术；还有马术、戏车、鱼龙变化等多种有趣的项目，在济南发现的汉画石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节目的生动图景。

长清县孝堂山著名的汉石祠壁画中，也有戴竿、跳丸的演出形象。戴竿戏演出者4人：1人单手擎一竖竿，竿顶有一横竿，横竿上倒竖1人，下挂2人。下挂的2人中，1人倒挂，双足攀住横竿，另1人单手挂于竿上，动作惊险，正如晋人傅玄《正都赋》描写的：“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

飞剑、跳丸，亦称跳剑、弄丸，是汉杂技中常见的项目，表演者把几个球丸或几把利剑，接连抛入空中，一手抛，一手接，抛接的数目越多，难度越大。孝堂山汉壁画的跳丸，抛出的有7个球丸，济南全福庄发现的汉画石杂技图，空中抛接的有3把利剑、7个小丸，更令人叫绝。须知飞剑是一种极为惊险的节目，抛入空中的是利剑，只能以手接柄，而不握其刃。

古代文化遗物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它们所保存下的精湛优美的杂技艺术形象，只是其中的片断，不过，这些也足以说明济南杂技艺术的悠久传统。

（于中航）

三十年代文人汇聚济南

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京津和沪宁之间的最大城市，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很早很深的。所以，早在30年代，这里就文人汇聚，文学创作繁荣。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济南人民、特别是广大进步知识青年，冲破种种束缚和压力，掀起了读马列、读外国进步图书和鲁迅等人著作的热潮。在此影响下，首先在各学校中涌现了大批文学青年。他们中的杰出者，在中学读书时即初露头角，搞文学社团，发表各种作品。有的随后又去京沪等外地高校深造，毕业后回济南工作，并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进而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像王统照、李广田、季羨林、臧克家、陶钝、田仲济、严薇青等，就属这种情况。

原籍临近济南之邹平县的李广田，最初在济就读于山东第一师范，即热爱文学，创作新诗。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济南，在第一中学任教，接连出版《画廊集》《银狐集》等著名散文著作。“七七”事变后，他带领爱国学生离济，又先后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校长。不幸，“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而死。离济后，他曾多次撰文称济南为其日思夜想的故乡。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作家季羨林，于1930年在济南省立高中上学时，就在师生所编《趵突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现已年逾90高龄，不仅仍从事重要

学术研究，且不断有文学佳作问世。

30年代汇集济南者，还有不少外省文学名家。其中，有老舍、胡也频、卜之琳、赵太侔、董秋芳、李俊民、陈翔鹤、吴伯箫、董每戡等。在当时艰难复杂的斗争中，京沪等地部分文学名人，或为事业，或为谋生，或为躲避敌人，到济南的大中学校任教，在此留下深远的影响。如胡也频到济南高中教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热情宣传马列、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深深影响了广大文学青年，也使敌人十分惊觉，准备暗中逮捕。胡也频被迫离去时，同时走的还有济南高中进步教师楚图南。现为山东老革命作家的冯毅之，当时也随胡也频一道去上海，从事进步文学事业。再如著名老作家老舍，在齐鲁大学执教4年，接连完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和《牛天赐传》4部长篇小说，以及不少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论文，有些至今仍是很有影响的。

另外，在济南各学校还有一批批活跃的青年学生，随后都成为全国的学术骨干或文艺名家。如邓广铭、李长之、姚仲明、梁斌、丁毅、李淦、崔向东、项堃、金然、燕遇明、王希坚等，都是二三十年代济南各校的学生。

至于全国的著名作家，像郁达夫、丁玲、徐志摩、杨振声、艾芜、萧乾、谢冰莹、周作人等，或讲学，或采访，或游览，或避难，也都曾前来济南，写过有关这里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成为流传遐迩的文学名篇。

（任远）

老舍笔下的济南

在近百年的文学作品中，讲到对济南的描写，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刘鹗的《老残游记》。其实，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在这方面的造诣和贡献，并不在刘鹗之下，只是老舍多方面的写作成就，对此有所淡化。

1930年7月，老舍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他来济不满3个月，就自当年9月至第二年6月，以《一些印象》为总题，在《齐大月刊》接连发表7篇写济南的散文。1931年夏，完成了以济南“五三”惨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32年6至12月，又在《华年》月刊连发6篇《济南通讯》，也都是精美散文。其中，包括《趵突泉的欣赏》等名篇。由此不难想像，泉城济南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人情，激起了老舍创作上的多大热情与冲动。

在老舍笔下，“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这里一年四季，除了春短，短到“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之外，在老舍眼里，济南可说一年到头都是美的，而这里的秋和冬更加动人。他说：“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儿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金黄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它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呀！”老舍对绿绘形绘色的描写，完全可以同朱自清所写的梅雨

潭的《绿》相媲美。

秋天，“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春天的赐给了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接着，老舍用北京的大风，伦敦的雾，热带的毒太阳为反衬，说：“济南真得算个宝地。”“济南的人们在冬天里面含笑。”冬天，“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白而轻软”，“使你不由得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连城市四周的小山上，落下一层白雪，都显得“太秀气了”。

当然，老舍是说真话的。在济南4年，他每年都利用暑期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偏偏“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当时，他既无电扇、空调、电冰箱和别墅可供享用，又舍不得时间休息，只好将自己关在南新街54号那小平房内，挥汗如雨，苦苦笔耕，这就难免在谈到他写《猫城记》和《牛天赐传》时，讲他怎样受酷暑的折磨了。可是，这并非济南的夏天不美。他说：“大明湖夏日的莲花，城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齐大校园，就更“以夏天为最好”。“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动着的绿山峰，成为以绿为主色的一景。”“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膏菜出卖，在北方城市大概只有济南这么‘阔气’。”话语间流露着对济南深沉的爱。

作为一名忠于现实的作家，老舍笔下不只写了济南的风光之美，以及养鸟、种花、吃大葱、赶山会、上药集、赏名泉和看耍猴等纯朴的民风民俗，也以散文、杂文、诗歌等形式，写了旧济南的瘦马、破车、道路失修、战争伤痕。特别是政府的腐败卖国和部分人的麻木不仁，也都给予表现，充满忧国忧民之情。至于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篇《月牙儿》及不少短篇，更深入地写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坚决抗争。可惜，重点写济南的长篇书稿《大明湖》，被焚于淞沪之战，读者没法看到了。

老舍热爱济南。1937年11月15日傍晚,他辞别泉城,奔赴国难,还一直想着这座心上之城,接连写了《三个月来的济南》《吊济南》等文章。他说:“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他进而回忆,在《大明湖》中写过:“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但国破城陷,“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所以,他沉痛地讲:“别矣济南!那是一场噩梦!”但他坚信:“再会面时,你将是清醒的合理的,以人民的力量筑城而归人民享用的。”可惜,老舍没来得及重游泉城,便被“四人帮”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令人欣慰的是:老舍多次想像、预言和企盼的一个“归人民享用的”济南,及其一些美好的景色,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任远)

解放前济南著名的学校和教育家

早在本世纪初,济南就已基本形成了从蒙养院到大学的较为完整的新的教育体系,同时建立了初、中、高多层次的职业学校。当时,济南教育的发展在全省属于前列,其中不少学校有一定特色,有的学校在全省乃至全国比较知名并有一定影响。

1901年创建的山东大学堂和1917年创办的齐鲁大学,是全国建校最早的一批公私立大学,而且延续时间长,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山东大学堂随时局的变化，1901年改建为山东高等学校，14年中，共培养毕业生770人，59人被选送去日本和欧美留学，辛亥革命时期山东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徐镜心即该校派赴日本的留学生。1914年再改为山东省立“六大专门”学校（法政、农业、工业、商业、矿业、医学），后又改为省立山东大学，1930年迁青岛后先后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设有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13个系，教授约200人，是省内惟一一所官办综合大学。

齐鲁大学是一所由英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1917年由设在潍县的广文书院和设在青州的神道学院迁来济南与共和医道学堂合并组建而成，先后又有南京的金陵大学医科、汉口的大同医院和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并入，规模日渐扩大，1931年建成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的综合大学，孔祥熙任名誉校长。齐鲁大学医学院曾以治学严谨、医道精湛名噪一时。医学院设有附属医院，医院的科室、医疗器械比较先进齐全。1926年医院在南圩门外还创设了麻疯疗养院，疗效显著。

济南的中小学教育也起步较早，发展较快，1901、1903年先后设东运中学堂和济南府官立中学堂。1904年创建了全省第一所省立小学堂——山东省师范学堂附设两等小学堂，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学增至22所（其中私立16所）小学增至124所。

1928年省教育厅提出改进小学教育，“创造山东小学教育之新纪元”，改建了5所省立实验小学，全部设在济南。通过省立实验小学“研究学理，实验新知，改良教学，增进效率，指导各县市小学教育之进行”。特别是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在校长陈剑恒的指导和主持下，进行了大量教育、教学的改革实验，通过本校出版的《一实月刊》（后改名《小学问题》）把实验情况和经验介绍出

去，对本市乃至全省小学教育、教学的改进和活跃教育思想，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公立中学当时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其中省立高中、省立一中、省立女中都是规模比较大、师资条件比较好、教学设备比较齐备，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校。1926年建校的省立高中不仅是省内第一所高级中学，也是解放前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省立一中建于1903年，起初学生全部官费，学制5年，1923年改为“三三制”。省立女中1922年建，也是省内第一所和唯一的一所公办女子中学，这在全国也为数不多。这几所省立中学的几位校长为彭百川、陈梓屏、赵太侔、孙炳炎、孙维岳、赵畸、苏维周等，都是在国内或国外大学获得学位、学有专长的学者。教师中更不乏知名人士，像胡也频、楚图南、李何林、季羨林、董每戡、王翔千、王祝晨、曲凤起、彭思三等都曾分别在以上各校任教。由于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不少学生接受了先进思想，多次在爱国反帝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批革命者脱颖而出，一中的邓恩铭、路友于、陶钝、王统照、李澄之、余修，省立高中的鲁宝琪、孙善帅、孙健萍、王石钧、林浩、林一山、陈耶、郭鲁、赵修德、狄非蓼、杨涤生、仲曦东等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私立中学也有比较知名的学校，像育英中学、正谊中学、齐光中学及黎明中学、懿范女中等。私立育英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早在1923年学校就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是当时山东中共和青年团的活动中心。教学成绩在30年代也在全省名列前茅。私立齐光中学在30年代编辑出版的《齐光校刊》半月刊，在1937年1月第6期上发表了李仲刚（该校英语教师）从《密勒氏评论报》上翻译过来的《斯诺访问记》中的一章《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在国统区内首次系统完整地介绍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

二三十年代，济南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发展很快，在数

量、规模和办学成绩方面都居全省首位。省立济南师范创建于1902年,至1937年共培养毕业生2755人,为济南教育做出重大贡献。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就是该校学生。省立乡师是1929年建校,该校有农业试验场及义务教育试验区,创办民众学校7所。当时,该校地下党活动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学生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19人,素有“红色乡师”之称。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成立于1915年,设高级土木、染织、机械、应用化学等科,学校附设染织厂、金工厂、化工厂,供学生实习。

济南的现代教育起始早,发展快,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有创见、有业绩的教育工作者,现只将在济教育界任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教育人士简略介绍于下:

宋还吾,1894年生于成武,北京大学毕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文学专修科主任教员,倡导新文化,宣传新思想,是山东文学革命和教育革新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后任《山东教育月刊》总编辑和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等职。1929年在省立二师任校长时,支持师生排演反封建礼教话剧《子见南子》,在全国引起轰动。1938年逝世。

鞠思敏,荣成人,1872年生,省优级师范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并在山左公学任教。民国成立后,曾任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主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13年参与创办正谊中学并被公推为校长。“五四”运动时与王祝晨、于明信等发起创办尚志学会并出版刊物《新文化介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9年任省立第一乡师校长。1937年济南沦陷后,日伪多次威胁利诱其出任“教育厅长”,均遭到鞠思敏的坚决拒绝,表现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民族气节。1944年病逝。

于明信,临淄人,1882年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后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1913年参与创办正谊中学并任义务教员,1916年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七七”事变后,曾在私立

正谊中学主持校务。1940年隐居北京西郊嵩祝寺，1947年病逝。

王士楷，1886年生于山东德县(今德州市)，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1916~1937年在济南师范任教20余年。1940年先后在济南中学、济南师范主持教务处工作。解放后任济南师范校长并被选为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9年病逝。

王翔千，1888年生于山东诸城，北京译学馆毕业。1911年任济南《大东日报》编辑，1920年起在育英中学任教，并先后在省立一中、省立女师等校兼课。曾和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劳动周刊》、《晨钟报》。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6年逝世。

王墨仙，1876年生于费县，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参加革命军，曾被孙中山召见。1934年创办尚志中学并任校长。解放后创办宏德、明湖小学，后任职省文史馆，同时应聘齐鲁大学文学系教授。王墨仙系我省著名书法家，著有《宜园笔记》、《书法指南》等。1960年病逝。

王祝晨，1882年生于齐河县，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1912年任省提学司科员，后任省《教育报》主编。1913年与鞠思敏等创办正谊中学并任义务教员，1919~1926年先后任省立一师教员、附小主任、一师校长，并主编《一师周刊》、《新文化介绍》等进步书刊。1927年参加北伐军作宣传工作。1928~1937年先后在济南一师、济南高中等校任历史教员。抗日战争期间在国立六中等校任职。济南解放初先后任正谊中学、一中校长。后调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1967年9月病逝。

彭畏三，1901年生于滕县，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省立一中、省立女中等校任教员和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被罗荣桓聘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特约高级参议，后任鲁南区参议会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师范学院院

长、名誉院长。1969年1月逝世。

綦际霖,1887年生于利津,省师范学堂理化科毕业。曾任正道中学、济南师范、立达中学教员、教务处主任。解放后,先后任济南三中校长、省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1969年病逝。

马克先,陕西扶风人,1895年生,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毕业。1922年来济南任正道中学教员,同年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省立一中教员,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后先后在国立六中、山东师范学院任教,曾出版《陷阱中的日本》、《中国文化史》,解放后任济南十七中学校长。1982年病逝。

陈剑桓,1903年生于济南,南京金陵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29~1937年任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校长期间,根据陈鹤琴“活教育”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对小学教育教学进行多方面改革实验,取得一定成果。抗战时期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解放初曾在山东师范学院任教,后任河北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1990年在天津病逝。

(高彬)

天主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在济南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济南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650年（清顺治七年），由北京教区派西班牙传教士嘉伯乐第一次来济南，在旧城内将军庙街创建了天主教堂，1660年又在城西北陈家楼建立了分堂。当时，由于传教士仗势欺民，激起百姓义愤，于1724年把将军庙街教堂焚烧、拆除，并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1721年，西班牙籍耶稣会神甫若望偕同依玛努尔来济南，在山东各地传教20多年。1723年耶稣会、方济格会的传教士相继来济南。

1837年罗马教皇正式派罗类思主教主管山东天主教务，1845年罗类思来济南。1846年道光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行善，与别项邪教迥然不同，业已准免查禁”，天主教势力遂趁机渗入内地进行合法活动，1861年初（咸丰十一年正月）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到济南，向山东巡抚提出，要在济南西门内高都司巷北首建立天主教堂，于1869年（同治八年）建成了高都司巷天主教堂，后被罗马教廷批准为济南教区总堂。

1839年10月3日，济南从北京教区划出为“山东代牧区”，当

时有教徒 3000 多人。1882 年“代牧区”改为“山东北部代牧区”，意大利的李明博、马天思，荷兰的申永福、德国的瑞明干先后任主教。1902~1907 年修建了洪家楼教堂，1911 年在平阴县胡庄修建了大教堂。1924 年，“山东代牧区”改为“济南府代牧区”，由德国瑞明干、海德凤、杨恩贲先后任主教。管辖范围包括“济南、章丘、历城、新泰、莱芜、禹城、陵县、齐河、德州、泰安、平阴、东平等堂区，有外国传教士 50 多人，中国籍神职班 28 人，修女 72 人，大小修院各 1 所，大小教堂 369 处。在此期间还兴办了黎明中学、淑德女中、懿范女中、若瑟医院、洪家楼仁慈堂等。到 1948 年，济南市有大小教堂 25 处，神甫、修女 41 名（其中外籍人 20 名），信徒 4500 多人。

解放后，仍由德籍杨恩贲任济南教区主教。1950 年底，济南成立了“天主教三自革新小组”，并发表了《反帝爱国三自革新宣言》，领导全市爱国天主教徒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揭发批判了杨恩贲的反动言行。当年 7 月 13 日，杨恩贲被依法逮捕，1952 年 3 月 8 日病死在若瑟医院。

1957 年，济南市建立了天主教反帝爱国委员会。1958 年 6 月 1 日董文龙任济南教区主教，1963 年 6 月，宗怀德出任济南教区主教至今。济南地区现有神甫、主教、修女 18 人；信教群众 6300 多人；开放教堂 26 处，简易活动点 2 处。

二

基督教传入济南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1867 年，英格兰圣经会代理人韦廉臣以售书为名来到济南，但未能立足。1873 年美国的长老会传教士文璧等人来济南，并在东关租地建堂。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之后，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传教。义和团运动（1900 年）以后，英国的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将其在青州

办的博古堂迁来济南，在南关兴建展室、广智院和教堂。基督教圣公会、卫理公会也相继来济南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创办了齐鲁大学、齐鲁中学、齐鲁医院、华美医院等。

当时，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教牧人员，对教会的人事、经济、管理等操纵在外国人之手甚以为耻。1913年，刘寿山等人将在青岛创办的自立教会迁至济南。接着有中国信徒自办的教会在济南先后兴起，建立了灵恩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等。

1948年，济南市有教派14个，信徒3600人，教堂20座，医院2处，大、中、小学10处。

济南解放后，外国传教士相继回国，由中国教牧人员担负起教会的一切事务，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195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革新运动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济南市各基督教会、团体工作人员及爱国的基督教信徒积极响应，支持吴耀宗等人倡导的“三自”爱国运动，并举行集会游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罪行。各教会登记帝国主义各宗派差会占用济南的房地产，拒绝继续接受帝国主义差会的津贴，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各教派组织以孙桂芳、李道辉为代表的联合会，为各教派的联合打下了基础。1953年，教会办的学校、医院等附属事业全都交国家经办。

1954年10月，济南市召开基督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以王神荫、孙桂芳、郭金南、王启明、王钧堂、郑子修为核心，成立济南市第一届“三自爱国委员会”。

“文革”期间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1978年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教牧人员中平反冤假错案。根据需要，教牧人员先后回到教会工作，并选派神学生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深造。

1982年，恢复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召开第四届代表

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王神荫为名誉主任，蔡重生为主任，项辛原、刘冠卿、许长泰、张蒙恩为副主任。同时，成立济南市基督教协会，王神荫为名誉会长，项辛原为会长，蔡重生、刘冠卿、赵延廷、佟至善为副会长。至1993年底，有基督教宗教职业者62人，信教群众25万余人，开放基督教堂7处，临时聚会活动点200多处。

三

伊斯兰教传入济南始于宋朝后期。元初，济南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大都在历山顶附近，并建有礼拜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山东东路都转运盐司使木八喇沙奉命撤寺，建盐运使司部，礼拜寺迁移到泺源门西，即今礼拜寺巷清真南大寺址，穆斯林逐渐移居西关地区。

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济南木铎为掌教，整顿教务。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陈礼为掌教52年。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陈礼之子陈玺任掌教。陈玺去世，其弟陈莹继任掌教。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陈恩任掌教，撰书《来复铭》，携碑立寺内。随后，当地穆斯林在济南府南关山水沟西侧，建清真寺。嘉靖二十四年，建南关清真寺。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永长街北首建成清真北大寺，掌教杨魁元。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建起和重修饮虎池清真寺、堤口清真寺、北大槐树清真寺、城顶清真寺。清朝时期，经堂教育得到发展，寺内建起阿文小学。

民国时期，济南穆斯林中的阿訇和有识之士兴办学校。爱国志士马云亭，在南关清真寺倡办第四清真小学，继之，西关地区先后出现第五小学、新育小学、康普小学、金氏小学、伊光小学等，均为新式小学，有的还设伊斯兰教义课。1925年，济南穆斯

林穆华亭、法静轩、马绂生与我国大阿訇马松亭在穆家车门清真寺倡建成达师范学校，既授阿文伊斯兰教义，又授师范学科。成达师范受到国内外穆斯林的关注。1928年，该校迁往北平。

30年代后，散居于城西、北的穆斯林为便于宗教活动，又建立了经七路纬一路清真寺（俗称灵官庙寺）、经二路纬十一路清真寺、经二路纬四路万紫巷清真寺，市区共有清真寺18座。济南女穆斯林先后在永长街、饮虎池街设立了“女稍玛”（阿语礼拜处），由懂教义的师娘主持教务，如领拜、诵《古兰经》、组织圣纪日（圣诞辰）和法图迈（穆圣之女）会，为纪念贤哲春季走“巴巴坟”等。女稍玛内还设阿文女校，由师娘教授女童学经文。

1919年“五四”运动时，济南穆斯林建立回教后授会，爱国志士马云亭、朱春焱、朱春祥被军阀马良枪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济南穆斯林纷纷送子弟到后方军训，参加抗战。1948年济南解放，山东省回民协会驻济办事处进城工作，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领导穆斯林发展生产，救济灾民，安排学校复课，设立华东军政大学回民进修班，积极组织支前工作。

1983年9月10日济南召开了市伊斯兰教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济南市伊斯兰教协会。济南现有伊斯兰宗教职业者113人，信仰伊斯兰教者8.1万人，开放清真寺49处。

（秦绪伦 许万荣）

五音戏与鲜樱桃

五音戏形成并流行于济南市的历城、章丘一带，其著名旦角演员邓洪山（艺名鲜樱桃）就是原历城县坝子村人。

它的前身是民间演唱形式“西路肘鼓子”，或称“秧歌腔”。早期演出时，演员肘间挎着一面鼓，边敲边唱，扭出舞姿，因而得名。它和流行在临淄、临朐一带的东路肘鼓子，惠民、济阳一带的拖腔（北路肘鼓子），以及柳琴戏、茂腔、柳腔等民间小戏剧种，同属肘鼓子声腔系统，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当年有位唱小生的演员，嗓音极佳，晚场演唱，顺风能远传几里路，群众称他为“铁笛”。后来流传的小生假嗓翻高的[立调]唱腔，就是他创造的，他的再传弟子邓九星与妻子邓张氏，继承其技艺，走乡串镇演出。他们的儿子就是著名的鲜樱桃。五音戏的成长与发展是和鲜樱桃分不开的。

1913年，以李德兴为首的戏班首先进入济南，在南岗子（新市场）演出。李的艺名原为“珍珠子”，后讹传为“跟柱子”。他的年龄比鲜樱桃大，善于扮演中青年妇女，经常演出《站花墙》，《安安送米》、《王二姐思夫》等剧。鲜樱桃于1917年到济南与他同台演出《王定保借当》、《李香莲卖画》等剧，珠联璧合，很受欢迎。当时还有高桂芳（艺名半碗蜜）以唱腔华丽取胜，王焕奎（艺名自来喜）以表演细腻见长，与跟柱子、鲜樱桃一起，被群众誉为肘鼓子戏的“四大名旦”。当时班社内人员极少，通称“五人班”。

1925年，山东督办张宗吕为母祝寿，在珍珠泉举办堂会戏。余叔岩、梅兰芳演出《游龙戏凤》，鲜樱桃同台演出《王小赶脚》，结识了梅兰芳。1934年底到1935年初，鲜樱桃率班赴北京，山齐如山介绍至四明露天剧场演出。梅兰芳赠以古装戏衣、宝剑，并资助银洋百元。归途，又在天津作短期演出。

1935年，经当时在齐鲁大学任教的马彦祥教授介绍，鲜樱桃和冯兰亭、李云祥、邓吉庆、邓吉祥等赴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安安送米》、《松林会》、《祝英台》、《王二姐思夫》、《王小赶脚》等。该公司赠以“五音泰斗”锦旗一面，从此，“五人班”定名为“五音戏”，名声远播各地。

在这个时期，五音戏班社在济南曾与东路梆子、莱芜梆子、化妆扬琴（吕剧前身）、河北梆子、京剧等剧种的艺人组成“五合班”或“五六合班”，通过同台演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均有提高。数十年来，鲜樱桃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妇女形象。不论是名门闺秀（如《彩楼记》中的刘瑞莲）、青年妇女（如《王小赶脚》中的二姑娘），还是农村老妪（如《探亲家》中的乡里妈妈），都演得惟妙惟肖，各具丰采。他唱腔委婉，表演细腻，跑驴、走雪、拐磨、采桑等动作，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美化，搬上舞台，既丰富了艺术内容，又保存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他还积极倡导试验增丝弦乐器伴奏，使五音戏音乐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1949年后，鲜樱桃等组成的五音剧社在博山登记落户，后来发展为淄博市五音剧团，但仍不断来济南演出和参加省级戏曲会演。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上海举行，鲜樱桃参加演出了他的拿手好戏《王小赶脚》等，获得演员一等奖。1965年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演出了《拐磨子》，获示范演出奖。1985年7月，有关部门举行“邓洪山舞台生活七十五周年座谈会”，表彰他在五音戏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发展五

音戏所作的贡献。他耄耋之年，仍不服老，以 84 岁高龄还在首都舞台上演出《王小赶脚》，被传为佳话。

五音戏近年来发展甚快，改编创作的《豆花飘香》、《石臼泉》、《换魂记》等剧，曾五次进京汇报演出，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赞赏。

（纪根垠）

大观园的变迁

大观园是济南的一个历史较久、闻名各地的综合性商场，也是一个文化娱乐场所。大观，即景物盛大壮观之意，《红楼梦》中曾有“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同赐)大观名”之句，商场命名，即取此意。

坐落在经四、经五路之间的大观园，东临纬二路，西接小纬二路，占地近 50 亩。建场前，这里是一个坑洼不平的棚户区。1930 年，北洋军阀靳云鹗占取了商埠大量土地，包括大观园这地方。1931 年初，张仪亭从靳云鹗手中租得这里的地皮使用权，想将此建成一个专供剥削阶级荒淫享乐之处。

1931 年 8 月 15 日，大观园对外开放。当时，建成的只有第一剧场(即大众剧场)、共和书厅、一个小花园，以及几家饭馆和部分摊点。随后，逐步发展。“七七”事变后，这里出现了表面“繁荣”，不仅有商业和娱乐场所，还有出售毒品的“洋行”、烟馆和搞坑骗

活动的赌场,以及宣扬封建迷信的“讲善堂”。商场内外,敌特和流氓横行,成为一罪恶渊源。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大观园得到逐步改造,成了商业繁荣和娱乐健康的著名场所。新时期以来,这里更有了极大变化与发展,大观电影院得到彻底改造和扩建。1987年10月,新建主营业楼落成。该楼地上五层、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14700平方米。楼内配有客货垂直升降电梯、自动扶梯、中央空调、电子广告屏幕和消防自动报警喷淋等现代化装置。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经营规范,使营业额大增。商场的天丰园包子、大观园烤鸭、米力乃快餐和各种火锅等新老名吃,以及灯光辉煌、灿若白昼的露天夜市,也吸引着众多顾客。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观园在人们面前呈现了更加宏伟、壮观和繁荣昌盛的动人前景。一座地上25层、高110.5米的主楼和8层的裙楼,以及地下3层的大停车场,又正日追夜赶,加紧施工。这项工程投资人民币两亿多元,建筑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比旧大观园的全部地面面积大1倍还多。

大观园的新建工程,从承包、设计到施工,分别由香港、上海和济南等著名企事业单位承担。这项新的建设工程完成后,不仅有豪华的大商场和餐厅、娱乐厅,还有现代化宾馆和写字间,供会议、办公和旅游等多项活动之用。

(任远)

遐迩闻名的济南菜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饮食文明在春秋战国时已达到高度水平。齐桓公的宠臣易牙“善和五味”被尊为厨师鼻祖；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为人耳熟能详。后经汉、唐、宋、元，下逮明、清，山东菜已成为北方菜的杰出代表，跻身我国四大菜系之列。山东菜由济南菜（西派）和胶东福山菜（东派）组成。两派各有特长。

济南是一古城，历为州、郡、府治和省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车马辐辏，过往行商，驻脚宴饮。这里更有达官显贵、富室巨贾云集，酒食征逐，殆无虚口。山珍海错，菹圃菜蔬，搜罗惟恐不尽，烹饪惟恐不精。佳饌珍馐，争相夸稀。

济南北临黄河，南依泰山，沃野广阔，有山林果树，荷塘水田。牛羊猪鸡鸭，禽畜兴旺；韭芹茄瓜菘，蔬园长青。且又有“大明湖之蒲菜、茭白、莲藕之美蔬”，“黄河之鲤，南阳之蟹都入食谱”（《济南府志·民俗》）入烹之料，多而且广。物产富饶与人文荟萃，为济南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历代文人对济南的饮饌多有赞誉，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所记之“碧筒饮”；明“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居大明湖白雪楼，其蔡姬所制的葱味包子“有葱味而不见葱”，为食客称道；清初“开国诗人”王渔洋的名诗中有《历下银丝鲈》：“金盘错落雪花飞，细缕银丝妙入微。欲析朝醒香满席，虞家鲭鲈尚方稀。”比王

稍晚,以“诗主性灵”说的袁枚,乃一典型美食家,他对济南菜中的“爆炒”激赏不已,特收在其《随园食单》中;晚清《浪迹丛谈》的作者梁章钜,系封疆大吏,宦辙南北,早年曾在大明湖的薛荔馆食过一味豆腐,垂老卧病江南,犹“每每触思此味,则馋涎辄不可耐”。旧籍所载,不胜枚举。

济南酒家饭庄林立,“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旧时凡著名酒家,必都有独家叫座的好菜。厨艺精湛,繁肴绮错,争奇斗胜。如泰丰楼的烤鸭、桂花鱼翅、布袋鸡,九华楼的九转大肠、手撕肘子,凤集楼的鲍鱼四丝、红烧干贝,吉元楼的糟煎鱼片、汤爆双脆,鸿元楼的全家福、扒海参,百花村的芙蓉鸡片、拔丝百果,汇泉楼的糖醋黄河鲤鱼、红烧面筋,燕喜堂的清汤燕菜、奶汤蒲菜,聚丰德的煎烹对虾、蟹黄鱼翅、油爆鱼芹……海中舀水,一掬多漏。仅据 80 年代初统计,传统的济南菜已达上千种。

一些酒家,或小楼数楹,宽敞雅致;或轩厅廊庑,临水傍街,酒座潇洒;或像府第,庭院深深,秀木葱茏,室内屏风绣帘,壁挂字画。华灯之下,红漆大圆桌,明光亮堂,虚篋匙碟,有银的、象牙的、细瓷的。在这里你可领略到济南饮食文化的风韵。

济南菜以清香、鲜嫩、味纯著称。本味突出,偏于清淡,尤为难能的是清而不失其腴。“一菜一味,百菜不重”。刀工精细。讲究火候。擅长爆、炒、炸、溜、烤、扒等。“味型”上分鲜咸、酱汁、葱椒、五香、酸甜、糟香、酸辣、清甜、蜜甜等。其油爆菜、芙蓉菜、扒菜、香糟菜、锅塌菜、火燎菜、烤鸭菜、拔丝菜、奶汤菜、清汤菜均为济南首创,独步四大菜系之中。

“唱戏的腔,厨子的汤”,汤为百鲜之源。济南的高汤,闻名遐迩。吊汤方法独特:汤用鸡、鸭、肘子熬制,待一定火候,分别将鸡腿肉泥(俗称“红哨”)和“鸡脯肉泥(“白哨”)徐徐倒入汤中,当锅微开,汤中细渣被肉泥吸收净尽,肉泥浮上,捞出,加葱椒南酒。汤竟清如秋水,鲜香醇酞,妙不可言。

糖醋黄河鲤鱼是济南菜中的奇葩。当年汇泉楼善作此味。这饭庄设在水池之上，池水澄泓，蓄有几十尾鲤鱼。食客可隔着玻璃窗看小伙计举网捞鱼。然后提鱼入室，金色的鱼尾还在摆甩，只听“乒”的一声，小伙计猛将鱼往楼板上—摔，看鱼挺了挺就不动了。此菜须先将鱼去脏刮鳞，两面划百叶花刀，撒盐少许，外裹淀粉面糊，滚油炸黄，置盘中，鱼尾高翘，呈跳跃之姿。速浇上一层琥珀般的糖醋汁，吱吱作响，单看那形色就令人馋涎欲滴。

糟煨茭白是济南的特色菜。茭白选短粗脆嫩者，切成斜刀片，稍焯，加高汤煮开，出锅前放入香糟汁、南酒、姜汁、盐，一沸即倒入海碗，茭白尽浮汤面。碗未登席，鼻观已开，一吸到口，芳溢齿颊。妙在高汤与香糟汁相融，别出一股清香，仿佛身在莲塘菰蒲间。论其格调，信是无上逸品。厚味之后，尝此一匙，亦觉口爽神怡。奶汤蒲菜做法与此相似，惟不加糟汁。

芙蓉鸡片是济南厨子的拿手杰作。先将鸡脯肉用刀背砸成细泥，放入大半碗蛋清中搅和均匀，入温油摊成片状，片要薄而不碎。起锅时加水笋、木耳，高汤勾芡入盘。鸡片洁白，木耳黝黑，汤汁晶莹，宛似初雪苍苔，淡雅之至。鸡片软滑，到口即融，堪称色、香、味三绝。

昔日在济的官僚、名士中不乏有“白吃成材”的老饕。卷袖入厨，嗟咄立办，颜色饶有画意，滋味别出酸咸。清同治时山东巡抚丁宝楨就创了一味“宫保鸡丁”，成为济南菜中的佼佼者。鸡丁外裹蛋清淀粉，在旺火足油中快速爆炒，兑入高汤南酒，颠翻炒勺，飞火熊熊。这样炒出的鸡丁果然细嫩异常，不同凡响。他后来入川为官，鸡丁中又加进干辣椒、花生米等，已变成川味，与源于济南的炒鸡丁迥异其趣了。

（张稚庐）

济南传统风味小吃

济南传统风味小吃种类繁多，风味独特。在80年代中期举办的济南首届风味小吃评审会上，就命名了87个品种，这并不包括近30年已湮没的那些小吃。若追忆昔年陈迹，更令人津津乐道：如凤集楼的罐儿蹄，又一新的盘丝饼，熊家扁食楼的水饺，盐道口的小烧饼，宴宾楼的炸三角，半里香的旋饼，振鲁阁的煎包，西城斋的焖饼，赵家干饭铺的把子肉，劝业场的五仁面茶，张贯勇的肘子米粉，洛口镇的枣杏儿，百花村的水晶包，文升园的油旋，三合馆的糝，雷家粥铺的甜沫……真是美不胜收。这些遐迩闻名的食摊饭店，往往是祖孙数代相传，俱有独得之秘，滋味迥异，至今留有口碑。

《济南府志》载：“惟济南水陆辐辏，商贾相通，倡优游食颇多”。济南作为省垣，又是通京大邑，故能集齐鲁小吃之精华，采南北小吃之风味，形成独有的特色。其品类繁多，不能殚述，仅举几种，以概其余：

油旋 过去从油旋铺门前走过，里面总传出小擀面杖敲打案板的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葱油香味扑鼻而来。油旋有圆的，也有椭圆的，色泽焦黄，中间有凹。其里层层叠叠，片片成“旋”，原料仅用章丘大葱、猪油、盐、面粉而已，先烙后烤，全凭手艺。当年文升园的主人常向食客自诩：“先生，您可试试，五个油旋攥起来，一拳猛击，如有一个不碎，压扁了，您不用付钱，白吃。”其香

酥可想。

小烧饼凡“老济南”都知道盐道口的小烧饼。“盐道口”就在城里运署街，这小铺叫福庆斋，怪了，其名反而不彰，人辄称“盐道口”。他家的小烧饼与众不同，大小仅如银圆一般，足有寸许厚。馅分豆沙、枣泥、椒盐、猪肉、霉干菜、白糖等，其霉干菜的甜中带咸，别具一格，可称隽品。

米粉 用小米粉压成，细如挂面。米粉铺门前都炉火融融，锅里煮着乳白的肘子汤，吃时先把虾皮、茺荽、紫菜、冬菜、酱油、姜汁放入碗内，然后抓一把米粉放在竹箊篱里，浸入沸锅中，略一晃动，烫透置碗内，再切上肘子片，浇上高汤上桌。米粉软润，汤鲜味浓。

枣忪晃 是济口镇的名吃。乃以枣泥为馅，杯口大，寸许厚的小饼，它是放在鹅卵石上文火焙成的。鹅卵石参差不平，焙出的饼凸凹焦黄，然而又不硬。枣泥细腻甜滑，经久而味不变。冬晚雪夜，寒风吹窗，拥炉啜茗，以枣忪晃为夜宵，别有意趣。

绿豆糕 用调好的黄米粉（上、下两层）当中夹上六七成熟的上好的绿豆和大红枣在瓦盆里焖熟。质地结实，扣过来放在一木板上，罩上一块润湿的白布。随卖随切，撕一角鲜荷叶托给你。豆香枣甜，入口清爽。当年有称刘大个者，已五十开外，驼背，还留着小辮，每到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的绿豆糕最为妇孺所喜爱。

糝（方言读sā）这是一种粥，用鸡和大麦仁熬制，加党参、肉桂、葱、姜、盐等佐料。喝时碗里撕上鸡丝，撒上胡椒粉，浇上少许洛口醋。具有鲜、香、咸、辣、酸诸味。寒风凛冽的冬晨，喝上一碗热糝，过瘾透了。20世纪30年代芙蓉巷的三合馆、40年代小布政司街的沂州小馆，都是以卖糝出名。60年代中期汇泉饭店曾一度卖糝，终因制作复杂，效益太低，停止经营。

荷叶肉 清人厉鹗诗云“荷叶绕门香胜花”，意谓荷叶的清

香,胜过荷花的芬芳。大明湖和北园里荷叶田田,初夏,荷叶肉应市了。它是将肘肉加甜酱、酱油、南酒、姜汁养好,拌以炒黄的大米粉,用巴掌大的小荷叶将肉包好,上笼蒸熟。叶香浓郁,肉质软嫩。

砂锅地瓜 当柳梢上刚冒出些许鹅黄,天气乍暖还寒时候,砂锅地瓜上市了。地瓜经一冬储存,其淀粉已转化为糖分。砂锅地瓜专选一种紫皮长条地瓜来做。小贩挑副担子,一端是个被木炭煨着的砂锅,另一端小案上摆着碗匙。遇到顾客,小贩就用小铜铲把紫红油亮的地瓜起到碗里,划上两刀,再浇一勺红澄澄蜜般的浓汁。地瓜又甜又糯又软。真是妙品!

《西斋偶得》中谓世上饮食与音乐变化最快,这话不错,吃的东西随时随地变化得很多。上面寥寥的几种小吃,有的就早已歇绝,不过,世易时移,新的小吃又不断出现,更为人们所喜爱。“后人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是自然的道理。

(张稚庐)

曲山艺海话济南

曲艺,是济南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

原来济南并无曲艺,清同治十年(1871年)秋,有歌伎郭大妮来济南演唱“梨花大鼓”(即现代的“山东大鼓”),一举成功,极为轰动;数年后又有黄大妮来济演唱,却因腔调依旧,无有改革而

告失败。

清光绪年间，王小玉姊妹来济演出，她俩就是《老残游记》中所写的在明湖居说书的黑妞、白妞。她们开台便红，什么原因？是她们总结了郭、黄的经验与教训，做了大量的改革，内容新了，曲调新了，观众也就自然动心了。

自王小玉之后，济南这片土地就播下了曲艺的种子，相继出现了一批女演员，较著名的有“上半截”、“下半截”、“洋长果仁儿”，鼓界皇后鹿巧玲，谢、李、孙、赵四大玉等。一连数十年济南曲坛成了山东大鼓的天下，各个书场演唱的无不是山东大鼓。

20世纪20年代曲艺阵容开始变化，但更大的变化还得说在“七七”事变以后，时局动荡，促使曲艺艺术的异地交流，逐渐地进来些其他曲种。开始是京、津的相声、数来宝，陆续来了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及京韵、梅花、西河、乐亭等大鼓，还有评书、落子、渔鼓等等，都拥入了济南，芬葩多姿，异彩纷呈，大观园、新市场、西市场、劝业场，以及后来的人民商场书场林立，如晨光茶社、九如书场、文成书场、兴旺书场、立武书场、青莲阁、共和厅、小舞台等。东起老东门，西至十二马路，南起南门外，北至铁道北，都有书场和明地。演员促进书场的建立，书场吸引演员的汇集，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景象，很快济南便获得了“曲山艺海”的美誉。

要说发展，还得数济南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曲艺日益兴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可谓达到了全盛时期。

当时，济南市有国营、民营等6个专业曲艺团体。计有山东省曲艺团和济南市曲艺团两个国营团体，市曲艺团下辖四个曲艺队：历下曲艺队，天桥曲艺队，槐荫曲艺队和晨光相声队。共有专业演员300余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流动演员，而且各队都有正常演出的场地和园子。这时全市共有大小书场50余处，星罗棋布，遍及全市区。不但场多人众，演员阵容更为强大。在济南坐地演

出的有：评书名家傅太臣，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山东大鼓泰斗谢大玉，此三位号称济南曲艺界三老。还有四少：曾荣获全国曲艺界四面红旗之一的河南坠子乔派传人郭文秋，在全国号称高杨两派的杨派快书创始人杨立德，勇于改革创新相声演员孙少林，大书西河大鼓名家张立武。此外，还有南路琴书画眉派传人李若亮，茹派传人杨芳鸿，西河大鼓大书演员王大玉、李文成、李积玉、阎春生、马玉凤、周春泉、张立云等；相声演员高桂清、袁佩楼、赵文启、张春全、吴苹、孙少臣等；还有勇于改革创新的西河大鼓演员安合顺、琴书演员樊明万、邓立仁，后起之秀评书演员刘延广等，均为杰出演员。至于在济南短期或过路演出的名家更是多如繁星，如马三立、刘宝瑞、高元钧、乔清秀、骆玉笙、王佩臣、王长友、李寿增、郭全宝、王树田、刘广文、常宝堃、常宝华、常宝霆、白全福、赵振铎、李伯祥、苏文茂、马志存等，都在济献过艺。当时，济南的曲艺地位在北方与京、津并列，可谓盛极一时。

正在这欣欣向荣之际，十年浩劫开始了，曲艺界遭到严重摧残。整个队伍一概解散转业，致使曲艺荡然无存。粉碎“四人帮”后，才又逐渐恢复，将原济南市曲艺团开始恢复为队，后改建为团。如今他们不断创新，力图振兴，使曲艺艺术适应时代的要求，更加繁荣兴旺。

（刘 礼）

济南的几副名联

中国最早的春联，现一般公认是：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作于公元964年。但有人不以为然，断定还要早，仍在研讨之中。泉城的对联，也不会晚于此，当滥觞于唐宋，而盛于明清，特别是清，现悬挂、雕刻的对联，许多是清代名家的作品。

济南的对联有多少，也无以计其数，上下千余年，左右几百里，官府、民间、山泉、亭楼，时时都有，处处可见。据《山东名胜楹联》（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所记，济南名胜楹联就有179副。这些名联，或言情，或寓意，或写景，或记事，或褒或贬，或古或今，或摹一山一水之特色，或叙一人一事之典故，有的赞美了泉城的风光，有的歌颂了济南的名士，缤纷多彩，各呈千秋，现选有特色者，略陈一二。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此联为石刻，现嵌于济南大明湖小沧浪庭园西门内壁上。作者刘凤诰，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清乾隆进士，曾任山东提督学政，官至吏部侍郎。此联由铁保书。铁保，字冶亭，号梅庵，清嘉庆年间任山东巡抚，书法家。

此联文辞优美，对仗工整。济南南屏苍翠群山，北有明湖秀色。大明湖，绿柳绕堤，湖中荷花溢香。此联准确地把握住济南

景色的特点，高度概括而又生动传神地加以表现，真是绝妙好辞。据载：“清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山东提督学政刘凤诰为官期满，即将回京，山东巡抚铁保，为他在大明湖饯行。明湖夏夜，月朗风清，荷香柳翠，引出凤诰才思灵感，得此佳联，铁保即席挥毫，为泉城留下这一绝唱。

云雾润蒸华不注
波涛声震大明湖

此联悬挂于济南趵突泉公园泺源堂门柱。作者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著名书画家、诗人。此联由金棻书。金棻（1895~1975），又名金树棻，号默盒，回族，济南人，当代著名书法家。至元年间，赵孟頫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极为欣赏趵突泉的景色，写了一首七律《趵突泉》。此联即该诗的颈联，是咏趵突泉的名句。趵突泉，三窟并涌，雪浪翻滚，水气蒸腾，犹如云雾，润泽着华不注山（即北郊华山），使它更加苍翠秀丽；银涛怒喷，声如奔雷，震荡了大明湖，使它碧波激荡。此联以夸张的手法，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趵突泉壮美气势，可谓脍炙人口。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此联悬挂于大明湖畔的辛弃疾纪念馆门柱。是郭沫若咏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齐州历城（今济南）人。

此联气势磅礴，赞颂了辛弃疾词的创作风格和爱国抱负。系1959年济南市人民政府筹建辛弃疾纪念馆时，请郭沫若撰书的。因辛词的风格与豪放派的开创者苏东坡相近，故云“继东坡高唱”。“铁板铜琶”系两种乐器。“大江东去”，为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之首句，此借以表达辛词悲壮激越的特色。这一典故出自宋俞文豹的《吹剑续录》：“学士词颂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

东去”，后“铁板铜琶”渐成为苏东坡词豪放风格的代称。“美芹”，指辛弃疾忧国忧民，为抗击金兵，收复失地而上呈皇帝的奏折《美芹十论》，论中直陈心曲，痛表忠言，表达了壮志难酬的爱国情怀。“悲黍”，是借《诗经·黍离》之意，以表达辛弃疾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以及希望南宋君臣振作，不要使国家衰亡下去的心愿。辛弃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词人，也是一位有“将相之才”的祖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此联准确地概括了辛弃疾词的艺术风格和爱国思想。

暮鼓晨钟警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此联刻于千佛山兴国寺西门两侧。是一副佛教的劝世联，是规劝世人皈依向善，勿逐名利，迷途知返的。体现佛门出尘脱俗的思想，十分确切。

日明晶，安天下
月册 翯册定乾坤

此联位于历城区风景点“龙洞熏风”（东龙洞）洞口处（“文革”中被毁）。龙洞有一传说是大禹治水降孽龙之处。此联虽个别字读音还不尽同（“册”，一说即“吕”，盛也；一曰音 xuān，明也。“晶”，一说通“圆”；一曰音 yì），个别字用字也说法不一（“安”有说“通”；“定”有说“正”）。但其意是歌颂为民造福的英雄的，认识却大都一致。联中“册”，明，盛也；“晶”，用光亮之意；“晶”，通“圆”；“册”用“同”意；“翯”，通“辽”，月照远也；“册”，通“朗”。其意为：英雄像又圆又亮的太阳，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使天下生气盎然，人们得以乐业生存；英雄又像皎洁的明月，清辉照着五湖四海，使天下人能得到温馨幸福。此联采用叠架用字的艺术技巧，按相同字的多少依次排列，别具一格，不能不说是精巧的妙联。

济南的对联丰富多彩，是写不尽，说不完的，仅择其有特色

者，粗略介绍，管窥一斑。

（刘茂林）

济南商业老字号及其经营特色

济南是座古老的城市，据史书记载，在 1600 多年前的晋朝永嘉年间，济南旧城即早已形成，到了明、清，济南已是山东省的省会，工商业已相当繁盛发达了。以后到了清末、民初，黄河铁路大桥建成，胶济、津浦两铁路线相继通车，1905 年又自开了商埠，济南的工商业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山东甚至华北商业荟萃之地。

正因为济南是座古老的城市，所以几十年乃至百年以上的商业老字号在济南城厢鳞次栉比。这些商业老字号有的由于战乱和时代的变化今已不复存在，如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位于城顶街专门代各地农民出售干鲜果品的马兴盛山果老行；开设于辛亥革命时期，位于城西门外以制作五香烧牛肉闻名济南的清真恩发长牛肉铺；以及创办于本世纪初，位于火车站附近以制作虾油小菜驰名省内的兴顺福酱园等。更多的老字号是虽历经沧桑而至今犹存，如始建于 18 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年间，位于西门大街的降祥布店；创办于 19 世纪中叶，位于院西大街（1924 年又在经二路纬三路今址设立分店）的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光绪初年，位于旧城西门外江家池，以经营糖醋黄河鲤鱼、红烧面筋、活鱼三吃闻名省内外的汇泉楼饭庄；创办于清朝末年，位于院前大

街的宏济堂药店；以及开业于20世纪初的泰康食物公司、精益眼镜店、亨得利表店、铭新池澡塘等等。现在，这些至今犹存的老字号，又紧跟时代的步伐，发扬旧的传统，踏着新的节拍，在改革开放的大合唱中，为繁荣济南经济弹奏着新的旋律。

商场即战场。一家商店在商业之海的众多商号中要想生存并得到发展，必须有它的与众不同的经营谋略和战术，一些开业百年以上至今仍凛然屹立开放着老树新花的商业老号如瑞蚨祥等等，无不如此。他们的经营术对我们今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仍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将济南所有老字号的经营方法一一介绍，仅择其要者略述于后。

在经营方法上，济南的商业老字号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即：他们既具有共同的为顾客所欢迎的、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经营方法，也具有与其他商号所不同的、根据其商业性质而确定的经营特色。如礼貌待客是所有商业老字号共同遵守的信条，即所谓共性，其从业人员如有违反，轻则严厉批评，重则开除出店。以隆祥布店为例，他们对营业人员的服务态度要求十分严格，当顾客一进店门，营业员即迎上前去招呼，陪着顾客沿各柜台浏览，待顾客停下来，才请他坐下，敬茶递烟，并根据顾客身份，察言观色与其攀谈，使顾客感到亲切。随之再问顾客买什么，帮他挑选商品，给他当参谋，并趁机介绍本店商品货真价实，讲究信誉，购多者并可送货到家等等。在顾客挑选商品时，要做到百问不厌，百拿不厌，始终和颜悦色地对待，即使这次不买，也不能说讽刺话。据说有一次隆祥布店去了一位顾客，声言要买礼服，营业员遵命取出，可是这位顾客只摩挲了一阵，没有买便走了。营业员有些不耐烦，便嗫嚅着说：“哼，买得起吗，不过来开开眼界罢了！”声音虽不高，可这话却被那位耳聪的顾客听到了，他反转身来向营业员大兴问罪之师。掌柜一见，赶快走过去向这位顾客道歉，并立即将这位出言不逊的营业员开除出店。隆祥布店是这

样做的，其他一些老字号也大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经营方法。

这些商业老字号除了共同具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营方法外，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性质，他们还具有自己与别家商号不同的经营特色，如瑞蚨祥绸布店是一家创业百年以上、在全国有14个分店的商业老号，其主要经营特点为：

1.搜罗珍贵稀有货品独占市场。有些珍贵稀有商品，小店因资金少无力经营，大店因其占用大量资金不肯经营，瑞蚨祥则依靠自己的雄厚资金，百计搜罗，居奇牟利，如5000元（当时可购买2500袋面粉）一件的貂皮褂子、400元一件的海龙领子等，为瑞蚨祥一家所独有。这些商品一经售出，则获利甚丰。

2.主要商品直接从厂家定进货，一般不从批发商购买。这样购来的商品成本低，质量高，不但顾客乐于购买，且有高额利润，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

3.采用优质坯布、染料自染色布。20世纪30年代以前，机器染厂很少，各绸布店所经营的各种色布，多系自购自染。瑞蚨祥为了创自己的牌子，广开销路，多选用优质坯布、名牌染料精工自染，染好后加盖自己的印章。因其所售色布确实与众不同，故销路甚广，有些人甚至非瑞蚨祥的布不买。

4.一向标榜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瑞蚨祥从不像有些商号那样，动辄采取大减价、大甩卖、大折扣、大赠送的方式推销，而是以货真价实、言不二价取胜。

这是瑞蚨祥的经营特色。另如20世纪30年代开设于估衣市街的九鹤阿胶庄，则以宣传取得商战的胜利。阿胶在山东已有300年以上的制作历史，制胶厂家很多，要想打开销路独占鳌头，除提高质量外，还应采取其他经营方式。九鹤阿胶庄在山东众多制胶厂家中是后来者，它的创办人赵鹤，除对阿胶精心制作外，还特别注意当时常为其他厂商所忽视的宣传这一方式。他开创

伊始，首先绘制出以九只仙鹤为标志的商标，登报宣传达半年之久。又特制了九挂鹤形灯，悬于店前马路中央，每晚于华灯初上时，九只仙鹤腾空旋转飞舞，光彩夺目，十分壮观。他还请人特意拍制了东阿县的阿井、狮耳山、狼溪河的照片，印成传单装在阿胶盒内；并在上海、杭州、长沙、重庆等南方大城市，雇乐队沿街吹打宣传。正因为他不惜工本广泛宣传，所以九鹤阿胶庄驰名海内，甚至远销东南亚，获利颇丰。

济南的商业老字号大都是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的，我市的工商史料中多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崔力明）

济南市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济南市博物馆建于1958年12月，是山东省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素以藏品丰富、精品荟萃享誉省内外。所藏文物，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近现代，上下数千年，有罕见的考古发掘品，也有珍贵的传世文物，通过这个小窗口，展现了济南地域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在馆藏数万件藏品中，以历代书法绘画、济南地域出土文物精品以及陶瓷、青铜、碑刻等为馆藏特色。其中书画精品，如北宋郭熙派的山水图轴、元代著名画家盛懋《秋溪垂钓图》、“元季四大家”中倪瓒《墨竹坡石图》等，皆品艺精绝、笔致柔劲，堪称稀世

珍宝。明清以来名家的书画作品，更是争奇斗妍，流派纷呈。其中，王翬《月下吹箫图》、张路《桐荫望月图》、周臣《访友图》、林良《芦荡雁嬉图》，明代“浙派”吴伟和“吴门四家”中的文徵明、沈周、仇英的作品，“松江派”中董其昌、陈继儒的作品，以及清代“四王”、“四僧”、“新安派”、“扬州八家”的作品等，均为馆藏珍品。晚清至近代著名大师如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等名家力作，亦颇多珍藏，饮誉海内。

该馆所藏文物，各具特色，蔚为大观，每件文物都闪烁着璀璨绚丽的艺术之光，其中有些是稀世珍品。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回旋纹透雕象牙梳”，长16.4厘米，宽8厘米，是利用一段弧形象牙皮雕成的，上宽下窄，梳身有断续的一条平行线透雕成的回旋纹，内填两个“T”字纹，界框三面雕以条孔，上端界框外有三圆形并在边缘有四个豁口，下面有16个梳齿，不仅修长细密，而且均匀美观。据考证，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件象牙雕梳，是原始社会女性装饰用品的杰作和大汶口文化中的精品，代表了该文化的工艺水平。从60年代以来，这件象牙雕梳长期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了中外观众的瞩目。西周晚期的“齐叔姬大盂”，是济南市发现的一件重要的齐国铜器。铜盂内有22字铭文：“齐叔姬作孟庚宝盂，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受大福用”。据《春秋》载，叔姬是齐昭公夫人，鲁君之女。此器当作于昭公在位之时，是研究齐鲁两国政治、文化、婚姻等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1983年在拣选的先秦青铜器中发现“元年闰”铜矛，为三棱形，长11.4厘米、宽2厘米，骹部有穿，一侧刻有一行细小的铭文，其文曰：“元年闰再十二月丙口口”。经考证，此器记载的是战国时期魏国安釐王元年（公元前276年）闰月之事。据现在所知，先秦古器铭中有“闰”字出现的，还是仅见。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久负盛誉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1969年4月出土于济南市无影山。陶俑群捏塑并

固定在一长方形陶盘上，盘长67厘米、宽47.5厘米，盘上塑有演奏者、表演者和观赏者共21人。钟鼓齐鸣，笙瑟悠扬，伴随着乐曲的节奏，陶俑居中的7人正在表演着轻盈优美的柔术、杂技和长袖舞。陶俑群以洗练概括的手法，真实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杂技艺术水平，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乐舞杂技生动活泼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乐舞杂技立体艺术形象，与今天民族杂技艺术一脉相承，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与这一国宝级文物同墓出土的“彩绘载人载鼎陶鸟”和“负壶陶鸪”，则造型奇特，构思别致，展翅欲飞，古拙凝重，形象地表现了古代人民乘仙鸟凌空遨游和喻意长寿吉祥的奇妙想像，是国内迄今汉墓中首次发现的奇品，备受青睐，堪称国宝。在济南市郊出土的唐代“彩绘透雕仙人凤鸟车”，是一件用整块青石雕凿而成的石刻艺术珍品。车山一只双翅微展、栩栩如生的美丽凤鸟拉着，双足趾爪一前一后，一仙人端坐车上，凤鸟两侧雕有三个高髻耸起，长衣束带，婀娜起舞的仙女，形象地体现了唐诗中“九色云中紫凤车，寻仙来到洞仙家”的意境。

在馆藏其他文物珍品中，如青铜器中的商代“亚丑鬲”、“有盞族徽嵌金戈”，春秋“鲁伯大父簋”；陶瓷器中的龙山文化“黑陶杯”，唐代“铜官窑犀牛瓷枕”、“龟形箕砚”，宋代“白釉剔地刻花瓷枕”，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磁州窑婴儿牡丹罐”，明代宣德“青花束莲纹大盘”，清代“粉青釉白花碗”；玉器中的龙山文化“彩石穿孔斧”，清代“于阗采玉图玉山子”、“龙凤雷纹黄玉瓶”等，已被收入《中国文物精华辞典》或《中国美术全集》等书，公诸于世。馆藏一些珍品，还先后到日本、德国、意大利、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展出，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何洪源）

平阴民间舞蹈“笳鼓通”

民间舞蹈“笳鼓通”，亦称“打长板”，流传于平阴县境，该县宋柳沟一带尤为风行。它节奏强烈，动作诙谐，表演有风趣。每当农闲季节，不论大人孩子一听到“加古、加古、加古咚，加古、加古、加古咚”的锣鼓声，便纷纷聚而起舞。三人一组，越跳人越多，越跳越热烈。

“笳鼓通”一般认为源于“祈雨”，相传明代某年，平阴大旱，连月不雨，禾苗枯焦，这时有一位县官决心为民“祈雨”，为表诚心他采用了南宋时所用的一种刑罚，站在热整子上祈拜苍天，双脚烙得疼痛难忍，就不住的蹦跳，但神色自若，并不断和身边的两个随从说笑逗趣，后终感动上天，普降喜雨。从此每逢天旱群众便聚集起来，模仿县官的姿态、动作祈雨。据“笳鼓通”老艺人康永章回忆说：“当年祈雨时，天一蒙蒙亮，群众聚集庄头，队前吹起羊角号，敲打锣鼓，走在队伍前面，接着有十几人头戴柳条帽圈，手持长条彩旗成双排行进。紧跟二人扮成开路鬼神，身背铜牌，手扶斜挂的青红棍，后面是大红竿支轿，抬着‘孙大圣’（泥塑），轿前有笳鼓通舞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边行进、边表演。轿后有銮驾队伴随。”从所述迹象分析，此舞由原始图腾信仰和迷信鬼神的思想发展而来，有巫师以歌舞祈神的特点。

后来，“笳鼓通”除祈雨外，群众作为春节娱乐的形式以自娱。

“笳鼓通”的表演以三人为一组，其中“官”一人，小花脸扮相，十字披铃，跳时铃随锣鼓丁当作响，右手持扇，左手持巾。“随从”二人，红坎肩，戴柳条帽圈，双手持夹板（似抽纱灯用的竹片两根），夹板上系若干铜铃，随锣鼓节奏相击，既是道具，又是独具特色的伴奏乐器。整个表演以锣鼓为伴奏，舞蹈动作轻快，情绪热烈，表演有风趣。情绪到高潮时，也即兴增加一些特技表演，如扮演县官的第二代传人杜衡茂，就曾“飞脚”上桌，在一平方的八仙桌上表演各种特技，两个“随从”在桌下与其呼应，情绪奔放，围观者无不喝彩，掌声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它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了较大的发展。如第四代传人宋义金（生于1955年），其动作敏捷，节奏极快，特别在“擗胡”动作上有“耸肩擗胡”、“甩扇擗胡”、“背手擗胡”、“跨腿擗胡”等有所发展，更加突出了诙谐、风趣的特点，每逢元宵佳节，组队表演，成为表达群众丰收之后喜悦心情的广场民间舞蹈。

（孙丽 木隆）

商河鼓子秧歌

鼓子秧歌最初发源于商河，流行于商河、惠民、临邑等地，源远流长，相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商河全县22个乡镇、1098个自然村中，就有700余支秧歌队。每年的元宵佳

节，是鼓子秧歌演出活动的高潮时日，无论是县城或者乡村，秧歌队川流不息，人们从早到晚沉浸在这振奋人心的锣鼓声里，陶醉在这古老艺术的精彩表演之中。鼓子秧歌这带有自娱性质的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当中，成为当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其久传不衰、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鼓子秧歌的起源，众说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北宋时期，有一年商河境内的河堤几次决口，良田被毁，蝗虫成灾，赤地百里，饿殍遍地。大水退后，幸存者辛勤耕作，播麦布谷，重建家园。次年，五谷丰登，粮食满囤，于是百姓们欢欣鼓舞，情不自禁地拿起面箩、面杖、雨伞等生活用具欢跳起来，呈现出一派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年复一年，每到秋收以后或逢年过节，人们就欢聚在一起，手舞足蹈一番。这样，一种群众性的自娱自乐为目的的民间舞蹈便形成了，并且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据民国二十五年《重修商河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里人行户扮渔樵耕读诸戏，结彩为春楼。”元宵张灯火、放花炮，酒宴乐歌竞为欢会，凡三夜”。这种于元宵节连续演三夜，走街串村竞相献技的狂欢大会，到了清末民初，盛况更为壮观。现在古历的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三天，是鼓子秧歌活动的高潮期，无论男女老少、长辈后生、大闺女小媳妇都涌上街头，尽情欢舞。

鼓子秧歌的伴奏是以牛皮大鼓为主体的打击乐，配以大锣、小锣、铙、钹等，鼓手用鼓点的疏密和变奏来指挥演出场子的阵式变化。舞蹈演员的扮相，大致分伞、鼓、棒、花、丑五种角色。由于“秧歌”缺乏规范化等种种原因，各个秧歌队的演出风格也不尽相同，有的队就没有棒，或者没有花，但总的风格是统一的。

伞，又分为头伞和花伞。头伞是指挥和领舞的，多由村中有名望的长者担任，扮为英雄壮士，头扎黄巾，身穿黄马褂，口挂长髯，有的还扮成戏曲中的人物，如《打渔杀家》中的萧恩等，其动

作刚健奔放,苍劲干练。花伞多扮青年小生,扮相俊俏,舞姿潇洒飘逸。另外,有的队还有女伞。伞的拿法又有肩扛、手拿、腰插等不同方式,这又带来了伞的样式、运伞线路、挥舞动作、表演风格的千姿百态。

鼓子手,是舞蹈队伍中的主要演员,多扮青年武士,其动作粗犷强悍,孔武有力,突出表现出了山东大汉刚毅、雄健、豪侠的性格。有时几十面鼓子一起插响,声若滚滚春雷,势如暴风骤雨,一会儿像千军冲杀,一会儿又像万马奔腾,气势雄伟壮观。

棒,多由青年壮士扮演。棒长约1米,两端系以五色彩绸,演员两手各一根,敲出清脆的花点,特别悦耳,其扮相机灵活泼,动作洒脱利落。

花,多扮少女形象,头戴红花,身披彩裳,左手持巾,右手握扇,动作优美灵巧,泼辣大方。

丑,多扮为“洋赖子”、“丑老婆”、“赃官”、“花花公子”等形象,他们在秧歌队伍中随意穿插,打诨逗乐,丑态百出,滑稽诙谐地表演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欣赏秧歌的同时,又平添另一番乐趣。

鼓子秧歌是一种大型广场秧歌,以跑场子为主,但在街头行进途中,也有别具特色的表演。一般成三路纵队,伞头一声令下,全体演员一起动作,高低起伏,首尾呼应,群伞飞舞,鼓棒齐鸣,真是“宛如游龙,翩若惊鸿”,这是秧歌队显示实力、表露阵容、吸引观众、先声夺人的重要步骤。

鼓子秧歌所需人数众多,大的队多至300多人,小的队也不下于五六十人。在跑场子时,这些角色大致按伞、鼓子、棒、花、丑的顺序排列,演员的增减为偶数,一般两伞带八鼓、四棒、四花伞、八花,如需增加人数则倍数递加。场子要求外圆内方,队形的排列也要平衡对称。场子的跑法分为二队式、四队式,也就是说是以二纵队或四纵队交叉,穿插跑场子的。

在跑场子时,有的秧歌队还把高跷、舞狮、旱船、武术等形式掺杂到鼓子秧歌中来,一般穿插到队伍里表演,有时也作单独表演。

目前,从搜集到的场子图谱来看,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以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命名的,如“剪子股”“扁担钩”;二是以生产工具命名的,如“牛梢头”“老牛梢”;三是以建筑物或生命形态命名的,如“牌坊”“蝴蝶”;四是以历史故事命名的战斗兵阵图,如“力杀四门”“闯王进京”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兵阵图进入到鼓子秧歌中来,可能在其流传过程中和军事发生过密切联系。据考证,鼓子秧歌的鼓子和古代作战时击鼓呐喊的鼙鼓极为相似。确实,从高处俯瞰跑场子的兵阵图,再加上密如骤雨的鼓点,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古代行兵布阵、战斗冲杀的壮丽场面。

秧歌队在进村前,首先派两匹“探马”前去报信联络(现在多用自行车或摩托代替马匹),对方也要派出德高望重的长者前来迎接,互致问候,同道寒暄。如果村中另有秧歌队演出,就要先在村头稍候,待别队出村后再进村。如果留秧歌队在街上表演,主人便在当街安放一桌,上置烟酒糖茶,以示尊敬;秧歌队也示礼貌,一般不动用。也有只在当街放一长凳,燃放鞭炮相迎的。如果两个秧歌队在街中不期而遇,都要偃旗息鼓,互相让路,礼拜而过,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一直沿袭下来,成为我国劳动人民礼让美德的具体体现。

(陈学孟 傅军燕 李本辉)

后 记

泉城济南永远是美好的。因为它是我国的一座历史悠久、景色宜人的历史文化名城。

然而，许多人对济南的历史文化，并不都十分了解。随着对外开放，五洲四海的朋友接踵而至。对于进一步了解济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要求，来自四面八方。为贯彻谢玉堂市长在全市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拟定编辑出版这套《可爱的济南丛书》。可以说，这套丛书尤为求知者所乐闻，它的出版将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套丛书的编写者人都是政协委员中对济南历史文化比较熟悉，并有一定研究的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及文史工作者。所写文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生动。高凤胜、赵钟云同志负责丛书的统稿工作，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主席孙常印同志任丛书总主编，济南市政协副主席褚玉颜同志任丛书副总主编。由侯佐昌、王忠林、宫昶东、王善桐、李涛、刘泮文、卞升云同志任丛书各分册执行主编。

本丛书是由多人执笔而成，虽经统一编审和修改，仍存有一些构思和文笔上的差异，敬希读者谅解。书中外误之处，也请大家不吝教正。

全书审阅、修订、出版工作都得到黄河出版社领导和耿龙武、孙海燕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表示衷心感谢。

《可爱的济南丛书》编委会

2001年10月1日

《可爱的济南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孙淑义	谢玉堂		
主 任	孙常印			
副主任	任荷舫	张印峰	饶曼妮	姚兆迪
	汤家永	姚敦义	沈嘉琪	尚林杰
	吴泽浩	李长水	褚玉颜	孟宪杰
编 委	侯佐昌	王忠林	牟陆阳	宫昶东
	王善桐	李 涛	刘泮文	卞升云
	平晓峰	常书俭	孙庆军	王淑铭
	周荣鲁	孙培森	冯光文	王建国
	何 楠	吴文宁	王丁成	杨新培
	杨永诚	秦 心	张乃仁	

总 主 编	孙常印			
副总主编	褚玉颜			
执行主编	侯佐昌	王忠林	宫昶东	王善桐
	李 涛	刘泮文	卞升云	
总 编 审	高凤胜	赵钟云		
编 辑	高晓光	崔力明	许延廷	

揆往昔而察今日

——《可爱的济南丛书》总序

孙常印

在这新世纪的元初之年，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可爱的济南丛书》（第一辑）由黄河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是济南文化建设的又一项重要的新成果。

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以自然人文景观俱佳著称于世，是经国务院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全国十六个副省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济南是可爱的。我在济南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对济南很有感情，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要以某种方式把济南的诸多可爱之处充分地反映出来，《可爱的济南丛书》的出版实现了我的这一夙愿，这部书之所以命名为“可爱的济南丛书”，是受了方志敏烈士狱中遗著《可爱的中国》的启迪。方志敏同志在他的这部不朽之作中，以火一般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赞颂了我们伟大而又可爱的祖国。因此，在去年市政协全委会之后，当我倡议编纂这套介绍济南历史文化的丛书时，脑海里便迸发出了“可爱的济南”这个对济南充满赤诚之情的名字，从而拟订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宗旨：要全方位、多侧面地介绍济南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展示济南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同时又要及时、准确而深入地反映当代济南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新成就，展示其日新月异的新风貌，描

绘其宏伟的发展蓝图。这套丛书力求融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以期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更加了解济南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进一步激发其对家乡的热爱，对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中华文明的热爱，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这次先期出版的《可爱的济南丛书》（第一辑）共有五部著作，读者可以发现，这五本书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虽然内容各异、风格不一，但都严格遵循并充分体现了丛书的编辑宗旨。其中《济南历史大事记》，起自公元前2700年，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1948），将四千多年间济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系统地加以梳理著录，提纲挈领、简明深切，一卷在手，即可对济南的历史沿革了然于胸。《贞观名相房玄龄》（附《鲍叔牙传》），广征博引，精思细虑，严谨而恰当地运用史料，以睿敏的识见、生动的文笔再现了济南的两位乡贤的风采。《济南旧习俗》，对旧济南市民日常起居、年节贺仪、婚丧嫁娶等风情习俗，娓娓叙出，描摹如画，趣味盎然，不仅能使读者对济南民间文化的特色深入腠理地认识和理解，而且为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资料。《文苑高手颂济南》，精选了古今名人描写济南的名篇佳作，丽词华章，让山川增色，涵咏吟诵，令齿颊增香。《济南历史文化概观》则是采用分题专文介绍的形式，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济南的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乃至名吃佳肴等，资料翔实，文字生动，一卷在手，趣味盎然，可以使读者沉浸在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增加对济南的了解和热爱。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这些著述的笔者，大都是为济南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政协委员中的老学者、老教师、老作家、老干部，多数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们热爱济南的那种执著精神未有丝毫的消解。桑榆虽晚，余霞满天，济南人民会铭记他们为发展和繁荣济南的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的。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荣共荣，一枯共枯。没有经济的发展，则文化建设就失去了根基，而文化事业的滞后，也会使经济建设缺少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的经济要向高层次发展，文化因素更加不可忽略。一个城市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不仅在于具备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必须具备优良的人文环境和高度的文化品位。经济要振兴，文化也要振兴。而振兴齐鲁文化，振兴济南文化，离不开齐鲁和济南的文化传统。“凝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形势》），揆往昔而察今日，深谋远虑，我以为这是《可爱的济南丛书》编者的良苦用心和该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当前，为了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了保证济南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尤其需要以健康的、先进的、积极向上的文化精品来抵制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抵制落后的、邪僻的、消极颓废的文化垃圾对人们的污染和侵蚀。在这方面，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年来他们为了弘扬优秀文化，大力宣传济南，编辑出版了多种著作，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可爱的济南丛书》（第一辑）的问世，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的又一个丰硕的成果。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但是，从全面反映济南的可爱之处的意义上说，这几本书是远远不够的，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我殷切地期待着这套丛书的第二辑：《海外济南人》、《近现代济南科技人事记》、《曲山艺海话济南》、《咏济南名泉诗文选》、《济南的腾飞》等陆续推出！

2001年10月1日

（本序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主席）

序

任孚先

重视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在维护国家形象和地位、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综合国力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化似乎失去了它的尊严，在有些人的眼里，文化似乎成为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世间的点缀。但是，当一些有识之士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程，看看眼下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发展之路时，不得不吃惊地看到文化的失落将会带来的民族共尝的苦果，大声疾呼着保持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发展经济，是大的战略；发展文化，也是大的战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建在文化沙漠上。正是基于此，当我们看到高凤胜、周长风二位学弟主编的《济南历史文化概观》的时候，不能不敬佩编者和作者的远见卓识。我看到过30年代出版的《济南大观》，也看到过前几年出版的《济南大观》，都各具特色。而这部《济南历史文化概观》，似乎是总结了那两部书的优点，以分题的形式，更加全面地从纵的发展和横的切面介绍了古城济南的历史文化。全书一百多题共分“济南名士篇”、“名胜古迹篇”、“历史掌故篇”、“文化蕴藏篇”四大部分，分别对济南的历史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名人故事、名吃佳肴，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在作者中大都是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专家，还有

我们敬重的前辈学者教授严薇青、徐北文等。他们在济南的浓郁文化氛围中执教数十载，不仅熟谙济南文化之掌故，而且能真正体味其中的真谛。如徐北文先生的那篇《曹操、曹植与济南》，既写了曹氏父子的其人其文，兼及曹氏父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资料翔实，论证准确，且饶有趣味。严薇青先生的《刘鹗和他的〈老残游记〉》，字数虽不多，但言简意赅，是很深的学术造诣的一种展现。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小文章同样可以显示大手笔。

这部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视野和思路更加开阔。不仅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了精湛的论述，而且挖掘齐文化及其他学派的精髓，给人以启迪。对过去较少提到的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经师张尔岐等都有专文论述。甚至对篡汉的王莽，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剖析，对袁世凯与济南自开商埠的关系也加以记述和论析，不因人废事。对工商业的发展给予特别关注，对瑞蚨祥及其他老字号的记述，对商界巨子孟洛川等人的重视，说明编者和作者在以新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

《济南历史文化概观》融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一册在手，可以对名城济南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对激发济南人热爱济南、振兴济南，对于吸引埠外人士来济南揽胜、投资、兴办各种事业会有所裨益。我想，如果再有一个选题，深入研究济南文化发展战略，作为此著的姊妹篇，会对济南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有益助的吧！

（本序作者系著名学者、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